

李公訓之五集

第五卷

李大钊全集

第五卷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编注

最新注释本

人民出版社



在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的李大钊同志

目 录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	(1)
(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		
中国最近之政变——在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的报告	……	(7)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二日)		
中国内战 中共中央委员李秦华对《消息报》记者的谈话	……	(11)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附：与《莫斯科工人报》记者的谈话	……	(13)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在莫斯科大剧院“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大会上的演讲	…	(14)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赤都通讯	……	(16)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上海的童工问题	……	(21)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	……	(28)
(一九二四年九—十月)		
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	……	(33)
(一九二四年十月)		
中国的事变和本团的训练——在东方大学中共旅莫 支部大会上的报告	……	(36)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	… (38)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在北京纪念列宁大会上的开会词(摘要)	… (40)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	… (41)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	
在北京民党三团体招待会上的讲话(摘要)	… (43)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在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讲(摘要)	… (44)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	
挽孙中山联	… (45)
(一九二五年三月)	
为梁容若所藏《三民主义》一书的题词	… (46)
(一九二五年三月)	
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	… (47)
(一九二五年三月)	
主张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代表大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帅府圆会议上的发言(节录)	… (50)
(一九二五年四月上旬)	
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在河南开封第一师范的演讲	… (51)
(一九二五年八月)	
从印度航路发见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	… (58)
(一九二五年九月九日)	
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	… (71)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土地与农民	(74)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与北京市党部 举行的元旦升旗仪式上的演讲	(87)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新帝国主义战争的酝酿	(91)
(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	
在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讲	(93)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	(96)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在清华学校追悼孙中山会上的讲话	(103)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	
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	(104)
(一九二六年五月)	
北方区委委员们的报告	(114)
(一九二六年六月九日)	
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情报处工作人员的谈话	(120)
(不晚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绝密	
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	(123)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	(128)
(一九二六年八月八日)	
守常政治报告	(134)
(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	
南口陷落后的北方形势——九月一日北方区政治通讯	(137)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北方区对于三特别区及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	(141)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八日)	
听取陈乔年关于西北军政治工作考察报告后的意见	(145)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切实改进与做好西北军中的政治工作——致刘伯坚	(147)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	
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	(150)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守同志来信	(153)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国民二军中工作应注意之事——致魏野畴	(157)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白和对于陕西问题的意见	(160)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赤化观	(163)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	
国民政府与晋阎关系(之一)——白和通讯	(166)
(一九二七年一月)	
国民政府与晋阎关系(之二)——白和通讯	(168)
(一九二七年一月)	
附：其嘉致胡海、白和信	
奉系最近军事计划——白和报告	(171)
(一九二七年一月)	
致柏文蔚、王法勤、徐谦、顾孟余	(178)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之一)——关于晋阎之报告	(180)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之二)——关于斯云鹗之第一次 报告	(184)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之三)——关于斯云鹗之第二次 报告	(192)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之四)——关于杨宇霆的报告	(208)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之五)——关于北京外交使团 最近态度的报告	(215)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狱中自述	(226)
(一九二七年四月)	

诗 歌

筑声剑影楼剩稿·登楼杂感(戊申)(二首)	(233)
(一九〇八年)	
岁晚寄友(二首)	(235)
(一九〇九年冬)	
题蒋卫平遗像	(237)
(一九一〇年冬)	
筑声剑影楼剩稿·哭蒋卫平(辛亥)(二首)	(238)
(一九一一年)	
筑声剑影楼诗·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	(240)
(一九一三年八月)	
赠筱舫、寿山(二首)	(241)
(一九一三年秋)	

筑声剑影楼诗·咏玉泉	(242)
(一九一三年秋)	
筑声剑影楼诗·有感	(243)
(一九一三年秋)	
筑声剑影楼诗·吊圆明园故址(二首)	(244)
(一九一三年秋)	
乙卯残腊,由横滨搭法轮赴春申,在太平洋舟中作	(246)
(一九一六年一月)	
黄种歌	(247)
(一九一六年春)	
送幼衡	(248)
(一九一六年春)	
送相尤	(249)
(一九一六年春)	
寄霍倡白	(250)
(一九一六年五月)	
复辟变后寄惺亚	(251)
(一九一七年七月)	
山中即景(三首)	(252)
(一九一八年八月)	
悲犬	(254)
(一九一八年八月)	
岭上的羊	(255)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	
山峰	(256)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	
山中落雨	(257)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	
欢迎独秀出狱(三首)	(258)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赠吴弱男	(261)
(一九一九年秋)	
附：民间谣谚(五首)	(262)
(一九一八年十月三一五日、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 信

致郁宪章	(267)
(一九一三年秋)	
致某君书	(268)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间)	
致霍例白	(269)
(一九一六年五月)	
致霍例白	(270)
(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前)	
致李泰棻	(271)
(一九一七年八月上旬)	
致白坚武(摘要)	(273)
(一九一七年九月八日)	
致白坚武(摘要)	(274)
(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	
致《北京大学日刊》记者	(275)
(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	
致袁守和	(276)
(一九一八年十月)	

致袁守和	(277)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致李辛白	(278)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致李辛白	(279)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致李辛白	(280)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	
致李辛白	(281)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日)	
致李辛白	(282)
(一九一九年二月中旬)	
致北京大学学余俱乐部	(283)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致胡适	(284)
(一九一九年三月下旬)	
致蔡元培	(285)
(一九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致李辛白	(286)
(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至十五日)	
致吉野作造	(287)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	
致袁守和	(288)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致王若愚、曾慕韩	(289)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致会计课	(290)

(一九一九年九月)	
致周启明 (291)
(一九一九年秋)	
致袁守和 (293)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	
致宫崎龙介 (294)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致宫崎龙介 (295)
(一九二〇年十月六日)	
致宫崎龙介 (296)
(一九二〇年十月七日)	
致周起明 (297)
(一九二〇年十月)	
致注册部 (298)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致钱玄同 (299)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一日)	
致胡适 (300)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复胡适 (301)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致胡适 (302)
(一九二一年六月中旬)	
致齐槩斋 (303)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致周太玄 (304)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日)	

致蒋梦麟	(305)
(一九二一年十月)	
致周起明	(306)
(一九二一年十月)	
复注册部	(307)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日)	
致沈士远	(308)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七日)	
致校长办公室	(309)
(一九二二年三月一日)	
致孙伏庐	(310)
(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	
致胡适	(311)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致周起明	(312)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	
致锡五	(313)
(一九二三年一月)	
致胡适	(314)
(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	
致胡适	(315)
(一九二三年十月下旬)	
致张溥泉、汪精卫并附剑云函	(316)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日)	
致梁瑞麟、吴亚男夫妇	(317)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	
致共产国际东方部	(318)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致韦青云 (320)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九日)	
给某同志的信 (321)
(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	
给某同志的信 (322)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日)	
致加拉罕 (323)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	
致冯玉祥的密函 (324)
(一九二七年二月八日)	
致存哥 (325)
致二哥 (326)

联 合 署 名

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发起人启事 (329)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	
附：北京大学法文暑假班启事 (333)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八日)	
学余俱乐部征求会员启事 (334)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胡适、周作人、刘复、高一涵、陈大齐、李大钊、钱玄同、 唐伟启事 (336)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举行全校教职员公宴庆祝双十节启事 (337)
(一九一九年十月六日)	
为发起组织李超女士追悼大会启事 (338)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 (339)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发起组织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启事 (341)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北京大学教职员会起草委员会启事 (343)
(一九二〇年二月十日)	
北京大学教职员会筹备选举委员致黄黼馨等君函 (346)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介绍学生工作启事 (347)
(一九二〇年四月九日)	
图书委员会致校长之报告书(一) (348)
(一九二〇年五月七日)	
图书委员会致校长之报告书(二) —— 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	
图书部试行条例 (349)
(一九二〇年五月七日)	
修正教员待遇章程委员会报告 (352)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争自由的宣言 (353)
(一九二〇年八月一日)	
提倡临时国民大会启事 (356)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北京大学赈灾会启事 (359)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通告 (360)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 (362)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致北京大学教职员 (364)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八日)	
“俄国灾荒赈济会”启事 (365)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出席北京市教职员联席会议代表紧要通告 (367)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三日)	
我们的政治主张 (369)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出席八校联席会议代表启事 (374)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 (375)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	
谭陈纬君夫人行状 (381)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 (383)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致北京大学全校同人 (384)
(一九二二年十月七日)	
致孙中山的信 (385)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附：马林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越飞和达夫谦的信 (387)
致顾少川、王儒堂言宜即宣布恢复中俄国交书 (388)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	
致顾外长函 (390)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三日)	
北大教授致校长公函 (392)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五日)	
中俄交涉破裂后各团体态度	· · · · · (395)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致共产国际东方部穆欣的信	· · · · · (397)
(一九二四年六月五日)	
致共产国际东方部穆欣的信	· · · · · (399)
(一九二四年六月五日)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	· · · · · (400)
(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	
致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申请书	· · · · · (402)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七日)	
主张抵制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成立——李大钊、于树德在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帅府园会议上的发言(节录)	· · · · · (403)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	

译 著

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	· · · · · (407)
(一九一三年四月一日)	
精琦氏宪法论	· · · · · (410)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世界观	· · · · · (420)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哀音	· · · · · (422)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国家与个人	· · · · · (424)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附 录

守常交来的报告(之一)——全国学生运动状况	(429)
(一九二四年七月)	
守常交来的报告(之二)——全国国民运动状况	(437)
(一九二四年七月)	
守常交来的报告(之三)——全国劳动运动状况	(441)
(一九二四年七月)	
靳云鹗免职前后北方军事概况——六月十一日北京通信	(447)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一日)	
天津会议与时局的将来——六月十九日北京通信	(451)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九日)	
北方军事政治状况——十月一日北京通信	(458)
(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	
北方政治情形与天津会议——北京通信	(467)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注 释	(477)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¹

(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

同志们：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拟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从那时起，东方各国共产党便依照这一决议的原则进行了斗争。

中国人民一方面遭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国军阀的压迫。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权力决定了中国军阀的存在，因为后者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所以，中国的民族运动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首先，我们谈一谈外国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的活动，然后，再谈民族运动的发展情况。

近一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嚣张到极点。我来叙述几个最重要的事件。

一、张家口的卡门事件。美国商人卡门预先同美国驻张家口领事商妥，企图从该城私运价值六万美元的白银给中国投机商，按照军事当局的命令，要对他进行搜查。卡门抗拒搜查并开了枪。中国士兵则开枪还击，因而卡门受了致命伤。于是，美国大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照会。结果，北京政府不得不赔礼道歉，赔偿了五万美元，惩罚了几个官员。

二、汉口纺织工人案。在一家英国纺织厂中，因组织工会，有三百来名工人被解雇，三名工人代表被捕。被解雇的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被英国军队驱散，冲突进一步扩大，有许多工人受伤。接着，英国军舰也上场了，威胁要轰击城市。结果，三十三名纺织工人被捕，其中三名领导者被英国驻汉口领事判处监禁五个月，其他人监禁两个月。

三、法国金法郎事件。由于义和团起义，中国应付给法国的赔款相当于一亿五千四百七十万九千五百八十二海关两。因法国法郎贬值，法国政府要求中国用黄金，而不用纸币法郎交付欠款，这样便出了五千五百万海关两的差额。法国人已征得北京政府同意这样做，原来反对这样做的议会，因得到政府贿赂，现在也改变了立场。

四、旅顺口和大连。旅大的租借权，从沙皇俄国转给了日本。1923年已期满，但日本拒绝归还，因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有一条规定了重行租借。

五、临城案。此案最清楚地说明了帝国主义者的特性。去年，有一群土匪，为给北京政府制造外交上的麻烦，在临城袭击了列车，劫走了一百名中国人和二十名外国人。英、美、日、法、意等国大使立即向北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当时情况特别紧张，帝国主义列强企图乘机取得对中国铁路、航运和财政的控制权。外交团要求：1. 赔偿每个被劫持的外国人八千七百美元；2. 组织由外国军官指挥的护路队；3. 撤销山东督军、驻军司令、铁路警长等人的职务。这些要求激起了人民的抗议，但是总统曹锟为取得外国列强的承认，满足了这些要求。

六、棉花出口。外交团强迫中国政府撤销出口棉花的禁令。北京政府无视华商抗议，同意了这一要求。

七、烟草消费税。利用中国烟草在华制造香烟的英、美烟草公

司免交消费税，因而中国人民每年损失二亿美元。各省当局打算征收消费税，但北京政府因该公司抗议，禁止征收。

八、广州的关税。广州国民党政府，为使广州的关税收人不致落入北京政府的腰包，开始自行征税。为了对此事进行报复，英国派了二十艘军舰去广州，要求取消税收，但由于孙中山的态度坚决和人民的示威，这一要求未获满足。

九、列强的海上联合舰队。帝国主义列强已达成协议，建立由十一艘英舰、十艘日舰、八艘美舰、六艘法舰及两艘意舰组成的长江联合舰队。目前，列强仍企图迫使北京政府同意这一做法。

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事实。这一切都证明，帝国主义者始终力图利用微不足道的借口来扩大其势力及特权。北京政府完全被他们控制了。在承认苏联的问题上，帝国主义者也在千方百计地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尽管北京政府已同加拉汉同志签订了条约，帝国主义者们并未停止其挑拨离间的活动。

在帝国主义列强无耻行径不断出现的同时，以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为首的民族运动也在不断发展，我们的同志正在领导这一运动。起初，国民党人只力争借助武力扩大地盘，不懂得搞群众运动，改组以后，在我们的影响下，国民党开始接触群众，发表了宣言，号召推翻国内的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我们党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必须发动一个能联合所有群众活动的统一的政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所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我党党员和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其目的是为了改组它，改变它的纲领，并使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左翼决定根据我们的建议改组这个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的改组，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年一月在广州举行了国民党代表大会，有二百名代表参加，其中我党同志占百分之二十。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决议和纲领，是

由于我党党员和左翼的共同努力，才得以通过的。“左翼”同“右翼”进行了顽强斗争，使后者不致反对我们。我党的一位同志发表了声明²，阐明我们对真正的民族革命所抱的观点。孙中山也发言专门谈了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大会奠定了建立集中组织的基础。在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里，我党同志占八分之一，在候补委员中占十七分之七³。大会所通过的政治纲领，最重要的有下列几点。

对内政策方面：

1. 普遍选举制；
2. 集会、出版、言论和信仰自由；
3. 用外国列强交还租界地后的收入消除盗匪活动；
4. 实行工人立法和保护工人组织；
5. 改组农业体制，改善农村生活条件；
6. 交通运输国有化。

对外政策方面：

1. 取消同外国签定的一切关于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及外人在华政治权力的不平等条约；
2. 不承认不负责任的北京政府所欠的外债。

代表大会之后，民族运动进入新阶段。国民党员分赴各地。我党同志和国民党左翼到处都在积极工作，在南方是开展合法工作，在北方则进行秘密工作。富有的华侨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热情地加入了国民党，南方的工人也加入了国民党的行列。

五月一日汉口举行了纪念施洋同志的大会，他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期间被枪杀了。甘肃、四川、山东等省和天津市举行了游行。广州有一万多人参加游行，孙中山还发表了讲话。当北方政府在外交团的压力下拒绝同苏俄缔约时，国民党在

北京组织了游行，警察驱散了这次游行而且还宣布了戒严。这一切都证明国民党开始领导群众了。

但很快反动势力就抬头了。北方政府慑于国民党与日俱增的影响，开始对其采取镇压手段。五月间，汉口的两个秘密组织被破获，因此有五人被捕，其中两名是共产党员，他们后来被吴佩孚枪杀了。此后，北京很快地又有五人被捕，张国焘（我党北方工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便是其中之一，被捕者囚禁在军事监狱，但未向他们提出任何控告。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我们加入国民党能够加速民族革命运动的开展。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革命先锋队。不久前，国民党发表了反对反动派的宣言。我们的秘密工作在继续进行。

最后，我想指出，我们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在国民党内部，我们将其左翼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尽管反动势力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而遇到一些困难，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掌握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有相当的影响，但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大，它的战线很长，因为它同时领导着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我们一直根据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统一战线的决议进行工作。我们希望第五次代表大会特别关注中国问题，并给予中国党有关今后工作的指示。

署名：秦华（中国）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 668—672 页·苏联国家出版社

1925 年版

按《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3 月第 1 版)刊印

中国最近之政变¹

——在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二日)

(一) 关于帝国主义侵华的行径。

中国各个军阀后面都紧紧地依靠着帝国主义，而且不仅仅是只有一个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者方面，它只是根据自身的利益作它与中国军阀勾结的标准。吴佩孚所依靠的是美国，同时英、日也是与他有关系的，不过以美国帝国主义者为主要的。在去年，吴佩孚打四川时，曾托日轮运军火入川，最近又有向日借款的消息，这些勾当，明明表示他是以美国为主要靠山，而同时又与日本、英国有关系的。美国是在欧战后新起的在中国强有力的帝国主义者，自然与日本在中国的利益范围是冲突的。日本助段祺瑞，被美国帮助的吴佩孚打败，日本就掉方法[向]去助奉张，促成直、奉战争去扑灭美国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结果美国的吴佩孚又胜了。在去年，日本又经过地震的灾乱，于是在中国的侵略政策就形成和缓的保守的态度了，美国就成了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当中的主要分子，英、法、意、比等都正在争先恐后地竞争。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大略情形。

(二)直系军阀的历史。

直系军阀是北洋军阀的主要派系之一。经过直、皖战争² 和第一次直、奉战争³，直系先后打败皖系和奉系，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垄断了北京政权，可以说直系处于全盛时代。在直系之下又分几派，名义上是曹锟为领袖，其实吴佩孚在左右一切，萧耀南⁴、张复[福]来⁵等都是与吴佩孚直接有密切关系的。吴佩孚原是曹部下的一个小军官，他自来都是反国民党的。第一次在四川打革命军蔡松坡⁶，他攻下衡州，不接受段祺瑞的命令（进攻），并在酒后的话（中）表明他反抗段的命令的用意。过后，段果然不满意他反抗命令，于是吴佩孚就利用民众反对段“卖国”的口号去打段，结果打胜了，直、奉战争又取得胜利，接着打川攻湘，一直到现在，他公然成为直系中的主要力量了。

关于冯玉祥⁷。他是基督教徒，张绍曾⁸部下的军官。辛亥革命时，吴禄贞⁹、张绍曾都在北方有起革命的动机，因武昌较先爆发，他们就没有作革命的先导。此时袁世凯出山了，他看清张、吴等在滦州、天津等地于他不利，于是把吴暗杀了，把张赶走了（因张、吴是国民党）。这时冯玉祥也还是在奔走于张绍曾部下。当直、奉战争时，冯有功于吴，所以他得着河南督军的位子。因他不忠心替吴佩孚抓钱，于是河南的地盘又被张复[福]来占去了，把他赶到北京虚悬起来（给他陆军监察使与西北边防督办的虚衔），没有一个可靠的地位，同时王怀庆又嫉妒他。在这时候，王正廷替他在黎元洪那里讨着一个西北边防督办，王怀庆就跑到保定报告，说冯玉祥要反了，已经投降黎元洪了。于是曹、吴就有不满意于冯的表现，而冯又自告奋勇去赶黎出京。冯玉祥是半途投降直系的，他没有地盘，只想侵略蒙古，一面从内蒙（察哈尔三特别区）攻王怀庆，一面又好躲开将来的直、奉战争的责任。而那一面吴秀才早已

知道他的心病，始终不许他得地盘，把他放在北京虚悬起来，以备作先锋调用。

关于王怀庆。他很忠于曹、吴。他是个保皇党，他在滦州杀过吴禄贞部下的革命党。他打蒙古失败后，已经是沦没下去了的，过后徐世昌登台时，因气味相投，又把这个保皇党找出来，作北京卫戍司令。把徐世昌赶走时，他就投降了直系（将来直系打奉张，大致分两路进攻，以王怀庆、王承斌¹⁰两人走热河去，冯玉祥走山海关去）。

关于王承斌。他是个满人，本名承斌，后来才加上一个“王”字。他是奉天人，也是个秀才，不及吴的手段高，所以还在吴秀才之下找饭吃。吴佩孚令他打过奉天，使他与奉天人的感情完全破裂，而给他一个空虚的直督。

关于齐燮元¹¹。他是段的学生，李纯当江苏督军时他任师长。李纯是反对段的。后李暴死，吴佩孚说是齐主谋刺主，因此吴、齐不睦。齐曾想谋副座，于是吴防齐用诡计予[于]卢，结果齐不得势仍守江苏。何丰林¹²是卢的部下，何驻上海听浙卢的命令，而使上海实际属于浙江了。

卢永祥¹³属段系，与齐不和。上海警厅长徐国梁被刺，都是因他是齐部人，与卢、何不方便的原故。齐、卢之战早就要爆发的，江、浙此次决裂，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吴佩孚把川、湘弄好了，转过头来注目浙、江，最后才去对付奉天，再最后就去打广东。奉张见江、浙起事，而马上出兵¹⁴，也是意中事。暗中奉、浙或许一定有联络，云、贵也要注意江、浙的势力，所以，江、浙战争，不是一回简单的事，而是牵连全国的，牵动帝国主义者美、日的。

（三）重要时期党的任务。

这次战争的时间一定是较长的，军阀还要分化，帝国主义者更

要伸张他们的势力，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也必将更强烈。总之，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我们的责任是要拿出很正确的口号到民众中去宣传。宣传我党所主张的国民革命，号召民众，组织国民革命的实力。

署名：李大钊报告

李季达记录

1924年9月12日

中 国 内 战

——中共中央委员李秦华对
《消息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三日)⁽¹⁾

正在进行的中国内战是由国际帝国主义煽动和支持的。是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同日本帝国主义者支持的张作霖与段祺瑞正在华北和华中交战。

在华南掌权的是孙中山的革命政府。英国资本家和直系军阀支持反动的陈炯明将军反对孙中山。英国资本家还组织和支持人称“纸老虎”的法西斯队伍，其为首者是汇丰银行买办中国商人陈廉伯。

外国帝国主义想让中国大乱，扩大内战并动摇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有利于他们侵略和奴役中国。

应当说，孙中山在华南的政策迄今为止都是十分清楚和明确的：他本人没有真正的凭借。前不久他甚至一度寻求“纸老虎”队伍的支持，参加了他们的检阅并且赠旗。近来的事态彻底揭穿了外国资本的一切阴谋诡计，帮助孙中山本人在工农群众中找到真正的牢固的基础。

内战使劳苦大众生灵涂炭。如果南方政府不寻求工农的支持，敌人可能不费什么气力就把它推翻。

正在进行的内战使遭到洪水灾害和食不果腹的中国农民的境遇更加悲惨。时局使广大的中国劳苦大众看到，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实中国代理人——军阀乃是真正的敌人。

目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向工农群众说明内战的原因和意义。中国共产党在全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斗争的同时，还将组织群众进行阶级的和民族的斗争。

署名：李秦华

《消息报》1924年9月13日

李玉贞译

译者注

- (1) 此为发表日期。

附：

与《莫斯科工人报》记者的谈话¹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目前，在中国正进行着由帝国主义分子策划和支持的内战。在华北和华中，由英、美资本家支持的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的直系集团正在同由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张作霖和段祺瑞集团进行着角逐。

在孙中山革命政府控制的华南，英国资本家正在帮助反动将军陈炯明（同时他也得到直系军阀的支持）进行着反对孙中山的斗争。正是这个英国资本家还组织了并且正在支持着称之为“纸老虎”的法西斯部队，其头子是英属汇丰银行代理人中国商人陈廉伯²。

应当说孙中山在南方的政策至今仍是不明确不清楚的。他本人尚未找到自己真正的依靠力量。就在不久以前，他甚至打算在“纸老虎”的军队中寻求支持，他出席了他们的阅兵式，并且还向他们献了旗。最近的事件彻底揭穿了外国资本家的阴谋诡计，这也促使了孙中山本人去到工农群众当中寻找真正可靠的立足之地。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向工农大众解释清楚国内战争的起因和意义，竭尽全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进行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将把这些群众组织起来，以进行阶级和民族的决战。

署名：秦华（中国）

《莫斯科工人报》

1924年9月13日

在莫斯科大剧院“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大会上的演讲¹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中国，已经成了世界帝国主义用来表演的大舞台。中国人民在受着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中国农民丧失了土地和生产工具，他们已经沦为流氓无产阶级，目前的境况十分危机。有的农民进了中国的工厂，有的去当兵，现在就成了军阀们的工具，还有的跑到了国外，因为中国的工业还很不发达。

你们都知道，现在各种军人省长之间都在你争我夺，然而，这个斗争不只是军人省长之间的斗争，而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斗争。日本一直在帮助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英国和美国则支持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不过，尽管有这两个以及更多的军阀集团之间的斗争，在中国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解放运动还是在不断地增长和扩大。

但是这个运动的发展不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中的优秀分子。

中国问题并不单纯是民族问题，它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无法发展。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

你们，莫斯科的男女工人们，组织起了“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共产国际就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东方殖民地奴隶所进行的解放运动的核心。

在莫斯科，我们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正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愿你们积蓄力量援助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一定会争得自己的自由和独立。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署名：秦华

原载《远东问题》杂志（俄文）

1985年第1期

《党史研究资料》

1985年第6期

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¹

——赤都通讯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记者足下：

入俄以来，忽已数月，以道途修阻未尝通讯于足下，而国中朋辈亦多以未接音书为念者，兹特借与足下通问之便，一述我漫游中所得的印象，能假大报余白为之披露，获以间接告其近状于朋辈，幸何如之。

曩昔披读地理，一说到西伯利亚，辄联想起于遐荒万里绝无人烟的景象，以为其地必终岁封于冰雪，荒凉枯寂，无复生气，乃今一履其境，却有大不然者。自满洲里以迄莫斯科，森林矗立，高接云霄，火车行于长林丰树间，人眼均有郁苍伟大之感。景致之最佳处，为贝加尔湖畔山巅的白雪，平野的青松，与湖里的碧波相与掩映，间有红黄的野花点缀于青青无垠的草原，把春、夏、秋、冬四季的景物都平列于一时一处，真令悬想西伯利亚为黄沙白草终岁恒寒之域者，不能不讶为绝景也。

自满洲里来莫斯科，约经七昼夜可达。在此漫漫长途中，只有手---卷以为消遣，偶或探窗以观此幽深伟大绵延万里的长林，故亦不觉旅中的倦苦。抵莫京时，正值全世界五十多个民族的共产党代表集于此赤色的都城，参与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他们与弟相

值，辄询及中山先生的健康如何，广东革命政府的近情如何，颇有一种诚敬的钦感及浓厚的同情自然的流露出来。俄人卫林士基，现执笔于真理报，近著“孙逸仙及其主义”一书，曾以一册赠我，属为批评，我以不谙俄文，未能览读，故至今犹无以应。据留俄青年告我，当路透电告中山先生噩耗的谣言时，消息传来，俄都各大报自“真理报”以下，均著论哀悼，把中山先生的肖像刊于论首。这可以看出中国革命的老祖孙中山先生在世界上的位置了。

暑中无事，曾到莫京近郊的马拉霍英卡一游。此地从前为莫京贵族及资产阶级避暑的处所，故有多数别邸建立于丛深的松林间，今皆为政府所没收，多为工人及儿童避暑之用了。东方大学²于此处亦领有房屋数所，有学生百余人和儿童数十人来此避暑，中国留学生之在东大读书者亦与焉。我因中国朋友之介绍得在此小住数月，--观童子军及少年团的生活。其时正值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十周年纪念，我曾随同童子军及少年团到一农村看他们的宣传工作。当他们报告大战惨状的时候，环立而听的妇女有涔涔下泪者，盖有不堪回首之感矣！报告毕，有一双已逾中年的工人夫妇，抱出一个刚刚弥月的小孩，亲手授之于一少年共产党员，说他们愿将此子送给党中人“红十月”的队伍，稍长即入少年共产党的队伍。当日即为此事举行庆祝礼也。礼成，有童子军表演大战的故事，描写前次大战完全是因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而起的。演完，已夕阳西下，他们便整队出了农村，一幅华美的赤帜临风飘扬，引着 International 的歌声，他们归去了。苏联的少年组织分为三部：九岁以下者为“红十月”，以苏联的劳农国家诞生于十月革命故云，九岁至十五岁者为“先驱”，十五岁至二十三岁者为“少年共产党”。这一班小孩子，都是在革命的风土中开起来的鲜红的花，其精神气度完全与旧社会里产生的人划一新时代。他们的宣传力特别伟大，听说有许多资产阶级的儿童，看见他们的队伍，听见他们的歌声，

便想跑进队伍跟着他们去，他们的父母关不住了。这些小孩的小手，不但可以打破他们的旧家庭，实在可以打破全世界束缚人类的一切锁链。

九月初，我和一位同志陪同一位海员代表到列宁堡（旧名圣彼得堡）去参观，我们沾海员的光，住在一个“国际海员之家”里。这是一个海员俱乐部，其中设有图书馆及种种娱乐的设备，每日由下午五点到十一点开门，凡停泊列宁堡的船上的海员，都可到此读书玩赏。管图书馆者为一五十岁左右的女子，能操英语，曾到过中国上海等处。其中欧文书籍不少，日文书籍仅有一本，至中文书籍则绝无。据此女子云，两个月前，曾有中国海员二人到过此地，很希望我们送点中国书来。我们在此住了一周。兹将列宁堡所与我的印象略述一二。

列宁堡街路宽阔，建筑的规模宏大，不知道怎样，他可以使游人起一种历史的感情诗的兴味。最大的街为“十月街”，我甚爱此街的建筑。此地的人情生计，似均有超越莫斯科的点，往来街市的男男女女，大都衣履朴素而大方，不似莫斯科街上新经济政策³下的暴发户的女子千奇百怪的样子。以莫斯科与列宁堡相较，我爱列宁堡。

我们承“海员之家”的办事人介绍，我们到列宁堡的劳动宫和主席团的一位见面，具述前来参观之意。此君首先示我们以一通列宁堡职工苏维埃打给英国职工大会的电稿，大意系唤起英伦的职工起来反对马克丹诺政府干涉广东革命政府，电中并声明系代表列宁堡四十万工人的意思。某君告我们说，此电已用无线电打过去了。某君派人陪我们在劳动宫里略一游览，时正在修缮各建筑物，预备图书馆博物院等等设置，因时间已晚，未能观毕，即在宫中匆匆午餐毕，即由劳动宫备一汽车送我们往红三角橡皮制造工厂去参观。这工厂有八千工人，是列宁堡第一个大工厂。在厂中

略一参观，即参与他们的工人代表大会，为报告英、美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革命政府的近情，举座皆为愤慨，随即通过一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议决案。

列宁堡的近郊有一儿童村。此地原为皇家村，俄皇的夏宫在此，其附近皆为贵族的别邸故名。今皆没收为国有矣。此地有十七处儿童及少年的住所，我们为要参观儿童的生活，所以特往一游。我们只参观了一所，中有儿童六、七十人，由一位管理儿童的女子导领参观毕，伊殷殷的嘱我们努力于改造世界的运动，伊在那里为我们训育后备军，并告我们以赴皇家花园的去路。我们便遵路往花园去。在花园中遇见赤军兵士三人，很恳切的询问中国革命的状况，并云“去年此际我们望眼欲穿的盼望德国的革命，惜竟未实现，今又盼望中国的革命了。中国何时为革命而需要吾人者，吾人当立往，吾人执戈待命也久矣”。我们握手谢谢他们革命的同情而去。

我们在列宁堡的时候正值少年国际的纪念日。是日有十数万的工人并少年男女，整队作游街的示威运动，冬宫前有一高台，示威行列都经行其下。台上每遇一队经行其下，即高呼“世界少年革命万岁！”等口号，该队亦高呼万岁以应之。我们因为去参观海口米冬宫稍晚，已经行过半矣，至则多人拥我等到台上的中央，群众便狂呼“中国革命万岁！”

是晚复在五一公园开一盛大的晚会，俄、德的少年演说中，均道及同情于中国革命及反对英、美干涉中国的话。待我们回到莫斯科的时候，知道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马克曼努斯，法国共产党执行委员特润及美国共产党代表亚门特儿合电中山先生，攻击英、美、法三国的帝国主义。全俄职工联合会对于英国职工会大会关于此事有所建议。此种运动在莫斯科及其他诸大城均是一样的热烈，“从中国收回手去”的呼声，全俄皆是，到处组织此等团体，天天

都有集会，报告中国的事，同声一致的赞助孙逸仙的革命政府，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干涉中国。最近东方大学特为此问题开一示威运动大会，英国少年共产党代表杨君演说，攻击英国政府甚力。前晚在大剧院又有数千人的集合，英国共产党领袖马克曼努斯及中国、法国、美国、日本的共产党代表均出席演说。马克曼努斯演说中，说到他曾记得当中国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英伦的时候，在满切士特有一示威运动，庆祝中国孙逸仙所领导的革命成功。马克丹诺曾有演说祝贺孙逸仙的革命成功，此种声音尚在人耳。曾几何时，而马克丹诺的所谓劳动政府竟自干涉孙逸仙所领导的革命政府了⁴ 云云（演说详稿容觅得寄去）。当全世界革命的青年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狂呼奋斗的时候，中国的青年应该怎样的激昂，在悲愤中跃起，奔赴于我们中国的革命老祖孙中山先生旗帜之下，去和那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战斗，我们远在莫京引领以盼此消息。余容续白。

九月念四日守常在莫斯科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1924年11月10日

上海的童工问题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近读大阪《编军英字日报》和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第二九卷第八号，内载有关于上海童工问题的资料，颇值我们注目。兹为约叙其要如次：

上海的外人自治会，曾为调查和研究上海的童工组织一委员会。委员会费了一年的工夫，研究这个问题。据其调查的结果，系把上海市分为十区，共得雇佣童工的大小工厂二百七十五个。童工总数有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就中含有十二岁以上的男工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一人，女工十万零五千九百二十一人；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四千四百七十五人，女童(工)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人。这二百七十五个工厂厂主所隶之国籍：日本三十二，英国二十四，美国十二，义大利七，法国五，葡萄牙、瑞典、比利时各一，英美合办者二，其余一百九十厂均为华人所营办。

茲更按其所分十区调查的结果，统计之如下：

(一) 哈尔滨路(Harbin Road)区

工厂数	73(日 4、英 2、美 1、葡 1、华 65)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	2,675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	3,036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	0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	83
合计	5793[5,794]

(二)提篮桥区

工厂数	73(英 5、日 2、美 2、华 64)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	8,321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	8,300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	433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	310
合计	17,364

(三)杨树浦区

工厂数	31(日 15、英 3、美 1、华 12)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	11,757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	29,793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	1,254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	3,327
合计	46,131

(四)小沙渡区

工厂数	34(日本 10、大英 3、美 2、瑞典 1、华 18)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	17,206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	30,363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	1,087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	1,934
合计	50,590

(五)西虹口区

工厂数	11(英 5、义 3、法 2、华 1)
-----	---------------------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	389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	4,936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	1,454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	6,794
合计	13,573

(六) 新闸区

工厂数	7(英 1、义 1、华 5)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	306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	4,472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	0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	90
合计	4,868

(七) 虹口区

工厂数	3(比 1、华 2)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	150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	1,950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	0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	200
合计	2,300

(八) 中央(Central)区

工厂数	2(英)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	450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	1,000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	0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	0
合计	1,450

(九)闸北区

工厂数	38(美 6、义 3、英 3、法 3、华 23)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	1,038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	15,802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	0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	5,079
合计	21,919

(十)浦东区

工厂数	3(日 1、英美合办 2)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	2,449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	6,269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	247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	318
合计	9,283

又据他们的调查，上海的下层劳工(如苦力、人力车夫等)的所得，比中国任何地方算是较高的。平均计之，苦力月得十五元，人力车夫月得八元，而一人及其妻眷的生活费，最苦的月亦须十六元，方能过活，今其所得，最多者且不过十五元，上海苦力及人力车夫生活的苦况，可想而知了。中国乡下儿童的身体尚好，至于都市儿童的身体，都在西方各国的准位以下，含有结核性的病症，流行极多，而以上海为尤甚。上海工人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受极重的损伤，而以童工为尤烈，这都是长时间工作疲劳过度之所致。童工被佣于家内铺店、小工厂、家庭工业、洗衣房，并建筑业及大工厂等。女童工间有沦落而为娼为婢者。徒弟的年龄，以工作的性质而有不同，其期限则依惯例为五年。在此期间，普通多不给报酬，即偶有给与报酬者，其数亦极少。很多的不过六岁的童工，在大工厂里

作工，十二小时内，仅给他们一小时的工夫去吃饭。他们大都是站立着作工。分日夜两班换班，直到一星期终了的时候，才停一班。工钱只按工日给与。一天的工钱，至多不过二角。工作场所的卫生设备极坏。那些儿童，多由包工者(Contractor)由乡间招来，一个月只给他们的父母银二元，而包工者则一个月由工厂主得到银四元。那些儿童们的衣食住，均极惨苦，而不得一钱，作了工厂主和包工者的小奴隶，听他们的剥削而不自知，真可怜啊！他们在各种工厂里的生活状况，大要如次：

(甲)棉厂 通气卫生的设备不良。一班十三个半或十五个小时。无夜工。有的在一定时候，给以一小时的工夫去吃饭，有的则令择空间[闲]的时候去吃饭。纺纱部童工最多，长时间站立着作工。许多的工厂，当夜工的时顷，有些小孩子，在喧闹的机器声中，(像)被放在摇篮中，或睡或醒。有些儿童太疲乏了，辄藏在屋角或棉花堆里，偷尝一点香甜的睡乡的滋味。此类工人生活水准较高，十二年前他们有百分之七十是着不上衣履的。据说日本组合，在中国有很多的纱厂，设备些初级教育机关，这不过是资本家想要造就些更有用的奴隶，还可以猎取温情主义的美名罢了。

(乙)丝厂 丝厂中的工人，几全为女(童)工及青年女工。常听人说，“一个小孩可当两个成人”，这句话可以表示资本家欢迎童工的态度了。小女孩子们在那里作些刷茧、去障碍、剖出丝纤的工作，为机工作预备工夫。此苦工作，须临于盛着沸水的盘盆前边，他们的小手，须和沸水相接，以致手受痛伤，显出粗丑的样子。一定的工时，是由上午六时至下午六时。夜工亦偶有之。这些小女孩子，须先十五分或二十分钟到厂，报告他们的工作。早餐给与十五分钟，午餐一小时，一气要站立五点或六点钟的工夫。室中的温度，在常准以上，为湿气所包围。久在炎蒸湿气之中，精神殊易疲敝。他们的工钱，一日由二角至二角五分。他们在身体上、在精神

上都是很不幸的，有时且受成年工人不良的感染与虐待。

(丙)烟厂 烟厂童工不甚多，且情状较棉厂、丝厂好。工作时间较短，通常由上午九点至下午十点，吃饭的时间不在此内，他们常坐着作工。工钱一日由二角至三角。夜工不像纺纱业那样常有。

(丁)火柴厂 火柴厂的童工，九枚铜板一天。有不过五岁的小孩，作的非常的快的。白磷有毒，殊害卫生。听说上海官吏，将于来年禁用。工厂内无防火的设备。作火柴盒的外工，多系母子。每千个盒的内部九枚铜板，每千个盒的外部七枚铜板，一个妇人同两个小孩，一天能完成二千至三千个部分，以补其丈夫赚钱养生之不足。该委员会调查既毕，随着亦有所建议。其要点如下：

1. 禁用十岁以下的童工。
2. 年龄的决定，与其根据出生的证据或他项文书的证明，毋宁依据明定的身高尺寸。
3. 此条例施行后四年以内，须将年龄的限制提高到十二岁。
4. 禁止用十四岁以下的童工，在任何二十四点钟的时间内，超过十二点钟以上的工作。每一个十二点钟内，必须休息一点钟。每一个十四天的作工时间内，至少要拿二十四点钟来休息。
5. 禁止用十四岁以下的童工，作危险不安全的工作(如机器或场所含有危险性等)，或于儿童有伤的严重工作。
6. 在租界内暂不禁止童工的夜工，此事留待四年后再议。
7. 设监察机关，违禁者查明处以惩罚或罚金。

北京政府所发布的条例，无监察的机关，无处罚的办法，而此则无此缺点。但租界内的外人行政机关，一方受资本(家)的驱使，一方复观望北京政府在江浙间如何施行其所发布的条例，一切皆是“以待来年”攘鸡办法。残忍的北京政府和租界的外人行政机关，断乎不会施行(那)为保护童工利益的行政的。为拥护这十七

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的利益和免除他们的损害，非赖上海的劳工团体的本身不可；为帮助他们智能的发育，娱养的得宜，非赖上海的献身于无产同胞的青年团体不可。吾跻身在苏俄，目睹工人儿童的幸福，娱乐，教育，不禁想起这一班沦于黑暗生活中的十七万多的幼年群众。因特函述其要，愿贵报记者及留心社会的青年同志们，看一看你们的小朋友们的生活状况，是如何的悲惨，如何的痛苦，而设法一改进之。幸甚幸甚！余容续白。

守常九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

《中国工人》第4期

1925年4月

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¹⁾

(一九二四年九——十月)

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 80%，他们绝大部分是半赤贫的小农。帝国主义从中国的南大门涌入之后，他们受到的压迫更为深重。于是南风北渐，广州（当今是孙中山革命政府的首府）也开始缓慢但踏实地把自己的势力向中国腹地扩展。从那时候开始，作为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主力军的无地农民的数量迅速增加。这次起义的急先锋是农民和农村知识分子。

起义的基本原因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侵入，它首先打击了中国的农民经济，这一点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颁布的耕者有其田、平分土地的法令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

帝国主义者十分明白，破产的农民是起义的基本力量，而且这个因素正逐渐演化为广泛的国民运动，他们便开始向中国民众传播基督教，想以此冲淡农民的革命意识，同时利用以反清复明为目的的秘密会道门，把反帝运动引入反清的轨道。因此帝国主义国家躲在幕后煽动内战，使破产的农民受骗上当，家破人亡。

事实上，明末已经有不少王公官员皈依基督教。所以反清复明运动是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的，而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皈依基督教则把方兴未艾的运动引导至争取恢复旧的明王朝的道路，故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有望得胜的革命遭到失败。

但是不言而喻，随着太平天国起义军革命力量的扩大，太平军

开始表现革命精神，帝国主义稍一觉察，便向反动的清王朝提供援助。帝国主义者从太平军的“洋兄弟”变成了仇敌，正是他们组织起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刀枪不入的军队”。

帝国主义从这次内战得到了下述好处：首先，他们逃脱了在战争中杀害大量革命农民（牺牲者多达几百万人）的责任；第二，他们控制了清朝政府，使之俯首帖耳。

几百万农民在太平天国起义中牺牲，结果怎样呢？

帝国主义得以掌握海关；

帝国主义在中国为所欲为；

把中国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

太平天国起义是帝国主义利用的首次中国内战，他们在战死疆场的无地农民的白骨堆上获得了广泛的特权。

帝国主义对华北农村经济的影响，在1900年当基督教徒深入中国农村为帝国主义商品开路之际表现得特别突出。农民生活每况愈下，对外国人的仇恨与日俱增，结果是酿成了著名的义和团起义。然而众所周知，它却以失败告终，并且迫使清政府缔结了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从此彻底束缚了中国。

义和团起义后中国农民的破产速度越发急剧。大批无助的农民涌入其他国家。由于他们的逆来顺受、愚昧和非常低的需求，倒成了外国资本家镇压罢工和降低工资的工具。外国资本家在需要时就把中国劳动力像牲畜一样引入他们的国家，用完了又像牲畜一样把他们赶回中国。那些多少有块地的农民在军阀和地主、地方当局和外国资本的压迫下也是难以为继，最后为生活所迫流落到城市，加入到失业大军的行列。

自然，像中国这样工业落后的国家，对于被帝国主义压迫而流离失所的农民大军，连其中百分之一的人也安排不了工作。于是他们出于无奈就去当车夫，拉那些财主们，要么就落草为寇或充当

炮灰，那就又被军阀用来掠夺人民，扩大权利。

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内战企图达到两个目的。

一方面使这些流离失所无地可种的农民牺牲于战乱之中，减少革命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则与中国军阀为虎作伥，利用他们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削弱竞争。下表可以说明中国农民生活的每况愈下。

年	农户数	可耕地(单位：亩)
1914	59,402,315	1,578,347,925
1915	46,776,236	1,442,323,638
1916	59,321,504	1,509,975,461
1917	48,907,853	1,365,186,100
1918	13,935,478	1,311,172,190

土地拥有量	1917	1918
不足 10 亩	17,805,125	17,914,231
10—30 亩	13,218,174	11,303,570
30—50 亩	10,122,214	6,712,366
50—100 亩	5,318,314	1,137,136
100 亩以上	2,? 35,461	2,2? 3,355
总计	49,359,591	42,345,658

从上表可以看出，无论农户数还是农民的可耕地数量都日益减少。拥有 30—100 亩地的农户数量减少的速度特别快，而拥有 10 亩地以下的农户数却在逐渐增加。这种倾向在 1918—1921 年间尤其明显地呈现出来。它生动地说明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下遭到破产的状况。

目前导致中国四分五裂的内战也是帝国主义国家煽动的。一

方面帝国主义者利用破产的农民当炮灰互相争战，另一方面内战有利于消除革命力量，这部分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的中国农民是构成革命力量的因素，可争战的各方却招募农民入伍。在目前的内战中，英美帝国主义支持曹锟、齐燮元的直系与其他敌对的军阀派系厮杀，但矛头所向主要是孙中山为首的南方国民党。安福系（段祺瑞）和奉系（张作霖）得到法、日帝国主义的支持。眼下这场席卷全国的内战实际上乃是英国、美国为一方同法国、日本为另一方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殊死搏斗。

这场内战在中国的波及面正日益扩大。江苏、浙江、直隶、热河（内蒙古）等地战事十分激烈。前两省是中国最大的稻米产地。战争给农民以何等可怕的打击，就不言自明了。抓夫、征收牲畜、征粮、抢劫和勒索直接落到农民头上。

此外还有财政混乱、物价上涨等，尤其雪上加霜的是自然灾害——洪水。农民处境确实水深火热。

帝国主义强盗们把欧洲文明强加给中国。起初他们从中国争战的军阀中寻找一些走狗，供应他们武器装备，让他们互相厮杀。帝国主义把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造成的大批本国积压的产品倾销到中国市场，获取巨额利润，从而破坏和挤垮了中国农民的私有生产和手工业生产。

几百万饥饿交加无以为继的农民只好被发送到前线，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争战决一雌雄。帝国主义的文明是何等的人道！

然而一切都有一个限度。中国内战延续的时间越是长久，越是激烈，它对中国被压迫工农群众的觉醒所起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工农群众就越能迅速地意识到，踏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之路才是唯一的求生之道。

中国被压迫的群众已经听到世界革命工人特别是伟大的苏联

工人呼唤他们奋起斗争的声音。他们响应这一呼唤，抛掉外国资本和中国军阀双层枷锁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署名：李秦华

《农民国际》1924年9·10月合刊

第7·9期，第71-74页

李玉贞译

译者注

(1) 本件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舍维廖夫(汉名：石克强)提供。

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¹

(一九二四年十月)

中国的群众已经在国际帝国主义沉重的压迫下生活多年。在中国，最富于侵略性的是英国帝国主义。太平天国起义以后，英国人控制了海关²，他们把征收海关关税当成了肆无忌惮地剥削和压迫的工具。目前，征收关税这条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扯不断的锁链已经导致了国内财政和经济的彻底崩溃。农民丧失了土地，绝大多数产业工人饱受着失业之苦，当第一生活必需品涨价之时，更是加重了人们为生存而斗争的负担。丧失土地的农民和失业者不得不离开中国奔走天涯，流落到日本、欧洲、美国，在这些地方资本家就利用他们的无组织性和廉价的劳动来破坏本国的工人组织。至于留在国内的那些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业工人，他们除去当兵或者当土匪，为军阀集团的狭隘利益去卖命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出路。吸血成性的帝国主义分子为了犒赏中国的军阀和结伙强盗，让他们充当秘密债务的首领，并把武器、军火运进中国。

在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再像从前一样顾及中国，这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加强它在中国影响的绝好机会。但是美国不愿意把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让给日本，因此同它展开了坚决的竞争。美国知道日本依靠的是安福系和奉系军阀，所以它就支持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集团，推出他们来反对日本的走狗。只是由于美国的帮助，吴佩孚才击溃安福系和奉系。后来，美、英帝

国主义者又合力支持吴佩孚打败了孙中山的革命力量。他们不仅向吴佩孚和起来反对孙中山的将军们提供武器，而且帮助陈廉伯开始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广州组织法西斯运动。

因此，目前在中国进行的内战是美、英帝国主义者支持吴佩孚进行军事冒险的结果，也是美、日帝国主义之间冲突的反映。在内战期间，各国帝国主义分子以保护本国侨民的生命财产为由携起手来，以便在由他们支持的、牺牲中国人民利益的内乱中取利。麦克唐纳³ 的所谓的工人政府撕下了自己的假面具，开始狂热地支持自己的法西斯走狗，完全公开地反对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政府。由于帝国主义者的互相倾轧，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究竟中国目前的内战会持续多久，谁也说不清楚。

所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的军队当然也是由失业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他们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不得不去当兵，不得不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利益去卖命。城市中的工人、农村里的农民被强行拉去当兵，被强行赶上前线。直系军阀控制区内的铁路工人受着尤其残酷的迫害。我们还记得，吴佩孚就是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枪杀铁路工人的罪魁祸首，他害怕发生新的反直系军阀的罢工，所以逮捕和开除了所有与工会有关系的人。产业工人的境况也很不好，帝国主义走狗给予他们的只是死亡、恐怖、压迫、饥饿和强迫他们去当兵。

但是，在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下，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懂得了谁是他们受苦受难的罪魁，谁是他们的敌人；它开始意识到自己在中国民族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责任；它懂得了中国的民族革命必须取得有利于世界革命的胜利。中国无产阶级还懂得为了取得中国民族革命的胜利，工人们应当紧密地组织起来，并且成为革命的中心。

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领袖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在他进行的反

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以及由它们组织起来的法西斯运动的斗争中，他应当依靠农民和工人。广州的部分工人已经武装起来，革命政府也向全体中国工人发出了号召，请求支持。这个号召是向中国工人在反对自己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发出的第一个战斗的召唤。

正当英国所谓的工人政府打算武装干涉广州的消息传来之时，千千万万的苏联工人在“不许干涉中国”的口号下团结起来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人也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加入了这一运动。因此，工人群众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向国际帝国主义宣战了。中国工人团体、共产党同中国全体工人一道，应当成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先锋队。

署名：秦华

《红色工会国际》第9—10期

1924年

中国的事变和本团的训练¹

——在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

(一)江浙战争的历史背景。直系十几年来统治中国，自直系得到政权以后，天天有战争，如西南的反抗，渐由西南到长江流域。北洋派内的争斗，打仗，日日压迫人民。这种战争的影响，对于经济上、财政上都起了极大的恐慌，如北京财政非借不能度日，而人民受军阀的压迫和剥削，都贫而变成土匪。尤其贫苦的，就是工人和农民。知识阶级也不能安生求学，因为各种学校，都因缺乏经费而停闭了。除了内政以外，还有帝国主义。

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勾结下，造成连年内战。

这次江浙战争，又是帝国主义与军阀勾结弄成内乱的一幕。

(二)党的任务。此时，负国民革命的使命的就是国民党，然而国民党中又因分子复杂，又有帝国主义的走狗商团，他们不但不做革命，反而要做反革命，破坏革命的事业。这样看来，国民革命的真正分子，除了孙中山外，只有一二人，其余的只有我们了。然而我们的党，又很幼稚，人数又很少，如何能负这种重大的责任！因此，我们不得不择其最要的工作和最要的地方。工作的重心地有四个地方：①广东，②上海，③汉口，④京津。在广东方面，有一点活动的自由，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广东。在此，应注意工人和农

民，尤要注意的是军队（中），所以我们（要）注意（在）军官学校中活动。

过去的工作，大半在表面上，结果只是空虚而没有基础。我们并不是不做表面的工作，不过这种工作，只要我们的党中央发出一种口号，指定少数人去做就够了。我们以后要做的，特别是基础上的工作，主要的：①铁路工人，②矿山，③海员，④纺绩。这些无论在政治上、财政上，均有很大的意义。

（三）在莫斯科训练的意义。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训练的意（义）：第一，要认清我们的团体。我们的团体是全被压迫的民族的先驱，我们的革命是为全人类的，所以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我们来此，是学习革命的，并不是留洋留学求博士的。我们的责任这样的重大，所以我们应以团体就是自己，自己就是团体。第二，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党和党纲。我们的同志，在党中做过多年工作的，然而有许多人不明白我们的党和党纲，这是很危险的。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党纲是科学的，很自然的，很合乎人道的，因此我们的党是光明正大的。

署名：李大钊报告

杨介臣记录

1924年10月30日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¹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李守常先生首先详述葡萄牙、荷兰等国势力东侵之历史，因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最甚，叙之尤为详尽。次则分析太平天国之事实。)

(太平天国)本系一般农民受帝国压迫而发生之国民革命运运动，因帝国主义者巧为宣传，将人民之恶感集中于满清政府，帝国主义者自身则回避其锋，使蓬蓬勃勃之国民革命运运动，竟变为狭隘的排满运动。帝国主义者初则阴(遣)教士暗助洪秀全，使战事扩大，以遂其挟制清廷任意要索之野心。迨所求既遂，则素被太平天国称为洋兄弟之外国人，一改其面目而化为戈登之“长胜军”矣，于是此最可注意之革命运运动竟以此而消毁。

义和拳亦系受帝国主义者压迫过甚而起之反抗运动，然因其智识浅陋，手段不良，竟为帝国主义者压服，酿成巨祸。至辛亥革命因鉴于义和拳之害，亦仅以倒满为惟一目的，对于外人力任保护，不敢有反抗的言论。现在孙中山先生看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之祸患，高树国民革命的旗帜，以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相号召，全体国民都应在此旗帜之下，努力奋斗。

现在有一班人以为现在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是义和拳思想之

复兴，大为恐惧，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现在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仅仅反对各国的帝国主义者，并不是反对他们全体人民。孙中山先生在俄、德退出侵略团体以后，即声言联俄、联德，有一个时期曾极力帮助菲律宾的革命运动，可见孙先生是抱世界主义的人，他反对的仅为各国的帝国主义者，所以现在的国民革命运动和义和拳的运动是大不相同的。

《京报》

1925年1月20、22日

在北京纪念列宁大会上的开会词

(摘要)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今日为列宁周年忌日。我们今天开会纪念他的意义，因为他
是世界革命指导者，同时又为东方被压迫者的良友。

《京报》

1925年1月21日

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

帝国主义者卵翼的军阀与民众的结合根本不相容。因为民众一有结合，便有一种力量抗拒他们的阶级的民族的仇敌，那作外国帝国主义者代理人、卖国殃民的军阀，焉有不时时堤防民众运动、压抑民众结合的道理。

英、美帝国主义者所扶持的军阀吴佩孚，当那京汉路工运动初起的时候，似是很想用他曾经用过的以“国民大会”的口号诈骗民众的伎俩，来诈骗工人群众和全国民众。后来渐渐看清工人群众的结合，能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形成一种纪律紧严、勇力雄厚的中坚势力，他便骤然揭破那副假面，拿出凶残的手腕来压迫工人的集会。等到京汉工人因为争集会、结社自由，举行全路大罢工，在军阀大本营的第一火线上和他短兵相接的时候，他更惊心动魄，知道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运动中最勇猛、最有力的先锋队，他的惊讶和恐怖更坚增了他那用辣手摧残工人的决心。

在一段工人流血的历史中，已经显出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和位置。现在吴佩孚的势力虽然烟消火灭了，那些凶残的帝国主义者，仍旧在制造军阀来摧残我们的民众。京汉路工热烈奋勇战斗的精神既已开了国民革命和阶级革命的第一幕，我们工人阶级和那些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们，更要奋勇万倍的高扬着鲜红的旗帜，踏着先烈的血路，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进攻！

我们要誓告全国的民众道：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国民革命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署名：守常

《“二七”二周纪念册》

1925年2月7日

在北京民党三团体招待会上的讲话

(摘要)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前到俄国时，一般俄国人民、学生，无不热烈慰问孙中山先生之身体事业，于此可见孙总理于世界革命人材之地位矣。“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京报》

1925年2月23日

在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 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讲

(摘要)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

真正国民会议之召集，非由诸位代表回去，在工人、农民中组织宣传不为功。

《京报》

1925年3月2日

挽孙中山联

(一九二五年三月)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陵，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黯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党员 李大钊

《孙中山哀思录》

1925年3月

为梁容若所藏《三民主义》 一书的题词¹

(一九二五年三月)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¹

(一九二五年三月)

蒙古民族，在辛亥以前，与汉、回、藏各民族，同受压迫于满洲民族宰制之下。满洲以一民族专制的政府，外既不能抵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全中国，内复以种种手段防制境内各民族的政治自由。其对蒙古民族，纯用藩属政策，以笼络其王公及喇嘛，沦蒙古民族于外国的帝国主义、中国的帝国主义、蒙古王公的封建制度、喇嘛教的愚民剥削四重压迫之下，而末由解脱。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国民党虽曾努力于国内诸民族平等的结合，终以国际帝国主义者与国内专制余孽的军阀相勾结，妨害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国内军阀遂得把持政权，复燃中国旧日帝国主义的死灰，于是蒙古民族，仍不免受与前日相同的压迫，或且更甚。民国十年顷，俄白党余孽谢米诺夫及思琴等为赤卫军所击败，一部分逃入蒙古境内，与志图侵略满蒙的帝国主义者相勾结，蒙古民族又大遭其蹂躏。嗣后俄国赤卫军为肃清危害俄国革命政府的白党，不得不派兵入蒙，驱逐白党，蒙古国民党因得乘此机会，建立民族的政治机关。三年以来，基础渐臻巩固，更因活佛的逝世，把王公制度根本铲除，至是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遂与中国国民革命的潮流相接。

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遗留给我们的手写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里说：“其三为民族。故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

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今国民党在宣传主义之时，正欲积集其势力，自当随国内革命势力之伸张，而渐与诸民族为有组织的联络，及讲求种种具体的解决民族问题之方法矣。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与蒙古民族结合，即以此数语为枢纽。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与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即以此数语为汇归。忆当去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蒙古国民党代表耶邦丹藏先生，特至广东，以中国国民革命与蒙古民族解放间的关系诸问题，与中山先生为同志的商榷的时候，中山先生早已诚坦的把他的民族主义表现于上述两个重要文件中的精义，亦就是中国民族对于蒙古民族真实的友谊与诚意，经由蒙古国民党代表陈布于蒙古全民族之前了。这样看来，中蒙两民族间的自由联合，兄弟似的协和和睦，早已建立在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与蒙古国民党所领导的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归趋一致的一点。

本月六日，苏联大使照会北京执政府，声明已得蒙古当局之同意，先撤蒙古境内的赤军，希望中国与蒙古人民，藉和平的了解解决两兄弟民族互相关系的问题。吾中国民众于感谢并谅解苏联之尊重中蒙两民族的自主自决，渴望中蒙两民族的自由联合外，并宜认明此为两民族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提携共进的良机。而严密的监视顽暴军阀之以旧日藩属征服的手段，施之蒙古民族，以防诱起国内民族间的嫌怨与纠纷，而为虎视于旁的帝国主义者所利用。中国国民党谨遵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遗训，高举国民革命的旗帜，愿与蒙古国民党共为两民族作自由联合的介绍。两民族的民众，盍兴乎来！

署名：李守常

北京《民国日报》

1925年3月

主张在广州召开国民党 第二届代表大会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帅府园
会议上的发言(节录)

(一九二五年四月上旬)

(李痛陈不能在北京开会之理由),谓:(国民)党在北京缺乏武力,不能令党员绝对服从命令,而北京又处军阀及帝国主义威力之下,不能自由行动。¹

《晨报》

1925年4月8日

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¹

——在河南开封第一师范的演讲

(一九二五年八月)

要明白英、日帝国主义者之侵略中国，当先看帝国主义者如何进中国。广州是中国的惟一门户，尤为中国潮流荟萃之地。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降服满清，知识阶级当时虽说知道，但是被于利诱，都不可靠了，所以这种种族思想，全保存在下级之工农界，被迫而全聚于南方，成一种秘密结社，这是一种种族思想的潮流。

在当时还有基督旧教²流人中国，亦先从广东进来。到清初这两种思想结合，加上明末之遗民，成了痕迹，后来就造成清朝第一次的民族革命运动——太平天国。

帝国主义是什么？就是资本主义发展之结果。因为他要向海外找殖民地作他自己的贸易场和原料地，因为又要保护，便要武装起来，所以武装之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英国是资本主义，即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亦即帝国主义之发源地，至今英国仍是世界之大资本主义，所以仍是大帝国主义者。它最先到东方时，先侵略印度，因为印度地大人多，正是个最好的殖民地，中国较印度更好，在他得到印度以后，当然要谋及中国。所以他不畏艰难，经过许多困苦和牺牲，要来拿到手中。

吾们看英国未来之历史，当先考中外交通史。一四九七年，葡

人发现南洋群岛，认为最好之殖民地，乃以宗教之力，先宣传后开辟，作商业侵略之先锋，后复设总督，于是马拉克诸岛遂尽归之。一五一六(年)(明正德十一年)，葡人复驾帆船至中国。一五一七(年)(正德十二年)，葡人复要求中国与之订商约，设海关，来船八只，态度极好，中国人与之感情亦甚好，后以其贪，乃副[许]上川岛(门外一小岛也)与之(通商)，以后葡人在沿海一带来往经商，尤以宁波、澳门等处为最活动。此时在历史上最要者，亦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要者，即为澳门，后来经过许多波折，中国人不堪其扰，乃划澳门与之(通商)，其余各处，则一概闭关自守。

当时日本亦然，对西洋也取关门政策，划平户出，与中国同。当时中国所以只限澳门者，其说甚不一致。据日人记载，系葡人在中国内地，颇有暴行，中国乃均遣之海口。据中国记载，则谓日本之商家宗社[设]，奉日大内艺兴之命来华通商，同时有僧人西[细]川高(贡)欲争此权，迁[遣]瑞佐亦来，然无明之信符，二人相争于宁波。华人晏之，瑞佐以事先贿通市舶太监[监]及市舶使(明之掌通商之官)，竟得上座，宗社[设]大怒，于是起大冲突。明帝得奏，遂废市舶官司，尽逐外人而送之澳门，行封门政策。然当时各种人均有，且中、日关系尤密，公商既不准通行，于是私商乃出。彼私商兼营海盗，于是有倭寇之乱，即禁止通商之结果。扰乱既久，更置教士于电泊县。一五三六(年)(嘉靖十四[五]年)，中国指挥黄庆，始许在濠统[镜](即澳门)通商。自是澳门遂成通商口岸，定澳门为外人居留地。至此生租借关系，每年纳金五百两，至今遂为葡之殖民地矣。

当一五二二(年)，西班牙亦来开航路，先至菲列宾，一五六六年(嘉靖三十)五年，西占菲列宾岛。在马尼拉有华侨被虐待，中国海贼李有奔(《大势年表》)谓：“海盗李马教”——编者率中、日两国人击之，大败，西班牙遂得占之。一五八〇(年)(万历八

年),西班牙派人来华,要求通商,葡人欲专利(《大势年表》谓:“为澳人所间”——编者),故不得要领而去。后荷兰人脱离西班牙时,亦来华,因与葡不和,乃设东印度公司——即商国所靠侵略东亚之机关,初实起于荷兰——付以宣战、媾和等全权,此为西洋人征服亚洲之始。成立后,荷人东来不绝,至一六〇二(年),荷政府更允安置军队及一切行政权,在爪哇一带势力甚大,后驱西班牙及葡人,至今爪哇仍属于荷。后英国亦组东印度公司为英帝国主义侵略之经济组织,于此吾人可知经济侵略政策之可怕。

此时荷兰在日本亦如此,至一六〇九年,更为发达,与日人感情亦好,日本之得西方文明,即在此时,至今日人犹称西学为兰学,即由于此。至一六二二(年),荷、葡争澳门,荷兰先占爪哇,然葡萄牙至终不让,荷人无法,乃转赴福建附近,至澎湖群岛及台湾一带。一六五六年,复派使臣来华,与中国交涉通商,中国允该国商船八年可来一次,每次只准四只。当时荷虽占台湾,在明末时,(后)中国郑成功自福建逃至该处,又将荷人逐去,后荷人怀恨,时谋报复,而终未能,直至清兵到时,荷乃帮清人铲郑之势力,仅藉以泄愤而已。一六六四(年)(即康熙三年),荷人再派使臣来华,商定条约,而未得大利,故始终态度均好,且朝见时仍必行三跪九叩礼。然须知以上来者,均为小国,对中国无大害,此后英国即已来矣。

英国本与荷同来,当初英国最注意印度,然当时以敌人太多,即西、荷、葡均已先来,故必与彼辈争斗始可获得地位。一五八八年,先与西班牙舰队在海上相持,结果败之,始得称霸[霸]。然以西、葡合邦,且西班牙之财富多仰给于葡,故英欲进而颠覆葡之根本势力,而自树其在东方之商业势力,后复覆荷兰在南洋之势力。一五九九年英人遂筹设东印度公司,一六〇〇年成立,代以前之东印度公司起而侵略,然当时规模极小,仅有一万(几)千镑(《大势年表》谓:“资本七万二千镑”——编者),此为第一合资公司,亦英帝

国主义侵略东亚之先锋。

且看以后如何侵略。一六二四(年)(《大势年表》谓：“一五九六年，明万历二十四年”——编者)，英使来华，在海上遇险未达；一六三七(年)，葡人允英国可至澳门，但终不能得势，后又被拒，乃改而据虎门；一六六四(年)，东印度公司与反对清室之郑成功之子郑经订约，英甚得利。吾人须知，此时英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手段，已开始施用矣。其利用某部势力而寻门户，预备侵入内地，此时英国已有所谓领事裁判权，然中国关门甚紧，故终未到[得]逞，但不久郑经又败，约遂失效。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英人在厦门建商馆(《大势年表》谓：“英人谋在厦门建立商馆，清廷未许”——编者)；一六八五(年)，清廷下令开放海口；一七一七(年)，中国总兵陈昂上奏言：“广东有红毛”，即英商也；一七二二——一七三五年，英人欲谋减税，另赴浙江谋定海，于是海门以外皆有红毛馆；一七五五(年)，英商由广东至，要求中国开放浙江门户，以闽、粤总督之抗议未准；一七五七(年)，清廷令所有通商之外人，只限于广东省一处，一面更在浙增税一倍，更毁红毛馆，以为抵抗之法。时英商洪化辉(《大势年表》谓：“洪任辉”——编者)不服，走天津交涉，复被中(国)政府逮捕送之澳门监禁，至一七五九(年)复派人赴粤调查。一八〇二(年)(嘉庆七年)，葡人以税率轻重不同，压制英人，盖当时只有澳门一处为各处[国]通商处也。英人借口防法，派兵占澳门(《大势年表》谓：“英兵舰六艘……窥澳门”——编者)。(嘉庆)十年，英使至广州，盖防法之离间也。于此吾人可知英法之冲突，实已甚久，后来在中国、日本、土耳其始终未曾和谐也，即最近亦然。此时英国战船既来，即武力、经济同时俱到也。一八〇八年，英将兵自安尚来，伺澳门(《大势年表》谓：“英人度路利未自安南，以兵舰九艘窥澳门，仍言法将袭取澳门……。中国以防守澳门由中国自任，无须英人代劳。”——编者)，在中国谢绝之，英兵

愤，走虎门夺黄埔——即今革命军所在地——，(扬言将)劫当时广州特许通商之十三洋行，³后由华兵打退，中国即对英及各国停止贸易，此盖中国对外之惟一方法也。因外人来华之目的，本在经济侵略也，后英人以吃亏太大，遂又变软，此潮乃解。

在一七九三(年)，英次[使]曾二次来华，至北京，被中国朝廷斥以冒昧，旋即退回。一七九六(年)，英舰又来，至天津，(令)挂贡旗于船上，并赐以九叩礼，英人不肯，又被遣广东，与中国要求订约，中国又不准。后在广东，以中国人不准西洋女子居住问题，几生大冲突，后外人托故治病，始了结。故当时中国之限制外人，实严之极。后英人卖鸦片于中国，借治病口实，然遭中国人嫉恨，于是中、英战事未久即开。中、英鸦片战争之近因，为林则须[徐]之焚烧鸦片，其远因盖在英国必欲在中国打开一门户，然后借条约限制，以保护彼之商人，得行其经济侵略政策。

自一八四四[二]年鸦片战后，英之势力，长驱直入打进中国来，南方以经济压迫最烈，于是失业人数加多，社会上顿起不安之现象，此不安现象，终成太平天国。故太平天国，乃(英)帝国主义(英)侵略中国而使中国农民失业之影响，而以民族思想及耶教观念相结合所成的大运动。此时外人以宗教主义彼树起反清之旗帜，爰外人之指导，以抗清，以谋外人之利益，同时更有英、法联军⁴直打人北京，来恐吓清廷。及清廷以“宁给友邦，不给家奴”之话来对外人说出，造成最大之不平等条约。此时英人以目的已达，乃转而帮同清室来打太平天国。诸位知道当时有所谓长胜军⁵者，用新军火加入中国军队，在江(江)南一带，大破太平天国，终而灭之。自是轰轰烈烈之民族运动，遂屈服而消灭于大英帝国主义势力之下！而英人遂得操纵清室，在中国任意横行矣。

自此以后，帝国主义者之侵略中国，盖完全采此手段——即利用反革命势力以压制革命，中国革命之所以至今不能成功者，此即

其大因。这种方法，即不用自己力量，只是假借人家力量，又可得最大利益，所以在他们看，这是最好的妙法。义和团本以民族革命运动，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北方后，社会经济上发生变动，以先以[之]油灯，尽成洋油势力，机声、纺织声都被洋布压下，中国人愤恨之结果，造成一呼即应之义和团。不过农民知识简单，对于事情不能观察，起一种仇洋的观念，于是弃洋枪大炮而不用，全以中国东西来抵御，而乡间所奉为惟一武器之孙悟空、关羽等神，遂相继出而应战矣。后卒以外人之压迫而消灭，更有八国联军⁶之最大坏果，使中国人永远不能抬头。故至武昌革命起时，必首先宣言维持外人权利，始可成功。然以尊外人，不能对外，故更造成十余年只能埋头内争之结果，外人（以）利（用）此机会，处处压迫革命势力，对于南方更为显著。历年广东之乱，俱为英人在内作祟也。彼盖以北方已有军阀代彼压制，故不足虑。此次沪、粤诸案⁷，英人对广东所以极硬者，盖即彼之传统政策也。

我人之民族革命运动，第一次为太平天国，惟后杂人污物，故不甚好。洪秀全⁸一八五一年起事，一八六四年灭之，正英、法联军之时也。日本此时，与中国相同。孙中山先生即生于一八六六年，太平灭亡（后）之二年。先生生于民族运动之发源地，于是一洗以前之污点，卒（成）造成民国，至今民族解放运动，还正迫行不止。孙先生言：“革命如山顶之石，不动则已，一动则非直滚至山脚不止。”故在此时期，大家绝无幸福可言，绝不能希望太平，（不然），任何事都作不成，只有大家都参加这种运动，以期早日作成。日本革命时，唱尊王、攘夷、复古三口号，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民族解放，且一十七年，费许多牺牲，当中曾换过十二次外交大臣，大隈并被炸伤。当时因帝国主义者正注重中国，故日本可乘机容易翻身，现日本已成帝国主义来侵略中国了。我们翻身将更要难，所以我们非全民觉醒不可。吾人之运动口号为尊重民权，打倒军阀，打倒

帝国主义三条。再进一步言之，即非仅中国之问题，乃世界之问题也。帝国主义已至一定程度，将来中国革命成功之一日，即世界问题解决之一日，即世界革命成功之一日。所以我希望中国的青年诸位，全都起来，参加现在之国民革命运动，使之早日实现。孙先生死时，嘱我们保存遗体，就是孙先生一眼望着我们的革命成功之后，他才安心的。诸位，我们大家当如何努力，才可对得起我们的先哲，我们的革命首领，为国奋斗四十年而劳死的孙先生！

筆記者附注：

一、此篇未经先生校阅，错误之处，想必极多，望读者诸君见谅！

二、原来此文甚长，因时间限制，李先生只能讲这些，惟闻先生言，他日当写出，供大家阅看，记者固极望能如愿也。

署名：李守常

员生笔记

《雷火》第8期

1925年8月

编者附注：此文是记录稿。其中年代、人名、事件的记载，有一些出入。现根据李大钊当年九月发表的《从印度航路发现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简称《大势年表》），校勘之，异文加于夹注中，供读者参考。

从印度航路发见以至《辛丑条约》 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¹

(一九二五年九月九日)

一四九七年 明弘治十年

葡人发现印度航路²，葡萄牙势力渐及于印度、苏门答腊、爪哇一带。

一五一六年 明正德十一年

葡人附帆船来华³。

一五一七年 明正德十二年

葡人来请缔约，并测中国海湾。葡船及马来船八只来广东，国人以葡人态度驯良，许其于上川岛通商，自是葡人居留地遂勃兴于粤、闽、浙沿海一带。

一五二二年 明嘉靖元年

西班牙人开辟航路，经略斐律宾群岛。

一五二四年 明嘉靖三年

中国迁外商于澳门（一名濠镜）。因日本大内艺兴改（派）僧宗设，细川高贡派僧瑞佐及宋素乡来宁波通商，互争优先，以致鬭杀，大掠旁海乡镇。给事中夏言奏，请罢市舶司。互市遂移于南澳，有一定期间，逾期不准停留。一说系因葡人暴行，遂有此举。

一五三六年 明嘉靖十四[五]年

指挥黄庆受贿，始许葡人岁输二万金在澳门互市，后竟扩地域，设官守，减租至五百金，俨然视为领土。

一五六六年 明嘉靖三十五年

西班牙人占领斐律宾，有虐待麻尼拉华侨情事。

一五七五年 明万历三年

海盗李马教进征斐岛，闽督派舰侦之，西班牙人因得附（船来华），是为中班交通之始。

一五八零(年) 明万历八年

西班牙派使来华，请通商，为澳人所间，不得要领而去。是年西班牙王菲利布，兼葡萄牙王统。

一五八一年 明万历九年

荷兰脱离西班牙独立，是时葡京里士本⁴ 为欧洲与亚洲通商百货集中之地，西王乃禁止荷人通商里士本以苦之，于是荷人感有自辟商路之必要。

一五八八年 明万历十六年

西班牙无敌舰队为英人所破，英人夺取西班牙海上霸权。是时西、葡合邦，故英人更欲进而颠覆葡人在东洋之商权，对握南洋商权之荷人，亦羡慕之。

一五九五年 明万历二十三年

荷京亚母士特丹⁵ 诸商人，创立私立东印度公司，资本六十万镑，自是荷船东渡者不绝。

一五九六年 明万历二十四年

美[英]耶利扎卑士女王⁶，遣使来华，中途遇风，未达目的。

一五九九年 明万历二十七年

伦敦商人发起组织东印度公司。

一六零零年 明万历二十八年

东印度公司成立，资本七万二千镑，为耶利扎卑士女王所特许。此为英国合资公司之肇始，竟成为侵略东方之急先锋；经营印度，推翻葡人在印度之势力，葡人屡败之余，至许英船得出入澳门。

一六零二年 明万历三十年

荷兰政府许东印度公司有在殖民地置兵、除吏及与所在国宣战、媾和之权，荷人遂在爪哇一带逐葡人而代之。

一六零九年 明万历三十七年

日本德川幕府⁷许与荷兰通商，荷兰在海上之权力，盛极一时。

一六二二年 明天启二年

荷人与葡人争澳门未得，遂据澎湖，又移于台湾，后又为（郑）成功所逐⁸。

一三六[六三]七年 明崇祯十年

英人率舰队来澳门，至则葡人又翻前约，不许英船出入澳门。英人乃转与粤吏交涉，葡人又间之，英人乃由澳门入广州，炮击虎门，冲突之结果，许于河口通商。

一六五六年 前[清]顺治十三年

荷兰遣使自爪哇来京，请互市，清廷许其商船八岁一至，以四艘为限。

一六六四年 清康熙三年

荷使扶助清覆郑之功，来京议约，未得偿愿以去。

东印度公司派船一只到厦门。

一六七零年 清康熙九年

台湾郑仅[经]（郑成功之子）与英人订约通商。

一六七七年 清康熙十六年

英人谋在厦门建立商馆，清廷未许，但允其商船以时间至。

一六八五年 清康熙二十四年

清廷下诏开海禁⁹，英人始来互市于浙[浙]东。

一六八九年 清康熙二十八年

英始正式派商船来广州。

一六九七年 清康熙三十六年

移宁波海关于定海，在定海城外建立红毛馆一区，招待外商。

一七一五年 清康熙五十四年

东印度公司设商馆于广州，有独占中国贸易权。

一七一七年 清康熙五十六年

总兵陈昂¹⁰始奏称粤东红毛，有英圭黎诸国，英国名见于中国公牍自此始。

一七二三——三五年 清雍正元年——十三年

英商在粤苦关税重，运动减税，后又运动移浙互市。

一七五五年 清乾隆二十年

英商泊定海，洪任辉、喀喇生等运动浙互市甚力，闽、粤总督抗议，因移浙则粤海关收入顿减。

一七五七年 清乾隆二十二年

清廷恐宁波成为第二澳门，下诏外人通商限于广州，每年夏秋交，由虎门入口，浙关视粤关则例增加一倍。东印度公司在厦门初建之商馆，旋即废止，定海城外之红毛馆，已遭毁废，洪任辉等到浙江旋即被逐；又之天津，讦粤吏规弊，以违禁来津被押，送澳门圈禁三年。

一七九三(年) 清乾隆五十八年

英王佐治三世派人来华，要求仿俄例派使驻北京管理商务，许英商至宁波、舟山、天津、广州贸易，求于舟山附近得一小岛，俾商人得以收藏货物，并求于广州附近得一小地方，俾英商居住，或准令居住澳门之人得以自由出入等项，清廷将佐治三世

及其使节大加申饬，令即速返粤东回国。

一七九五(年) 清乾隆六十年

英使又至广州，由粤商船转递国书，仍欲议订商约，又未遂。

一八零零年 清嘉庆五年

因英商输入鸦片毒品日增，清廷下诏严禁。

一八零二年 清嘉庆七年

英兵舰六艘泊香山之鸡颈洋窥澳门，意欲争得葡人所享之特权，托言防海，旋即退去。

一八零五年 清嘉庆十年

英使又附商舶来粤。声明英已胜法，仍以防法离间中、英为言。

一八零八年 清嘉庆十三年

英人度路利来自安南，以兵舰九艘窥澳门，仍言法将袭取澳门，此实为大班喇佛所嗾使，中国以防守澳门由中国自任，无须英人代劳。度怒，踞市楼，粤吏调兵防御，英兵舰三只，径入虎门、黄埔以民船入省城，寄京商馆，扬言将劫十三洋行，黄飞雕击之，始退。大班索商欠退货以示抵制，船主来，甚怒大班，自行转圜，风潮乃息。

一八一零年 清嘉庆十五年

英大班诉苦，请减税。

一八一五年 清嘉庆二十年

清廷下禁鸦片令，时英商输入鸦片年达三千箱。

一八一六年 清嘉庆二十一年

英遣使来华至津，清廷派员招待，为悬英国贡使旗于其舟，并赐宴，令行跪拜礼谢宴，英使不从。清大员与之为难，抵圆明园，不使国书及礼服与之俱至，而遽召见。英使称病，又召副使，亦称病。清廷怒其无礼，乃迫令即赴粤。后查知真相，仅

备聘物送粤，属致意英王，议约事又不得要领。

一八一八年 清嘉庆二十三年

广州十三洋行中有京裕洋行司事谢某，以肩舆与英妇人乘之，华吏重申禁外国妇女居留广州，几致决裂。

一八二二年 清道光二年

两广总督阮元¹¹疏禁鸦片，时鸦片输入中国年以万箱计。

一八二三年 清道光三年

清廷定察禁鸦片条例。

一八三零年 清道光十年

清廷定查禁内地行銷鸦片章程。是年四月，英人商馆有妇人来访，十一月又有归国妇女来粤，皆以违禁起纷议。

一八三四年 清道光十四年

东印度公司被解散，英派律劳卑来华¹²为贸易监督官，中国不允，仍视为大班，英遂以炮舰二艘攻虎门，进泊黄埔。

一八三六年 清道光十六年

英派义律¹³来华。

一八三八年 清道光十八年 日天保九年

英派海军少将梅特兰¹⁴率兵舰来华，清廷烟禁益厉。荷兰人来日本，密告英人莫利逊将至日本。

一八三九年 清道光十九年 日天保十年

林则徐¹⁵焚毁英商鸦片一万九千一百七十九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共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下令沿海州县绝英人薪蔬食物，义律以军舰炮击九龙。

一八四零年 清道光二十年 日天保十一年

英帝国主义以炮火攻破中国门户，是为鸦片战役。

一八四一年 清道光二十一年 日天保十二年

英帝国主义者挟战胜之威，迫我偿军费六百万元，割香港，我

不允，和议又裂。广东三元里乡民奋起平英团，集众数万。

一八四二年 清道光二十二年 日天保十三年

英帝国主义者迫我缔结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许英人通商及居住，割让香港，开协定关税之渐。是年冬，粤人闻广州开港信，聚数万杀英人于市，焚其商馆。

一八四四年（二月） 清道光二十三年 日天保十四年（癸卯十二月二十七日）

日本朝野闻英人莫利逊将至，甚恐，拟炮击英人。兰学者高野长英着[著]《梦物语》，渡边华山著《慎机论》，以风当局，痛陈盲目排外之危险。以是触当局，下令逮捕，华山被捕后，长英亦自首。荷兰王威廉麦塔致书日本，请以华事为前车，速开海禁。

一八四五年 清道光二十五年 日本弘化二年

英人谋入广州，粤民举行团练，每户三丁抽一，百人一甲，八甲一总，旬日间城乡镇市灯旗相望。粤绅潘士诚延法造船炮、水雷，谋战守，英人惧，不敢入城。

一八四六年 清道光二十六年 日本弘化三年

耆英¹⁶与香港总督台威士¹⁷私约，不割让舟山列岛于他国，而将英人人广州城之要求，约以延期二年，再为实行。

一八四九年 清道光二十九年 日本嘉永二年

香港总督以兵舰入舰[粤]河，迫中国践耆英延期二年之约，要求准英人人城。两广总督徐广缙¹⁸集乡团十余万于河干，自诣英舰，告以粤民不可侮。英人谋扣广缙以为质，两岸乡团呼声震天，英人惧，不复言入城事，改定广东通商专约，永禁英人人城。

一八五零年 清道光三十年 日本嘉永三年

洪秀全起义于金田。

一八五一年 清咸丰元年 日本嘉永四年

太平军据永安，洪秀全自称天王。

一八五三年 清咸丰三年 日本嘉永六年

英国提督彼理率军舰四艘来日本浦贺，旋由浦贺入江户湾，迫使日本通商互市。俄提督普嘉青率军舰四艘来日本长崎，要求日本通商互市。太平军攻克南京，英国全权公使普衡至南京通牒太平军，严守中立。三点会占据厦门，旋即被逐。又占上海与太平军通款，上海法帝国主义者助清军以武力干涉之。

一八五四年 清咸丰四年 日本安正元年

香港总督鲍灵¹⁹率英海军与清总督兵联合保守广州，追击太平党兵船，视为海盗。是年英人更在上海干涉太平军。美提督彼理再率兵舰九艘来日本浦贺，将入神奈川，江户湾，日本幕府全权代表与彼理在横滨开始谈制[判]。神奈川条约签字，是为最初之日美条约。日本吉田松阴因犯国禁欲航美，入狱。日兰条约在长崎签字，日俄条约在下回(关)签字。

一八五五年 清咸丰五年 日安政二年

三点会在上海因受美、法联军之压迫，粮绝出城，惨遭屠戮[戮]。

一八五六年 清咸丰六年 日安政三年

英人以亚罗船事件²⁰搆衅，兵陷广州，放火焚衙署，英兵退，粤民乃焚美、法、英各商馆，及十三家洋行。日本设立讲武所、蕃书调所，在大版[阪]两川口筑炮台。美使哈利思来日本，驻下田。

一八五七年 清咸丰七年 日安政四年

英、法联军陷广州，英军掳叶名琛去，遂据广州。英使额尔金、法使噶罗、美使利得、俄使布恬廷至上海，连名致书清大学士

裕诚，请派员赴上海商善后，清廷拒之。日俄、日兰追加条约签字，幕府全权议定美使提出之条约草案，约以翌年正月五日幕府开江户、大阪、兵库、新泻，两都二港通商。

一八五八年 清咸丰八年 日安政五年

英、法联军北犯，俄、美遣舰从之，陷大沽炮台。清廷遣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赴天津议款，六月与美[英]、法定天津条约，英约五十六款，法约四十二款，除增开口岸、赔偿军费、允准传教外，凡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制、最惠国条约等，均于此条约规定焉。时广东佛山镇绅民办团练，悬赏购巴夏礼头并谋以团练攻广州联军，不果。是年订中、美通商条约，凡十款。英公使额尔金巡扬子江，自上海至汉口，过南口[京]不遵太平军定则，以炮艇尔伊号前行，不通知附近炮台，遽驶入港，太平军开炮，英海军还击，翌日竟攻击炮台，历一小时半，太平军知系英舰，不再回击。

一八五九年 清咸丰九年 日安政六年

英、法公使赴北京，强由大沽入口，轰击大沽炮台。日本开横滨、长崎、函馆三港。

一八六零年 清咸丰十年 日安政七年

英、法仍以额尔金、噶罗为特派全权公使，英遣格兰特、法遣蒙地板，合将海陆军二万五千人北犯，破天津、北京，僧格林沁、胜保军先后败溃，清帝避热河，英军纵火焚圆明园，遂于是一年十月与英、法订北京条约，除实行天津条约外，又增天津为商埠，并赔偿英、法军费各八百万两。是年始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太平军攻克无锡、金坛、宜兴、嘉兴、湖州等产丝区域，后李秀成即督师攻上海。英人卜罗斯以通商大臣资格，通告以武力干涉中国内乱，保护上海。太平军李秀成致书各国领事，声明如再助清，惟有停止本国境内与外人一切贸易。

一八六一年 清咸丰十一年 日本文久元年

英海军大将何伯训令亚柏林舰长干涉太平军入上海或吴淞境内，干涉太平军攻击宁波，并与太平军关税冲突，但宁波卒为太平军占领。何伯再至南京，要求太平军再缓一年用兵上海，太平军不许。

俄舰至日本对马，图占领。长井雅乐至日本京都，奏《开国论》。

一八六二年 清同治元年 日本文久二年

英舰在长江为清军输兵士，并接济军火。英、法联军干涉太平军用兵上海，与太平军开衅。太平军为英、法联军所败。英将何伯伤腿，法将卜罗德阵亡。英海军助清军夺回宁波，英人与清恭王勾结，组织中、英舰队。美人华尔战死，所练之华兵改隶英国陆军。清廷与英续订长江通商章程七条。日本岛津三郎发江户，其从士在生麦杀遮断行队之英人。高松晋作、久板立[玄]瑞等烧品川御殿山新筑中之英国公使馆。

日本幕府以攘夷敕旨达诸侯，征意见。

一八六三年 清同治二年 日本文久三年

任英人赫德为总税务司，自是迄一九零九年始归。英管我海关全权，凡四十余年，同时实清廷一最高之外交顾问。又，是年李鸿章以英将戈登，统常胜军助平太平天国。

日本天皇祈攘夷，长井雅乐自杀。

幕府对英支付生麦事件赔款四十五万元。长藩兵炮击通过马关海峡之英船，又在马关炮击法船，又炮击兰国军舰，又在马关炮击美军舰，法军舰炮击马关，长藩兵与之战。英舰七只，入鹿儿岛湾，要求生麦案赔款，萨藩不听，遂开战。幕府派池田筑后守等使欧谈判锁港。日、瑞通商条约签字。

一八六四年 清同治三年 日本元治元年

太平天国之洪秀全自杀。

日本水户尊攘党倡议攘夷，池田筑后守等报告各国，不容锁港。英、美、法、兰联合舰队十八只，炮击马关，长藩与之战，败而讲和，幕府赔款四百万元。

一八六五年 清同治四年 日本庆应元年

英、法、美、荷四国公使等率军舰九只到日本兵库，迫批准条约，虽允批准条约，而兵库开港未许。

一八六六年 清同治五年 日本庆应二年

孙中山先生诞生。

列国公使等迫日本幕府改正税则。

一八六七年 清同治六年 日本庆应三年

英人苏哲兰发起创办汇丰银行。

日本明治天皇即位，敕许兵库开港。下讨幕密谕于萨、长。敕谕王政复古。

一八六八年 清同治七年 日本明治元年

各国公使觐见日皇，英公使巴库斯为暴徒所（要）击。

一八七一年 清同治十年 日本明治四年

日本派外务大臣岩仓突视为全权大使，赴欧美提议修改不平等条约。

一八七二年 清同治十一年 日本明治五年

清廷与日本改订商约。

一八七五年 清光绪元年 日本明治八年

英人欲从印度侵入西南各省，印度政府遣大佐布罗，率印度、缅甸兵士百余人，谋从缅甸入云南，北京英公使威妥玛遣书记官玛加理为布罗助，是年二月玛加理为云南土人所杀。

一八七六年 清光绪二年 日本明治九年

因玛加理事件与英订烟台条约²¹，除赔款、谢罪、增开商埠并

重申领事裁判权外，又以专条规定英国得遣人由中国内地或印度入西藏，英人侵略西藏自此始。是年郭嵩焘²²使英。日本神风党乱作。

一八七九年 清光绪五年 日本明治十二年

日本井上鳌为外务大臣，向列强提议修改不平等条约。

一八八四年 清光绪十年 日本明治十七年

法帝国主义侵略安南，清廷下诏与法国宣战。

一八八五年 清光绪十一年 日本明治十八年

清廷与法国议和，订越南新约十款，开龙州、蒙自、蛮耗为商埠。清廷与美国订烟台条约专条十款，与日本订朝鲜撤兵条约三款。

一八八六年 清光绪十二年 日本明治十九年

清廷与法议定越南边界通商条约十九条。英灭缅甸，清廷与英订缅甸条约五款，承认缅甸为英国属地。

一八八八年 清光绪十四年 日本明治二十一年

日本大隈重信为外务大臣，依国别谈判法与列强谈判，废止不平等条约。

一八八九年 清光绪十五年 日本明治二十二年

英灭哲孟雄王国，并逐在哲孟雄之西藏军，谋西藏益力。

日本大隈重信因向列强交涉收回领事裁判权，略事让步，为舆论所不满，来岛恒喜以炸弹狙击之，大隈被炸去一足。

一八九零年 清光绪十六年 日本明治二十三年

与英订藏、印条约八款，正式承认哲孟雄属英，并规定西藏哲孟雄界线，及藏哲通商事。

一八九二年 清光绪十八年 日本明治二十五年

日本陆奥宗光为外务大臣，继续向列强提议废止不平等条约。

一八九三年 清光绪十九年 日本明治二十六年

与英订藏、印续约九款，开西藏之亚东为商埠。

一八九四年 清光绪二十年 日本明治二十七年

日帝国主义侵入朝鲜，中、日开战。日、英改正条约成功。

一八九五年 清光绪二十一年 日本明治二十八年

清庭[廷]派李鸿章与日本议和，订马关条约十一款，另约三款，割辽东、台湾，开沙市、苏州、杭州为商埠。台湾宣告自立，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还辽东半岛。

一八九六年 清光绪二十二年 日本明治二十九年

俄占旅顺，法占广州湾。

一八九七年 清光绪二十三年 日本明治三十年

德国教士在山东曹州被杀，德海军占领胶州湾炮台。

日本国民废止不平等条约运动完全成功。

一八九八年 清光绪二十四年 日本明治三十一年

德租胶、澳；俄租旅、大；英租卫[威]海卫及(九)龙。

一九零零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 日本明治三十二[三]年

义和团运动起，八国联军入京，大屠杀，清帝、后出奔西安。

一九零一年 清光绪二十七年 日本明治三十三[四]年

列强迫我订辛丑条约，赔款四百五十兆两，拆毁天津城垣、大沽炮台，允许外人在京津一带驻兵。

(辛丑以后年表当续登)

署名：猎夫

《政治生活》第 50 期

1925 年 9 月 9 日

本文发表时有多处年代前后排印错乱，此次排印时一一作了改正。

- 编者

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国内战争的形势，是一个三角关系的形势。形成这三角关系的三个势力（国民军、直系、奉系），相互的每个势力都有两个仇敌。惟其如是，所以他们中间的离合变化的关系，异常的复杂而各有顾虑，同时由他们中间关系所推演的时局进展，亦异常的迂缓而不明了。

孙传芳发难¹以来，奉系军阀所以着着北退的原故，固然在战略上是为求缩短战线，而其中心所怯惧者，乃眈眈虎视于其旁的国民军。奉军第一步的战略，是以徐州的防御交给张宗昌，而以其主力军屯驻于京津一带以监视国民军，尤其对国民第一军特别严重的注意。徐州一败，不但没有转移奉系的主力军于援助徐州的方面，而反使之对于国民军尤其是第一军更由监视而进于压迫。奉系的压迫国民军²，可以说是对于国民军真实态度的试探。这一试探果然探出冯玉祥的态度与决心，探出第一军退守南口的战略，探出国民军恢复保大以完全京汉、京绥二路的连[联]络、划出天津为公共使用海口之期于必达的要求。这些事实既经依奉军压迫京畿而探出以后，在奉军一面，表面上乃不得不暂示妥协以为展缓，战略上似仍集中其主力军于赤峰，在热河方面骤现益趋严重的形势。在国民军一面，沿京汉路北进和沿各要路由河南向山东北进的军队，听说还在浩浩荡荡的前进而并未停止。

段祺瑞明令各派军队都回原防，而以防护京汉全线铁路的责任交给冯玉祥和岳维峻，这明明是于国民军有利的³。冯玉祥已通电表示接受此命令，同时传说第二军的军队已经占据了保定，可是别一面又说奉军仍在保定一带正掘战壕。这样一种形势，只能说是战局酝酿的推移，不能说是和局告成的结束。国民军与奉军的破裂，在保定方面，热河方面，仍然是在一触即发的形势之下。

山东奉军败退之余，已不堪再战。在最近期内山东不归国民第二军，即归直系，可以断言无疑。孙传芳占领徐州后，似不愿再行北进，其原因大约有四：（一）不愿离开在全国中独擅精华的江浙；（二）闽军因广东革命军追击入闽之陈炯明故急急退回；（三）苏军内部不甚安靖；（四）以山东与国民二军，使与奉军接触。而由国民军方面而言，二军之在河南者，久已有人满之患。从前三军入陕，即为就食，不料入陕之后，军食之难，亦复如故。现在因为时局紧急，陕北各军及国民三军，均皆相继出关。这样浩大的就食无地的军队，都聚集在河南一隅，自然的要向山东发展，有不可遏抑的势子。

综观时局的现象，在北方，奉系军阀已经神气沮丧于民众威力所指导的反奉联合阵线之前。奉军所以不敢逼入京畿的原故，民众反奉的气势，亦颇与[为]有力。反之，国民军因为得到民众的援助，虽然尚未加入战争，而所处的地位，比从前已较为强固。直系军阀，此次乘民众反奉的怒潮而再起，其初虽借口于奉系军阀之如何压迫民众为其发难的理由，但其自身在沪、汉各处的行动，压迫民众仍与奉系军阀同其行径。全国民众对于照样压迫民众的直系应即提出严重的抗议，切实的指出直系压迫民众的事实，要直系知道他如不改易其类似奉系军阀的行动，民众将以其曾经反抗奉阀者以反抗直系，则直系亦终于继奉系之后为民众所征服而后已。在南方，广州革命政府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于荡平东江⁴之后，

西江以及南部，亦将指日肃清了。这些事实，都是民众势力发展的验证，亦是民众势力作最后胜利以结束国内战争的朕兆。

署名：猎犬

《政治生活》58期

1925年11月18日

土地与农民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

一、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运动

在中国历史上，自古迄今，不断的发生平均地权的运动。关于井田制度，虽尚有人抱是否曾经实行的怀疑¹，然自周秦以来，为谈政者一种理想的土地制度，则确为事实；而原始经济的状态，有一个土地共有的阶段，亦确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井田制的根本要旨，乃在收天下土地为公有，而均分之于各家，使他们收益使用，是一种比较完满的土地国有，平均的授与农民耕种使用的制度。中国古代，似亦经过此阶段，直至春秋战国时，土地私有制才渐次确定。

汉时，土地兼并的风潮盛，贫富日趋悬绝，故武帝时，有一种限田制的建议，而迄未能实行。至王莽²时，依据《周礼》名天下的田地为王田，作为公有，而禁止买卖，规定一家占有额不得过一井九百亩，有余田者，分与九族乡党，犯法者处死刑。不久反动起，故当时的土地问题终于未能解决。

晋代的占地制度，乃在应人民的男女年龄，课以一定额的土地，使他们耕作。无主的土地，亦使人们工〔耕〕作，同时且限制王公官吏的占有额。此其目的，乃在增加税源，故豪强兼并土地的问

题，依然无法解决。

后魏孝文帝容纳李安世的建议，设均田法，要把天下的田地，均分给人民。均田法的大要，是把田地分为露田与桑田二类。民达十五岁，男子给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女子给露田二十亩，奴婢准于良。丁牛，给露田三十亩。露田，即种谷的田。民年及七十，或身死，则归还于官府。桑田，是种桑榆的田，身死不必归还于官，许为其家的世业。土地的还受，在每年正月调查人时举行。此等土地政策，皆因大乱以后，人民离散，土地荒芜，豪强跋扈，税制紊乱，乃谋所以安插游民，奖励稼穑，以荒闲的土地给与贫民，以图增加税源的方策，而非根本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

唐武德七年，立租庸调税法。依此法则，男子达十八岁，每人给田百亩，其中以八十亩为口分田，以二十亩为永业田；六十岁以上以迄老死，给口分田的一半，即四十亩；笃疾废疾者，给四十亩。女子在原则上不给土地，但寡妻妾，给三十亩，其为一户者，更增给二十亩，皆以其中的二十亩为永业田，余为口分田。奴婢与牛不给田。口分田同于露田，种谷。永业田同于桑田，植桑、榆、枣等树。田地的授受在每岁十月农闲的时候举行，是为班田法。班田法又谓集晋以来田制的大成，但其目的，并不在没收富者的田地以给贫民，而在整理租税，故许民迁徙，所分田均得买卖，而其给与亲王、郡王以下的永业田，乃至百顷、六十顷、五十顷之多，形成一种阶级制度。故农民仍多失产流亡者，豪强乘之，以行兼并。至安禄山乱，班田制遂废。此种土地阶级制的根萌，后来流行而为庄田制，形成一种封建的大地主阶级，用种种手段，兼并贫民土地，既夺其土地，复以重大负担，加于贫民。

宋代谋行限田制，以图稍加制止而终未著效果。金元崛起，挟侵人民族的威力，夺田甚多，致启民族的重大的恶感。明代庄田滥设，引起豪强兼并土地的事实。至武宗时，皇庄达三百余处，勋戚

庄田，尚不在此数，一庄有达二万顷者。富农多献地于王公，藉庄田之名以避赋役，管庄官及庄头，假威以雪民。清代因之，除将一部还于故主外，悉以之分给于满、蒙、汉军各八旗兵，更用跑马行圈的方法，圈地甚多，是皆谓之旗地。雍正年间，又于京兆固安县行八旗井田制，将官有地均分给八旗贫民。此不过为一部分征服民族，立一种保障特权的土地制度，而非解决全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

太平运动兴，实含有农民革命的意义。观于首事诸人，多为烧山种田的农夫、农村中落第的士子，并其攻下南京后（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即宣布一种含有均分共有性质的土地政策³，足以证明。此种土地政策，自然亦随着太平天国的灭亡归于消灭了。

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其中心亦在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惜其所拟的平均地权办法，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

二、中国今日农民破产的趋势

中国今日的土地问题，实远承累代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轨迹，近循太平、辛亥诸革命进行未已的途程，而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

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

中国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的经济，故以自耕农、佃户及自耕兼佃为最多（看第一、二、三表）。此等小农因受外货侵入、军阀横行的影响，生活日感苦痛，农村虽[遂]显出不安的现象，壮丁相率弃去其田里而流为兵匪，故农户日渐减少，耕田日渐荒芜。据农商部第九、第十次农商统计，因有兵乱省分未报不能得有完全的统计比

较。但就京兆⁴、直隶、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⁵十省区合计农家户数耕田多寡别，由六年至九年的统计比较以观，则知十亩未满及十亩以上、三十亩以下的户数，著见增加；三十亩以上、五十亩以下的户数，略见增加；而五十亩以上、百亩以下及百亩以上的户数，则著见减少。由此现象，可以看出中农破产的趋势。盖五十亩以上百亩以下，及百亩以上的户数减少，即其间有些破产而流为小农者，而小农户数的增加以此。由此趋势以推，则由小农完全丧失或弃去其土地，而或流于都市，投身于工厂，投身于人力车夫，或流为兵匪者，更不知凡几了。但五十亩以上百亩以下，及百亩以上的户数减少，一方面是中农破产而为小农的验证，在另一方面，亦有豪强兼并土地集中的意义。因为百亩以上者，可以自含至千亩、万亩乃至百万亩，而此百亩以上的各级户数，在统计上并未分别等差为之表出，此其中必有连阡连陌新兴的大地主阶级，吸收多数中农而集中其土地者等户数不必加多，而土地之量可以增至甚巨，此不可不注意者（看第四、甲乙二表）。且此统计完全的十省区，尚为秩序未大破坏的省分，其趋势犹且如此，其他西南各省，兵战连年的地方，农民困苦流离，其度更不知倍益几许啊！我们再把九、十两年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六省区合计起来的农家户数及农田亩数统计表比较以观，可以看出十年的自耕农、佃农，以及自耕农兼佃农户数，并自耕田、租种田亩数，逐渐减少。此殆由于十年以来，内战区域已扩至北方各省，故北方农民亦骤受与南方农民同样的影响。由此更可证明水潮似的全国农民破产的潮流，正在那里滔滔滚滚的向前涌进而未已〔已〕（看第二、三表）。

一、民国七年农商部统计中国全国农家户数表：

农户总数	自耕户数	佃农户数	自种兼佃
13,935,478[5]	23,381,200	11,307,432	9,246,843

依此统计，自耕农民之数多过佃农一倍。其中相差最甚者，为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则甚[所]差极微。此统计表不包涵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

二、民国九、十(年)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六省区合计农家户数统计比较表：

	农户总数	自耕户数	佃农户数	自种兼佃
九年	43,966,632	25,178,773	10,514,915	8,272,944
十年	16[0],887,751	3,050,603	4,538,798	3,298,350

因九、十年农商部统计只此六省区可以完全比较，故只就此六省区统计比较而概观其倾向。

三、民国九、十年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六省区合计农田亩数统计比较表：

	农田总数	自耕田数	租种田亩
九年	1,386.3(7)9,358	929,255,093	457,124,265
十年	566,623,293	380,256,861	186,368,429

园圃亩数不在此内，兼涵水旱两种田地。

四、京兆、直隶、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各省区合计农家户数耕田多寡别累年比较表：

	十亩未满	十亩以上	三十亩以上	五十亩以上	百亩以上	计
六年	10,014,232	2,507,719	4,978,728	3,052,774	1,855,960	22,409,413
七年	9,829,771	7,088,663	4,506,783	2,770,266	1,514,617	25,710,100
八年	10,689,877	7,610,145	4,673,203	2,997,940	1,375,054	27,346,219
九年	10,387,275	7,758,652	4,716,276	2,951,564	1,402,048	27,215,815

三、农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阶级 ——自耕农与佃农

在小农中，以自耕农为最多。据金陵大学《农业丛刊》第八号芜

湖一百零二农家之社会的及经济的调查，按农场所面积而分组如次表：

农场所面积分组	十亩以下	十一亩以上	二十一亩以上	三十一亩以上	总数或平均
各组在全数中所占之百分率	13.7%	50.0%	16.7%	19.6%	100%
农场所数目	14	51	17	20	102
平均面积	7.9	15.9	25.1	59.8	24.9

(佃户十三家)(农场所甚小)

据上表则知此一百零二家中以十一亩以上者为最多的户数，几占户数的一半。又据某机关在河南荥阳等县的调查，八个农村中的农民，亦以小自耕农占多数(看第五表)。由芜湖百零二农家生活调查，可以看出农场所大小与场主的利益有密切的关系。有十亩或十亩以下之场主中能得五十元以上的工作进款者，仅居百分之七，而那些有三十一亩以上的场主中，能得五十元以上的工作进款者，竟占百分之五十。就田产权方面说，田主的农场所平均每家二十亩，半田主平均每家三十八亩，佃户的农场所平均每家十五亩，此三者中以半田主一类的农民为最有利。盖因他们除自有的田地以外，尚租种他人的田地，故其农场所面积较其他二类农人为大，而其工作进款的数目，在此三类农人中，居于最高，平均为每人一百五十六元，故其生活状况亦较自耕农、佃户为享乐。其原因则由于农场所面积的大小，对于使用人工、畜工、农具等的效率，亦有一种确定联带的关系。在面积较大的农场，其工具设备的效率皆较高。其率如下：

大农场所男工的效率，等于小农场所男工效率的二倍；在十亩以下的农场所，每人仅能做五亩，而在三十一亩以上的农场所，则每人能做十亩。大农场所畜工的效率，几乎等于小农场所的三倍；在十亩以下的农场所，每畜仅做一〇·六亩，而在三十一亩以上的农场所，则每畜可做二八·八亩。其他农具设备之用于大农场所者，其效率等于用于小农场所者的二倍。准此则知此组农民之需要土地，需要较大

的农场，为最迫切。因为农具设备效率增大的结果，可以增大场主的利益，可以稍舒此级农民的痛苦（看第六表）。

五、河南荥阳五村、密县二村、汲县一村农民生活要项调查表：

所在地	河南荥阳周沟村	河南荥阳王庄村	河南荥阳鹿庄村	河南荥阳水磨村
户 数	35	20	110	200(又一调查达250户)
亩 地	600亩(大略)	250亩	1,600亩	2,000亩
人 口	150 男：80 女：70 壮丁：50	170 男：90 女：80 壮丁：40	800	800 男：450 女：350 壮丁：200
富 农	150亩(一户)	100亩(一户) 家口廿人	100亩以上 (一户)	100亩以上 (四户或云五户)
农 民	70亩以上 (三户) 50亩以上 (二户)	50亩以上 (二户) 20亩以下 (五户)	50亩以上 (五户)	70亩以上 (十二户) 50亩以上 (八户)
种 类	小自耕农 (十户)	20亩以上 (四户)	50亩以下 (六十户左右)	10亩以上 百余户
佃 农	二户其租地十亩，无地者二户	四户 无地者五户	三十余户，无地者十余户	佃农四户，无地者二十五户，雇工三十人
税 额	正税每亩五百文，杂税八百文	正税每亩五百文，杂税约六百文	正税每亩五百文，杂税本年二千文	正税每亩五百文，杂税本年二千文
地 主 与 佃 户	佃户须向地主纳每亩夏二斗、秋二斗	每亩须纳一半，有减让	佃租每亩须纳二斗	与周沟村同
雇 工	每日平均	约三百文		约四百文
工 银	每年平均	约二十八串		平均工资二十串
	备考	河南每串核银三毛八分三		

河南荥阳贾峪镇	河南密县柳沟村	河南密县赵庄	河南汲县塔岗村
200	100	65	80
2,000 亩	1,300 亩	830 亩	700 亩
1,600	500	330 男:161 女:169 壮丁:50	1,200
100 亩以上 (四户)	上富百亩户数未详	无	占全人口十分之一 (120)
70 亩以上 (三户)	中富五、七十亩间户数未详	90 亩者二户, 61 亩者一户	占全人口十分之三 (360)
50 亩以上约百户以上	下富三、五十亩共八户	自耕农三十五户, 亩数未详	占全人口十分之三 (360)
佃农八户, 雇工约五十人, 租地百余亩	佃农三户, 雇工六人, 租地约十余亩	佃农十七户, 约五百十余人	占全人口十分之三 (360)
正税占全收获百分之三(每亩), 杂税占百分(之)十一, 合计占百分之十四	纳税约需岁收百分之十二	正税每亩二百五十文, 杂税今年每亩五千	每粮三亩纳税六百文, 近则附加捐征大约每亩即出税一串四百文
未 详	未 详	佃户每亩三斗, 不减让。佃户多赔, 不敢抗租, 放债利息三分	村中土地多与佃户分种, 秋收后地主与佃户各分一半
七十串左右			三百文或一串左右
			七十串左右

六、佃户、自耕农、自耕兼佃周年进款比较表：

(甲) 农家周年现款收入的比较

半田主	267.15元
田主 (即自耕农)	120.05元
佃户	63.43元

(乙) 农家自用农产品价值的比较

半田主	269.53元
田主	17.81[171.81]元
佃户	125.19元

(丙) 合农家现款收入及自用产品价值而成的农家周年进款

半田主	536.70元
田主	291.86元
佃户	188.62元

四、耕地农有

在这种情形之下，“耕地农有”便成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怎样能耕地农有致之实行呢？每一农夫或含有一定人口的农户应有多少耕地？倒是一个极需讨论的问题。据前清乾、嘉、道、同诸朝的官家册簿，中国本部的耕地，大体以由七百四十万顷至八百万顷计，而欧人中推定中国耕地地积者有说是四十亿亩的，有说是二十四亿亩的。日本酒匀农学博士曾推定中国本部的耕地地积是一亿四千万町步。此等推算皆不能认为精确足信。夫全国总耕地地积及人口总数并其分布既不得正确的统计，则欲知农耕

地对全国版图总面积的比例，与对一农民耕地亩数的比例，无从推算而得有确准。一九一一年日人所出的《支那调查报告书》，曾就长江沿岸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个比较明瞭之省分试为考核，其结果如次：江苏对农民一人的耕作亩数为三亩强，安徽为二亩余，江西及湖北为三亩欠，湖南亦为三亩强。长江流域地沃人众，此比率虽未见足为全中国的准则，然大体固可以供我们的参考。又以距今八、九十年前清廷钦定的户部则例所载，十八省的耕作地积，分配于按民国十一年邮政总局所调查十八省的农民（按全人口百分之七十计），每人平均只得耕地二亩四分四厘有奇。若分省计算，则除甘肃每人仅得耕地八分，贵州每人仅得耕地三分，福建每人仅得耕地四分外，余则由一亩至四亩不等（看第七第八表）。至于多少亩足供若干人口的农户生活，则又因地质的良否而异。兹就一九二三年十月至一九二四年三月间华洋义赈会调查概算起来，较沃的田地每五口之家需十五亩至二十亩始能生活，较劣者则需三十亩乃至四十亩。这样算来，平均每人口所必需的耕地应为四亩至五亩。若以上述长江沿岸五个较为明瞭省分的调查为标准，则耕地实觉不足，而对每一农民的耕地为量亦不为多。可是现今的中国农业不但没有进步，而且却有退步，实在有复振或改进的余地。如果水利稍加整理，则农民生活必较今宽裕数倍，而且沿边省分待垦的田地以及内地各省为豪强所兼并或为兵匪所蹂躏而荒芜废弃的土地尚多。国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苟能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

五、农民的要求及我们怎样在农村工作

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已日趋于难境，重以兵祸连年，流离失所。入民国来，苛捐杂税，负担日重，各省田赋，有预征至数年后者。佃农及雇工所受的压迫，比自耕农更甚。凡有大地主地方的佃农，处境尤其苦痛而艰窘。有些地方的雇工工银极低，几乎决不能维持其生活，尤其在小自耕农众多的地方，更不易寻觅工作，只有流为兵匪，或流于都市去作苦力。试一考河南之农民生活调查，及华洋义赈会⁶ 在直隶、山东、安徽、江、浙等省之调查，均可看出农民常有移徙，生活变动日益转下，遇有婚嫁，即须负债之不安现象。乡村中旧有的农民团体，多为乡村资产阶级的贵族政治，全为一乡绅董所操纵，仅为乡村资产阶级所依为保障其阶级的利益的工具，不惟于贫农的疾苦漠不关心，甚且专以剥削贫农为事。在此等组织中，贫农几无容喙的余地。若想提高贫农的地位，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

随着帝国主义所造成军阀土匪扰乱范围之扩大，一般农民感有组织农民自卫军的必要。例如直隶、热河等处的保卫团及民团运动，均甚普遍。虽是等地域，前曾在奉天军阀支配之下，民间枪械多为奉军所搜去，而是等事实愈足引起一般农民组织民团之兴趣与希望。奉系军阀崩溃以后，各处民团运动一时呈出极盛的现象。此外如哥老会⁷、红枪会等皆为旧时农民的自卫的组织。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随着乡间的组织工作，当注意到乡

间的文化提高问题。到乡间去的同志们，应知利用农闲时间，尤其是旧历新年一个月的时间，作种种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为使此项工作多生效果，图画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均须预备，并须要联合乡村中的蒙学教师，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年来广东的农民运动，已著有成绩。陈、洪、杨、刘之败灭⁸，以及国民政府之巩固，得农民之助力不少。最近河南的农民运动亦颇著有成效。直、鲁一带农民自卫运动亦方在萌发中。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七、中国本部十八省地亩及人口表：

省名	地亩	人口
直隶	688,410 顷 64 亩	34,186,711
山西	532,845 顷 01	11,174,951
山东	984,729 顷 46	30,803,245
河南	718,208 顷 64	30,831,909
江苏	647,547 顷 27	33,786,064
安徽	340,786 顷 33	19,832,665
江西	462,187 顷 27	24,466,800
福建	128,626 顷 64	13,157,791
浙江	464,120 顷 26	22,043,300
湖北	594,439 顷 44	27,167,244
湖南	313,042 顷 73	28,443,279
甘肃	335,366 顷 21	5,927,997
陕西	258,420 顷 12	9,465,558
四川	463,819 顷 39	49,782,810
广东	343,939 顷 09	37,167,701
广西	89,601 顷 79	12,258,335
云南	93,177 顷 09	9,839,180
贵州	26,854 顷 00	11,216,400
共计	7,486,121 顷 38 亩	42[1]1,551,940

全国农民数目(以全国人口十分之七计算)二九五、〇八六、一五八人，每人平均能耕之田二亩五分五厘，此表共计本部十八省之数目

八、各省对于每一农民耕作地积表：

(以农民占人口总额百分之七十计)

直隶	每人平均二亩八分有余
湖北	三亩一分……
山西	一亩四分六……
湖南	一亩五分七……
甘肃	八分……
山东	四亩五分……
陕西	三亩八分……
河南	三亩三分……
四川	一亩〇分四……
江苏	二亩七分……
广东	一亩三分……
安徽	二亩四分……
广西	一亩〇分八……
云南	一亩三分……
江西	二亩六分……
贵州	〇亩三分三…
福建	〇亩四分一…
浙江	三亩………

署名：守常

《政治生活》62—67期

1925年12月30日

--1926年2月3日

青天白日旗帜之下¹

——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与北京市党部
举行的元旦升旗仪式上的演讲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今当民国十五年元旦，中国国民党在北京举行升旗典礼的日期，我们很是欢欣，同时我们又很是伤感。欢欣的，是这青天白日的革命旗²，已经很庄严的飘扬在中国首都的北京，作北方民众革命的指导；伤感的，是我们这一班同志在今年此季以热烈的情感共同庆祝升旗典礼的时候，不由的要追思那已[已]经离开我们的总理孙先生。前年此季，总理正在广州，于军书旁午的时顷，他还很忙碌的指挥同志们筹备国民党改组的事。记得总理那时曾命廖仲恺³同志告我说：总理要和京津的青年同志们谈话。总理把他们召集在面前，奋勉他们，鼓励他们，要他们努力于首都革命的运动，并且约他们于留在广州的期间，多来听总理训话。有一个同志问总理道：“总理每日政务军务很忙，我们什么时候来见好呢？”总理说：“政务军务无论如何忙迫，都可以暂搁，你们何时来，我便何时接见，因为党务比政务军务都要紧。”更有一位青年同志，问总理道：“广东的军队，何以不称为革命军呢？”总理说：“革命军这一个名称，不能轻易的被在目前纷杂的军队的身上，因为他们的无纪律、无政治教育，徒以引起广东人民的怨恶，丧失革命军的面目。

这一个好好的名称，还要留待给那方在创立中的黄埔军校⁴ 所造成的军队用。你们有志的青年，可以加入黄埔军校所造成的军队，才配称得起是真正的革命军。革命军的徽名，不能轻以加诸无纪律、无政治教育的军队，致为所糟塌。”由这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总理是如何的倚重北京的青年同志们担负这首都革命的责任，是如何倚重那黄埔的军校培成这可称为人民的武力的党军。可是从那时到今天，不过有两年的光景，广东的党军已经将广东全省的反革命势力肃清，这一幅表现国民革命精神的青天白日旗，也居然在首都革命的凯歌声中，飘扬在北京的空际了！假使总理在世，他看见我们举行升旗的典礼，该如何的欢喜？如今他却同仲恺同志都离开我们了！我们如何不伤感呢？

我们再回想去年此季，总理抱着满腔的热望来到北方，要和全国民众商量解决召集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二大问题，不料那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百般阻梗，以善后会议⁵ 阻挠国民会议，以“外崇国信”的谬论，阻挠废除不平等条约。其时不幸总理又以积劳成疾，国事逐[遂]误于媚外军阀之手。犹忆总理在病榻上，一听到“国民会议”及“党军在东江胜利”的消息，便色然喜；一听到“善后会议”及“外崇国信”的话，便怒不可遏。如今屈指以数，总理离开我们已快到一年了！我们的旗帜虽然高树在北京城，而国民革命的障碍，尚残存在政治中枢的地方，未能根本铲除，这又是我们于伤感之余，觉着有未能告慰总理在天之灵的。

我们的欢欣，我们的伤感，都能激动我们革命的情感，使之凝结而成为革命的勇气。我们总理的革命精神，是地久天长的如青天白日一般，照临着我们，指导着我们，陪伴着我们。我们只有鼓舞勇气，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牵起手来，向革命的战线上前进。

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的势力给我们的黑暗，只不过是过眼的云烟；民众的革命精神，正如皎洁的青天白日一样。民众要团结起

来，站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打破帝国主义及反革命的黑暗的势力！黑暗的势力，遮不住青天白日的光辉。

国民党改组以来，因为共产派的参加，党内有一部分人发生了误会。但我们相信这些误会转瞬即能消释，因为凡是革命者的襟怀必定是光明磊落的，必定能够肝胆相照，披诚相见。即有些微的误会，决阻隔不住革命者的声应气求，正如几点浮云，决遮蔽不住青天白日一样。我们国民党中的同志，不论他是共产主义者，抑是非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披肝沥胆的提携起来，把由内部发生的误会或敌人挑拨的造谣而生的疑云障雾，一扫而空之！

蒋介石同志在他所作的《〈黄埔军校同学录〉序文》中，有几句最沉痛的话。大意是说：“我们所能告慰先烈的，就在我们有总理遗留给我们的这一系相传的国民党内共产主义者与非共产主义者凝结而成的血统，缵继国民革命的大业。我们悔未问过那些殉死的先烈们，是为共产主义而死呢？抑为三民主义而死呢？但是我们可以替他们回答道：他们直接是为总理的三民主义而死，间接即为国际的共产主义而死。”我们同志们应该谛听介石同志沉痛的话，本着我们党内三民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凝结而成的精神，踏着他们提携前进的血路，为革命的工作努力，把一切的猜嫌疑忌蠲除净尽！

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派，仅[尽]管在那里造谣，以图低减民众对我们的信用，煽起我们内部的纷争；让我们保持住青天白日的光辉，照澈他们鬼蜮的伎俩。

近人评论现代的中国军人，每把“北冯”与“南蒋”并举，说中国军人以他们俩为最有希望，亦惟他们最易有走入歧途的危险。他们所谓“歧途”即是赤化。我们要知道一般人所以感觉着他们俩有希望的原故，正是因为感觉着他们俩有走入赤化的“危险”。因为

赤化不是旁的，就是民众化，就是武力的民众化。

又有人挥着青天白日的旗帜，喊出“青白化”的口号，来对抗赤化，反对赤化，似乎青白化与赤化是相反的东西，其实这是大错。青白化是革命的象征，赤化亦是革命的象征；赤色旗是世界的阶级革命的旗帜，青天白日旗是中国民族革命的旗帜，是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先驱。

在近来每次北京的民众运动中，布满全城的，不是青天白日旗，便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五色旗则独不多见。中外人每起一种怀疑，说中国民众已经废弃了国旗。殊不知这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正是国民领袖孙中山先生手订的国旗。这是中国国民党联合中国工农民众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的象征，亦就是中国民族联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及无产阶级企图世界革命的象征。

全国的革命者联合起来！

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中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元旦）

（中国国民党在北京举行升旗典礼之期）

署名：守常

《国民新报》副刊第 31 号

1926 年 1 月 8 日

新帝国主义战争的酝酿

(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

世界大战的血幕，依凡尔塞的条约¹ 掩闭了，紧接着就是国际联盟² 的创立和华盛顿军备缩小会议³ 的开会，仿佛像是靠着这些可以保住世界的平和似的，然而事实上却正相反。资本主义存在一日，决不能有真正的平和，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常常有战争的危险潜伏着。尤其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他最后的阶段帝国主义时代的今日，战争的危险更是一天一天的逼紧。

一九一四年那样惨酷的大战，只是英、德帝国主义间利润之争的结果。现在各国帝国主义者间利润之争，亦必然的要造成第二个世界大战，它的危机一天一天的迫切。

这未来的新帝国主义战争，恐怕要以中国及太平洋为中心。因为现在世界的资本主义都先要求他的安定，特别是曾为交战国的欧洲各国，拼命的努力回复其在世界战争中被夺去的东洋市场，想更把它扩大起来，使其自国的资本主义安定；而在另一方面，那乘交战国的欧洲各国埋首战争不暇东顾的时顷获得了东洋利权的英国，亦一样的拼命努力以图保持其既得的权利而勿失，且更以在大战中所得极大的利权[权]，发展其自国的资本主义，以其巨大的金融资本，垄断东洋的市场。日本的资本主义在大战中曾很快的发达起来，战后的大恐慌继以大地震，结果使资本急速的集中，金融资本的势力替代了从来的工业资本而增大起来，发展到少数金

融大王独裁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了。帝国主义的特征不是单纯的生产品的输出而是资本的输出，日本的帝国主义若不靠着输出资本于中国，即是投资于中国以获得在中国的利权，到底不能维持，不能发展。由这个事实看来，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为了获得在中国的利权，当然不能不发生冲突，冲突的极端，就是新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

现在各国尤其是英、美、日本三国都在那里很忙迫的准备这方〔未〕来的大战。英国谋筑要塞于新嘉坡，美国在太平洋举行大演习，日本把师团的数目减少，表面上装作像是实行缩小军备的样子，其实全然相反，他废止了几个师团乃是由于大战而生的武器革命、战术变更的结果。为补上师团废止的缺，正在那里施行对于一般民众的军事教育，十五岁以上到二十岁的青年则入青年团，过征兵期间一直到四十岁的人人在乡军人会，受军事的训练，同时更在中等以上的学校施行军事教育。现在日本文部省（即教育部）为行军事教育于未满某一定年龄的青年，定了四百五十万圆（日金）的预算，更定了国家总动员的计划，使民间工场制造多量的新兵器，靠着兵卒、新闻等鼓吹军国主义；在另一方面则以治安维持法抑压无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可以明明白白的看出各国的资产阶级正在准备那拿无产阶级大众作牺牲的新帝国主义战争的情形了。

这未来的新帝国主义战争，要以中国及太平洋为战场。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中国，即是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中国的民众应该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民众，起来反对这残忍的战争。

署名：守常

《政治生活》第 63 期

1926 年 1 月 6 日

在列宁逝世二周年 纪念大会上的演讲¹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同志们！列宁先生已去世二年了！他的死是世界的大损失，而且他给了我们很重的责任。今天我们追悼他，就回想到我们的中山先生。前两年我们在广州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列宁的噩耗传到广东，先生亲自出席大会来报告这不幸的消息，曾经有很沉痛的演说，使得到会的同志都有感动，都不能忘。去年今日，我们的中山先生便呻吟在床蓐之上，我们那时抽工夫来纪念列宁，而我们的领袖也就没有希望不能把他的抱负发展了！所以我们同时感觉列宁的死是个损失，中山先生的死也是我们的损失。二年以来，国民革命的局势如何紧迫，而两次死去我们的领袖，损失何等的重大，我们的责任更如何的重大！我们所以不能不联想到中山先生，而感觉自己[己]的责任更应该努力！

因列宁先生想到中山先生，我们就可以比较的看他们。中山先生的人格伟大，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列宁的人格伟大，也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在俄国的人民非共产党者，他们往往反对共产，却对于列宁个人非常崇拜。他们的革命精神，两人也有相同之点：列宁遇到反动不灰心不失望，中山先生亲自说过二次革命失

败亡命东京的时候，手下人人灰心，先生以为革命党人并没有损失，不必灰心，再干好了！这样，列宁精神就是中山精神，就是革命者的精神！我们应该服膺这种精神！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策略。中山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与策略。在理论上，中山主义与列宁主义是可以联合成一贯，策略上也是能联贯一致的。所以，列宁主义者可说就是中山主义者；中山主义者也就是列宁主义者！他们的主义同是革命的主义。假使中山生在俄国，他一定是个列宁；假使列宁生在中国，他也一定是个中山！他们主义表面看起来不同，实在是他们环境的不同。中山先生与列宁的目的相同，可是惜乎环境不让他实现得如列宁那样成功！他最初想联合菲列宾，先帮助他们革命成功，再来实现中国的革命。中国国民党最初有日本的革命党人。这都是他主张联合世界革命的表现，与列宁的主张相同。他们主张以党治国，列宁主张以无产阶级的党治国，中山主张以国民党。党的制度是集权，两两相同。何以列宁能够在俄国革命中表现出他主义的成功，而中山先生不能呢？这全是环境的不同，我们的经济落后。他们两人的思想和人格的伟大，全无异点。

前年广州大会追悼列宁，中山先生演说，非常沉痛。他说：“列宁死了，俄国决不危险，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很完密坚固的组织。假使我死了，你们看中国如何？我们的党如何？”我们听了非常悲伤。他当时的遗言，现在如何？他那时就教我们好好组织，就把革命责任交给了我们！即如把共产党加入组织，就是他自己将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亲手给连接起来了。他的主义，我相信现在还没有把光华发扬得出来，将来全世界的革命成功，才是中山主义的胜利！我们那里好分出什么此疆彼界来，谁是中山主义者，谁是列宁主义者？现在无论列宁主义者或中山主义者都不应该两下分

离！等到中山主义胜利的时候，也就是列宁主义胜利了！在坐的同志们，你们不管是列宁主义信徒，中山主义信徒，应该紧紧的连[联]合起来！

《政治生活》第 66 期

1926 年 1 月 27 日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 革命史上之位置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由一八四〇年英人以炮火击破中国的门户，强行输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中经英法联军之役、中法之役、中日之役、庚子联军之役、日俄之战、日德之战，一直到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沙面、汉口、九江等处，对于中国民众的屠杀，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

由一八四一年，广东三元里乡民因愤英人挟战胜的余威，迫我偿军费六百万元，割香港，集众数万，奋起平英团。一八四二年粤人听到英迫我缔结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开五口通商，割香港，留下协定关税的根萌的消息，聚众数万，反抗英人，焚其商馆。一八四五年粤民举办团练，抗拒英人复入广州。一八四九年，粤人集乡团十余万于河干，拒禁英人入广州城。中经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三合会¹、哥老会覆清仇洋的运动，乃至白莲教支流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运动，强学会²、保国会³的立宪运动，兴中会⁴、同盟会⁵的革命运动，一直到由“五四”到“五卅”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

这一条浩浩荡荡的民族革命运动史的洪流，时而显现，时而潜

伏，时而迂回旋绕，蓄势不前，时而急转直下，一泻万里。他的趋势是非流注于胜利的归宿而不止。简明的说，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只在压迫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完全消灭的时候，才有光荣的胜利的终结。

孙中山先生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实据有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净尽。他整理了许多明季清初流衍下来以反清复明为基础的、后来因为受了帝国主义压迫而渐次扩大着有仇洋彩色的下层结社，使他们渐渐的脱弃农业的宗法的社会的会党的性质而入于国民革命的正轨。他揭破了满清以预备立宪欺骗民众的奸计，使那些实在起于民族解放运动而趋入于立宪运动的民众，不能不渐渐的回头，重新集合于革命旗帜之下。他经过了长时期矫正盲目的排外仇洋运动，以后更指导着国民革命的力量，集中于很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战斗。他接受了代表中国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员，改组了中国国民党，使国民党注重工农的组织而成为普遍的群众的党，使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很密切的与世界革命运动相联结。他这样的指导革命的功绩，是何等的伟大！他这样的指导革命的全生涯，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要想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及其事业的重要，必须先一一考察他的时代及境遇。先生的生存期，是从一八六六年到一九二五年，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酷烈的时代。先生的诞生地是广东省的香山县，距广州很近，广州是中国开放海禁最早的地方，这是帝国主义最初侵入中国的门户。西历纪元四世纪时，印度南洋一带，已有闽、粤人的足迹。十世纪至十三世纪间，是广州的繁盛时代，最初来广州的是阿拉伯人⁶，欧人是西、荷、英等国人。

一七八四年美舰“中国皇后”号到粤。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成为澳门的季节出张所，外国在那里设立商馆，只准经过行商的手，与中国贸易。中国对于居留广州的外人，设有种种的限制。一六〇〇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以来，耶利查别士女士[王]⁷特许其有对华贸易独占权。到了一八三三年，对华贸易权才由东印度公司转移到私人商业手里。在这东印度公司有对华贸易独占权的期间，英帝国主义者只是羡慕葡人先占的澳门，只是常常在广州的门户以外徘徊着，想伺一个机会进来占据广州，像葡人占据澳门一样，但是因为广东民众严密的监守，强烈的抵抗，终于没有能够偿了他的愿望。所以一八三〇年以前，中、英商业的平准，还是于中国方面有利，银货不断的由印度、英国、美国输入中国。在那个时候，英棉及一定限度的羊毛亦输入了少许。一八三三年以后，英棉及羊毛继长增高的以巨额输入于中国。鸦片的流毒，像潮水一般的涌进来。中国的银币，亦像潮水一般的流出于印度，几乎耗尽了中国民族的膏血。在那一世纪，英国政府的收入有七分之一靠着卖鸦片于华人，同时印人需求英国的制造品，亦全靠在印度的鸦片的出产。那时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输出于印度的商品额量日以增高，则其取自印度而需要卖给华人的鸦片额量，亦必随着增高。英国此时需要打破中国门户，不仅是为印度出产的巨额鸦片谋一尾闾，并且是为那在他本国畅旺出产的制造品谋一销售的市场。英人为达此目的，乃于一八四〇年用猛烈的炮火，攻击中国南方不给外人开放的门户——广州，以武力强挟鸦片及其他商品等经济势力，压迫中国。结果英国的炮火打破了中国的门户，帝国主义遂由广州侵入了中国。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洞开，外国商品因得以畅行输入而无阻。这个外国制造品的引入，对于本国的制造品自然要发生破坏的影响。此时这个影响于中国与其曾影响于小亚细

亚、波斯、印度者，全是一样。在外货竞争之下，中国的纺者织者遭遇了最大的艰难，社会生活随着外货压迫的比例，呈出不安的现象，发生了破产的手工业者及农民的大众，加以鸦片的不生产的消费，因鸦片贸易而生的贵金属流出，鸦片战争的对英赔款，以及关于鸦片贩卖的贿赂公行，以及公家行政的弊端百出。总此诸因，增加了巨大的人民负担，新税增设，旧税增额，遂以酿成太平天国的大革命。

太平天国的运动，是并合明亡以来“反清复明”的民族运动，随着外力侵入中国的耶教运动，以及骤变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压迫而发生的国民革命运动三大系统，汇注而成的。有明既亡，许多孤臣遗老，亡命南来。在闽、粤一带的下层民众，留下了秘密组织，把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深深的散布在中国民族最深最下的层级，希图保存其种萌，而待时以发育。这个藏留民族思想于下层阶级的事实，足以昭示吾人以革命的力量，常含蓄于工农阶级的下层民众之间，并且预示吾人以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多半要靠工农民众的努力。闽、粤一带以及海外的三合会（一名天地会）即是这种反清复明的秘密团体。太平天国的运动中，亦曾容纳了三合会的一部。太平党与三合会的宗旨不能尽合的地方，约有二点：（一）太平党信耶教，而三合会信道教与佛教。（二）太平党主张于颠覆满清以后建立新朝，而三合会则主张恢复明室。故二者未能完全合一。至于反清复明的民族运动，在满清初入关时，已经与耶教思想有了接触。明室遗族在广东曾与罗马教皇有文书的往来，明皇族及其遗臣，那时已有百数十人加入耶教。太平党人之有耶教的关系，一方是那个时代随着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耶教影响的反映，一方是明末的民族思想与耶教思想结合的历史的因缘。看那太平党人的教主“朱九畴[涛]⁸”、“洪秀全”的名字，便知他们的教门，必与朱明子遗洪门会党有所渊源。

太平天国的半[年]代，是由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六四年。在这十四年间，正是英产业发长最猛的年代。这一班抱有民族思想的农村的青年们，身受外来经济的压迫，目击鸦片的流毒，以及官僚政治的腐败，自然要发号召那些种田烧山不能自给的农夫，破产失业的手工业者，以及那些因为贿赂公行而进身无路、落第不平的士子起来，恢复他们的民族的国家了。

太平天国的运动，是满清入关以来中国民族反抗满洲的民族革命运动，同时亦是反抗帝国主义武力的经济的压迫的民族革命运动。他们的严厉的禁吸鸦片，便是表示他们对帝国主义者以炮火护送进来的毒物，非常的厌恶，同时又是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下的农民革命运动。看他们占据南京以后，颁布了一个含有均平性质的土地令，便知那次的革命，多半起于农民经济的要求。

太平党人虽然知道鸦片是帝国主义者麻醉中国民族的毒物，而不知宗教亦是帝国主义者麻醉中国民族的东西，其作用与鸦片一样。他们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宗教观念，在好的方面减少了狭隘的人种的仇视，在坏的方面，遮蔽了帝国主义者凶恶的真相，埋没了这次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使他们没有看清他们所认为洋兄弟的，可以摇身一变而为扶助满清、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的长胜军。

一八五〇年顷，英国产业有猛厉无比的发展，有濒于产业的危机的征象。即有大规模的移民出国，即有加里佛尼亚与澳洲，仍不能调剂英国产业伸张与市场扩大的平衡。当时英国茶税的减低，希望以增加茶的输入，奖励增加对华制造品的输出，就是为了开新市场扩旧市场的必要。太平天国动乱，缩小了英国制造品的市场，可以使英国产业危机的迫至，加速社会革命。大师马克思在当时说过，“英国造成了中国的革命，中国的革命将要反响于英伦，经过

英伦，反响于欧洲”⁹。所以英国对于太平军动乱取两面的态度，一面利用这次动乱，与法国联军压迫满清，使他放弃那天朝上国妄自尊大的态度，而不得不降服于帝国主义之前，许与增开口岸，为帝国主义者扩大市场；一面以武力干涉太平军，使之不能入重要的港口，援助满清，以消灭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观于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成立以后，英公使巡游长江过南京时，以炮艇轰击南京太平军的炮台。一八六〇年李秀成攻克上海时，英人卜罗斯以通商大臣的资格，通告以武力干涉中国的内乱。一八六一年英海军大将何伯训令亚柏林舰长，干涉太平军入上海或吴淞境内，干涉太平军攻击宁波，并与太平军关税冲突。一八六二年英舰在长江为清军输送兵士及接济军火。英、法联军以武力干涉太平军入上海。英海军助清廷收回宁波。英人与清恭王勾结组织中、英舰队。一八六三年李鸿章以英将戈登统所谓长胜军，助平太平天国。至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亡。

这样看来，太平天国的灭亡，不是亡于满清，乃是亡于英、法帝国主义者。满清降服于帝国主义者，以中国民族的权利，贡献于其前。他们遂助满清，扑灭了含有民族革命性的太平军。自是以来，援助反动势力以扑灭民族革命运动，遂成为帝国主义者宰制中国民族的传统政策。

在太平天国的动乱中，英、法忙于侵略中国的时候，美国的势力遂压迫到日本，以后各国踵至，日本民族亦受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

这是太平天国时代帝国主义压迫东方的大势。

太平天国虽然灭亡，可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未即此而中断。太平天国灭后二年——一八六六年孙中山先生诞生。由一八六六年到中山先生逝世的一九二五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总在那里蓬蓬勃勃的向前涌进。中山先生在这个运动中，是个惟一的指

导者。他以毕生的精力，把中国民族革命种种运动，疏导整理，溶解联合，以入于普遍的民众革命的正轨。他那临终的遗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

先生所生的时代及其环境，在在都使他自觉其所负民族的历史的使命的伟大；英、法帝国主义的跋扈，太平天国的痛史，在在都足以激动他革命的情绪，而确立其决心，帝国主义对于中国进攻加紧一步，他的革命的奋斗（便）猛进一步。

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的正统，而淘洗了他们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整理了三合会、哥老会一类的民间的民族的结社，改进了他们的思想，使入于革命的正轨。一九〇〇年合并兴中会与三合会、哥老会而为中和党¹⁰、兴汉会¹¹。一九〇五年，又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又在东京改组中华革命党。一九二四年又在广州改组中国国民党，容纳中国共产党的分子，使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联成一体；使民族主义的秘密结社，过渡而扩成现代的工农团体，一体加入国民革命党；使少数革命的知识阶级的革命党，过渡而成为浩大的普遍的国民的群众党。这都是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继往开来，铸新淘旧，把革命的基础，深植于本国工农民众，广结于世界革命民众的伟大功绩。

《国民新报·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

1926年3月12日

在清华学校追悼孙中山会上的讲话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

今日追悼孙先生，吾人即想到他在国民革命史上之地位。中山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国被外国力量所侵略，为外人经济（掠夺）的时代。孙中山先生相信三民主义，以抵抗一切帝国主义者，则是一方面结束以前的历史，一方面开新的道路，其为功实甚伟大。

《清华周刊》第 25 卷第 4 期

1926 年 3 月 17 日

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

(一九二六年五月)

马克思批评当代历史事实的论文，是无产阶级研究马克思的人们绝好的材料的宝藏。我们现在要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就中国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寻求一个显明的分析，最好是一读马克思当时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从此我们不仅可以得到他的公式，我们更可以看出他怎样的应用他的研究的方法，以解剖那赤裸裸的历史事实，整理那粗生的材料，最后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

前年莫斯科无产阶级政治论坛，曾有一度勃兴了研究中国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的狂热，拉荻客¹ 在《真理报》上发表论文，谓太平天国的变乱，恰当马克思生存的年代，何以偏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找不出关于此事的评论？近者美国出版的《工人月刊》载有马克思《中国及欧洲的革命》² 一文，这是非常重要的材料。足见马克思的著作，还有很多埋没在图书馆的故纸堆中的，真是可惜！马克思这篇论文是一八五三年六月在《纽约日报》发表的。原来马克思充该报的外国通信员，是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二年的事，而太平天国的年代恰恰是由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四年，正与马克思在《纽约日报》上发表论文的年代相值。这一篇论文，说明太平天国的变乱实为大英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第一次中国国民革命的大运动，并且指出中国的革命将要影响于英国，经由英国影响于欧洲的关系。这实在值得我们的注意研究，尤其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普遍

全国，英国发生空前未有的大罢工的今日。以下便是马克思论文的译述：

“一个探求支配人类运动原理的深玄的想象家，惯称两端相接的法则，为支配自然界奥秘的原则。在他看来，俗谚所云‘两极相遇’者，在人生的每一方面，都是一个伟大而有力的真理。这一个原理，哲学家用之可以执简驭繁，如同天文家用 Kepler 的法则或 Newton 的伟大的发见（引力的法则）一样。

两极相遇，是否是那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勿深论。而此原则之显明的表现，是可以在中国革命似将影响于所谓文明世界的结果看得出来的。说欧洲人民的未来暴动，和他们的为共和的自由与政府的经济的未来运动，其系于现代所经历于此天朝帝国者将远胜于现存的任何其他政治原因，抑且胜于俄罗斯的威胁，以及从而发生的全欧战争之似有可能。这似乎是奇而妄的推论，但此并不谬妄，只一细察此事的实状，便可洞明无余了。

不管什么是他的社会的原因，不管他们听的是什么宗教的、朝代的、民族的形式，他产生了慢性的变乱，过去约十年间存在于中国，现在集合起来成了一个可惊的革命。他的暴发的机会毫无问题是那强制输入麻醉毒品叫作鸦片的东西于中国的英国大炮所给与的。在英国炮火之前，满洲皇统的权威，扫地无灵了；天朝永世的迷信，全然打破了；封锁未开与所谓文明世界未曾接触的孤立，骤被侵入了；东西交通的开发，从此以后，在加利佛尼亚州及澳洲的黄金的诱引之下，很快的进行，同时这个帝国的银钱，——他的生命膏血——开始流出于大英帝国的东印度了。

一八三〇年以前，中外贸易的平准，还是中国方面站在有利的地位，银货不断的由印度、不列颠、北美合众国输入于中国。一八三三年以后，特别是一八四〇年以后，则银货由中国到印度的输出，几乎耗竭了这个天朝上国。于是中国皇帝严令禁止鸦片贸易。

但是所得的还答是对于他的法度与以更强的抵抗。除去直接的经济结果以外，关联于鸦片密输的贿赂公行，将中国南方各省国家官吏的风纪完全腐化。如同把皇帝看作全国的父亲一样，皇帝的官吏，亦被看作是对于各该属县邑的维持亲长关系者，但此父权的威力，是维系国家全局惟一的道德纪纲，渐为以默许鸦片密输、自饱私囊的官吏的腐败所蚀毁了。此种情形，曾多见于发生变乱的南方各省，鸦片遂适如其分以获得了制御中国的主权，而皇帝及其官派十足的臣仆，乃以丧失其所自有的主权了。这好像历史于他把中国全民族从其遗传的愚昧中拯救出来以前，先使他们沉醉一回似的。

英国棉花的输入，从前几乎没有，英国羊毛的输入亦只有少许。至一八三三年以后，则二者输入于中国，很快的增加。这是由东印度公司把对华贸易独占转移到私人商业的时期。至于此等物品大规模的输入中国，乃在一八四〇年以后，这是其他各国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北美合众国）在中国贸易亦获得一份的时期。这个外国制造品的引入，影响到本地的产业，同他从前曾经影响到小亚细亚、波斯、印度一样。在外国竞争之下，中国国内有许多纺者织者，都遭受了很大的艰苦，而社会生活，亦随着外货侵入的程度呈出不安的景象。

一八四〇年不幸的战争以后，赔款必须付给英国。那巨额的不生产的消费的鸦片，随着鸦片贸易而生的贵金属的流出，外国竞争对于本地制造品的破坏的影响，公共行政的腐败情形，产生了两件事物：旧税益加烦累，新税又见增设。这样，在一个一八五三年一月五日由北京发出的皇帝诏令里，我们可以察知有些命令颁布给武昌、汉阳等处以及南方各省督抚，令他们减轻或延缓人民的纳税，特别是无论如何不许强取以逾定额。诏令上说，倘不这样，则‘贫苦人民将何以堪’？诏令上又说：‘则当举国艰忧之时，如此吾

民或能免于苛吏诛求之祸矣’云云。这样的辞语和这样的宽假，我们犹忆在一八四八年顷曾从奥地利亚听说过，那是日耳曼的中国。

所有这些集合起来从着中国的财政、道德、产业及政治构造而行动的崩解的动因，在一八四〇年英国炮火之下，领受了完全的发展。这个炮火，打落了清朝皇帝的威灵，强迫了这天朝上国与俗野的世界相接触。完全的孤立，是老大中国保藏的原状，那个孤立，必须依英国的媒介来一强制的终结。分解必定随之而起，这与谨藏在封固的棺中的木乃伊，不论何时，一与空气相接，立即分解一样，是确然的。现在呢，英国已经造成了中国的革命，问题是那中国的革命怎样的迟早将其反响及于英国，经由英国以及于欧洲，这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一八五〇年以后，读者常被唤起，使其注意及于英国制造品不平行的发长。在那最可惊的繁荣中间，不难指出一个逼近产业危机的显明征候。虽然有加里佛尼亚洲和澳洲，虽然有浩大未曾前闻的移民出境，苟无任何特别事变，在一个相当时顷，迟早总有一天，市场的扩张，不能齐驱并驾于英国制造品的扩张。这种不相比齐，必要造成一个新危机，其确定与过去所曾经历者全无异致。但是假如大市场中之一忽然变成缩狭，那么危机之到来，亦必因之而加速。目下中国的变乱完全有此影响及于英国。开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的必要，是英国茶税低减主要原由之一，期于以茶的增加的输入，谋对华制造品的增加的输出。现在每年由联合(王)国(The United Kingdom)输出到中国的价值，在一八八三年³，东印度公司所享有的贸易独占权废止以前，总额只为600,000镑；在一八三六年，总额达于1,326,388镑之数；在一八四五年⁴，又增加到2,394,827镑；至一八五二年，则达于约3,000,000镑了。至于由中国输入于英国的茶的总量，在一七九三年，尚未超过16,167,331磅⁵；但在一八四五年，达于50,714,657

磅；在一八四六年，则又达于 57,584,561 磅；现在（一八五一——一八六二年），已超过 60,000,000 磅以上了。

上季的茶收获超过前年的额不下 2,000,000 磅，已经为上海的输出表所明示。这个超过，有两个情由可以说明：一方是一八五一年终的市场情形很是低减，多量剩余下来的过剩物品，移入于一八五二年的输出；在另一方，是那关于茶输入的变更的英国立法的近顷报告，传到了中国，使所有的有利的茶，都以极贵的价钱，上了预备市场。但是关于来季的收获，则情形大异了。这可以从伦敦某大茶庄的通信中，摘录下来的下列语句证明：

‘在上海，恐慌已达于极点。金价涨了百分之二十五，银的缺乏至于一点亦不能不见得以还付英船对于中国应付的税款，这于出港许可是必须的。因此阿尔阔克（Alcock）君曾同意于负有对中国官吏交还这些税款的责任，而以东印度公司的票据或其他认可的担保的领收为质。设若着眼于商业的最近的将来，则贵金属的缺乏，乃为最不利的景象之一。因为此种空虚，适值于他们的使用最是需要的时会，以致茶丝的购买者深入内地影响于他们的购买，因为此等购买，须以正在腾涨的金银块付价，以致那些生产茶丝者得以尽操纵的能事。’

‘历年此季，开始办理新茶以为常。可是在现时除去保障人身与财产的方法而外，什么亦谈不到。一切交易都已截止。……设若在四、五月中不能应用那些保护茶叶的方法，这黑茶、绿茶一切纯良种类均包含在内的早期收获，将成为同在复活节尚未成熟的小麦一样的损耗。’

现在保护茶叶的方法，一定不是英、美、法等国的舰队驻在中国海中可以给与的。可是因为他们的干涉，这些却很容易产生像那可以切断产茶内地与输茶海港间一切交易的纠纷情形。如此则于现在的收获，一个价格的腾起是可以预期的（投机已经在伦敦开

始了)。即于次季的收获一个大的缺乏，亦是同样的确定。不宁惟是，中国人亦同在革命的震动时期中的一切民族一样，虽然准备着将他们手下的那一切笨重物品卖与外国人，而如东洋人在大变动的恐怖中所惯作者然，亦欲置之于贮藏。故于茶丝的取偿，除硬货的钱币外，则多不愿受。英国于是乎可以预期他的主要消费品中之一的价格的腾起，金银块的流出，出售他的棉花和羊毛制品的一个重要市场的缩狭，即那一切威胁商业社会沉静精神的事物的乐天祝咒家的‘经济学派’，亦不能不作如下的语句了：

‘我们不要自信觅得一个为我们输出品去到中国的市场，其广大一如从前。……我们对于中国的输出贸易将遭蒙损害，满切斯特(Manchester)及古拉斯哥(Glasgow)的生产，将有一个减少的要求，这是最可能的。’

切勿忘记了像茶那样一种必需的物品，像中国那样一个广大市场的缩狭，将适合于一个西欧的歉收，从而发生麦谷和其他农产品价格的腾贵，于是缩狭了制造品的市场。因为每一种首要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腾涨，依一个相当的对于制造品的需要的低减，相为消抵以保内外的平衡。迩来大不列颠各处，时闻关于收获减色的叹声，‘经济学派’关于此问题有云：

‘在英伦的南方，不仅有些土地尚未耕种，并有许多已种的田，亦呈出恶象，或则谷实的发育不良。预定种小麦(Wheat)的濡湿下田，正在发生损害的征候，已极明显。种菾菜(Mangelwurzel)的时期，现在可以说是已经空误了，种植的很少。而那预备种植芜菁(Turnip)的田时，看看亦迅将过去。为这样一种重要的收获的任何充分的预备，亦没有安置妥当。……燕麦的耕种，被雨雪妨害了不小。及时下种的燕麦很少，迟种的燕麦，少有能得丰厚的收获的。……在许多区域内，饲养的羊群间的损失，其价值亦不在少。’

谷以外的农产品价格，比去年的增高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甚且有百分之五十者。在欧洲大陆，谷较在英伦腾高，而在比利时及荷兰，则菜麦(Rye)高涨了一倍。小麦及其他种谷物，亦从其例。

在这种情形之下，因为普通商业范围的大部分，已为英国的商业所荡尽。我们可以很稳当的卜知中国革命将掷其火星于现在产业制度积载过多的地雷上，而致此长期准备的总危机的爆发。这个广播海外的总危机，将为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所紧接。中国送来骚乱于西方世界，而西方列强方由英、法、美的战舰载着所谓‘秩序’到上海与南京。这是一个伟壮的奇观。这些将要援助那动摇的满洲皇统的秩序贩客的列强，忘记了对于外人的憎恶并驱逐外人出此帝国，从前只是中国的地理的人种的位置的单纯结果，而自满洲鞑虏征服此邦以后，才成为政治制度了么？在十七世纪末，那互相竞敌，争着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间的纷争轧轹，给了满洲所采行的排外政策一很大的助力，是明显无疑的事实。此外这个新朝因恐外人或将袒右那当中国人民被征服于鞑虏的上半世纪间在大多数华人间存在的不平，而益促其采行排外政策也更剧。根于这些顾虑，当时外人遂被禁止而不许与华人交通。外人只准经由一个离北京及产茶地方甚远的都市广州，与华人通商。而外人的通商，又只限于与行商交际。行商是政府特许公开的从事外国贸易的商人，为的是使其余的人民得以避免与那可憎的远人相接触。无论如何，西方各区政府对于中国的干涉，此时只能致中国革命愈益猛烈，愈益延长商业的停滞而已。

同时关于印度有须注意的，是那个世纪的英国政府，足有他的岁入七分之一，是靠着售卖鸦片于华人的。同时印度人的大部分，又靠着在印度鸦片的出产，以需求英国的制造品。华人对于鸦片的使用的非难，并不减于德国人的禁绝淡巴菇(Tobacco)。但是因为这位新皇帝知道赞助罂粟的培植及在中国自己境内鸦片的预

备,很明显的将立刻予印度的播种鸦片事业、印度的岁入以及印度斯坦的财源,以绝大的打击。此种打击,虽不能立刻即为与此有关的利害关系所感觉,经过一个相当的时期,将必显其效用,将必加厚并且延长这普遍的财政危机。这危机是我们已在上文卜定其命运的。

自从十八世纪开始以后,在欧洲未曾有过激烈的革命而不先朕以商业和财政的危机者,此理证之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与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悉无二致。这是实在的,不仅仅我们每天看见那些统治的权力者与其人民间,国家与社会间,各阶级间,冲突的胁迫征候,一天一天的加多,便是现存的各强国间的冲突,亦似乎将达到图穷匕见的程度,最后谈判的机运亦且若现若隐了。在欧洲各国的都城中,每日都有关于普遍大战的飞书相告,一到次日,此等消息,又复消灭了,似乎又有半个星期的平和的确保了。虽然,我们的确知道,欧洲列强间的冲突可以达到无论如何的极度,外交界的情形可以显出无论如何的危迫,由于这个国那个国的些个狂热的党派,无论如何的运动都可以企图,可是那些王公的忿怒,人民的愤慨,都一样的被那繁荣的呼吸销沈下去。战争与革命,都一样的不能令欧洲争哄起来,除非是一个普遍的商业的和产业的危机之结果。这个危机的信号,与夙常一样,必要发自英国,他是世界市场中欧洲产业的代表。

注意政治的关系是不必要的。就以英国工厂有未曾前闻的扩张,英国的公开政党全然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关变成了广大的诈骗投机卖买的商馆,奥地利亚的财政濒于破产,招人民仇恨的错误层层叠叠到处都是,反动的列强间的利益冲突,和那曾经一度显露于世的征服世界的俄罗斯迷梦等等事实看来,在这些时候,那样一个危机必定产生。”

我们读了马克思这篇论文以后,应该很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

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在世界革命的运动中，中国和英国所居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英国是世界市场中欧洲产业的代表，中国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的重要市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扩大，就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的市场的缩狭。这个缩狭，可以促起普遍危机的迫近，加速世界革命的爆发。这种英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造成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更以其影响还答于英国，经由英国还答于欧洲，造成了英国革命，欧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关系，在马克思生存的时代，就是太平天国动乱的时代，是如此；即在今日，中国全国爆发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时代（的），亦还是如此；直到世界革命完成的那一天为止，总是如此；不过这种关系的暴露，一天一天的明显，由中国革命以趋于世界革命的倾势，一天一天的逼近罢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主潮，自从太平天国动乱以还，总是浩浩荡荡的向前涌进，并没有一刹那间的停止。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压迫，只有日益增加，故中国民族之革命运动，亦只有从之而日益强烈。现在怎么样了？帝国主义者与从前一样？否。现在更百倍于从前，日惟用其驻华军舰载来所谓“秩序”——大屠杀，由上海而广州，而九江，而汉口，乃至北方的北京、天津、济南、青岛、旅顺、大连，到处都有中国民众被屠杀于他们所谓“秩序”之下的血迹，即到处都有中国民众反抗列强的斗争，因为对于压迫的还答，只有反抗。对于他们镇压我们的“秩序”的酬应，只有我们反抗他们的骚乱，这便是革命。依“礼尚往来”⁶ 的礼让，这个骚乱，亦必然的要输运到欧洲去，输运到一切帝国主义的国家去。帝国主义者倘如横来干涉中国民众的运动，马克思说的好，这个干涉，只能使中国的革命运动日趋于凶猛，只能致列强在中国的商业日趋于停滞。屈指一算，现在距马克思作这论文的时候，已经七十三年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一天一天的扩大，欧洲的危机，一天一天的逼近。最近两年间，中、

英两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大有一日千里的势子，在全世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竞赛中，有首屈一指的进步。现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普遍全国的今日，同时英国工人号召了一个几百万参加的空前未有的大罢工，正如铜山东崩，洛钟西应，这是不是英国资本阶级以其用军舰装来的“秩序”，由中国换去的骚动？这是不是中国革命的火星，已经进入欧洲产业制度积载过重的地雷上，将要产生一个大爆发？那逼在眉睫的革命的历史事实可以证明。

署名：猎夫

《政治生活》第 76 期

1926 年 5 月

北方区委委员们的报告⁽¹⁾

(一九二六年六月九日)

范⁽²⁾同志：国民军退出时，所有俄国领导同志都因之而十分不安。甚至有人说起，因受到反动派的压力，可能被召回国。但我们就（北方区委）看的非常清楚。反动派的进攻只是暂时的，并就此事写了相应的计划。

这个计划说的主要是从广州出师北伐，矛头所向首先是吴佩孚。他力量薄弱，同孙传芳没有联系，但暗中勾结张作霖，企图消灭革命力量及其支持的国民军。

应该说，伊万诺夫斯基⁽³⁾同志也写了一个计划，得出了与我们相同的结论。还应当指出，4月12日写的计划中已经预见到国民军退出后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这个计划会使你们对近期的形势有大致的了解。

李同志：国民军退出后我们遇到一些十分耐人寻味的事。革命阵线呈弧形展开，涵盖的是：革命力量和倾向革命的势力占领的地区：内蒙古（察哈尔、绥远特别区），山西（北部）、陕西、甘肃、宁夏、四川、两广。

四川局势是：该省前督军和吴佩孚的亲信杨森将军给我们写了信，声称愿意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派出彭⁽⁴⁾同志以为回应，后谈定：国民党将获得在杨森部辖区开展政治工作的一切条件，国民军和革命团体享有充分的自由，国民党领导组建军

校。相应地，国民党给予杨森以全面的政治上的支持，并且像国民党和通过国民党支持国民军那样，保持对杨森部的援助。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大本营：卡尔干（张家口）、四川（长江）和广州。

迄今为止，国民军已经在江[陕]西和山西省北部彻底打垮敌兵，攻克了大同，据最新情报，又拿下了雁门。在政治方面，目前国民军具有更强的革命性，并要求我们派遣革命的政工干部，但因联系中断，我们还派不了。

国民二军残部现据有山西省并与吴佩孚作战，后者退至潼关。我们在陕西省也开展了大量工作。在四川省办了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国民党的报纸和一座三民学校。当地军阀（不是国民二军的人）迫切表示愿意归并国民二军。这说明国民党的工作开展得力。

四川杨森占有该省大部地盘，兵丁多达 70,000 人。其宿敌陈炯明则同广州国民党有联系。这样一来，两位宿敌就通过国民党和解了。如此看来，内战似乎不是把中国以南北划分，而是以东西划分了。云南和新疆还在弧形分布图之外。

我们已经直接掌握了整个晋北，直到太原府。然而即使在阎锡山将军坐镇的晋南，我们也开展了大量工作。太原府有我们的 100 名党员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在山西全省我们有 200 名党员和 200 名青年团员（1925 年 11 月山西党组织只有 70 名党团员）。这就向我们表明，尽管有反动军事力量存在，革命力量依然在发展中。

国民二军残部占领着山西，但是军纪涣散，士兵放任，行为不检，无异于敌军。所以破产的农民就加入了红枪会和白枪会，首先打吴佩孚，其次就是国民二军士兵的胡作非为。国民二军现有 20,000⁽⁵⁾ 兵丁。其人员编制超过武器数量的 3—4 倍。国民二军的将领是：杨虎城，李胡陈[虎臣]，邓宝珊。尽管农民也仇恨国民二军，但更恨吴佩孚。我们务必设法改组国民二军。在党的关系

方面，陕西省一分为二——陕北归北方区委管，陕南归河南区委。陕北有 100 名党员。据一个外国记者说，过去人们都以为杨虎城是布尔什维克。同一个记者又云，此一说法现在已经证实，因为国民党学生党员完全可以发表激烈的言论，举行旨在反对吴佩孚、张作霖的集会和示威游行。

我们现在可以在四川公开活动，所以工作要更加积极。

现在讲一讲农民运动。国民二军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受到农民的反对。农民之所以有上述组织就是为了自卫，防备国民二军胡作非为的士兵。所以农民正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越来越紧密地组织起来并走上革命的道路。现在他们的矛头所向是吴佩孚，因为国民二军的领导正在采取措施防止士兵的胡作非为，所以农民对国民二军的信任正在恢复之中并与之建立联系。

山东省的农民运动开展也很得力。有一个叫“黑枪会”的农民组织拥有大量武器和机枪，他们反张宗昌。张宗昌想使他们中立，但毫无结果，甚至适得其反，有一次“黑枪会”把张宗昌请来过节，竟缴了他和部下的枪。

反革命。

这方面首先应当介绍的是，国民军撤退时，我们和俄国同志一起决定寻找一个什么办法让张作霖和吴佩孚反目。其中措施之一就是推翻在张、吴之间起缓冲作用的段祺瑞。众所周知，4月9日事件⁽⁶⁾并非十分成功，然而当时我们做的工作现在已经有了结果。眼下的问题是吴佩孚想自建一个政府，张作霖及其后台日本自然是全力反对，因此政府至今尚未建立。结果是国民一军的战略地位改善了，同时呈弦形接近上述弧形末端的反革命势力营垒开始出现分裂。这个弦形分布图的各派势力有：田维勤、靳云鹗、李景林和孙传芳，孙同广州政府关系密切，反对张宗昌。这两位将军秘密结盟，被吴佩孚揭穿并召至保定府。到保定府后，他将靳云

鹗革职。这一革职并没有影响靳云鹗，所以秘密的结盟未曾分裂，继续起作用。

如前述，吴佩孚在设法组织颜内阁，他的口号是——护法。张反对，说吴佩孚应当先把国民军消灭，派田维勤和靳云鹗的军队打南口。然而事实上这两位将领无论如何是不会打国民军的。张作霖坚持这样做并想把自己的军队从前线撤回。他也应该这样做，因为鲁军对直系军队实行的是一箭双雕的策略，他们明显地表现了不仅想打国民军，而且要打直系。与此同时，鲁军又对直系表示有意“建立联系”的愿望。

由此看来，我们可以把政治局势做如下的概括：反革命派针对革命力量的口号仅仅是在这些反革命势力中传播。这还得利于国民军士兵的严格纪律，而所谓“反赤军”的士兵则胡作非为，抢掠百姓。国民军的立场现在更具革命性了。

反动分子提出的口号现在帮不了他们什么忙，比如日本人，现在根本就不在报纸上提什么“赤化危险”了。湖南省唐生智将军转入反攻，正在攻打长沙。由于国民党从中帮忙，四川那些不久前剑拔弩张的将军现在已经罢战言和，同国民党建立联系。孙传芳准备打山东省，在徐州府秣马厉兵。国内农民运动发展势头强劲，这是时局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如果按期打下山西省，或者靳云鹗和田维勤公开起事反对吴佩孚，或者由唐生智部夺回长沙，那么吴佩孚、张作霖的反革命势力就将被击溃。

如你们所见，我们对事态发展并不悲观，相信这个弧弦形会组成一把弓，届时我们就能向帝国主义射出一支利箭。

回答问题。⁽⁷⁾ 孙传芳不久前发表宣言，声称他占领的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和福建五省实行独立，并称任何中外人士均无权干涉上述各省的事务。日本报界对此十分不安，竟问及这个宣言是否意味着孙传芳不想维持外国人根据条约拥有的特权。接着，孙

传芳把他发给广州政府的一份电报也发给了中华民国革命政府，总的说，他开始对我们表示友好。然而帝国主义却在设法影响他，不过，我们在自己的计划中已经讨论过同他建立联系的问题。

目前，吴佩孚凭现有的军力不能打南口。如果说要从多伦诺尔和大同打南口，那么必须看到，这也做不到，因为一旦打赢了，就意味着吴佩孚势力大为加强，在政治方面就会迫使张作霖同吴佩孚和解，并从政治上受制于吴。所以日本人想让国民军同张作霖罢兵言和。张因山东事务正把军队从南口确切说是从沙河（南口东30里）调开。然而即使预料到敌兵会胜利，那么国民军也可以后退至山西或者甘肃、新疆。吴佩孚、张作霖之间的冲突一直呈现激烈状态。张作霖和日本反对颜惠庆组阁，因为颜是亲英派，由他组阁首先意味着吴佩孚得到财政支持。张作霖本人实行的是相当狡猾的策略。他宣布对满洲实行门罗主义。在军事策略上，张一向是把他疑为不忠的将领调至最前线，打天津和北京时就是这样。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李景林和张宗昌的军队在前线，而张作霖的嫡系部队则在山海关和唐山。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全宗 514, 目录 1, 案卷 222, 第 56—59 页
李玉贞译

译者注

(1) 据与此件有关的一个报告《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工作》(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 514, 目录 1, 案卷 222, 第 61—65 页)看，这是李大钊和范鸿勋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情报处工作人员所做的报告。后者“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工作”的文件就注明这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负责人关于 1926 年前 3 个月的报告”写成的。这个报告于 1926 年 7 月 1 日送到了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下设的中国委员会成员伏罗希洛夫、温什利

赫特、特利里谢尔和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等人手中。

原件上方标有“28 VI. 1926”字样。可能是共产国际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

文件上标有“托洛茨基同志”字样。这不是报告人所写，可能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其交给了托洛斯基。

(2) 范同志即范鸿劼。

(3) 伊万诺夫斯基是 A. C. 布勃诺夫(1884—1938)的化名。1925 年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4—1929 年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8 年苏联肃反扩大化时被错杀，后恢复名誉。1926 年初率领使团到中国，曾经到广州，“三·二〇事件”后不久离开广州。在李大钊写此报告时，他正在北京逗留。

(4) 彭即彭泽湘。

(5) 档案中此数字无法辨认。

(6) 指是日发生的北京政变，段祺瑞的左右响应奉军消灭京内国民军的阴谋败露，鹿钟麟派兵包围了执政府，段祺瑞及其安福系诸要人逃入东交民巷，执政府受到鹿的改编，鹿并以警卫总司令的名义宣布段氏罪状，并恢复曹锟自由。

(7) 是李大钊在回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情报处人员的问题。

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情报处工作人员的谈话⁽¹⁾

(不晚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²⁾ 绝密⁽³⁾

总的情况：(国民军撤退后)整个工作自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转折。所有的党组织必须取守势，联络中断。甚至出现了危险的取消主义情绪，但是我们的组织经受住了考验，所有地方党组织不仅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领导同志在危急关头坚守岗位。

组织工作……取得以下成绩：

1. 组织上的大发展。

1925年10月总共只有225名党员，1925年底614名党员，(1926年)3月1500名党员，133个支部。要指出的是方振武部有两个共产党支部，共50名党员。

2. 北方区委的工作已经具有一定的计划性，并且把多数地方组织纳入有计划工作的轨道。

3. 尽管许多地方组织尚欠完善，但还是实行了工作的集中化，有经常性的联络和情报工作。

工会工作。北方区委最重要的工作有以下几件：

1. 北京市总工会。

2. 天津市总工会。

3. 唐山市(最大的矿工城市)总工会。

北京市总工会(1000 多人)和天津市总工会(达 3000 人)通过广矿企业秘密的工厂支部同广大工人群众保持联系。

国民党。地方组织在孙中山逝世周年之际广泛吸收许多新党员,三天的纪念活动党员人数从 4000 发展到 5000。“三·一八事件”后有部分新党员退出国民党。

我党同国民党之间发生了磨擦。比如山西省中共居然同右派合作。⁽⁴⁾

学生。学生运动顺利发展。北京的两个学生会目前秘密开展工作。

共青团。“三·一八事件”前北京⁽⁵⁾华北青年团有 11 个团委,27 个特别支部,总数为 1050 人。

“三·一八事件”后组织发展达 1300 人,几乎所有的地方,甚至直隶的一些农村都有团组织。一些还没建党组织,却已经建了我们的团组织。

团组织有 500 名工人,30 名农民,女团员仅有 15 名。

共产党同青年团之间已经建立了联系,同地方党组织也建立了联系。

在学生和其他青年组织中的工作开展顺利。

出版工作顺利进行,(北京、天津、卡尔干即张家口)所有刊物发行量增加,传播范围扩大。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全宗 514, 目录 1, 案卷 22, 第 61 - 65 页

李玉贞译

译者注

(1) 本件原题为“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工作”(据中共北方区委负责

人就 1926 年第一季度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工作所做的报告),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情报处工作人员整理。但其中直接引用了李大钊的原话并予以明确标注。此处选译的就是这些部分。

(2) 原件未标注日期,但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情报处 1926 年 6 月 30 日,莫斯科”字样。

(3) 文件上方标有“1926 年 7 月 1 日交季诺维也夫、斯大林、莫洛托夫、温什利赫特(俄共中央委员会下设的中国委员会成员)、契切林(外交人民委员)、特里利谢尔(中国委员会成员)”。

(4) 原文如此。

(5) 黑体字系原文所有。

日本帝国主义最近 进攻中国的方策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日本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的活动，采取积极进攻的方策。第一，他与英帝国主义结成联合阵线，撮合张、吴间的讨赤联盟¹；勾结国民党右派，组织工农党，使与日本的劳动农民党及第二国际发生关系，以破坏中国的以工农阶级作主力军的国民革命运动；勾结上海的资产阶级，以图共同对抗中国的劳动运动并缓和中国的民族运动；勾结黄攻素、彭绍贤、林可彝一流的反动分子，与谢米诺夫等发起亚细亚民族同盟，欺骗亚东的弱小民族，一面对亚洲民族自雄，一面对白种民族示威，在骨子里头，更深深的布置了一个反俄的阴谋，破坏世界革命运动中东方弱小民族革命的联合阵线。第二，他急愿离开英、美的关系，要单独的和中国订立一种条约，至少在满蒙境内，实行取得那二十一条里所规定的土地所有权，以树立他那所谓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的基础。

关于第一项方策的进行，我们所得的证据如下：

甲、当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开会以前，林森、邹鲁等在京谋占据北京执行部的时候，日本驻京公使芳泽氏曾设法与邹、林等接洽。

乙、最近东京方面传来秘密消息，日本政府曾训令其驻中国重

要都市的外交官，设法与当地国民党右派勾结，进行破坏国民党的工作。

丙、日本驻北京的外交机关报告日政府，谓在北京仅得一资望地位较浅的右派分子，但如资以经济助力，使他能够赴上海活动，亦可收相当的效果。

丁、在得到此项消息的同时，在京的日本机关报《顺天时报》²，即大书特书的登出赴上海孙文主义学会总代表巫启圣的像片。

戊、七月十八日在北京发行的和文日刊《新支那》上，有下列一段的记载：“国民党右倾派劳动先觉者马超俊氏，得孙传芳氏等的谅解，有在全国组织农民劳动党的计划，举出十二名起草委员，纲领起意书正在制作中，设本部于上海，派遣[遣]组党员于全国二十二省，设支部于各省，与日本农民劳动党谋提携，并在香港与第二国际及美利坚劳动会谋联络。”

己、七月二十三日北京《晨报》载，电通社上海电讯：“国民党工人部长马超俊，刻在该党右派及留沪日侨后援之下，从事工农运动，以反抗共产派之劳动运动。”

庚、上海商人虞洽卿³等游日本的时候，日本朝野有组织两国实业家混合委员会的提议。东京《日日新闻》希望此委员会对于关税会议、中日互惠条约一类的问题充分的交换意见，诉之两国舆论，进而各促动其政府，努力以求其实现。大阪《每日新闻》谓，去年夏间上海日本纱厂罢工的时候，曾依上海总商会的斡旋，将以解决，足征上海的华商团体是有指导的力量，因之对于中日关系委员会的活动，抱有厚望。

辛、据日本在华的英字机关报《华北正报》所载，所谓亚细亚民族大同盟⁴，现在长崎召集开会的事，实由于日本议员今崎氏两次来与黄攻素等磋商的结果。北京《晨报》预测此会(议)的结果，中国代表不为日人所利用，即失望而回。其实彭绍贤、林可彝等所抱

的目的，即在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者反对苏俄，本已甘心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互相利用，更何有于失望！

关于第二项方策的进行，我们所得的证据如下：

A. 二月十八日大阪《朝日新闻》曾发表一篇社说，大意是说日本在满蒙方面的发展，在普兹茅条约所规定的范围内，已经是到了尽头。日本若想在满蒙为进一步的发展，非重新和中国订立一种新条约不可，在这种新条约里，我们（日本）鉴于中国国民运动气势的昂盛，顾念日支亲善的大局，除大连、旅顺外，可以把日本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撤销。中国既热心于收回法权的运动，自应发一大宏愿，下一大决心，使动乱不侵入于满洲。自然，张作霖一系的军阀，亦当专心致力于东三省境内的保境安民的工作，山海关以内的事不宜多所过问。这个报的主张，足以代表日本资产阶级的心理。真聪明啊！日本的资产阶级，他们为要给他们的资本主义谋一个新的发展，就是要给他们的正在进攻中国的帝国主义换一个新方式，所以要牺牲那于日本已经没有多大用处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换取一个目下于日本为莫大的权利而有极切的必要的土地所有权。表面上说，我许你以撤去领事裁判权，你许我以内地杂居，这是最公允、最便宜的交易，其实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程度，已经到了那不需要领事裁判权而需要内地杂居以容纳大规模的殖民的阶段。随着内地杂居，自然需要日本人在中国得享有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他们因为急切的要求此权利，故提出满蒙土地商租问题，而谋一个更明确更坚固的解决。所谓商租，所谓会办，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攘夺中国土地的变相的名辞。

B. 日本资产阶级那样一个聪明伶俐的方案，还不易为一般帝国主义者所赞许，乃有日人久间猛作了一篇《满蒙土地商租问题》的长文，在一个和文日刊叫作《京津日日新闻》报纸上于六月十日顷，亘数日间连续的发表。他在那文的后段里说：“关于这满蒙商

租问题与支那的治外法权问题，如大阪《朝日新闻》于二月十八日揭载社说，倡言顾念日支亲善的大局，除旅顺、大连外，宜将我租借地的全部返还于支那，以解决多年的悬案。由吾人看来，这未免过于极端了。溯及条约上的既得权，而轻易的主张放弃租借地，这难称为慎重的大新闻的态度。我关东州及铁路附属地，与列国在支那的租界地异，而有历史的因缘。……欧战以后，此因为国际协调主义所倡导，而于另一方面，国家主义、国民主义的实行，亦系极明了的事实。国际联盟的进行中，法国占领鲁尔，厥后义大利又占领菲麦及哥尔府，美国占领桑多曼哥，乃至英国之在埃及，不是各自都发挥伟大的国家主义吗？……”看这一段话，可以知到[道]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满蒙进攻的步骤，第一步是要取得土地所有权，第二步是大规模的移植，第三步就是占领满蒙，同法国占领鲁尔、义大利占领菲麦一样。

C. 七月十五日北京《晨报》伦敦特讯，《满切斯达保护报》北京通讯员云：中国近时所发生之排英举动，日本宣传员应负其责任……日人之宣传目的，即在掩饰其乘中国倾扰，不欲实行华府会议决议之意。日本对于将来在华之经济，深怀恐惧之念，对直系首领重起主持大政，大抱惊骇之感，故不惜出此破坏关会之伎俩。……日本在关会之战略，一方欲坚持华会原案，同时并欲推行其政治家之建设政策。所谓建设政策者，即中、日另行缔结条约，中国对日本予以让步，而日本即以允许取消治外法权为交换条件。这里所谓“中国对日本予以让步”，即指承认日本人在华得以享有土地所有权而言。

D. 据奉天长春方面的通讯：最近日本人及朝鲜人移住满蒙者，纷至沓来。日本人则多携妻带子，赴北满一带屯垦。其朝鲜人的来满，(关)系因大批日本人来到朝鲜，强占土地，逼朝鲜人不得不弃井离乡，流散于中国境内。以日本人侵占朝鲜人的土地，而以

朝鲜人挤入中国，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妙策。

E. 七月八日《民立晚报》载东京专电：日本政府规定加重关东司令官军队召集权。如在满常备兵不能维持在满侨民之生命财产及国防第一线时，该司令官可不待政府训令，召集在满预备兵，直接供其指挥，并在满设兵器弹药被服库，以利供应。现日本外务省正与各关系方面商酌，一俟商妥，即于八月一日实行。

综合以上所述，日本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的进攻，异常的凶猛。目前张作霖躬往大连，与日本关东州儿玉长官会见，亦颇含有重大的意义。全中国民众尤其是北方民众啊！在全国民众号召各地的国民革命军讨伐勾结英、日帝国主义的张、吴的战争中，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注意和监视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国民革命阵线及其侵略满蒙的阴谋和行动。

署名：猎夫

《政治生活》第 79 期

1926 年 7 月 22 日

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¹

(一九二六年八月八日)

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扰乱中国，以致内乱踵起。影响所及，日益扩大，其结果，遂使中国全国的农民生活不安定，以急转直下的趋势，濒于破产的境遇。北方直接遭受兵祸最厉害的省份，如山东、河南、陕西、直隶等处的农民，以不堪兵匪的骚扰，乃自然的有武装自卫的组织——就是红枪会的运动，这个运动在山东、河南、陕西尤为普遍。

在山东有红枪会、白枪会、红沙会、黄沙会、五煞会、黑枪会；在河南有黄枪会、绿枪会、白枪会、红枪会；在陕西有硬肚、白枪会、红枪会等名目。红枪会所用新式武器，如机关枪、迫激炮、来复枪等，故名。至如红沙、黄沙、五煞等名目，则带有阴阳、五行、沙语、符咒一类迷信的色彩，行动颇有类似义和团的地方。

这个现象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这样的农民运动中[将]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

红枪会名称的由来，乃是因为他们所用的武器多系长矛，在长矛上系以红缨，其起源实发于山东，而渐流行于豫、陕。溯其渊源，远则为白莲教²的支裔，近则为义和团的流派。其蔓延的迅猛，完全是因为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兵匪所压迫所扰乱而自然发生

的反响。红枪会的运动，既这样普遍，其间自然的亦要发生分化。军阀利用土豪，土豪利用农民，其结果于纯粹农民自卫的红枪会外，更产生了匪化的红枪会，因为土豪要想以农民为牺牲，以达其升官劫财的目的，第一步就是设法使红枪会匪化。这种匪化的红枪会，自然要与纯粹农民的组织为仇。河南荥阳农民协会委员长张虎臣全家十一口惨遭屠杀，即是这匪化的红枪会徒所为。可是概括的说起来，红枪会确是一种武装自卫的农民团体。山东汶上、宁阳的红枪会据城七月，所住的地方都是庙宇、学校、公共机关，所吃的东西都是自己携带的大饼馒头，丝毫不扰及人民。洛阳的红枪会，当冯毓东为警备司令时，在城内清街查匪，在城外保护行旅，均是红枪会负责，并且红枪会所驻的地方格外安静。河南通许县知事下乡劝告绅民勿勾结红会，绅民向知事质问道：“要叫我们不信红会很容易，只要地方不见土匪，军队不扰乱，官府不派苛捐杂税，完粮纳税收用纸币，便可不奉红会。”这都是可以证明大多数的红枪会，是农民自卫结合。通许绅士答知事的话，更可反映出来红枪会是代表农民利益为防备兵匪，反抗苛捐杂税而组织的事实。

河南的红枪会可以消灭国民二军的军阀势力，陕西的红枪会可以消灭刘镇华的军阀势力。而且同样的红枪会分子当其在洛阳列入民众队伍的时候，则可以战胜国民二军，可以抗拒其他的军队，而一为刘镇华所改编，带入陕西形成军阀势力的时候，则为陕西红枪会所困败；反之陕西农民编入国民二军在河南形成军阀势力的时候，则为河南红枪会所困败，而那留在陕西组织农民自卫团的农民，则可以使刘镇华、麻振武一班军阀的军队屈服。这可以证明农民阶级的力量可以制胜军阀，可以崩溃军阀的军队，尤可以证明同一农民，守着他的阶级，则可以战胜一切军阀；离开他的阶级，则将与军阀同趋于灭亡的命运。

农民的乡土观念颇含有其阶级觉悟的质素，农民不忘其乡土，

便是没有忘了他的阶级，即在军队中的农民似乎亦还没有完全与其阶级断绝关系。看那河南军队中助本省兵士不助国民军，和那山东兵士不愿在张宗昌军队中当兵而愿回到他的家乡，投入红枪会，反抗张宗昌，便可以证明兵士们与其本阶级——农民阶级尚未全然断绝关系。

武装农民自卫运动的发展，不但可以用他的阶级的力量打败军阀的军队，并且可以用他的阶级的力量召回军阀营垒中的农民，使之回到他们的乡井，保卫他们的闾里，这样子不但可以增加农村的壮丁，并且可以崩溃军阀的势力，根本的破坏军阀的营垒。

红枪会有几个显著的特征：（一）反洋人，（二）要真主，（三）迷信。但这都是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下落后的农业经济生活反映出来的自然现象。

红枪会反对洋人，便是农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表现，因为他们感觉着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些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些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我们应该给他们以正确的解释，使他们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把他们的仇恨转移到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剥削中国农民的行动和工具上去，以渐渐的消灭他们狭隘的人种的见解，知道全世界革命的工农民众，都是他们的朋友。

红枪会要求“真主”便是农民要求政治的安定的表现。他们以为政治上的扰乱与他们的生活上以莫大的痛苦，如果有“真主”那样一种东西出来把中国政治弄好，把那洋人和奸臣们镇压下去，才有日子好过。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起来革命可以自救，不能够认识民众政治的实现，可以结束中国政治的纷乱，故只模模糊糊的希望一个“真主”。我们应该告诉他们，只有工农民众自己团结起来，才是他们得到生活安定的惟一出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

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这一类的歌声，应该常常吹入他们的耳鼓。

至于迷信一端，亦是客观的事实自然的反映。自从现代的武器随着兵匪的扰乱入了农村，一般农民便不得起来谋自卫。可是农民要想自卫，自然需要武器，但是他们的武器不外是些竹竿、木棍、刀、枪、剑、戟，乃至锹、叉、锄、镰等，他们也感觉着这些还不够，于是那些农业社会流传下来的术士、拳师，便来教他们打拳练气用工夫，好补刀剑棍棒的不足。这些还不够，他们便把农村生活中所有的家当，如那学房牌位上的孔子，庙中偶像的关帝、观音，以及道士口中的太上老君，土地庙中的土地爷爷，《三国演义》中的张飞、赵云，《西游传[记]》里的猪八戒、孙悟空，巫医符咒，乩台沙语，阴阳卜筮，八卦五行等等都搬出来，以为这回该可以吓退他们的敌人了。一边是些符咒拳术，一边是些机关枪大炮，自然是敌不过，自然在事实上与以很痛楚的教训。加以农村中有些农民曾经入过军阀的队伍，知道怎样的运用那些机关枪、大炮等利器，于是使他们有极猛的进步，毅然弃却那些妖魔鬼怪的迷信，采用现代的武器。他们有了机关枪、大炮，便用不着孙悟空、猪八戒了，便用不着画符念咒了，现代的武器入了他们的手中，五行八卦的迷信，便渐渐的失了效力。

红枪会采用现代新式的武器，这一个事实，将要在中国农民武装自卫运动史中开一新纪元，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民运动的一大进步，同时亦可以认作乡村中少有产者起来反抗兵匪（的）一个表征。

落后的农业经济反映而成一种农民的狭隘的村落主义、乡土主义，这村落主义、乡土主义可以把农民运动分裂，可以易受军阀土豪的利用，以致农民阶级自相残害。山东的白教会与红枪会的冲突，河南洛阳红枪会城内派与城外派的冲突，陕州一带白枪会与红枪会的冲突，沁源一带黄枪会与绿枪会的冲突，吴佩孚唆动河南

红枪会与樊钟秀冲突，乃至刘镇华利用河南的红枪会去残害陕西的红枪会，吴新田更利用陕西这一部分的红枪会杀戮陕西另一部分的红枪会，都是极鲜明的事例。这个事例是目下武装农民运动中一个极大的危机。我们应该使一般农民明了其阶级的地位，把他们的乡土观念，渐渐发展而显出阶级的觉悟，知道农民的团结应该是扩大的而不应该是狭隘的，应该是联合而不应该是一村落或一县邑的分立的，甚至于自相冲突的。为的使他们消免相互间的冲突，应该使他们有集中的组织，联络的关系，否则一有冲突，必有一方为官府或土豪所利用，以蹂躏另一方的农民结合。

军阀改编红枪会，是一个消灭武装农民组织最毒的政策，因为把红枪会改编成他的军队，便可以使他们离开乡土，一面可以除去一部分人民的武力，一面增加一部分军阀的武力调往他处去残杀他处的人民。本地土豪以及土匪首领，最喜为军阀牵线，把本地的红枪会出卖给军阀，农民变成了猪仔，土豪作了大官。结果武装农民每以离开自己的阶级而终于自蹈灭亡。这一类的土豪，是出卖农民的贩子，是农民运动的仇敌。河南红枪会多被改编，便是吃了这一班人的亏，洛阳的刘镇华、张治公便是这一班人的代表者。应该使农民们深切的了解红枪会改编军队的害处。吴佩孚、刘镇华等诱骗农民牺牲农民的种种事实，应该可以使他们知所醒悟了。要知道乡村是他们的营垒，他们应该守着自己的营垒而固着于乡村，严防为兵匪一类离开乡土的运动所浮动，须知军阀们土豪们骗他们去当兵或是当匪，便是骗他们出自己的营垒去送死。随着新式武器的使用，对于上述的危险更多，故宜多加提防，因为有枪有人更易为军阀、土豪所居为奇货。我们的口号，是武装农民自卫的组织，应该是属于乡村大多数群众而从事于守望相助的，而不是供军阀、土豪、流氓、土匪所驱使，而离开农村化为兵匪的。

农村中觉悟的青年们，乡下的小学教师们，知识分子们，以及

到田间去的农民运动者，你们应该赶快的加入红枪会的群众里去，开发他们，辅助他们，把现在中国农民困苦的原因和红枪会发生的必要，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很明了的知道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很明了的认识出来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很明了的了解红枪会的性质及其应走的道路，然后这一种澎澎勃勃的农民大运动，才不至于走到错路上去。才不至蹈袭以前失败的覆辙，才不至于为军阀、土豪所利用以诱出其自己的营垒而归于消灭。才能脱去那落后的迷信的蒙蔽，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变旧式的乡村的贵族的青苗会而为新式的乡村的民主的农民协会，才能真正的达到除暴安良，守望相助，阻御兵匪，抗拒苛税，抵制暴官污吏，打倒劣绅土豪的目的。同志们，水深火热的沟洫中，倒卧着几千百万倒悬待解的农民，他们正在那里渴待着你们去导引他们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

署名：猎夫

《政治生活》第 80、81 期合刊

1926 年 8 月 8 日

守常政治报告

(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

此次西北国民军¹之退却，并不是原于战败，乃是原于西北军内部有张之江作奸细²。在国民军未退南口之前，京畿一带有三万以上的军队，相约于十二日一致动作，解决吴佩孚，并截断奉、鲁军后路，乃张之江故意弄错³，致国军未能届时出来，功败垂成，反在张家口假装疯魔，痛哭流涕的说人家骗钱失信，至十四日他便大举撤兵了。我们看日本东京、大阪[阪]各大报所载，十日北京发的电通社电说，张家口方面主和派(非战派)⁴的秘使赴奉，又张的秘书长某致某君函云，以后如有关于与广州接洽之事件，可径函鹿，关于与奉天接洽之事件，可径函张之江，便可知道这次撤兵的黑幕⁵了。张之江于自觉的或非自觉的反革命外，还是一个最无能力的东西，所以撤兵之顷，弄得一塌糊涂，冲车失火，毁损甚巨。昨家兄⁶接到包头方面电音说，这次国军退却，实为一大失败，丧失精锐兵士及器械无算，这不是因为战争失利，而是因为主帅之无谋。退至包头后，张之江命一部分入新疆，一部分入甘肃，一部分入陕西。包头情形不佳，惟一的希望在冯即日回包，还可重整旗鼓，否则万事将败于张之江之手矣。

此间国校政委曾以个人联名方式致电于冯⁷，请即出兵陕西⁸，经富谷县、葭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一则可以阻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不知此电能达否？

近据某陕籍将领接到家信，似方振武、徐永昌军已过榆林⁹，并岳秀¹⁰被迫南下。计程国军此时已可抵西安，奉派报亦载有太原专电，谓国军已入陇南，占领天水等处。

于须¹¹在西伯利亚遇李鸣钟、刘骥¹²等，觉彼等思想大变，颇有革命的倾向。嗣又在莫与奉[冯]谈，觉冯思想更进步，从前于、冯不甚相得，此次则融和无间矣。冯在莫归志不决，徐季龙¹³乃电于往劝冯即归国革命，于抵莫与冯谈，冯即毅然归。于于十日行，冯于十七日离莫，闻于十九日尚在上乌金斯克与史、任等相值¹⁴，似此他们在听到国军退却讯后，必等候冯一同回库伦。闻冯已与于商定，由于带二三军残部并一部分国一军经陇南入陕。冯在乌拉山车中致家兄侍称同志，谓此次归来，系要革命，措辞极其恳切，系亲笔写的。似此则国军退却之损失，虽不在小，而经此一番折磨，一番淘汰，卷土重来时，必又多一层革命色彩矣。

武汉下后，对孙对奉¹⁵似不宜同时宣战。近据四日顾孟余¹⁶由广东来电，似革军对江西已下动员令，则对奉的折冲已不可缓。对奉的交涉，向由石曾¹⁷、寅村¹⁸去办，他们所接头的有三部分人：一系代表张学良的胡若愚等；一系代表张作霖¹⁹的梁、叶、郑等；一系代表杨宇霆²⁰的郑谦等，综合这些日期接洽的结果，可以说是没有结果。他们先说老张已派人赴粤了，可是去了没有，去的是谁，均不可知。后又说要派一个姓梁的去，但至今尚未成行。最近梁、叶又表示奉方希望粤方先派代表或打电与奉接洽（此事自然要等一等再说，特别是武汉下后的现在）。小张最热心与粤接洽，杨宇霆则主战，对孙对粤一个一个的打，至于张宗昌²¹则力主援吴，名为援吴，实则要夺取保大及河南地盘。现在英、法两使均在奉，嗣又闻法使已往大连开会议，大要不外排俄与援吴二事。张、褚赴奉亦系与奉张商援鄂取豫事。安福方面²²消息，奉张已决出款百万，张宗昌已派定褚玉璞²³为援鄂总司令，王栋为总指挥，王已赴保，

褚由奉归即起程。又闻张宗昌秘印小册多本，系宣布孙传芳罪状及其谋鲁阴谋等。柏烈武²⁴曾托人与张宗昌谈询对粤态度，张答我们与粤这些年宗旨不合，但究竟如何，须在奉决定，谈罢即匆匆赴奉去了。

日昨石曾、烈武、寅村等与家兄讨论，结果大家仍主张对奉继续接洽，可以与之相约，分东南地盘，军事解决后再商政治。

预测中国政局，将有南北分裂之势，家兄谓此为于革命进行上最理想的局面——一边是国民革命政府，一边是张作霖政府，任列强择其一，以与之交涉；任人民择其一，以与之合作，是白是赤，是暗是明，皎然并列，何等分明！

看钟兄²⁵致粤特委函，主政府仍留粤，不必迁武汉，弟以为此在武汉局面未固以前，自然应尔，但武汉局势稍固，把政府迁到武汉来，不但意义重大，而且更有必要。因为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有三个利益：一以塞武汉之地位，免野心者别谋树立；一以空北京政府，使之丧失中国政府的位置；一以树革命政府北进之声威。此策所关甚巨，幸钟兄详加讨论决定之。

《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

1926年9月15日

南口陷落后的北方形势¹

——九月一日北方区政治通讯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一、南口陷落的前后

以战争进行的顺利与防御工程的坚实，南口陷落几为不可能之事。这一突变使我们北方的政治计划，受一重大打击！

我们曾经说过，奉系对国是和、战并行：和则以退出直隶地盘为条件，战则趋重于东侧之进攻。在战的方面，奉军于七月二十七日攻下多伦，同时并开始向南口炮战，意在一鼓荡平国军也。但是多伦既于八月五日夺回，而南口战事，奉军方面亦毫无进展，且以损失过大，呈不能支持之象，故自[至]十日后，南口入于休战状况。十四日攻下南口的消息²，几不能令人置信——而此突变，固事实也！

奉联军在多伦得而复失之后，对南口正面已不能取猛攻战争，而其后方京、津、京畿西路各(友)军约三万余人，均已商量就遂，并与国方约定，于十二(日)晚由国军冲出为信，截断奉联归路，一举而歼灭之。岂知事至当时，国方无一兵之出动，而此计划根本失败，京、津友军并被解散。此计划失败不过二日，奉联军累月猛攻

之南口，突然陷落，真是一方面失败于功在垂成，一方面成功于失败之倾[顷]，致北方民众更入于水深火热的境地。

南口既失以后，国军忽剧撤兵，损失甚巨，余众不过七、八万人，合二、三、五各军不过十二、三万人，现已退至绥境。大概须固守丰镇为第一道防线，平地泉为第二道防线，包头为第三道防线。

二、国民军失败的原因及其仅有的出路

国民军未败以前的地位是很胜利的，但竟失败如此特剧，其中必有大缘故：

第一，张之江破坏战争。我们提到张之江的名字就马上要想到两件事：冯玉祥的去职与三一八的惨案。这两件事的发生，张之江都要算主动[要]人物。当国民军初次进攻天津之时，张之江就争地盘、要位置，及至退到北京以及南口之后，他更一意以投降张作霖或吴佩孚为事。因此之故，冯派“人治”的国民军意见分歧，内部冲突日益渐剧，张之江遂为部下所反对。如是，虽不敢明投敌人，但是暗中进行破坏战争工作，若非痛哭流涕以主和，及暗中摆布以阻军事之迅速与成功。其在国民军中，虽无具体实力，但在内部扰乱则有余，如此本无统一思想的国民军终归失败。

国民军退出南口以后，“战出一条生路”，为当时必然的办法，不占住富庶之山西，国军绝无存在之可能。故进攻山西为国民军退出南口后，在生存上必不可已之战争。但此为张之江所反对，又于军[实]行之中多方掣肘，致大同、天镇两城直至南口陷落尚未攻下³，羁住大量兵力为围城之用，而不能尽量反师多伦、南口诸要塞，战较山西更顽强数倍之敌人。

十二日运动，张之江本已与奉联后方友军约定与当夜八时，由国民军冲出发动，但其命令前方则谓：俟奉联后方友军发动后再行冲出，以致该项计划根本贻误，南口失败于功在垂成之时。

第二，奉联军累战累败的结果，有从南口撤退倾向，所以至一起，炮战无进展之后，奉联方面飞机即向南口一带探察国军阵地，远而至于居庸以北，并在十日起已有开始撤退行动。这在国军视之，当然认为无法续战，故而撤退，但在奉联方面，则因飞机探得国军后方空虚，故移动正面部队向南口后方作迂回战争。故十三日夜二时，延庆失守，国军前方尚未全知，直至十四日午方全部退却。

第三，多伦、沽源因宋哲元部反攻深入，被奉军包围而再次失守，遂使南口之兵势不能不退。

第四，龙虎台失陷，使奉联向南口攻击，居高临下，并截断国军水源。

第五，张之江坚持退兵，不于南口作数日之支持，以于奉联后方共同举动，以至牵制。

第六，库、张交通不便，子弹接济不上。

有以上原因，国军似乎非退不可。其在撤退时损失之巨，实交通系之捣乱。同时，因国民军平昔对工人之仇视，工会之破坏与对交通系之勾结，遂使工人于国民军撤退时无法帮助，虽然战争中他们曾帮助国军不少。所以，凡交系工贼驾驶之车头均行撞车，及我们工人交通队往救且受杀毙之惨。

总之，能战能爱民之国民军，以无中心的政治思想，腐败领袖与对工人、农人变式的压迫，决定了国民军终须失败的命运，虽然尚有许多直接的原因。

国民军既如此失败，其出路或不免于向甘、新垦殖边陲与占领陕西，东出潼关与中原友军汇合，以与国民革命军相呼应。前者迟

慢而且敌之随踪迫来，并未能安以垦殖，后者，则虽有几分冒险，但国军惟一有希望的出路，确不离乎此。

《中央政治通讯》第2号

1926年9月8日

北方区对于三特别区及 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八日)

一、在三特别区¹ 工作方面

(a) 国民军未退出南口以前

国民军未退出南口以前，在党的工作方面，虽有相当的发展，但党的基础极不巩固。同时，内部负责同志又不能互相了解，共同努力工作，使党的组织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甚至于同志只听党中个人指挥，不接受党的组织指导。如张家口京绥路工人同志只听仲一² 同志命令，支部会非仲一同志去召集，即不能开会，在南口也有这种现象。总之，一切工作只有同志个人活动，而没有党的组织的指导，因此，有许多负责的同志，不但在工作中不努力，而且行为极为浪漫。另一方面，张家口地委工作既如此，其他各特支亦甚不好。职工运动方面，从前虽能公开的召集，在此次战争中亦能实际的帮助国民军，但尚不能达到成为党的指导下的群众组织。二区工作最糟者，为国民党工作。三区国民党在我们手中，可惜过去的指导太不得力，所有一切民校工作，全由麟符³ 一人包办，名义上虽有多少党部、组织、党员、机关，事实上不过花了很多钱，养

了一班不作工作的同志。过去负(责)三区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如张良翰×××等,不但是不作工作,而且抽大烟,逛窑子,因此,许多进步的青年学生,对于三区国民党负责人极不满意。不但是国民党在三区不能发展,而且影响于我们的党在三区的工作。在三区一般人都有这种感觉:国民党是好的,但在三特别区的国民党却不好。绥远市党部(在山东派手中的)曾借此向民校中央控告绥远省党部。现在民中已派路友于⁴来京查办此事。

(b) 奉军占领张家口以后

现在三特(别)区有党的组织的地方,为张家口、大同、绥远、包头、五原。南口、康庄等地,党部组织尚未恢复。在以上有组织的地方,以张家口地方为较好,绥次之。大同方面尚未能正式开会,只能作个人谈话。包头方面,同志不多,五原虽有很多的同志,但该方党部尚未组织起来。职工运动及国民党工作都是在复兴的时期中。农民运动还是在开始进行状况中。

(c) 目前的计划

1. 从前张家口各特支均改为区的特支,直接受区委的指导。如大同、绥远、包头均应调一得力同志去主持一切工作。
2. 民校工作应完全重新换人去做,并应受该地党部(我们的)的指导。
3. 在农民运动方面,现正派由粤农校归来之十余同志去各县工作。
4. 在职工运动方面,除从事调查与救济散去之得力分子外,须在工人群众中建设新的基础。
5. 关于工作者分配问题:张家口——×××,大同——×××,绥远——×××,包头——×××或×××。

二、在西北军中党的工作

西北军现在不但组织上渐次统一，即在政治上亦有相当的进步，虽然这种进步尚未有下层的基础，但现在冯之左倾，却是我们不可放弃的机会。按国民军现在的地位看来，我们自然不能轻视在国军内之工作。在国军中的政治工作及与民校关系，我们很同意于和森的意见。至于我们派同志去国军中工作，重(在)要慎重。现在冯虽饥不择食，我们固然不能使他失望，如果不慎重，派许多的较弱的分子去工作，不但使冯不信任，并必引起国军一班将领的恶感，因国民军的将领思想较广东军中将领更弱，这是我们应注意的。

现在第一军中军友团的同志约有九十余人（该团乃西北军干部学校改组的，共约三百人），该团现正分配给各军中充下级军官或参谋。第三军中同志约四十余人，此外，在陕西井岳秀军中尚有同志三十余人，合共在西北军中约有一百七八十同志，但是在组织方面都非常之涣散。现在这些同志都集中于五原，因此在该方非派得力同志去工作不可。过去我们在这些军中的同志，工作极不好，急待重新整顿，并且在该方非建立得力指导机关不可。现在除要求中央速派平山⁵及一飞⁶同志去西北军中工作外，北方区现正指定同志，受短时间特别训练，准备去该方工作。

北方区因感觉过去三特别区工作之遭[糟]及现在西北军中工作之重要，特派××同志去西北一行⁷，沿路巡视各地工作，并至五原与伯坚接头⁸，考察该方实在情形及目前一切纠纷的问题（在军队中同志的）。至于三特(别)区及西北军中工作具体详细计划，须

俟××同志归来时才能规定，因这样比较切实些。

《中央政治通讯》第 10 期

1926 年 11 月 3 日

听取陈乔年关于西北军 政治工作考察报告后的意见¹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冯之为人，极谨细切实，虚心好问，勤俭廉洁，不似其他领袖之狂妄自大，纵容部下贪赃（如蒋的总司令部及黄埔军校），且较其他军事领袖更多懂得民众的痛苦，拥护民众的利益。所以这支军队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是极有作用的，在目前，牵制奉军不敢南下亦有很大功效。现时，国民政府应尽力维持国民军能在北方存在。国民政府应知道，维持国民军以牵制奉军，即所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即所以为将来打倒奉军的预备，除充分的给以物质的援助外，并与国民军联合拉住晋阎，抵制奉军进攻。

努力使冯、于间之关系弄好，把二、三、五、六各军均送入陕西。陕西交给于右任，以于为副司令。一军只助解西安之围而不留陕，由 KMT 及 C.P. 助于整理陕西工作。

对于蒙、回民族问题，需告冯有适当的解决，应尊重这些少数民族的权利。对哥老会不可纯用羁縻的方法，而当发起手工业工会、农民协会等组织，以渐次减少哥老会之作用。

目前政治工作人才既十分的少，不必各师、旅、团、营均设政治部，只由总政治处集中所有宣传人员分组宣传队，轮流在各营讲演，并且当选择最有希望之部分（指军队——编者），集中力量去

作工。

《中央政治通讯》第 12 期

1926 年 12 月

切实改进与做好 西北军中的政治工作¹

——致刘伯坚²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

(一) 冯这次回来，的确是非常进步，非常左倾，国民军虽在残破之余，却另给以新的生命。我们为国民革命的前途、未来北伐的前途计，国民政府必须维持国民军能在西北存在和发展。因为他的存在：第一、现时可以威吓奉军不敢南下，使北伐军能保住长江已得的胜利。第二、未来北伐，对奉若没有国民军之骑兵、炮兵参加，实难望驱逐奉军出关，而且冯军之纪律与战斗力，实较一般的北伐军为好，再加以一个时期的休养训练，同时助以政治工作，在中国革命的前途是有很大作用的，所以，我们对于现时的西北军工作十分重视。

(二) 不过我们重视西北(军)工作，不是把西北军同全国隔离的来看。要知道西北军在现时的革命争斗中占什么地位，未来的革命争斗中占什么地位；要知道西北军现在处的是什么环境，他只能有些什么可能的发展；要知道国民军的内容，他所包含的成分，他一般的政治程度。我们必须十分的了解这些客观现象才能工作。

伯坚同志在工作上自然是十分努力，就是太主观了一点，没有虚心的去求懂得以上所说的现象，而只是简单的执着莫斯科理论应用，所以，在伯坚同志信中发现如“西北工作方针”中所指出的错误。我们在西北军中工作，以下几点皆(须)明白的：

1. 西北军经了很大的残败之后，他现时需要的是补充、训练和迅速肃清陕西全境，与晋阎结成很好的联盟，才能站住西北，为将来发展的基础。他在现时没有就积极对奉作战的可能，不能有马上回复去年状况的野心。

2. 西北军现时所占的地盘，是最贫瘠苦穷之地，经济上一切措施均受限制，政治上还有一个民族问题(对回民)，须对付得好，文化上亦非常落后。我们在这种环境中工作，是不能乱发野心有过于高远的行动。比如对妇女问题，只是在提倡天足，妇女教育时代，万万说不到就宣传什么社交公开，两性自由。

3. 西北军只是冯玉祥进步了，他的部下很多还在[是]非常落后，若果我们不注意使冯的部下能够赶得上冯的左倾，仅仅冯一个人左倾是很危险的。总要注意使冯与他的部下之进步不致相隔得太远(若果相隔得太远，不是部下对冯不信仰，便是冯部下痛恶我们作工同志，认为我们蛊惑冯如此做)。

(三)莫斯科所定冯军工作的三个原则，是非常之对，也可以说是我们在粤工作两年所得的宝贵经验之应用。尤其是指出“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民)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不要限制冯之职权”更为有见地。

军中党代表制度，本是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产物。要有这样组织严密具有无上权威的党，才可以说以党治军，以党治国，现在，中国还离不了以军治党现象。各将领对于党的命令，并不十分尊重。国家行政对于党的决议，也尚不能奉若命令的执行。党并不能真正指挥政府，指挥军队。国民政府境内的国民党部，大多数均

尚只能做到代表民众利益与政府合作(的)地步，党在军队中也只是侧重政治宣传工作，而没有可能指挥军队。广东过去实行党代表制的结果，是党代表在军中名尊而无实权，或附属于军官，或与军官冲突，一面破坏了军中指挥的统一，同时又弄出许多纠纷，所以，此后西北军可不再走此错路。万一此制因别的关系不能废免，则其作用亦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

(四)现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是非常缺乏，有能力的更是缺乏，不仅我们，就是有能力的左派分子亦十分的少，所以此刻我们在冯军中的政治宣传工作，须量力举办，万不可只从形式上注意设备完全，而不计其影响效果。现时工人既少，可以不必各师、旅、团均有固定的政治工作人，而只是把这批政治宣传人组成宣传队，轮流至各师、旅、团讲演。

(五)在西北军中，我们的同志除绝对无法避免必须公开的部分外，其余均尽可能的秘密，以免引起冲突的目标。对于工作同志当十分严重的督察，勿使有浪漫越轨的行为。不良分子不惮开除，勿使败坏本党名义。当地党的组织与军中组织可以分开(此处是指两部分的群众可以不相接头，而指导机关自然要有亲密关系)。

总之，我们现在西北军工作方才开始，老冯又是抱有满腔的热望从事改革他的军队，若果我们现时工作不好，可以使以后工作发生不良影响，甚至影响老冯之失望，改变其左倾观念，这是要十分小心的。

《中央政治通讯》第 11 期

1926 年 11 月

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自始即是世界的一部。中国革命的成功，将与伟大的影响于欧洲，乃至全世界。在太平革命（太平天国事件）时期，马克思即是这样的观察。太平革命（一八五〇——一八六四）的年代，恰是马克思为《纽约新闻》（New York Daily Tribune）作通讯员的时期（一八五一——一八六二），故马克思曾有一篇通讯，分析中国革命的因果关系，并其所与于欧洲的影响。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国革命将要影响于所谓文明的世界，欧洲民众的下次暴动，为共和制、自由政府与经济的下次运动，所靠中国现在的革命（太平革命）的经过，比其他任何政治的原因（如俄国的威胁以及全欧大战的将要发生等）都多。在一八四〇年英国炮火之下，许多的分解的要因凑合起来，日益发展，以影响于中国的财政、产业、政治与道德。皇帝的权威遂不能不崩落，自命天朝的上国，遂不能不与人间的世界相接，闭关自守的老支那遂为英国的炮火结束了他的孤立的生活。恰如保存在神秘的固封的棺中的木乃伊，一与空气相接自然的便要解体。英国造成中国的革命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革命怎样影响到英国，经由英国影响到欧洲。太平天国的灭亡在一八六四年，一八六六年孙中山先生诞

生，由孙先生诞生到现在，刚刚六十年，这六十年间的中国国民革命运运动，仍在继续着向前涌进，孙先生的主义，便是指导革命进路的南针。

第一国际时代在法国有一关于“天地会”的记录，这是一个中国人的第一国际的支部。会员以百万称，蔓延遍于全中国及印度。“天地会”是太平党人失败后所组织的革命的秘密结社，会员多散处于中国南部及南洋、印度、美洲各处。这一个天地会与第一国际发生关系的事实，可以证明太平革命是含有阶级性的民族革命，可以证明中国革命自始有与世界无产阶级提携的需要与倾向。

中山先生所创立的兴中会的前身，便是太平失败后继续中国革命系统的团体。兴中会的宣言里已经说明，外国人同情于中国国民革命运者，亦得为会员。同盟会的时代，有许多的日本同志为中国革命牺牲了。中山先生曾与日人宫崎滔天等共同援助过菲列滨人的革命运动。中山先生并且说过，我们先援助菲岛的革命，等到菲岛的革命成功，他们必来援助中国的革命。这可以证明中山先生早已看清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及全世界的革命者，均有互相联合的必要。

列宁说：“四万万落后的亚洲人，达到自由的境地，对于政治生活觉醒了，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由愚昧觉醒起来，向着光明前进，运动争斗。”孙中山先生便是亚洲人向着自由与光明奋斗的领导者。

列宁又说：“在亚洲一个有威力的民主主义的运动正在发长与延扩，那里的中产阶级尚与民众站在一边去反抗那反动势力，几万万人觉醒起来，要生活，要光明，要自由。这种世界运动振奋于一切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胸怀中是怎样的喜悦……但是那‘前进’的欧洲呢？他是正在掠夺中国，在中国援助民主主义的敌人，自由的敌人。”孙中山先生正是亚洲的民主主义运动的代表者，他的一生

的事业在指挥中国民众向那掠夺中国，在中国援助民主主义和自由的仇敌进攻。他的躯壳虽然死去，他的主义尚在中国民众革命的运动中生动着。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山先生认中国国民革命为世界革命的一部的信念愈益坚固，使中山先生把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接起来的努力愈益猛烈。换句话说，中国民族革命的潮流，直到中山先生晚年的奋斗，才真正确定了他那接近世界革命潮流的倾向，而完全汇合一起，就是依了中山先生的指导，才入了世界革命的正轨，以达于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建设。

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奋斗，已经唤起了沉睡的亚洲，中山主义所指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亦必要影响到英国，经过英国影响到欧洲，到全世界。马克思和列宁的话，必能由中国民众革命的努力经由中山主义的道路一一证实。

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

中山主义万岁！

列宁主义万岁！

《政治生活》

1926年11月

守同志来信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侧闻鲁张¹ 颇以南方与鲁性质上冰炭不相容，终难谋妥协。以言似张曾以告杨度² 者，但彼既不得一新同盟者，则叛奉实有所不敢。不敢叛奉，则其一切举措不能不唯奉之决策是从。现在时局之推移，靳、田、魏倒吴对奉之运动，已使京汉线上酝酿新变化，而杨宇霆眼看鲁张要把肥美的江苏独吞下咽，心殊不甘，且恐鲁张之长腿飞扬易惹新战祸，故又放心不下，遂又拉孙传芳，使之再度南下。一以避党、奉两军之马上直接冲突；一以杜奉[鲁]张之勃勃野心，眈眈虎视，这样一来河南问题更形重要。我以为目下的策略应该是：(一)如能接近鲁张，仍当怂恿他赶快去吃江苏这一块肥肉，驱孙而拒杨³；(二)收纳靳、田、魏⁴ 等，使之北拒奉，东拒鲁，西向潼关与国民军携手；(三)联络阎锡山，使之消极的不与奉合作。关于第一策，在北京方面，只好令石曾常常与杨度接头，有机可乘即照此进行。关于第二策，前接汉口来信，据云靳、田、魏、寇等派有代表到汉⁵，连袂向总司令部接洽，当时由邓演达⁶、王励斋⁷ 出名招宴他们，当场声明靳等如能赶走吴，通电声明服从国民政府，则可实行接济。他们的代表等谓此次回去报告再答复。最近吴有下野之说⁸，似靳等已与南方已有一种协定亦未可知。如中央以为此策可行，即请去函汉口推进此事，无论如何总不使靳等归奉。据此间所接确报，靳已两派代表来津谒奉张，所上两函皆含有

拒奉出兵河南之意味，其第二函已公然说出联唐的事来。于此应注意的是：（一）所谓“联唐反蒋”是否为一种辞令或事实；（二）靳^上⁹这种的态度是否故意作出来的，为靳大要总理¹⁰，为自己要河南督办，此点须要谨防扒手。关于第三策，此间早已进行，在一个月以前我便托人向晋阎的驻京代表¹¹说：“国民党中央驻京负责的人很想知到[道]晋阎对于国民党的真实态度为敌抑为友？”他的代表听了此话含糊其辞，便急忙跑回太原，在太原住了二十天，回来托人告我说，晋阎决与国民党合作，至时彼唯从党令动作，但此时幸为严守秘密云云。其余关于晋阎对于国民军之态度，彼所告者，全与我们及包头方面的消息若合符节，以此证其代表某或不吾欺。最近奉张压迫晋阎，令其合攻国民军，当时提条件凡三：（一）是否能将绥包一带之冯部驱除净尽；（二）是否能向甘陕进击冯军；（三）如一二两项办不到，则请以京绥全线让之奉方，奉方将单独进攻。阎复电谓一二两项均办不到，三则请雨帅¹²自由施行，晋愿将京绥全线交给奉方。在此时顷，晋阎驻京代表复托人告我说，冯在包头大张旗鼓的作起来，颇令晋方为难，党对此有何善策？我即着人答他说：“晋阎自第一次革命即督山西，于今十五年矣。革命以来，历督一省而始终未遭更动以迄今日者，百川¹³而外宁复几人？然百川之苦心孤诣，历尽事齐事楚¹⁴之艰难，而不惜卑身屈节以保此位置者，岂仅为身家一己之尊荣乎？抑将守此以有待，而为吾国家民族完成革命之大事业乎？如使为一己，则吾于百川复有何言！如为民族革命之大事业者，则百川今日所处之境，真所谓千载一时之良机，不容或失者矣。现在革命军之势力已足控制长江，国民军亦且雄视西北，倘来岁春深反奉战起，百川果能率其十数万健儿加入我革（命）军方面作战，则榆关以内胡骑全清，易如反掌耳。冯在包头知公为难，刻已旌麾西指，赴平凉督战矣，幸勿介意也云云。”其驻京代表说，据以电阎。阎复电云：“本号（暗指山西）与田君（暗示

国党)同行，早具决心，幸为转达，惟照(暗示换字)章作法太差，令我为难，现已决由奉方单独解决。我军除留一军[师]二旅留驻绥远外，悉数调回晋境，此外还有由国军改编之晋军二万余人。”闻奉军近已进至平地泉，向晋索取晋北十三县，国军之未改编及已改编者均已退至包头布防。以国民军方面之人推测，奉军决不进击包头，因晋阎之态度奉方决不放心，故不敢深入于黄沙白草无人烟之原漠，以穷进[迫]国军也。昨有蒙古同志归自包头，沿途所见知国军已由绥远退至包头，京绥路上之晋军，除一师余人驻绥者外，确皆调入晋境矣。西安之围已解，国军已进至潼关，冯于阎关系似无问题。于现在西安，实际上已为援陕军总司令，即入陕一军亦皆受其指挥。新疆之杨增新¹⁵确已故去，国军对新似已有一部分人新。刘伯坚¹⁶在冯处已渐引起冯左右之嫉妒。闻伯坚临行曾对留守副司令张允恭说了一段话，隐含讽劝张对于革命理论应该多加研究，因现所具有者尚感不足，意谓C. P. 人们来此工作不是为升官发财，乃是为革命云云。张答以：“请你不要注意我，我将来或者还可以入C. P.，你只注意冯就够了，因冯时有动摇之倾势。你说你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来，可是你的地位比谁都高，你须注意，不可太出风头了。从前有个刘牧师¹⁷，当时冯极宠信之，以致人人侧目，后来就是冯总司令亦不能拥护他了。”又闻冯近来对于政治工作之成绩，颇露失望之色。因人材分散，不集中，不够用，故无成绩，除画报外，无成绩可观。在未接兄信以前，已致信伯坚请其注意，并告以须令人材集中于最好之一师或一旅，俾冯及其部下将领得以睹其成效，俾知政治工作之确有成绩。(倘若人材够用，人材分配得当)吾党之政治工作者确能作出成绩，(倘若人材够用，人材分配得当)现在成绩所以不能卓著的原因，全是因为人材不够用的缘故，并不是政治工作不生效，政治工作者不得力。

《中央政治通讯》第 14 号

1926 年 12 月

国民二军中工作应注意之事¹

——致魏野畴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国民二军前在河南时，大部分均是土匪编成、扩充，人数虽多，然战斗力十分薄弱，经不住吴佩孚少数组队之袭击，便要全军瓦解。听说现在陕西二军，仍与从前一样，每个将领均各怀野心，乱事招募土匪壮己声势。此种军队，在平时，徒耗费饷弹，加重人民负担，在战时，又一无能为。我们应忠告于先生及明白的二军将领，劝他们勿再蹈前此的覆辙，当注重质量的加好，而勿徒事数量的扩充，尤其是我们要做爱民的革命军队，不该多招土匪，苛捐扰民。

过去，二军和一军关系不甚好，双方均各存着许多疑虑。一军不满二军之土匪行为，二军又忌恨一军之把持械源，甚至疑惧一军解决他们。最近于、冯的关系，听说也不大好，三军、六军对于一军也有同样感觉，我们认为这是极危险的现象。我们应知，现时国民军的处境十分危险，奉张认为他目前最大的敌人、最急需消灭的敌人，不是北伐军而是国民军，若不先消灭国民军，则他所有的一切野心皆无法实现，因此，他现时是正在处心积虑的勾结晋阎，图消灭国民军。国民各军此时必须诚意合作，始能免于灭亡，否则十分危险。我们试想，国民二军若无一军之助，能够肃清陕西么？能够

守住陕西么？当然是不可能的。

现时一、二、三、五各军，必须统一于冯玉祥总司令指挥之下，不可号令歧出不相下，因为指挥不统一，决不能作战。

我们还要明白，现时 K·M·T² 中有部（分）人，如张静江³等，正利用冯、于之冲突，想法使二、三、五军另成一个系统与冯对抗，使冯遇事不能顺利进行，同时使整个的国民军亦不易发展。我们须用种种方法，勿使右派阴谋得以实现，须使于先生能看到革命的全局，与冯玉祥维持很好的关系。

整个的国民军，现时方当极大的残破之后，还不能取进攻形势，只要能使现时的力量可以维持、存在，不至消灭，且逐渐的恢复、充实起来，已经是很大的胜利。目前，国民军的力量不能维持对奉作战，他要抵抗奉军之进攻，必须同阎锡山的关系弄好，勿使晋阎助奉张，才有办法。

当说于先生及二军明白将领，勿压抑陕西的农民运动，并加以提倡，在军队中唱出兵士与农民合作的口号。必如此，然后这个政府才是有民众基础的，为民众所拥护的政府，否则，我们今日虽逐走了刘镇华等，并不能使此政府巩固。

一定有许多将领在得了西安后，又对河南发生野心。我们须注意，从前二军与镇嵩军在豫陕之骚扰，已使两省人民结下很深的仇恨，若果二军再占河南，又要驱使河南民众尽倒向奉张方面（方面）去，二军必须避免这个冲突。现时大局的情形，自然不容我们取河南，万一将来机会到来时，亦当让一军、五军或北伐军的兵进去，二军不必出兵河南。

对于二军将领，我们不可从他的言语上去相信他左倾革命，要从实际行动上去看他是否左倾。不可简单的只灌输他以许多不能真正懂得的革命理论，而要有方法的领导他切实做点革命有利的事。

现时我们的工作人力既十分的少，则分配工作时，便不可过于分散，须选择最有希望的几部分，集中力量去作工，庶工作更易做好。

冯玉祥自游莫回来后，他的思想的确是很大的进步，很左倾。这个人不是一个机械狡猾的人，而是一个中古时代勤俭、爱民想做点好事的英雄。我们陕西的同志，或许也蒙蔽于偏见而站在乡土观念上（二军关系上）反对冯的，须注意改正。

《中央政治通讯》第 13 期

1926 年 12 月 9 日

白和对于陕西问题的意见¹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要解决陕西问题，换言之，即是解决二军问题。现在陕西内部问题并不因刘镇华失败而有所解决。我们可以说，二军是无法解决陕西问题的，因为二军内部之复杂，军纪之恶劣，无以复加，甚至陕西人民有要求一军消灭二军的趋向。此种军队不但妨害整个的国民军的军事行动，且妨害整个的国（民）军与民众的关系。二军本身之改造，几为不可能之事²，若确要改造它，结果恐怕是费力不讨好。无论一军或于右任对于二军的态度，虽然不应马上取消（取）消二军的态度，但也不要希望将他们改造好来统治陕西。现在对于这部分军队所应该做的工作，不过是减少其反动程度而已。如果能够做到此点，也就是很难的事了。

二、于右任自俄归后，思想上虽有进步，对于一军之观念与冯之关系或许也有相当的进步。但要他在冯之下做事，这是他始终不满意的事。根本说来，他本自莫有成为军事首领之可能，在事实上，他也莫有能力统辖二军的可能。在陕西，一般土匪式之军队之所以拥于为首领，不过是拿于来作为他们抵抗一军而已，因为恐惧一军来消灭自己的势力，所以，我们应该使于了解此点，不要使于为土匪（式）军队所利用，不要只希望取得陕西名义上的军事首领，而要注意新的好的军事力量，最好就从史可轩的八百人军队及甄寿山之千人着手做起，慢慢的发展起来。只有这样，于或者能统治

陕西，不致为土匪式之二军所误。至于于对于陕西二、三军总司令职，可以暂时保留，不必取消，因此时尚可以利用名义笼络二军也。

三、冯、于关系现在虽然不好，但还说不上是什么地盘的冲突。因为在于方面，此时尚莫有能力统治全陕，而在冯方面，亦因有（向）河南方面发展的可能，亦无占领全陕地盘的必要。不过事实上，一军为在军事上便利与安全起见，必然要占领陕西一部分地盘。一军此种行动，或亦不致于影响到冯、于关系。冯、于关系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冯不满意于于不推冯，而于亦不愿在冯之下做事，现在于尚未就联军副司令职，由此即可见于之心理。此事，最好由国民政府先向于、冯间疏通，得对方同意后，再由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冯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于为副司令兼二军军长，无论对内对外，或可改善冯、于关系。

四、于在陕西，政治上自然是要处领袖的地位，将来组织省政府时，省政府委员中，除容纳各军事及民众的领袖外，当推于为主席。

五、关于在陕西军队中之政治工作及党的工作，在目前应该采取下列的原则：(1)不要马上设立许多政治工作机关及在军队中成立许多国民党党部。否则，不但花费许多财力与精力，设立许多有名无实的机关，并且将为投机的军人所利用；(2)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最好集中于于之基本军队中（如史可轩等），不要将许多力量分散在不可救药的土匪式军队中；(3)即在于之基本军队之政治工作，亦不要像在国民一军中的那样复杂的组织，最好只要集合一部分较好的政治宣传工作人才，组织一政治宣传机关，从事军队中政治宣传工作。其它各级军队中，其它各基本军队中，一概不需要组织各级的政治宣传机关；(4)至于政治工作的内容，比一军的更要浅显，首先要使他们明了“不搅民”三个字，切忌空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抽象名词……

六、自刘镇华军队退出陕西后，陕西境内的交通当可以恢复。因此，陕西 C. P. 的工作亦应统一起来³。过去陕北的榆林、绥德、宜川、定边等地 C. P. 的组织均归白和指导，而陕西中、南二部的工作，均陷于无组织的状态。现在全陕同志约有四百左右，目前的办法是：(1)派炳光同志为党的工作临时特派员，指挥全陕党的工作；(2)在最短时间内，陕西境内 C. P. 的工作，应成立区委的组织；(3)陕西 C. P. 的工作由中央直接管理与指导。……

《中央政治通讯》第 15 期

1927 年 1 月 5 日以后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赤化观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

关于赤化的趣话，真是美不胜收。从前听到段祺瑞赤化、贾德耀赤化一类的话，已经令人笑不可仰。紧接着又是邵飘萍、林白水两位记者，天外飞来一顶红帽子无端的落在头上，便前后惨遭枪毙了。这更是邵、林两氏不白之冤（亦可以说是不赤之冤）！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新闻记者，又来凑趣，说现在的北京政府——顾维钧政府亦赤化了。这真是愈出愈奇。

在十二月二日的东京《日日新闻》所载《支那法权问题》一文中，有几句很妙的话：“赤化不仅是被与于广东的名辞，一涉及外交问题，就是北京政府亦颇有赤化的倾向。现在北京政府反驳列强渐进的劝告条件，绝叫治外法权的即时撤废”。我们一听北京政府亦赤化的话，不由的起了可笑的惊讶！但是仔细推敲，从这几句话里却得到了赤化的一部分的正确的意义。这便是反驳列强的劝告条件，绝叫治外法权的即时撤废者，即为赤化。如果赤化是指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而言，反抗帝国主义，废止不平等条约，的确是赤化的一面。关于这点，十二月一日的日本东京《朝日新闻》所载《支那赤化的大势》一文，说的愈颇露骨。兹举其要意于下：“依北伐军的成功，赤化的大势已至统治中国的一半，已毫无存疑的余地。今后的问题，即是更将席卷那剩下的他半，即越过扬子江以北的一半的时机迟速如何的问题。……无论是孙传芳派，是奉天派，其他任

何的军阀，只要是被称为旧军阀的，即便武器怎样的精锐，兵数怎样的众多，久已非北伐军之敌了。旧军阀之不足赖，不足统御中国人心，只要与北伐军一对照，便历就可睹……。在吾人所推断的限度中，中国全国的赤化之时期，必不在远。中国全国的赤化，即是第二个俄罗斯的抬头。广东国民政府和北伐军首领，都极力的辩解说，他们不是行共产主义者，而是奉孙文氏的三民主义者。吾人亦不相信在理想主义共产主义失败于俄罗斯的今日，共产主义会在中国能行的？然一观广东政府之政治的体容，则知于以无产大众为骨干的细胞组织，究与劳农苏维埃的组织并无何等差异，则目之为第二个俄罗斯出现，亦非过言。吾人以为以中国的赤化即是中国的问题，是没什么可以怕他的。所怕的只在若是他们统治中国全国的时候，是否仍然持续其主张废止既存条约而并复强硬的一点。由此将于对华国际关系唤起异常的低气压，这是可以想像而得的。中国的赤化虽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赤化的结果竟延而及于使既存条约的一律的破弃亦随之而至，则此于日本是生存的问题。为了生存问题，无论对方是赤化与否，不能不主张应该主张的权利……”我们很感谢他们一针见血的说出赤化即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说出他们很知道广州的国民政府并没有施行共产主义，只是以无产大众为骨干的组织。当作中国的问题，没有什么可以怕的，所怕的是他们统治全国便要废止不平等条约；他们更赤裸裸的说出他们的对方是否赤化都没有什么要紧，惟有废止不平等条约，便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存问题。诚然，帝国主义者的生命，是建立在压迫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族的关系之上的，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生命所托，几乎全在强迫中国所与结订的不平等条约。没有亚洲，欧洲帝国主义的国家便失了他们的生存之所托；中国废弃了不平等条约，国际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便失了他们生存之所托。我们中国民族要争生存，所以顾不得你们的生

存问题，因为废止不平等条约亦是我们的生存问题，是我们打破压迫的唯一的出路。

署名：猎父¹

《政治生活》第 86 期第 2 页

1927 年 1 月 10 日

国民政府与晋阎关系(之一)

——白和通讯

(一九二七年一月)

时局渐展，党军进出长江以后，KMT 北京政治分会曾间接对晋阎为下列表示¹：“我党甚愿知百川为吾党之友，抑为吾党之敌？吾人以为百川今日所处之境，最宜于促进革命大业之成功。百川皆隶同盟会籍，辛亥之役，曾建丰功。迄今 15 年来，尚能自保其地位者，百川而外，尚有何人！然而，百川处境，往往在两大之间，事齐事楚之难境，独能忍辱负重，苦心支持以至于今者，岂第为个人之利禄权位计耶！若欲留其硕果仅存之势力，将以伺机乘时，对于国家民族有所建树，则今日者，诚千载一时之机会，不可或失者也。百川而欲其十数年来之苦心孤诣，有以大白于天下者，宜速自决定大计矣。”此语已经由其驻京代表转达于晋阎。晋阎复电云：“敬电悉，本号（山西）于田君（KMT）同行（合作），早下决心。希转达绥远，事照（煥）章作法太差，致我为难。已定由奉方单独解决，我留一师两旅守驻绥外，余部已开始回晋²。此外，尚有与晋合作（之）西北军约两万人³，分驻绥区，并告。”此间得电后，即一面电告王英⁴同志（因彼时间方由外国购得步枪两万枝，子弹五百万颗，须由津入口，如奉方疑其态度有他，则必扣留，故阎嘱为严守秘密。今则此物已到手矣。），一面托其代表电复。谓：冯已离包西去，即

是为你解此难题。数日前，阎电其驻京代表温寿泉⁵云：随委派南去之某已由汉回晋，携有士英同志诚极恳之长函。阎即拟派温为正式代表南下。温电复他说，还是另派一人好，因彼在京亦可时时与我方接洽。如必欲彼往，有两个先决条件须你斟酌：（一）温一去汉，便不能再回北京；（二）温到汉，风声必高，因之，必须预备军事行动，否则另派他人前往。现尚不知阎如何决定。昨晚，阎忽来一下列的电报：“生甫军（奉军）已过汾西（绥远），再三交涉，非斐然部（焕章部）退出五原，恐不惟战事不能避免，且虑牵及本号，望向玉庵（石曾）、筱仙（L）⁶一商确之。”现已答复阎说，五原重要，万不能退，决严阵以待。我军有雄厚兵力集中五原一带，如彼必欲迫我，只有与之决战。此时，山西不必露出何等行动，但须准备一切，于必要时行动。韩麟春⁷昨在温处，大骂阎态度不明。《顺天时报》公然的说，要小心阎。阎在今日亦非同我们合作不可了。

《中央政治通讯》第 15 期

1927 年 1 月 5 日以后

国民政府与晋阎关系(之二)

——白和通讯

(一九二七年一月)

兹由石曾、L 名义致民中¹一电，其文如下：“晋阎咸日²致其驻京代表温寿泉一电云：‘奉决攻五原³，再三交涉，不能打消，如国民军不退出五原，不惟战事不能避免，且虑牵及山西。如何？望与石曾、L 一商。’我们详加讨论（后），托温电阎，告以奉方此举，不仅在取五原，且在威胁山西。现在统筹全局，不能让出五原。设敌进逼，惟有一战，望山西亦速加准备，至必要时，与我军一致动作。顷接阎复电云：‘不让五原，既系党议决定，彼只有赞成。惟有两点，望加以注意：（一）此时开战，山西处境极感困难；（二）焕章处境亦觉危险。因其军队距离相隔太远，供应给养极其艰难。且实际上，国军仅至阌[阌]乡、卢[灵]宝⁴，尚未攻至陕洲。守陕洲者，仍为柴云壁，国军图出中原，似须经周密之筹备，方能操有胜算。敌方炮兵及其他生力军已集中京汉路。闻国军无猛利大炮及充分之子弹，何以应战？且国军主力分在五原、潼关两方面，其间道里潦[潦]远，欲首尾相顾，须要一个月以上，方能达到，途中食物、薪火一切物资皆极困乏。敌方似决于一个月内，分途向两方进攻。如五原方面之国军不能接河南，则豫西何以[以何]策战守？靳、魏等部之态度究竟如何？靳、魏以外我们所指挥之军队又如何准备布

防？均望详加筹划，然后通知晋方，以便知所布置，协同动作’，云云。”

现在奉方压迫晋方，已有许多事实：如枪毙晋军旅长。商震代表到津谒奉张时，张厉色予以申斥，谓商与国军打成一气。又闻奉方派万福临[麟]攻五原，韩麟春攻山西⁵。万迫商同赴包头，商电阎请示，阎电商可暂同往，但商仍未肯。阎已悟，与南合作不惟在政治主张上应如此，实亦势逼处此，舍此更无他途可以自救……。

《中央政治通讯》第 15 期

1927 年 1 月 5 日以后

附：

其嘉致胡海、白和信

(一九二七年一月)

昨接北京 L、石曾同志来电，述阎锡山的意见，大意是：(一)他要回到 KMT 中来；(二)由他组织一不属西北国民军系统之下的国民军，而阎为首领。V 同志立即将此电报转往汉口、江西。

其嘉及远东局对于阎的这个提议是完全赞同的，要 B 同志和 K 同志切实向国民政府建议，承认阎的提议。其嘉很早就见到中国南方革命势力与奉张反动军阀的斗争，谁能拉住阎锡山便是谁占胜利。国民政府以往对于此事，非常忽略，今幸由阎自动进行联南反张，这事(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若果国民政府要反对或修改阎的这个提议，便要犯与张胡对阎一样的错误，结果或将逼阎倒向奉张方面去。国民政府应即迅速向阎表示：

1. 山西 KMT 不反对，阎可以照办。
2. 承认阎组织北方国民军，以阎为主席，联络陈调元、靳云鹗

等加入，不受西北国民军冯玉祥之节制。

3. 除以上阎自己所提两事外，国民政府并进一步向阎表示：战败奉军后，山西、绥远均给阎锡山。

总之，我们现时当根本使冯、蒋明白，应该以平等态度对阎，不可自高自大的以降将态度待阎，即令阎此时不愿在国民政府之下，而只反奉，国民政府亦须很好的与之合作，不必要有什么条件，待至将来奉军败后，阎绝不会跑在国民政府之外去。我们现时何必一定很简单的逼阎低首，使阎难堪呢？万一阎因此而翻脸附奉，我们更做了反革命的工作。

在战略上，阎锡山现时联南的态度若尚动摇，则我们当催促他迅速发动与奉反脸；如他联南态度十分坚决，则我们可授他以阴谋，此时仍虚与奉张敷衍，不使奉张对阎起一点恐怖、疑心，俟奉军精锐南下后，再突出保大，截断他的归路。

《中央政治通讯》第 15 号

1927 年 1 月 5 日以后

奉系最近军事计划¹

——白和报告

(一九二七年一月)

近自张作霖就安国军之职后，其讨赤之声似稍低降，而其和之望念，屡屡露之于外。然迄最近，证诸奉方对西北、对河南之用兵，更证诸奉方其他一切之言动，则又窥见其倾重于战之一途。

奉方内部于最近旬日间，确定其方针，内容如次：

奉方对南之真意，可概括言之如左：姑以他人之兵力抵御党军、国民军，他们能抵御得住，固佳，如不能，则奉方出其生力军以与转战数省疲敝无力之党军、国民军战，如此，确信可取事半功倍之效。

兹更详细说明其策略步骤如次：(1)在今日，以孙传芳、张宗昌两军与浙皖党军交战，更使吴佩孚之直系军与豫西国军交战，倘能抵御得住，奉方不废[费]一兵一弹而可高枕无忧，自亦为奉方之所愿。(2)倘孙、张、吴三军能击败党军与国军，甚或克复浙、闽、赣、鄂、陕、甘诸省，则亦为奉方之所愿。奉方正可依据预约或依据事势之可能，而得直、鲁、豫三省之地盘。(3)倘孙、张、吴三军为党军和国军所击败，则东南方面，第一牺牲者，自为先锋之孙传芳。孙灭，自然由宗昌继之。在河南方面，第一牺牲者，自为忠于吴佩孚之直系军。吴之灭亡，不过时间问题，倘能就豫省军内觅得一适当

之人，以为吴之代替者，驱之以抵御国军，此则计之上者。如果此项适当之代替者觅不出，则惟有调奉军实行入豫，进而与党军直接交战，此则计之下者。其所认为适当之代替人乃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寇英杰、齐燮元等五人，最近设尽方法极力拉拢此五人，依然只田、齐二人可就其范，此张作霖对于河南所以十分愁虑，无时或释者也。（4）倘长江方面张宗昌复继而为党军所击败，河南方面吴佩孚覆灭，或代替人根本觅求不得，或代替者亦继吴而灭，此则张作霖之所更愿。

张宗昌、孙传芳、吴佩孚倘能战胜党军，则彼等在北方政治上之势力与地（位）自必骤然增高，同时奉方之地位与势力亦必骤然低减，此自为张作霖所不愿者。

反之，张、孙、吴皆为党军所击败覆灭，北方统成奉系之天下，纯成张氏父子之天下，张氏父子而欲圆其总统、皇帝之梦，谁敢反对之者，此其一。张、孙、吴覆灭而后，奉军立倾其早已备妥之全部东北军起而与党军、国军直接交战。党军已转战湘、闽、赣、浙、皖诸省，先后战胜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诸大实力者，则其元气必已大伤特伤，凋敝疲懈，甚至不堪再战；至于国军方面，自败退西北，元气今犹未复，历经陕中崎岖之道，复作战如许之久，迨其败退吴佩孚之后，其战斗力亦必大减，或并党军而更不若。若论我东北之军，补充修养至如是之久，实一充实、坚强之实[生]力军，以之击破疲败[敝]之党军与国军，直如摧枯拉朽耳！决战之期，最多为一月，最后胜利自然归我奉方，占取豫、陕、鄂、赣、苏、皖、浙、闽，易如反掌。今日黔等省，各派将领正与我奉方接洽联络，届时正可会同川、黔等省进而窥复湘、粤，则统一中国易如反掌。彼时既由我张作霖统一之，则万民拥戴，世界钦崇……（以上为张作霖与张学良之一段密语）

以上为奉方对南之方针与计划，皆出于杨宇霆之规划²。杨草

有极详细之计划书，旬日前，派张式毅到津与（张）作霖为最后的具体决定。

先是，张作（霖）与张宗昌议定地盘分配之（包）办法：（1）苏皖归宗昌。（2）宗昌取得苏皖后，以直隶让之于奉方（现时适以豫局危急，奉张在直隶境内继续扩充防地，入占保大，褚玉璞在保极力把持，而所保亦只有六十余县而已）。（3）宗昌取得赣浙而后，则鲁省让之与奉方。

江苏地盘，本亦为奉方之所必争，而张作霖则竟与宗昌订定上述之协定，而将苏省让之宗昌，其重要原因在当时为左列种种。

张氏总统欲过于热切，而宗昌则系反对最激烈之人，作霖乃不得不尽其力之所及怀柔宗昌。苟奉张不以苏省让宗昌，或竟以他种办法取得苏省为已有（如收买苏省十万国军），则宗昌势必对奉取敌对或倒戈之行动（是时，宗昌方面特意散布一种谣言，谓：宗昌不便出头反奉，将是褚玉璞实行倒戈云云，实所以威吓奉张者也）。而事实上，奉军又不能先鲁军而入苏省，纵不许宗昌取苏，而宗昌亦有取苏之可能。此外，东南民众复为拒绝奉、鲁军之热烈运动，亦引起张作霖之极端得意。张在今日，乃买人心，做总统之将〔梦〕。纵令奉军有人苏充分可能，张必亦不屑贸然而为之，以触群众之怒也。

右之所述，乃是奉张与宗昌订立协定之当时，其不能不以江苏让之于宗昌之原因也。张宗昌能相对的赞成安国军之组织者，亦即以取得苏皖故耳。

宗昌之赞成安国军，乃是有条件的，即安国军总司令应专以对南对西北之“军事”为任务，不得牵涉及于“政治”。故其致张作霖之贺电，亦只在“讨赤”两字上做文章（阎锡山亦然）。作霖欲入京主政者，固以外交团之消极拒绝，同时，实亦以鲁张之阴示反对也。

当张作霖决将苏让于宗昌，杨宇霆大为不悦。杨之出关返奉，

实有负气而去之意味。惟杨返奉而后，为大局设想，则转觉充[弃]苏之为计，弃苏而后，则可避与党军直接交战，任孙传芳、张宗昌当战局之冲，于奉方尤有无恨[限]之利益，于是乃草成一对南之计划书，内容大致如后所述。

江苏让归鲁方，实为上策。假使奉军之今日占有江苏，则党军既入浙皖，奉军势须立与直接交战。纵然财政诸项筹有办法，可以勉强一战，亦绝无必胜[胜]之把握；倘财政仍如今日之困难，则必难得持久之战，结局或陷失败之境。吾人已往但知对南用兵之不可，今则吾人已发现暂不用兵之极端有益。孙传芳终必为时势所牺牲而受淘汰，然孙灭之后，尚有张宗昌为孙之代替者。既有鲁、孙两军为我奉军抵御党军，我奉得两重屏障，正可高枕无忧，休养一切。宗昌与党军苦战之结局，十之六七，彼殆将继孙而陷于败灭之境。然党军驰数省于打败鲁军之后，亦必精疲力竭，彼时也，我奉突出生力军二十万以击疲敝之党军，必若摧枯拉朽，事之至轻易者也。（豫）亦宜首先设法造成类似最[对]南之局，使该省境亦有如孙、张其人者，为奉作一时之屏障，为奉作先锋，挫除敌方之气势与战力。靳、魏之辈于未来之豫局关系最重，奉首当联络之，使其不为南用，而为奉用。阁揆一席，不妨畀诸云鹏，但须其确有把握拉拢乃弟。河南地盘不妨与云鹏，但须其确愿与党、国二军作战，他如忠吴各军亦不妨助以饷械，使其一致对敌。如是，则奉可高枕卧矣。靳、魏等及其他直系各军，以其内容之杂乱，饷械两乏，绝无战胜党、国二军之理，其必归于失败、淘汰，亦可预言。而豫中之党、国两军亦必成强弩之末，然后奉之生力军出而一鼓荡平之，多则十万人，少则五六万人可耳。如是，则第一步，陕、豫、鄂、赣、苏、皖、浙七省，必立归我有；然后第二步，整备大军，联络西南各省反赤将领，进而肃清珠江，则统一中国者，非奉方其谁？目前奉之于党、国二军，万必当虚为委蛇，有代表来接洽时，不妨示好，实使其

疏于预防，则将来收效更大更速也。

张阅杨之计划书毕，不禁拍案叫绝曰：“真聪明！邻阁真聪明！”曾以之示其子学良与吴俊升，亦极口赞成。于是，杨之计划书，乃成定议矣。

此次英公使蓝得森在津与张会议³，张谓蓝曰：予统一中国已有把握。蓝谓：言其详。张谓：明春即可明了，盖即暗指杨所拟之计划（亦即奉方既定之方针）也。

东南长江方面，在奉方视之有孙传芳与张宗昌抵御党军，在最近短时期内，自可无虞。惟河南方面，在奉方则认为十分危急，盖忠吴（佩孚）之军饷械缺乏，无作战之能力。而靳、魏之辈复倾于南，奉方虽正积极设法拉拢豫中各军，使其打先锋抵御国军，然成效如何，尚不可知。且国军冲至郑州，与党军、樊军并靳、魏等会合一起，势必不可轻侮，而奉军则又不能不入豫与之交战，既无必胜之把握，自非经过重大之牺牲不可。然牺牲之结果，未必能驱除党军、国军、樊军、靳、魏等军数大势力于豫境之外。今日奉方之于河南，真可谓忧心如焚，寝馈难安者矣。

东南长江既有孙传芳、张宗昌为作屏障，正可持隔岸观火之态度，而河南之危，则危如垒卵，朝不保夕。故今日奉方之军事，已完全置重于京汉线上矣。

最近奉方之人几以战讯报告张作霖者，若谓党军在浙皖方面如何胜利进展，张不以为意，甚或置若罔闻；若谓国军在豫西方面如何胜利进展，则张立现忧虑之色，同时奉系之机关报，亦取如此之态度。即北京警察所检查通讯社稿，对于杭州失守、安庆危急之新闻，不甚扣留，对于西北军胜利之新闻，有时并官电亦不准载（对各家通讯社皆如此），亦可见奉方内部恐慌一斑矣。

两三日前，张作霖迭得探报。一谓：冯玉祥已决定取得郑州，而后立向保大，北京进展，奉方如愿与之和，则须将京绥、京汉两线

交还国军云云。又一探电，谓：冯与靳云鹗接洽妥当，靳暂勿逼吴佩孚出走，俾大军到郑时，可以生擒吴氏，以吴交付国民，由国民与吴结算六七年来之战账，是否每次战祸皆吴一人所酿出云云。蔡家花园会议席上所陈列者，皆此等关于豫事之电文也。

奉方希冀地盘最为急切者，乃张学良与韩麟春。学良之直隶已逐渐到手，麟春之目标则在湖北（不要破烂不堪之河南），（河南拟畀于珍），故麟极力主张奉军即入豫加入前线作战。谓再延缓，至国军攻下郑州之时，奉军虽欲入豫，恐为时势所不许。对于吴佩孚则不妨立刻请其下野，不可再事姑容云云。而张作霖与杨宇霆等则俱不以为然。第一，奉军此时入豫，纵为重大之牺牲，亦难操必胜之算；第二，吴佩孚最好由党军、国军推倒之，奉方既素标榜信义二字，不能由奉方之手而使吴倒；第三，直系军为国军击溃之际，奉军正可缴其械。盖张氏必欲依照前述之方针步骤而行，先以地盘饷弹鼓励豫中直系军，使之抵御国军，减灭国军之声势和战斗力，然后奉军始起而击破之。今日之军阀注重在讨便宜，而此则大讨便宜之事也。

张作霖刻正积极联络靳云鹗，前已令靳云鹏电告乃弟，许乃弟以河南地盘。盛传靳云鹗已为张作霖联络成功，已来电贺张就安国（军）总司令职。惟谓因环境关系，须请张勿以贺电公诸报端。靳云鹏因办妥此事，奉张始畀以组阁之任云云。此项传说，亦有谓为可信者，谓靳云鹗所求者惟地盘，奉张既许以河南，云鹗自可欣从。党方宜速与靳成立妥协⁴，迟恐有误。

云鹗二次派杨湘为代表，于十七日由信阳动身，先往见张宗昌，继再来津见张作霖。吾人不妨姑就此点而加以推测，云鹗与奉张在月之十七日以前，必尚未成立妥协，如果已经成立妥协，云鹗似乎无派代表往见宗昌之必要，更不能先见宗昌而后见奉张，故妥协纵成立，亦必在十七日以后。

靳与党方磋商条件，既不能取得满意之地盘，而奉张则速以河南许与之，靳之舍党而就奉，亦属意中之事。换言之，即靳云鹗与奉方亦有妥协之可能，惟在今日，则尚嫌稍早耳。云鹗之于今日附南归北，必尚在犹豫未决中，暂以灰色的态度，对党、奉两方皆极力周旋，以待时局之进展，观时局之进展如何，再为最后之决定。大约杨湘日内可到京津，真相如何，不久便可探明（云鹏组阁，云鹗将来必可多得军饷，此层也可诱云鹗附奉也）。（上系十二月二十五日天津所寄之报告）

《中央政治通讯》第 15 期

1927 年 1 月 5 日以后

致柏文蔚、王法勤、徐谦、顾孟余¹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烈武、励斋先生均鉴
季龙、孟余

兹随吴渊同志赴汉之便，特将所有重要材料汇上报告，阅后即刻送交中央政治会议作为参考。此间经费困难²，阳历年关即由弟及石曾借贷勉强过去，迄今月余，屡电中央而并一字之答复亦不可得，真令人不解。现在旧债已负约未还，而阴历年关又复迫人，为吾党所补助之机关将交迫而来索款，究不知从何应付？此外，《心声晚报》将谋重刊，前《国民新报》已由达尔逊与美国人 Fox 商妥在京编辑、在津刊行，亦因经费茫然不可靠致生迟滞而不能进行。中央以为北方工作均当停止，即望代请中央明白告知，长此消极对北京分会不合作，不是一个好办法。又，中央向来不与我们以任何政治消息，亦足令人起奇异之感！例如，此次移都南昌问题，何能〔等〕重大，听在武昌和南昌的中执同志争持甚烈，而京分会同人并消息亦不得知，以此可知中央如何看待我们了。夫国民政府定都何所，中外观瞻所系，岂能朝令夕更，视若儿戏？以今日论，广州为革命根据，武汉为全国中心，不留于广州，必迁于武汉，百思而不可得可以迁移南昌之理由？如为集中起见，如果不为一时军事上的必需，即介石同志及总司令部亦宜坐镇武汉，今忽轻易的提起移都南昌，致令外交团对我内部频生怀疑，以为我之内部中有危机，不

然何以遽弃武汉耶？至于敌党报纸如《晨报》则讽刺迭出，画一旅行的箱子，上书党政府，贴上些广东旅馆、汉口旅馆、九江旅馆的条子。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这真是我们自取之侮了！自移都南昌的消息传入北京，吾党同志骇然莫释。尚望公等力持大计，毅然决计设都武汉³，以定人心，而安国本，则党国之幸也！敌军内部较受吾党之影响，至如详细情形，此时应守严重秘密，故暂不报告，只好事后再请中央追认罢了。胡政之君不久当赴汉口，他的《国闻社》和《大公报》对于吾党表示相当的好意，望兄等与为比较的亲切之接洽。康心之同志为人明快干练，将来高培五旅如须派政治委员时，望兄等荐之于邓演达同志。又，吴渊同志亦至老成稳妥，亦望予以相当工作。又，北京市党部选举均已商洽就绪，似无偏倚不平之处，故可望无纠纷发生。南中军政消息有须我等知道的，幸兄等时电好音，吾侪企领以盼，所不能得于中央者，只有望于兄等矣！童冠贤同志来京助益我等之处实多，数月以来，所还至感（后）于中央者，惟此而已！匆匆不尽。望于武汉择一最妥当的通信处，便中示知。

弟 李大钊

一月二十四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九）4669

1927年1月25日

载《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

第1辑第18册

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 报告¹(之一)

——关于晋阎之报告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此间与晋阎之交通(间接电报),至今未断。当奉军进迫包、绥之顷,晋阎又有电来,谓:“奉军决取五原,再三交涉,毫无效果,何以情形,如国军不退五原,则战事不可(避)免,且恐牵及本号。望彼仙诸君(指石曾、守常)一商之(大意如此)”。接此电后,即与此间军事专家开一紧急会议讨论此事,结果金谓:无论如何不洋[能]退去[出]五原,因如此则在(全)局上不能牵制奉方军事。决定后,即由我方通知晋方。旋接奉[晋]方复电,谓:此议既经党决定,只得赞成。盖彼固希望国军退出五原,一以冀国军之离晋境日远,一以避免晋、军[奉]之冲突不因国、奉之冲突而爆发也。嗣接宁夏方面来电,所谓固守五原,而孰知奉军抵包后,仍继续向西径迫,国军惨败之后,士气疲糜[靡],不堪一战,一闻奉军之来,即闻风退去。
<却>近依各方报告,国军不战而退五原²,系又是事实矣(晋代表亦云确系事实)。

晋阎既对我们有间接接洽,于是我便以记[纪]廷梓、王振翼两同志及许多之人在大同被捕之事,托其代表转电晋阎。此即得太

原复电谓：已电大同查明开释矣。王、纪两同志既被释，而于各人尚不得解（者），其原因（者），晋阎释彼等时，尚附一条，即放出后仍留晋境，不得他往，所以二人便到太原了。可是王、纪虽释，而其余二友尚未释，故我仍向晋交涉，结果如何，仍不得知。

在此时顷，晋阎又有电云：太原军官学校决为外者同志开放，望我们选择吾党党员派往该校。我们便复电问他，需要多少学生？他回电说：现在营治校址，颇需些政治教官和学生，数目开学再详报告。据太原报告，阎本办有军官兵传习所，其中学生有数十人已秘密加入吾党，阎夙知之。至此，阎遂表示接近他们，并想和他（们）领袖谈话。此班同志很幼稚，以为晋阎对他们无善意，故拟全数退出，嗣知晋阎之态度，遂复留校，并派人与晋阎接洽，结果甚好。

晋阎代表孔繁蔚³ 师长来京，托人要与我们相见（时）。他遂于[与]孔某约，孔某于[与]温寿泉（晋驻京代表）一同到守常处相见。本亦约石曾来，（石）派段子均代表他来会。是孔对我们所谈之要点如下：

（一）晋颇欲造一势，不甘居冯下。现已联络陈调元、靳云鹗、魏益三、米振标、张治公等部，直系之王金标一派，鲁之孙宗先一师，董鸿达一师，李徵五两旅，组织北方国民革命军。据闻，此议实发自靳云鹗，由晋[其]派人联络晋阎，而以领袖饵之，闻晋（阎）颇为动（参观靳之种种）。

（二）晋阎希望党军攻入浦口后，然后由靳、皖陈首先发难，占据陇海，截断津浦路，同时党（军）由武胜关、国民军由潼关向郑州进展，同晋出兵截断京汉、京绥两线，国军亦出五原攻包绥（但以现在形势而论，国军恐不能出五原矣）。

（三）晋阎曾商之孔，欲办一军官学校。孔向他说，如果仍（办）旧（贯）的军官学校我不愿办，要办非黄浦[埔]的不可。阎颇有此倾向。孔希望在[由]（民）校供给政治教官和学生。

综合孔之来意，系观察党方与国军方面对于晋阎之态度如何。是晚谈，本约他们九点钟来先同我们谈，约定国军方面的人 10 点钟来，不意孔等来迟了半点钟，所以谈未顷刻而国军人至。孔等告我，最好我们谈完后，再请他们来。于此可见吾[晋]、国间当不无介蒂。孔说：国军士气不振已极，当奉军迫追包头之际，国军仓猝逃去，失去炮弹千余枚，子弹好几万发，飞机廿余架。此项飞机，晋方曾欲得之（在韩复榘[榘]投降之际），国军不与，今竟人奉，殊为惋惜。孔又谓：奉方拟将绥远以北的铁路完全拆毁，经晋再三劝止，暂留。

我们当时赞成晋方能在北方另造成一势力参加国民革命战线，惟此“北方”二字，恐冯发生误会，最好另换一名词，但当时若[苦]遽未有所决定。我们谈后，国军人与他们晤见，只谈了些（不打不交）的话，但是他们过二天又在另一地方晤面，所谈较为亲切。孔等说，冯等派赴山西的代表多不重要，而且在谈话内，往往有命令我（们）的口吻，以致阎对冯深资不快，希望冯（换重要）且善于辞令之人或可挽回许多。

在这个时候，郭新涛、林勉之、胡廷珍等同志一行四人欲赴西北，无路可通。我们乃向晋阎为他们办交涉。晋阎复电云：谓彼等赴大同，经[迳]赴镇守使署，彼已派军用汽车到大同迎候他们了。并无[如]有到西安、平凉之消息，彼亦可代达。又有电来说：太原兵工厂积弊太深，他想改革一下，如党方及工人方面不予以援助，则改革不易。我们当即复电，告以改善工人生活，许工人集会、结社自由，然后党方可向工人求谅解。晋阎又复电云：太原兵工厂工人待遇甚优，系包工制。一等工月薪三百以上，二等工人月薪在二百以上，三等工在八十以上云云。我们得此电后，不解这是一种什么工，而又设[没]有得到太原方面关于此事的报告。（好）这时我们正想派人到太原与阎商量一个通西北消息的办法，故此遴选了

王光临同志与郭新涛等同行，往太原实地调查兵工厂事，并与阎商量此后通西北消息的办法。现王同志尚未未来京，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孔留京直到前日才返晋。濒行，我托人告诉他说，我极赞成晋阎的北方（国民）革命军运动，并且知道汉口方面干部中人亦极赞成，不久必有正式答复，足令百川满意。尚望积极进行，助进革命统一，厥功甚伟。至于军事方面，晋军宜急速与革命总部及国民军总部发生密切关系⁴，作一通盘筹划，及如何动作，最好听国民政府中央军事部的命令而行。孔对此亦首肯。

顷晋驻京代表来告，近来日本人屡到太原与阎接洽，表示深恶奉张的意思。晋阎以不知日本此种表示是否真意，抑或为探消息而来，故以山西始终与奉张一致答之。又，最近太原民众，曾以当地吾党指导，举行盛大的反奉游行示威，奉方闻之，即派专人向晋阎质问。晋阎说，这都是些青年学生干的，我已警告他们，不许再干了。五原自国军去后，即归奉军占有，现在奉撤回了三旅，只留二旅守五原，在名义上以五原交付晋军，实际上财政机关仍在奉军手中。

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九)4669

1927年1月25日

载《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

第1辑第18册

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 报告(之二)

——关于靳云鹗之第一次报告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靳云鹗¹ 派其参议杨湘为正式代表，于去年十一月廿六日由信阳抵津，与张(作)霖接洽一切。

去年一月，在靳未被免职之先，杨为其驻京办公处处长。

靳所最亲信者，乃其参赞张淑平(兼督战司令)，其次则惟杨湘。靳之机密，惟张、杨等四人得知。关于靳方之消息，皆由杨处得来。兹分述如下：

甲、靳代表杨湘与张作霖之接洽：

杨湘携靳云鹗致张(作)霖之亲笔函，于廿六日到津，经靳云鹗〔鹏〕(无日不在张处谋组阁)之先容，于廿八日晤张于蔡园，当以靳函交张。其函大意如下：

(首为普通应酬语从略)河南大多饷绌，我(公)亦必知之。倘贵军入豫，势必引起无穷之纠纷，想我公亦筹之熟矣。以今日河南之兵，足讨平赤贼之用。其所以屡言进攻而终不能者，纯以饷械缺乏之故，倘我公能接济饷械，规复武汉，易如反掌。兹派杨湘晋谒崇阶，乞赐示训。

此函原文不长，其拒绝奉军，措辞则十分坚决。右不过述概，且不完全。张读靳函后，乃与杨为下列之问答，其十分之六七乃其原语。

(杨)：现京汉军事，非补充饷械，不足言发展。靳将军的意思，是想上将军对于饷械方面有充分接济。

(张)：接济饷械，是可量办的，但必有具体办法，容与翼青评商之。请你回去向靳将军说，只要他能努力作战，功名是有的。

(杨)：靳将军讨赤心决，始终不渝，功名之念，却极淡泊。

(张)：那更好办了。好，让我与翼青商妥办法后，再告诉你。(作送客状，杨乃辞去。)

张与人正式接洽，只寥寥数语。其与杨之谈话，亦只此而已。

廿七日(疑应为廿九日——编者)，奉张与翼青秘密兹事。张云：只要你老弟能加入安国军(即拥其为总司令之意)，接济饷项，便可办照[照办]，请你把这个意思告诉杨湘。这里有我答你老弟一信，亦交杨带去。

靳翼青以奉张之言告杨。杨云：这事我不能作主，我离信阳时，不知有安国军的组织，只好回去请示。

奉张答靳之函，完全的大意如左，间有数语，亦系原文。

杨参议来述老弟意旨，并承惠书，亦经解悉。所谓讨赤决心始终不渝，深与鄙意相合。作霖入关后，迭与各方交换意见。签[金]谓：挽救危亡，惟有澄清赤祸。武汉居全国中心，倘任赤祸盘据，流毒无穷。敝军拟南下，绝[纯]为助谋规复武汉，绝无地盘之念。近来迭与玉帅²商洽，只须豫军进攻，敝军定又中[决]心南下，至于贵处饷械缺乏，深望量力为助。务望老弟联络各部，克日进攻。再，魏君益三处，亦望老弟时相励勉。自郭贼伏诛³，所有郭部，除魏而后[外]，皆已反正来归，作霖无不宽容，一体优迁。孙君馨[馨]远，曩为我仇，今亦为我友⁴，此皆魏君所明了者也。作霖早有

将魏部收回之意，只因讨赤正在进行，不能不督[暂]归玉帅节制。作霖对于魏君，固无芥蒂，且望其有所发布？。现在规复武汉刻不容缓，魏君若能努力，前途未可量也。（张之劝魏实为劝靳之暗示）

云鹏以亲笔函致乃弟，交杨带去。其函大意如下：

（一）述奉张为十五省区之拥，劝靳不可轻北重南。

（二）述奉张亦颇愿吴之下野而以靳（代之）。

（三）述奉张极欲拉拢靳云鹗。

云鹗[鹏]时以函电劝乃弟勿附党，而靳终致[未]答。其兄弟感情极不洽，今春以新直系之运动，一度归于和好，最近则又水火不相容。云鹗接云鹏函时，语又曰：动不动摆其哥哥架子，我十七岁便自立于外，军功尚不求保，现在还有求保的不[必]要吗？

奉当时已两度许靳云鹏组阁，因始终不能为奉拉拢乃弟，故组阁终不能实现。

得天津电话，云鹗又会[令]翁参议来京，携有靳致奉张之第二函，请杨再赴天津，将第一[二]函交张。杨遂于夜八时再到津，当夜将第二函交张。其大概如次：

（首述杨参议携第一函来京接洽，次述饷械支绌，仍望进攻。）鄙意以为，赤祸固当讨伐，然释[择]其真赤者而讨之，其不赤或似赤而非赤者不当讨伐，且当怀柔之，以张讨赤之势，夫然后真赤乃可歼灭。

是夜，张阅靳第二函后，当谓杨曰：前[兹]事体大，容我考虑。杨参议先归，将来由云鹏转达令弟可也。

杨亦知奉张一时不易答复，而云鹗亦告翁参议云：第二函只须交与奉张即得，不必听其答复。故杨遂于二月[日]晨八时返。因来之车头为路局夺去，再三交涉，于三日十二时始行放还，乃定于四日晨返信阳。

杨之此行，可谓毫无结果，然靳之意亦非真欲与奉张携手者，

其重者，为拒绝奉军南下。至于第二函则为进一步之表示，（对）奉方曰：吾已与南方之一部分将领相结合，倘奉军而竟南下，则惟有联党抗奉，不可谓言之不宣也。

乙、靳方之一切

第一步联陈调元⁵

靳第一步联陈调元，前月已完全成功。其结合性质，颇似攻守同盟。其与陈关系，实为最亲切。靳、陈二人，无日无电函之往返，陈之如何对付鲁军、孙军，如何与党方接洽，事先一一得靳之同意，对付南北双方，实取同一步调。旬日前，靳、陈二方，即已商洽，如果一方受奉、鲁之迫协，他方起而应援之。

为防止孙、鲁、奉之压迫，陈望靳能占陇海路，在靳为谋自身之发展，亦未赞同。陈告靳云：只要靳军能至陇海线，则皖军可拨若干土[驻]陇海路，倘能将郑、徐间之一段占领，则豫、皖两省之防御外患，当有相当把握。

关于靳在陇海线之秘密布置，详后。靳之联陈，在靳自视为得计，对北，抗奉南下；对南，谋优越条件之取得，及避免党军势力之侵入，且可进而谋与党军中之一部（分）将领组织一种新势力。

第二步联党

去年十一月中旬，靳赏[尝]语左右曰：吾不联党，有何可以联络？消极而言保存，积极而谋发展，皆有与党方携手之必要。惟我所疑虑者，党方无诚意耳！恐党（方）不能许我优越条件耳！

靳确有联党诚意，对生智⁶两次派来代表，俱优礼有加。田军⁷所获侦探，内有女的二[三]名，中有一十八岁者，削其发乔装为男子，应募入田军，为其发现，田欲杀之，而靳反对，至今三女犹存。靳对樊亦有[友]好⁸。武汉失守，败退信阳时，靳司令车殿后，车辆拥塞，阻于信阳以南，樊军追赶到急，靳及僚属颇为震骇。及后，樊忽终止追击。未几，樊派人告靳曰：闻前为靳将军之车，立即

下令停攻。靳深感之。靳语人曰：或[我]与党方携手之意甚坚决，当战谓[事]吃紧之际，武胜关之党军面我方。郑州会议，玉帅严词诘责，何不进攻？而我俱以饷械缺乏为言，不肯下令。当日，田维勤急欲进攻，非我按兵不动，则武（汉）早非党有矣。我曾为党方大大出力，不知党方察觉否？

在未与党方妥协之先，靳不能公然反奉，故靳对外仍辩其与党方无关，但自认（与）党军中之一部（分）带有温和色彩者有所接洽。去年十一月间，党方派至信阳之代表，实皆以唐生智之名义派出。在靳氏及僚属，亦明知与唐妥协即与党方妥协，蒋、唐固完全一致也。第二次派至信阳之代表，年廿余，其言辞固完全代表党方，而非有温和色彩者，故靳及僚属亦称之为党之代表。

靳口口声声恐党方无诚意，乃恐党方无优越条件之许。所谓无优越条件者，乃在代表至信阳曾谓：唐拟许靳自由驻兵湖北之条件，在靳殊不满。与张淑平（参议）等推敲研究：从前我们不是已得报告吗？党军已划河南为[归]国军，好像是西北军归入党军条件之一。党军对豫，不过助西北军进攻，不对[过]西北军未出潼关，故党军对豫迄未用兵。此说仍[乃]系事实，否则，党军何必要我到湖北？由此见党方之尚不欲向西北进展，不然，何以不要我取直鲁而到湖北呢？如果我到湖北，未免太无意义了，我还要担个国民党之名，太犯不着了。靳与左右研究结果，询问党方是否不攻直鲁？如果不攻直鲁，则请以河南让彼，肃清后归彼之地盘。杨湘以十二月四日返信阳，三日晚得靳来电，谓：与党方接洽已大进步，言外之意，嘱杨不必与奉周旋也。

第三步抗奉去吴

靳已切实决定，非与党方正式协定，且得饷械之援助时，不能为露骨的抗奉去吴的行动。

以前，靳因疑党方之无诚意，颇觉与党方之正式协定一时难以

圆满成立，而奉方尚有调军入豫之准备，乃认对奉有行缓兵计之必要，遂派杨湘到津，既示其倔强，复露其柔软，二者维系兼施，然究重于柔软，使奉知靳非毫无联络之可能者。及后，又派翁参谋[议]北上，以暗示党方一部将领已成立谅解，对奉示威，则又纯然示其倔强意思。即与党方之谈判，将有进步之故耳。即此一端，已可见靳在未与党方协定之时，决不肯明白抗奉也。靳氏所以必须先与联络，而后始可抗奉去吴者，重要原因如下：（一）饷械缺乏。比较殊属不易之若大军（队），本年以来只发饷三成；给养方面，近月以来，已由白面改吃黑面，日发几分钱之菜钱（兵士二分，中级军官四分），军心实即[极]疲乏。（二）田维勤尚不一致。前线军队，惟田、靳、魏三军。其分配情形如下：

东：右翼 任师⁹
右路 魏益三军
中路 田维勤
左路 靳云鹗军
左翼 庞、梁二师（靳部）

西

武汉失守以来，豫南实未交战一次，党军与北军在两月以前，早将一切军事行动撤销。南下旅客，至信阳下车步行二十里至柳林（党军所在地），可搭车至武汉，双方皆不检查。

三军中，因[田]军纪律最佳，魏军最坏，靳军则介乎田、魏之间。

魏与靳完全一致。魏与田则颇隔阂。靳之性暴，田则素有奸猾之名，双方不能投契。二三月来，田固时欲与党方谋妥协，而樊钟秀却不信田，明示不屑为伍。因[田]既不得志于党方，乃不得不忠吴。

靳之意，正式联络党方以后，抗奉去吴，而抗奉又在去吴之后。

盖去吴始可得陇海线，得陇海线，然后可以抗奉也。

去年十一月初旬，靳已暗为夺取陇海线之军事准备。张英华¹⁰就豫后，实业、教育、财政三厅，皆靳参议。三厅长承靳之暗嘱，早为暗出陇海线之准备。其最要者，即为联络沿线土匪与军队也。

靳之性暴，不甘屈服，不感受人指挥，然治事确能负责任，事必躬亲，不假手。体弱，食鸦片，每日三两，目前财产一空，其妻首饰即早充军饷，鸡公山别墅¹¹亦被抄毁。现其妻寓汉口法界。论靳之性怪，有一事为证。当武汉紧急时，吴派蒋雁行至靳，请靳督战。靳怒谓蒋曰：既用我，复疑我，无事时不认姓靳的，有事时可以卑屈相求，我非可以任事摆弄者。蒋旋求至再，声泪俱下，靳不为顾。蒋不得已双膝跪下，靳仍不顾，甚至克[跪]其两足于床之栏上，作睡眠状。蒋狼狈归去。左右谓靳曰：大帅为上官，总不能亲来自求，派参谋长为代表，隆重已极。蒋且居总长之职，亦有相当资格，将军任其长跑[跪]！大会[太令]吴难堪，将军似应函吴，应其所求。靳忽然曰：不行！不行！谁要他跑[跪]！也不过三十分钟非数小时之久。由此可见靳之性情如何矣。靳云：愿望不仅在作一省主人，实欲作时局重要人物，且有操纵北方时局之宏愿。故靳新直系之失败后，欲作再造新势力之企图，对奉、鲁，且主张驱奉、鲁于关外。盖靳之地盘目的：第一，在山东；第二，在直隶。欲大江以北，长城以南之地，尽居于新势力之下。外传靳与党方一部分将领及陈调元之联络，乃系实（直）行其新直系之计划者，即奉、鲁亦（非）如此观察，且疑孙传芳亦在其内。孙之北上请兵，即欲完成此种阴谋。凡此皆[非]完全不确。

孙、靳之间，自去夏靳自免职之后，恶感甚深。靳对人骂孙曰：这小子太毒辣了，我被免职，他即望风转抚[舵]。我已上他的当，不能再上他的当了。最近，靳、孙二人仍无往来。

当日新直系运动，陈文钊、王维城、王维蔚等皆在。陈为靳旧部，今者皆弃靳而忠吴，皆因靳性情太坏之故。孙传芳复归于奉，新直系之计划，无实现之可能。

靳氏认其自身若不与党方联络，北方无可与联络之人。惟联党方面，有生存之(必)要，其与党方正式协定久未成立者，实欲党方能予较优之条件。新势力之计划，实建筑于党方联络之基础上。盖系拟与党方之温和派及陈调元等，甚而西南川、黔等省之将领，联络而成一新势力也。

预计靳氏与党方正式发生关系，取得河南后，必积极谋新势力之实现也。

右系十五年十二月所得报告。

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九)4669

1927年1月25日

载《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

第I辑第18册

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 报告(之三)

——关于靳云鹗之第二次报告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兹篇所述，乃十二月中旬前(反吴讨前)靳云鹗之一(切)，然就中在在皆足注意。当兹吾方与靳发生关系之际，欲自后对靳为相当合宜之对待或处置，尤非明了兹篇之内容，不可轻忽视之也。

兹篇附带述及佩孚、宗昌及奉派方面，并奉、吴最近关系及中央政局之种(种)。

兹篇系六七两日随时访得，随时录出者，故前后必有不一贯之处。

一、靳与党方谈判久未成功之原因，根本由于未得地盘。认第三势力可以成立，先取河南为基本地盘。倒寇失败，转向吴输诚。

二、吴决示讨靳，靳输诚无效，乃准备抗吴，吴讨靳之前一旬，靳即准备抗御矣。

三、靳与宗昌之接洽，亦提议联唐讨蒋。宗昌绝无与党军立战之意。待孙攻取上海。

四、靳云鹗、李景林之谈片[判]，奉方真愿扶植云鹗。吴佩孚

之太太派。靳云鹗之拉拢景林。靳氏兄弟性情。云鹗□之兴迁：初时谋加入党军，将来再组第三势力；后即不加入党军，急组织第三势力，欲立足于党军[奉]之间；进行倒党[吴]，联络奉、鲁。

五、被讨后之靳云鹗，(靳、)魏必一致。奉不重视佩孚于京政局。

靳云鹗二次派参议杨湘为代表，于十二月十七日由信阳出发，先与张宗昌接洽，继而北上与张作霖接洽等情，前已根据信阳来电具有报告。兹杨湘已于前日(五日)午后一时，由南京经过天津来京，其在郑州、在南京、在济南之全部接洽情形，及其所见所闻，纵属十分秘密之事，探访皆一一得悉无遗。依据此信阳至郑、宁、洛、京之(先)后次序，一一记录于后。

十二月十七日在信阳，靳与党方谈判，久未成功之原因，根本由于未得地盘。谓第三势力可能成立，先取河南为根据地盘。第一步逼寇下野，失败，因畏吴，转向吴输诚。靳云鹗第一次派杨湘与(张)作霖接洽，其接洽详细情形，当时已依据事实报告之矣。杨湘已(于)十二月四日由京南下。杨离津时，颇以靳与党方之合作业已签订成立，盖靳氏来电谓：谈判已大有进步。而靳又派翁参议北上，以第一[二]函致张作霖。似与党方温和分子谈判，联络党方。乃杨十一日到信阳而后，则靳党间之谈判依然未得具体成立。是时党方派党代表四人到信阳，(杨)已十七日晚间离信北上，四代表则于同时离信阳南下返汉矣。

靳与吾民党接洽已有如许之久，信使往还频繁已极，而谈判迄未具体成立，其故果安在？第一，靳不欲归附国民政府，而欲联络吾党之温和分子樊钟秀、陈调元、冯玉祥或并西南川、黔等省，组织第三势力；第二，吾民党未许以适当之地盘；第三，欲以一己之力驱除吴系，尽先取得河南为已有。兹将右之三项更为详细之说明，并附带说明自十一月以迄十二月中旬，靳氏对南对北之态度言动。

十一月以前之情形，已详细[见]前时报告书。第[弟]前次报告已言，靳有组织第三势力之决心。惟在九、十两月及（十）一月上旬，靳与吾党各重要将领一致，颇认今日第二[三]势力殊难成立，在将来则有成立之望。故拟先与国民政府发生关系，取得地盘，将来机会来到，则再图第三势力之组织。乃至十一月中下旬，靳复派遣代表到汉与吾党一部分将领接洽，意在试探组织第三势力是否可能。盖靳氏以本人对于国民党之主义既不了解，一旦遽加入国民党，必受种种束缚，难于发展，与本人之性情、抱负皆有不合，国民政府又未许以优越之条件，因此种种原因，遂又觉第三势力有提前组织之可能与必要。在十一月中下旬之内，一方面对南对北虚为委蛇，一面则暗地力谋第三势力之组织。十一月下旬，即第一次派杨湘北上致第二函与张作霖，主张联络吾党将领中之温和分子。

第二，关于地盘问题。在靳方实视为与党方谈判之中心问题。只须地盘问题有满意之解决，便可正式归入革命军。靳氏实亦十分热中名利之人，野心甚大。在今日，凡所作为无非以根本地盘为标的。惟国民政府既以河南许与西北军势力，不能以河南再与靳。而靳最所垂涎者为直鲁，而直鲁一时又不能攻，将来攻直鲁者，亦必为西北军，是直鲁又无归北军之望，故靳乃思及湖北，希望党方能以湖北地盘与之。但湖北乃国民政府所在地，以靳之新加入国民党且又未建何功，决不能以湖北许彼。至唐生智拟以湖北之西北部，如平、耒阳一带划归靳军驻防，而靳则认为不满，谓此偏僻之地何等于一镇守使！彼决不能受之。

靳与党方谈判既不能谋地盘问题之解决，一时自无归附党方之可能。纵能组织第三势力，在本人尚无确实地盘以前，号召亦属不易。鄂、直、鲁三省皆无归己之望，则惟有谋河南之倦[优]先取得。倘能倦[优]先取得河南，第三势力固易组织。而先归附党方，党方势必要求以河南让于西北军，以践先约，则自予本人以相当之

交换之条件。换言之，即本人以河南让与西北军，党方自另畀本人以相当之地盘也。故靳乃毅然决然力谋驱吴占豫。自十二月初迹以至十二月初十左右，此旬日间，乃靳谋驱吴占豫之时期也，前次报告书已言之矣。

靳最所亲近者之左右，乃其参议张淑平（名镜寰）。张原系李景林亲信，继舍李而改事寇英杰，数月前，因寇未畀以烟酒公卖局之缺，乃急而舍寇而事靳。此人性情激烈，颇有才气，靳最倚畀之。十二月初，彼主倒吴最力。谓吴不倒，靳不能为直系之新领袖，而河南之地盘亦即不能归靳。河南地盘一日不能归靳，则第三势力便一日无组织之望，纵归附党方，亦难取得优越之条件，此张力主讨吴之措词也。是时，靳适以种种琐屑之事，恨吴益为深切，几于无时不痛骂吴氏，复有张淑平从旁怂动，使靳驱（吴）之念更为急切。报端所载靳（致）吴佩孚之书，即出张淑平之手也。靳之讨吴，早有相当之准备，其笼络陇海线上之土匪与军队，已于前次报告中略言之矣。十二月初五日，靳嘱张淑平致电寇英杰，讽寇下野，寇置之不理。八月[日]，又以张之个人名义致电寇氏，威吓寇氏辞职。电谓：河南饷项，公既无法筹措，应即知机下野。否则，三十万大军因公之溺职而受冻饿，不能再堪之时，则必超[起]而兴师问罪，则公之身家性命皆不能保矣。公果为维持生命财产计，应及早引退，勿再（恋）栈云云。寇接此电，立赴郑州向吴辞职，报端曾略载之。而吴之于靳，自靳以上吴佩孚书张贴各地，已恨之刺骨，今靳复为逼寇辞职之举，同时又以靳与党方信使往还不绝，谈判有已成之说，其恨靳之心乃亦俱进，每有除靳之表示。但自十二月初十日至二十日，则又为靳向吴输诚之时期。缘靳以本人饷弹缺乏，无以武力去吴之可能计，惟有逼寇辞职。以为吴既对寇早有不满，必可准寇辞职，而本人则继任督理河南。督理既已到手，去吴自易，河南地盘终必为己所有。不意吴竟慰留寇氏，复得蝉联。靳之去

寇已不得遂，而又对吴着更深之反抗痕迹，恐吴必有不利自己之举。自身既未归附党军，倘吴竟愤而剿灭己之所部，则自身终为危险。适杨湘于十一日返信阳，杨固极端主张暂不去吴者，因闻有暂不逼吴下野之意向，乃联络其他左右僚属偕同谒靳，劝靳暂不去吴。其措辞大致谓：（一）吴在，则可以对奉之缓冲；（二）与党尚未携手，实际上亦难灭吴；（三）去吴而后，则直系各军未必拥靳为领（袖），但若任（任）吴督存，将来至吴为他人所逼去之时，则靳起而代之，光明正大，必可受直系各军所拥戴也；（四）田维勤既与靳不相一致，信阳已由田军混驻，一起倒吴殊属不易云云。靳颇然其说，决定设法暂和缓吴氏，向吴输诚。此十二月十三日之事也。

靳既决定对吴输诚，和缓吴氏，同时又本人与党军谈判仍无成立之望，乃觉有同时和缓奉、鲁之必要，遂派杨湘二次北上，先至济南见张宗昌（是时张尚未南下），再北上见张作霖。靳与张宗昌今春在鲁南徐州方面，相处极为融洽。是时，张宗昌与李景林在鲁抵抗国民军，而靳云鹗未尝乘机取得山东，此张宗昌所最感激者。再则张宗昌与吴佩孚之成立妥协，亦纯由靳云鹗居间斡旋之力，此靳氏之大功也。某日，靳在济南会见宗昌、景林，谒孔陵，仿桃园三结义之故事，结为弟兄。靳居长，张次、李更次之，此事外间知者甚少。其后，靳由济南至保大，有图取直鲁之意，因与宗昌、景林复稍扞格之。及靳为新直系之运动，则又亲李景林而疏张宗昌。宗昌以新直系最后目的在倒奉、鲁，恨靳益深，怂恿吴佩孚北上免靳之职，谓可举全力相助吴佩孚，至宗昌实不敢北上免靳也。最近报端载，宗昌有助吴灭靳之意，实为吴方放出之空气，不可信也。惟在靳自不免于恐慌，而认有与宗昌联欢之必要。靳与宗昌之间，既有种种破裂之痕迹，今日联欢，惟有追溯孔陵结拜弟兄之谊以为根据。故其派杨湘往谒宗昌所携致宗昌之函，亦即请宗昌顾念孔陵结义之谊而合作也。杨湘十七日由信阳动身，十八日至郑州。十

五日靳向吴输诚，计特派贺国光师长（号静元）由信阳先至开封见寇英杰，极力解释谓，逼寇辞职之电，纯系张淑平个人所发，靳并不知情。现时为靳查出，靳甚抱歉，特派彼来道歉意。寇闻贺言，亦极力表示谅解。贺于十七日由开封至郑州见吴佩孚，两谒均被挡驾。至十八日杨湘至时，贺第三次谒吴，吴始手[予]接见。贺向吴述靳意：（一）南方不能进攻，纯以饷粮子弹缺乏之故，只须接济若干饷械，可进攻；（二）靳与党军绝未发生关系；（三）对吴始终服从，毫无贰心，望吴勿疑。吴当以郑重之容态对贺曰：自有办法。贺问曰：大帅有何办法？吴曰：七日复，定可明了。贺曰：大帅何妨明言之。吴曰：汝且去，不必问。我现在不便宣布。贺退而语杨，金谓：吴时曰（十七日）召集寇、田、王等开秘密会议，必已决定解除靳之武装，应请靳早日防备。杨当以密函致靳，并请贺从速返信，请靳速谋御吴。二十日，杨得靳复函云，吴之密谋，〈去〉已在吾预料之中，今既将见实行，自当积极防御，我已有所准备。杨遂（于）二十日离郑州，由陇海东进，在未动身前，复由郑州吴之探部探悉，十七日吴召集寇、田、王等开秘密会议。田维勤当场声言，只须吴能筹二十万元作为前方发给粮饷之用，则即可以解决靳部，破除障碍，反攻武汉。吴当立即允准。会散后，张英华适携二十万元至郑州，吴立嘱张英华拨二十万元交田氏，乃王维蔚私自由张英华处，（从）田氏二十万元内取得八万五为后方饷粮之用。王乃主持后方事宜者也。田闻之大怒，立即谒吴谓：大帅拨二十万系作前方之款，王笑予不应擅挪作后方之用，如果笑予不能交还，则此十一万五千绝不能专前方之用。吴装作不知（实则知之。王维蔚究系吴之嫡系，吴颇袒之也），嘱副官长虞际唐明查属实，乃命王将此八万五交出。王与田乃构为仇隙。十九日，王与田打仗，为一张白板而起冲突，田、王二人皆出手枪作互击状，若非护兵从中阻挡，则已开枪互射矣。因十七日，吴与田、王、寇等在上述之秘密会议中，有讨靳之

决定，故吴对贺国光有七日后便有明了之语。杨二十(日)离郑州之时复以此等情形具函告靳，请靳从速防御，勿为吴氏所乘。杨湘告[云]，在田、寇等向杨[信阳]开始进兵讨靳之前一旬(即十二月十八日、十二月二十日)，靳氏即已接到余之密报，及贺国光之返信报告，即行准备抗御，故可以断言，靳之由信阳向南撤退，纯为自动的，绝不至有丧失大部分队伍之事。

杨湘以二十日乘陇海车离郑州，二十一日到徐。闻宗昌已赴宁，乃由徐南下，二十二日到宁，二十三日访见宗昌，皖之陈调元适亦在座。兹将其谈话情形，照录如左。

杨湘谓：靳之于效帅¹，实觉异常亲切，无非系由孔陵之结义，同时实以十分钦佩效帅之故。就时局论，靳亦深觉有与效帅合作一致之必要。宗昌谓：我与荐青素具好感，深望其为国家做一番大事业。我这次率师南下，实在是完全为国家讨赤，绝对不是为着地盘，这我可以发誓的，大概你们可以从事实看得出来。外传荐青与赤党勾结，我是始终不相信的。究竟荐青之具体意见如何？杨云：靳嘱我以三事商陈效帅：(一)今后彼此时局实行合作一致，时时互通声息；(二)党军中有一部分温和分子的将领，实为反对赤化之人，靳迭接洽，极为融洽，外间不查[察]，疑靳加入党军，殊属非是。靳认定，欲谋赤化之及早铲除，除非联络党军之一部分温和将领不可；(三)请效帅接济粮饷子弹。吴玉帅惟保安进攻，而不顾前线之将士黑面亦不得饱，饷金之积欠未发尚其次焉者。他如子弹异常缺乏，只须效帅能接济若干，便可实行反攻武汉(这是当然的官话)。宗昌：第一条，当然合作。即日起，我当时时与之通讯；第二，联络党军中之一部分反赤将领，果如荐青所言，亦我所(言)愿，即当酌办；第三，饷弹我当接济。总之，合作讨赤实余所深愿。不过，第一须推诚相与，绝对不可谓[滑]头。以目视陈调元，你(指调元)看，是不是？

调元对杨湘云：效帅之言极不错，合作讨赤，非相见以诚不可。效帅说不为地盘，我从来也不以地盘为念，但求讨赤，牺牲个人生命财产亦所不顾。效帅军队为讨赤而入皖，我总是极力欢迎，且请效帅军队多多人皖，我与效帅总算真正合作了。

杨与宗昌、调元会谈之要点尽如前述。宗昌复问杨以豫中之现状。杨详举以告之。谈约一小时，杨乃辞出。在杨认宗昌对靳颇有若干好意，其愿与靳合作，亦有若干诚意。惟以与鲁张自身无特殊之利益，故不积极以为之耳。现时，宗昌既（与）佩孚不甚融洽，自可拉拢云鹗也。靳派杨与吴[鲁]接洽之最初动机，乃以宗昌有助吴除靳之说，倘竟成为事实，则靳危险殊甚。缘靳在当时，颇以吴无除己之实力，根本饷弹至缺，无作战之可能，而陈文钊等近虽与己不合，而往昔之渊源则甚深，纵无[吴]令彼等攻讨本人，彼等亦必不好意思实行攻讨。然苟宗昌由徐进兵入豫，助吴攻讨反吴之各军，甚或奉军加入进攻，则本人所联合魏益三所部出而抵抗，以饷弹之如此缺乏，殆必为宗昌所败灭，此靳联欢宗昌之最初动机也。至联欢宗昌之积极作用，则为第三势力，见后。杨在南京复与其老友师景云²暗谈数次。师现经张宗昌委为总参议，乃宗昌来宁之第一红人也。师之所以能有此者，纯以为宗昌拉拢陈调元之故，渊（源）甚深。陈亦持[特]师为之与宗昌接洽一切作一居间缓冲之人也。据杨与师密谈之结果，其在宁、浦观察之所得，宗昌目下决无主与党军直接交战之意，故亦无直接交战之准备。其所图：第一在皖北，皖北既得之矣。惟有待[待]孙传芳为浙江党军击败之际，进而据有淞沪之地。除非党军败于浙、豫，予宗昌以可弃[乘]之机，则宗昌自必攻赣以拣便宜，否则，宗昌断不至与党军直接交战也。宗昌与上海，当年之历史关系颇深，知上海之富，固宗昌之所以极欲攫权[取]，惟当有一点，乃宗昌之部属人人所知者，是即上海可以供宗昌之发挥也，慾也。此非虚言，乃其性情也。

其军队则更视此层为重要。去冬鲁军人人恨未进至江南，向江南（一家）索花姑娘。其江北败退之际，沿门逼索大闺女，已闹的不成人世矣。总之，宗昌之于今日，惟求占有苏、皖之全部地盘。和平的占有苏、皖，不假武力，必待[待]孙传芳为党军所灭时，而后进占之。鲁军不占，则必落于党军之手。光明正大，何以（不）能加以讥议。宗昌在今日，既决定不乘孙传芳之危，以武力攻击其后而侵夺孙传芳之地盘，则不争地盘之风凉话，宗昌固可以发誓以言之也。师景云密告杨：效坤真糟糕，终日花天酒地外，便是赌博（可见无战意），置正事于不顾。现在把一切事都交付于我办，我初至此，诸事都不摸头。（不遵）这里特别乱，真是一塌糊涂，不可言状，叫人无法下手。效坤一任其乱（罪）到什么样子，他们都不管。按师之言，俱系直[真]相。至其总部，凌罪[乱]之状令人惊讶，而宗昌及彼中之人皆泰然处之，不以为怪。至前方与后方之任何机关，除一二师、团部外，殆无不乱。幸未打败仗，一败，则必成一盘散沙。如今春在徐州为传芳所败，转瞬全军溃散，若非传芳停止攻击，宗昌必下台矣。

杨湘以二十四日离宁北上，无机车，阅七日始到津（现在津浦特别快车受军事影响，须二三日到津）。二十八日到济南，闻潘鸿钧言：吴佩孚实行讨靳，靳部有丧失大部分说，白坚武有通敌之嫌而被软禁。杨闻潘言亦不甚惊异，在郑时，杨已知之矣。至云靳大部分丧失，杨颇不信，以靳旬日前即有所准备，并非度[变]起仓卒也。至白坚武被软禁，可谓当然。曰[白]属靳之一派³，故不得势于吴，且深受太太派之倾轧。所谓太太派，即吴之妻为首领之张其锽⁴、符定一⁵辈也。至去冬吴之再起，其妻则时时不离吴之左右，干预一切。前时，汀泗桥党军与吴血战，吴亲督战于桥旁，继而党军敢死队冲锋而至，吴乘马狼狈而逃，（吴）另有两骑随吴之后，则其妻与婢也。近吴氏困居郑州，因环境日恶，确有神经病，除特别

重要事外，吴皆置之不理，日惟沉迷于诗酒之中，于是一切事权渐入吴妻之掌握。迄于今日，吴妻已参与一切重要机密，张其锽为第一策士，于是郑州人皆所谓太太派矣。凡有求于吴者，非先疏通太太不可，否则，太太不允则不能实行。张其锽之握权纳贿，皆吴妻为其背影也。靳、前[田]、魏等联名电吴远小人，罢免张其锽（报端已载之），历数张卖官鬻缺之罪状，间接击吴妻也，吴妻因此恨靳。日近复有张鼓动于旁，吴妻乃极力劝吴讨靳，吴之决定除靳，其妻之怂恿亦其一因。此（中）内幕，杨在郑即已闻之，故认白坚武之被软禁乃当然之事也。因吴妻及张其锽大约[得]势，吴之他幕僚因利害之关系，自深恨之。皆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今竟有一女妖出现，吴之末日至矣。

杨于三十日到津，首访云鹏，问其曾接到乃弟消息否？云鹏愤言曰：现在打听老二的消息有何用？不用说，当然他的军队被吴收过去了，纵然能剩少数残部，有何用处！老二真不中用，糊涂！我早令之倒吴，他不倒，现在叫人家倒他了，该死，该死！顿足而言。按：云鹏前数月，确劝乃弟倒吴，缘云鹏深恨吴氏之人。今春鹏由日本返国时，吴本与奉商定，以彼为第一任阁揆。乃鹏到日[京]后，大摆其老师架子（与吴有师生关系），骂吴不至亲近。吴设宴为之洗尘，又大发反对护宪之论，骂议员皆非人类。座中皆议员，翌晨各在报上一致痛骂靳氏。靳见报端如此，立即不辞而别。自是遂与吴構为深仇。靳氏兄弟性情皆极暴烈、骄狂，然亦偏狭，非正直之人。靳大则简直小人耳！十一月，奉张入京后，确定三十日入京组阁，二十九日，忽闻吴以武力解决乃弟，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打消翌日入京之意。缘彼对张作霖纯用买空卖空之手段，谓彼能调度乃弟，使乃弟归顺奉方。张亦十分刁滑之人，明知彼兄弟二人不能一致，且极不相合，然不妨姑以组阁之事许之。故口口声声称赞靳为一政治家以激励之，使彼竭全力拉拢乃弟。如果拉成，亦

不妨令其组阁，好在无他敢干之人，拉拢不成，那就对不起，只好另觅他人。靳大组阁为拉拢乃弟之关系。适靳二派杨湘于十一月来津谒见张作霖，在靳二不过缓和敷衍之计，在靳大则自夸于奉，谓已拉拢成功，如是，靳阁呼声乃骤然增高。实在靳二与靳大绝不一致，不为无促成靳大组阁之意，且积极反对靳大组阁，曾一再致电靳大，劝其不必上台。谓：既拥有百万之家产，何必出来受罪。而靳大则官味太浓，毫无觉悟。所谓靳阁之行（市）在天津蔡家花园内一日数变，忽高忽低。有时靳大与张作霖推牌九，赢了靳大一些钱，于是鸦片榻上说了两句请靳组阁的话；有时靳大得了乃弟一两通电报，纸[只]须电中对奉表示若干好意，便急忙送给张作霖看，于是作霖又说了两句组阁的话，这便是靳阁忽低忽高的由来。张作霖入京之前后两三日，乃行市最高之时。缘靳告诸奉张，乃弟不日将有贺电到津，实则靳二自始至终即拒绝贺张，左右劝之无效。靳大每当行市最高时，见人则辄摆其总统[理]架子，倨傲异常；行市低时，见人立呈可怜丧沮之容态。最近受靳二影响，组阁根本绝望，逢人即骂乃弟不中用。津地一般政客，近日莫不拾此为笑柄。皆谓：靳氏兄弟气派太小，但会耍数年前似巧实拙之手段，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更不明今日政治之新趋向与新手段之运用，绝无做大事之望也。靳氏兄弟皆刻薄吝啬[啬]，于下甚苛，故左右无一人才，而尤以靳大为甚。靳大之旧日僚属，无一人不背地痛骂之。至吝啬[啬]之性，亦兄弟二人所同，其靳大甚于靳二，故有“守财奴”之称。

杨在津并访晤李景林于某日界浪花街私寓内，亦代表靳氏也（杨与李私交甚好）。李与靳交谊颇厚。孔陵结义时，靳、李二人曾舍宗昌而密订永久合作之约，后李加入新直系，与靳之关系更臻密切。现李重出，入[靳]之希望，前于张人京，到津时（经宗昌疏通），均[经]两度谒张。李与宗昌渊源甚深，最近感情亦渐恢复。而靳

以为组织第三势力，仍有邀李加入之必要（李确有才能，惟锋忙〔芒〕太露），故特嘱杨到津时访晤之。李对杨所表示者，如下：我（李）为荐青打算，也是先取河南地盘较为妥当也。既取河南，且须逐吴。这也我[我也]极赞成，很愿意从旁帮助荐青，将来大家都好。我和荐青关系至密，总算是特别深厚。现在河南我的旧部很多，我当叫他们都帮荐青。至于我自己，雨帅至津时，曾叫我出来做事，不过我已决定不干。看奉、鲁都是很危险，而尤以鲁为最，效坤到江南，便既[即]迷女色，置正事而不管，部下如此凌乱，凭什么战胜党军？鲁军败之日，奉军之末日亦至。北方军阀表面是轰轰烈烈的，后台却不置一顾，谓内部皆极乱且弱。这次吴子玉以武力解决荐青，据我想，荐青一定可以保持其实力，只要实力保得，便联奉仍旧是可以成立的。北方军阀的心理我最清楚（的），张雨亭是真正愿意拉拢荐青、扶植荐青的，为拉拢荐青，特许翼青（靳大）组阁，总算是雨亭聪明的地方。他拉拢、扶植荐青当然是为着奉方自己的利益。其利益有四：（一）靳乃反吴之最有利[力]者。有靳，纵吴不灭，亦可利用靳以牵制吴，使吴不能有所发展。吴不能发展，使奉方灭一政治劲敌，大可把北方做成奉方清一色的天下；（二）利用靳为对党军之缓冲者，且当进（一）步而使靳实行讨赤，奉军安然坐观，而其后待收渔人之利；（三）靳果归附党军，则河南必立归党方所有，河南已归党方，则奉方势须立与党军发生直接关系。然战既无必胜之把握，和则守[受]党方之胁迫，无论是和是战（战），皆不利于奉方也。故余为奉方计，亦有拉拢荐青之必要。奉方之所以必请翼青组阁者，亦无非联络荐青耳。余深望荐青今次能保存实力。处今日举足轻重之地位，正本人之大事发展之时，不可错失此良机也。

杨深以上述李景林之所（言）为然者，于奉张拉拢云鹗亦属诚意一节，尤为确切。盖云鹗本人亦深知奉方有拉拢、扶植之诚意，

南方之党军(订立正式之协定者)既亦拉拢本人，遂更觉本身他〔地〕位之高超，而本身之希望则更奢，其所以迄未与党军订立正式之协定者，其实为重要原因也。总之，云鹗对〈河〉南对北之方针，其变相乃如左述：

九、十及十一月上旬，专谋与党方携手；十一月中下旬督〔暂〕不加入党，谋第三势力之创造；十二月初旬，谋先取得河南，以为创造第三势力之根基；十二月中旬，谋南〔向〕北方输诚，联络奉、鲁，俾第三势力将来可立于南、北之间，左右全国时局。云鹗何以于十二月中旬，忽又向北方奉、鲁输诚，真耶？伪耶？就事迹论，自完全属于伪，所谓敷衍缓兵之计也。然若以云鹗心理论，则又带有两三分之真意，盖为第三势力而联络奉、鲁也。云鹗自十一月中旬以迄十二月中旬，其一个月间（即被吴讨之前一月），惟谋第三（步）势力之创造。在十一月上旬以前，云鹗第三势力之最初计划，据其于九、十两月（正与党方积极谈判时）对于左右所表示者，乃南倾党方之第三势力，作为党方之一温和性的独立派。盖斯时之云鹗，已决定加入党军，只待党军许以优越之地盘也。及至十一（月）中旬以迄十二月中旬，则云鹗理想之第三势力，渐由南倾党方变而为倾南亦倾北之第三势力，是即本身不正式加入党军，将来于取得地盘组成第三势力之后，立于南北之间，以超然之地位，操纵全国时局。其所使云鹗理想之第三势力，由南倾党方变而为倾南亦倾北，由加入党军变而为不加入党军者，其最重要之原因如左。

初时（十一月上旬）以党军未许以优越之条件后（十一月上旬以后），因奉方之对彼极力拉拢。（初时）云鹗本人仇奉最深，与奉方感情最恶，与鲁方之嫌亦甚深。奉、鲁复言：将以重兵压迫河南第三势力，第三势力惟有南倾党军，本人惟有加入党军，可得党军之助，抗御奉、鲁军，倘不加入党军，则必为入豫之奉、鲁军所宰割，将无以存在也。后时，云鹗忽见奉方对本人之极力拉拢，同接其兄

云鹏之电每至两三起，力言奉张之如何愿加以扶植，云鹏恐乃兄之利用己身为求官之具也，尚不敢深信。乃派杨湘第一次十一月中旬北上到津谒张，一探究竟，结果认张确有诚意。如于[斯]深觉本人有立于党、奉之[间](倾党复倾奉)之可能，同时则更觉第三势力有立于南北之间之望。党方<既>未许优越之地盘，盖河南既早已许与西北军，而湖北又为国民政府所在地，断不能<与之>给予新加入、未尝建功、未受训练之云鹏也。初时，联络党军中一部将领之计划，未见成效，以为党军中之重要(人物)乃完全一致，不可分离者也。后时，联络党军之一部分将领，在靳以为大有可能，遂觉第三势力可望谋创造，且觉第三势力无南倾党方之必要，而有立南北间之可能。云鹏既决定督[暂]不加入党军，而专谋理想中之第三势力之实现。如是，第一步，乃谋驱逐吴系，优先取得河南地盘为基本。自身既决定督[暂]不加入党军，驱逐吴系，一时自无相当之能力(饷弹不足)，于是先谋驱寇，冀河南督理之归于己。及至倒(寇)不成，乃转向吴输诚，讨好，恐吴愤而讨伐之举也。顾吴与云鹏结仇甚深，不复可能，竟实行讨伐矣。第二步，联络奉、鲁两方，不惟消极方面使奉、鲁不予第三势力之阻碍，且积极而使奉、鲁能与第三势力以相当之援助；不惟奉、鲁不阻碍其攫取地盘(不助吴驱彼)，且欲奉、鲁之能接济饷械、即[使]其攫取河南地盘。其派杨湘之往见宗昌、作霖(之)主要动机也。其派杨湘往谒李景林，亦冀李在今日，能助其攫取河南，在将来，能助其组织第三势力也(李亦今春新直系运动之人)。

杨湘到津后，向各方探询吴攻讨靳(云鹏)之结果如何，迄未得确实消息，各方皆未得云鹏之来电。但凭吴(一)面之通电，伤[扬]言靳军<已>大部分已经受编或击散，只小部分逃窜各地，各方面因不信，杨则更认为不确。以为云鹏既于事变发生旬日前而即知之，且有所准备，断不至有何损失，必以寡不敌众，联络魏益三自

动向南撤退，与唐生智及樊钟秀部联合一起，谋异日之合力攻吴。杨离信北来（十二月十七日）之际，云鹗专谋第三势力之创造，不欲与党方成立合作之约，其后与党方之谈判如何，尚不知，或因行将攻讨之故，急将方针改变，已与党方签约，亦属意中之事。纵云鹗于事变之前犹未与党方签约，然云鹗与驻豫之党军将领，感情甚佳，必自动撤退其军队至信阳迄至柳林一带及信阳东南各地，而与党军联合一起。杨在信阳时，靳曾与左右闲谈，谓：如果吴竟以武力对彼，则彼当移兵豫东及皖北各地，再图发展，决不与吴计一日之长。虽云昨日（六日）杨得有报告，谓：靳军之大部分实督[暂]退至信阳之东南，与党第七军在一起。假令靳尚未与党军签立合作之约，然处于今日之境地，势非签订不可矣。至于魏益三自必与靳取一致之行动⁶，在杨亦认为毫无疑义。两三个月以来，魏与靳同居信阳袁家大楼之上，其房门为斜对面，魏之隔室为靳之秘书长所居，食则一席，出则时时同行，隔三月[日]必作一麻雀之戏，遇事则互相商而后行，二人之亲切，可谓已臻极点矣。无论如何，魏决不能背靳而助吴也。杨以云鹗之确实景况如何当[尚]不可知，故来津后，决定督[暂]不见张作霖，且于自身之来京尚守秘密。倘日（后）云鹗方面仍无消息，则拟乘津浦车南下，赴信见云鹗也。云鹗被讨之消息传来，虽云鹗之丧失队伍之真相如何，尚未得知，然奉方之对于吴，已由轻视而变为重视。奉方虽不愿吴之声势复振，能一振矣，奉方究不能不稍等重之也。

最近月余以来，奉方之内定以靳大（吴之仇人）为阁揆，而将（直）系内阁推倒，对吴可谓重视极矣。梁士诒之旧交通系，上月下旬本已与奉张翻脸，奉张到京后，靳阁已产，除梁氏外，无他适当之人，遂不得不拟及于梁。然至两日前，终以次等重吴之故，而取消梁之拟议矣，因梁乃吴反对之人也。警厅不准各报登载不利于吴之新闻，亦尊重吴氏之意见。靳事未发生前，则任各（报）披露于不

利于吴之消息，故致吴愤而下令不准京、津报纸在豫发行也。

北京临时报告书

1927年1月22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九)4669

1927年1月25日

载《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

第1辑第18册

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 报告(之四)

——关于杨宇霆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张作霖拟于旧历年前入京¹，谋于元旦实行主政，或以临时总统之名义，或以临时大元帅之名义，或仍用安国军总司令之名义，在张自己以为已有相当之把握，只须受外交团之为非正式之欢迎，面(子)即已过得去。至国内各方，如鲁、晋及豫中吴佩孚并靳云鹗虽心中皆(不)甘，心反对，但本人登台而后，大家在情面上、历史上不好意思不赞成。南方党军及西北国民军从未为反奉之表示，对于本人之主政，当然持其缄默之态度。

张自认为主政不成(问题)，故入京时密嘱军警迎接以元首之礼，且已准备于元旦日在太和殿受外交团之觐贺矣。不期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不良之消息分[纷]至沓来，第一使张氏受重大打击者，厥为吴之解决靳云鹗(一)部。是时，但凭吴之片(面)电传，捏称已将靳部如何击败，如何改编，明之[知]吴之善作夸诡之言，然吴本人及部下将领日必有通电之拍来，同时公私各方俱未得信阳靳云鹗之反证电讯，于是奉张及其左右遂亦认靳军之瓦解为可信矣。

奉张预定之计划，以为靳氏既未正式附南，本人主政后，以乃兄为国务总理，有其拉拢云鹗为河南督办，更助之以充分之饷械，不悉[愁]云鹗之不反而为奉所用也。既以云鹗为河南督办，不愁云鹗之不倒矣[吴]也。吴既倒，奉方又少一劲敌，夙愿得偿。云鹗既与党军及西北军有相当之联络，正可居南北间而为缓冲者，奉方之于京汉线上，可以无忧矣。乃忽有云鹗所部被吴解决之讯传来，是吴之势力已大为之一振，是即奉方在北方之声势颇为之一减，张果实行主政，吴必起而反对之，处处与奉方之政府为难，非张所能堪也。故张一闻佩孚之解决靳部之消息，其主政之心便已冷却一半矣。北京外交团之不能承认北京政府，在奉张亦认为当然无疑，后亦只望外交团之能非正式的欢迎之于实行主政之元旦，(一)致至太和殿行覲贺之礼。乃奉方之(一)与外交团已(一一)经疏通接洽，各国公使最后但允之(以)元旦日以私人资格，各自赴顺城王府覲贺新年，至赴太和殿覲贺就职，则极端不可，避正式承认之嫌也。张氏至此，其主政之念，完全冷却矣。张氏主政之决心，既以受上述之内外两重打击而不能不取消，惟有退于讲求不主政之办法。是时之奉张沮丧已极，环顾左右，皆拥其主政之旧派吴俊升²及其公子派之张学良等，无一可与商大事者。吴俊升等皆老而无用之人，昏聩无识。张学良一见乃父，则畏不敢言(其父至今仍呼其乳名“小六”)。张望不能不求教于其惟一智囊杨宇霆也。其召杨来京之电，辞意极为摯切，中有心如乱麻之语，亦可见张当时之颓丧矣。

杨初不肯来，谓：自身既经人(旧派吴俊升等)指为有罪，在未证明冤屈之前，一切不便预闻。嗣经张亲电话慰劝之再，而杨又闻积极拥张主政之吴俊升、张学良等因事失败，噤若寒蝉，而张之于彼等亦颇有责言，固杨更证明其入京无何危险，张之相召且极欲就商一切，然后始实行于正月二日入京。杨因张之入京主政，其新派

已濒于灭亡，不得已而为最后之奋斗，密谋东三省之独立。以此首先向奉张告密者，吴俊升也。吴且谓：杨已与党方联络，谋东三省之独立，正为党方谋全国之统一。又谓：哈尔滨之杨卓与杨有密切之关系，杨卓乃担任谋北满方面独立者也。（按：杨卓因谋北满独立，事机败露，被捕枪决。其在北满方面之布置已臻完妥，联胡匪及一部分之军队，所购军械[火]颇多。东三省各机关之俄员多与之有关系，已定阳历年后起事。据奉方人曰：彼乃受国民政府之命令，得海参威俄当局之协助。又，杨在中东铁路充监察员之职，固一重要之职员也。关于杨卓事，报端曾略载之。以谋东三省独立之罪归于郑谦一人）。杨宇霆二日到京后，经奉张极力慰劳、怀柔，如（乃）实行为奉张筹划一切。杨以[己]月之十九日出京返奉。奉方对于一切问题之方针、策略，至此，可谓已为全部之确立。兹可一一述之如左：

（甲）临时办法：维持顾维钧内阁

（一）维护吴佩孚系统之顾[维]内阁，（所）以（为）尊重吴之表示。吴既解决靳部而声势复振，奉方有尊重之必要。倘再如从前数月之（躬）至[轻]视之态度，则吴必有种种不利奉之举。尚有更重要之一点，即利用吴佩孚在河南抵御党军及西北军。奉方初用靳云鹏，今靳已为吴所解决（当日之消息如此），靳之军队纵尚保存（是时关于靳军已渐知之），其势力亦必归附党方，豫中之北方势力，惟吴与靳而已，靳既不堪利用，则惟有利用吴矣。

（二）奉张本人在今日既不能主政，而靳云鹏、梁士诒又皆吴佩孚所反对之人，又不能当组阁之任，靳、梁而外，无第三人敢任阁席，除维持顾阁³外，无他法。

（乙）永久办法：张为总统。

奉张元旦日主政之试图既遭失败，其所富有虚荣心，令其十分羞愤，惟恐报端之披露、讥讽，乃对报馆、通讯社施行严厉之检查。

惟其羞愤、脑[恼]恨，故其尝试总统之念乃益裂[烈]。于杨宇霆到京后之数日，对杨曰：我终久[究]必要干电[它]一下。即谓其无论如何终必一任总统而后已矣。前者，杨宇霆反对张之入京主政，因恐开罪于张，其措辞只敢谓：今日非大帅主政之(时)，大帅何不稍缓做正式总统。今张欲待时(先充分准备)而为正式总统，杨殊无反对之理由，倘再反对，乃(恐)新派自身之失利。故〈对〉张乃预许杨以种种利益条件，杨既取得种种利益条件，乃改变其从来之态度，允助奉张谋取正式总统。故奉方新派至此，乃与旧派一致为张谋总统矣。条件之内容如何，他人不得知之。学良方面谓：张已许杨直隶之地盘，此说可靠与否，尚不得而知。然学良乃预定为本人所有，惟恐杨之攫夺，因此有种种神经过敏之推测，亦意中事。惟张之必许杨以较好之地盘，殆无疑意[义]。杨日夜所欲望者，亦惟求一优厚之地盘，如直隶、江苏等。因杨在东三省所处之地位及其权利[力]固至高大，然其实利(所)甚薄。东三省吏治甚好，贿赂之事极不多见，常有以午[舞]弊数元即人模范监狱者(不论职位如何高)。

杨之积蓄殊不丰。去岁在江苏所获入十万，仓皇离任返奉时，途次徐州，尽为陈调元所截去。杨近年复受种种刺激(如郭松龄之事)，益觉(谋)固[个]人财富为不可缓矣。此亦杨之所忿，又赞成张之为总统也。阳历年以迄今日，奉张最所注重者，即为自身总统问题。奉方之人曰：所谈者，亦即奉张之总统问题，奉张对于外交、财政、军事以及对于其他一切事宜所定之方针，所取之策略，莫不以企图正式总统为其惟一之标的。如何可以达到总统之标的，如何可以利用(于)总统之企图，便决定如何之外交、军事、财政上「之」方针策略。故在记述奉方其他一切之前，述中央政府问题，奉张之总统问题也。

兹将奉张与杨宇霆所议定企图正式总统之步骤、办法一一述

之如后，其中有一部分见之事实矣。

(一)今次所图，必谋正式总统，决探[采](平)合法、(和)平(革命)之手段、方式。所有大元帅、总司令等类临时非正式之名义，决不采用。

(二)先积极为充分之准备正式总统之实现，在准备未臻完妥以前，决不造就[次]实行(财政，外交等亦必先有准备)。今次奉张力促二五附税之矣[已]实行，为作总统之一种准备。

(三)必须在北洋系现有势力范围内，无一反对之人，始实行就(任)总统。其素持不甚赞成之态度者，必先一一疏通妥帖(对张宗昌等)，或以妥善之方法铲除之(利用靳云鹏辈对吴佩孚)。最近已明了豫南之真相，靳非特未为吴军之解决，且与魏益三等与党方联络，起而实行驱吴。于是奉张乃立召靳云鹏来京，许以来春组织新阁，嘱其速为奉方拉拢乃弟。

(四)在吴佩孚尚未实行下野以前，虽可就任总统，亦决不实行就任总统。

(五)吴佩孚下野之后，必须河南之新首领为可与奉妥协之又[人]如靳辈，始行就任总统。

(六)河南如果为党军或国军所占领，无论如何，决暂不就总统。

(七)倘长江流域党军势力范围已又推展而不能实现。

(八)倘至河南为党军或国军所据，或长江现局又为党军所破坏时，奉方若与党军弃战言和，则亦可以就总统之任。

(九)奉方迫不得已，或利用适当有利之机会，而对党军及国民军直接用兵之时，必当搁弃政治，暂不就(任)总统之任。

(十)关于政党方面，设法笼络安福系、交通系、研究系⁴及直系政客等，使其消极方面多[少]为梗阻，且望其种种方面能加以赞助，而许之以将来之利益。

(十一)关于总统之产生方法及新政府之组织方法，请奉方以

外之各方人物筹议决定之。使各方皆负有若干责任，免除日后的反对纠[纷]扰，且藉以示新政府非奉系一家之政府。十、十一两项即设置外交、财政、政治三项讨论会之用意也。

(十二)在张未能实现就任总统之前，倘时局上[遇]有必要时，当先以恢复段祺瑞之临时执政为过渡性，必先与安福系为切实之约定，过渡之时间，现[规]定为若干日。在过渡时间内，该系在台上，应以全力助张谋正式总统，不得反颜(惟恐为安福系所欺)。

右之第十二项，如安福系加入三讨(论)会之条件，亦设置三大讨论会用意之一也。

(十三)财政之准备，先谋二五附税之实行征收，继谋公债之发行与关税会议之重开。其办法曰[由]财政讨论会议定之。

(十四)外交之准备。疏通各国之事，由外交讨论会担任之，只希各国予以正式的承认。

(十五)总统产生方法，有主张召集如民国元年之参政院以选举之者；有主张恢复旧国会或恢复参议院以选举之者；有主张以段政府之国民代表会议以选举之者。此项代表当[尚]差两省未选，但可以会[令]两省于一个月选出。此等议员，近有七八十人在京津两地活动，连日派代表向奉鲁[张]往[晋]谒。

(十六)拟以阴历明年三月初一日为张就任总统之期。

又，据另有报告，奉张在京，日惟迷恋于总统最高酣梦，最乐闻(又)与商量总统问题，除此以外，全不入耳。某君曾访杨宇霆时，曾问之曰：以君之明哲，胡坐奉张之自蹈复[覆]辙而不之阻？杨慨然答曰：袁项诚作洪宪之迷梦时，难道他身边没有一个明白人吗？不过他一定要做，谁能拦阻得住他呢！亦只好听其去作、赞成他去作罢了！我于奉张亦是如此。奉张因迷恋总统而迷恋京华，故虽岁云暮矣，而犹不愿归。(讨)杨归去时，曾力劝张归，奉张诺之，杨不敢定其必归，故对人言为[如]奉张年前不返奉，彼乃[仍]当来京

劝彼也。

杨宇霆在京时，曾由杨度⁵传达间接有所接洽。最后距杨离京前一日，石曾曾经被彼邀到杨处，亲自晤谈。杨向石曾明白表示：奉军即入河南⁶，解决吴、靳各部，据武胜关后，再与吾党议和。曾约石曾与他同伴出京，转赴南方主持和议。任可澄⁷携带伪阁员共同署名致吴佩孚的信，赴郑州劝吴下野，让郑州于张学良。寇英杰派石龙川请奉军速入河南攻武汉，谓武汉此时尚易攻，迟则防御之事完成，便不易攻击了，云云。

北京临时报告书

1927年1月22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九)4669

1927年1月25日

载《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

第1辑第18册

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 报告(之五)¹

——关于北京外交使团最近态度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英 国

汉案¹发生后，唐悦良(国民军外交处长)曾访英使蓝普森²氏。蓝氏对他大发牢骚，说：此次来华，深望把中英邦交弄好，对于国民政府，尊重其地位，并且深致同情。故抵华后，即先赴南方接洽，随即发表对华新提案。其用意完全在促进英国与国民政府间之良好关系，不意其结果适得其反，不能不令我深抱悲观了。我在汉时，曾晤陈友仁君六七次，陈君意甚恳挚，如能按照此言办法，或有良好结果，亦未可知。但我自始即怀疑陈君是否能如其所说去办，今我离汉不久，即发生汉案，前途正未乐观。唐君答称：中国民众及国民政府都认新提案有援助北方的意思³，故对英起反感。蓝氏说：这是误会。试思广州政府已自行征收二五附加税，而无所阻难，北方军阀焉有不尤而效之呢？我们已不能阻止南方，又何能阻止北方呢？新提案之意，亦不过预知此事之必未[来]而先自承认

之，以自保其体面而已，非有他意。或者将疑吾承认北方政府，此事南方政府请放心，英国此时决不承认北京政府云云。翌日，国闻社记者胡政之⁴访蓝氏，蓝氏所言，则视与唐所言更为露骨。蓝氏说：英国亦是一个国家，亦是（一）个民族，他的忍耐有一定的限度，现在恐已达到忍无可忍的限度了⁵。胡云：君对北京政府的感想如何？蓝氏云：毫无希望。胡云：对北已无希望，则希望仍在南方，然则非继续忍耐下去不可。民众运动在其性质上，容或有过甚的地方，不能因此小小波澜而使邦交有大大的变更也。蓝云：我觉南办外交真是一种难事。蒋介石、唐生智则忙于军事，无暇及此；陈友仁、孙科、宋子文等仍皆无大力量可以主持此事，然则操纵民众运动、主持外交方针者，鲍罗廷一人耳。今我向谁去办外交呢？蓝氏向人表示虽然如此，但张（作）霖访他的时候，则又大张盛典，陈（列）礼件件，（列）兵于门首以欢迎之，礼食甚隆重，前未曾有，相谈有二时之久。日本甚忌妒之。谓：英人甚鄙，以迎皇帝之礼迎张作霖。当晚，北京警察即干涉北京国民社，不令继续出版了，大约这是蓝、张会见后之一端。

二、日本

自清浦子来北京与石曾、寅村等见面后，接着左分利⁶又到南方，临行时亦曾与石曾、寅村等见面，直到现在日本外交有关人们和石曾等间接接洽，不曾中止。日本人又有大内畅三者，系众院议院？某大学的教授，中、日文化事业协会秘书。他到南方视察后，即回北京与石曾、沈尹默等继续商量中、日关系的问题。自然在北京（的）芳泽⁷日使、坂西⁸顾问在□□□□，亦曾参与此事。在东京，日本政府当局及政党干部皆有与闻。有一天，（大）内请石曾拟

出几条纲领来，以便据此非正式的征求国民政府及日政府两方对此政纲的意见。石曾说：不便拟。最好由文化事业协会中的中日两国朋友们，（以）第三者的地位拟出来，再由日本朋友征求日本政府及朝野的同意，然后交我们转达国民政府。由是，由大内、沈尹默等拟出方[六]条。大内说：已约[经]日本朝野的同意。其条件如下：

1. 中国、日本两国，以平等互助之精神，共同解除国际间对东洋一切束缚，并谋两国国民经济的提携，以彼此互惠为根据。
2. 关于主权的中国，定期收回治外法权，按期取消一切租借条约，日本以诚意协助之。
3. 关于经济的废除厘金，收回关税完全自主，日本以诚意协助其成功。
4. 东三省境内，日本政府、日本国民一切既（得）权利，应俟中国统一后，中日两国自动的让步，以好意改善于两国不利益的条约。
5. 中日两国通商条约及税则，应以双方最惠的精神，订立平等、互惠条件，双方尊重而实（行）之。
6. 关于中国暂时的政局，日本以友谊的精神，促成南北一致，或中国南北首领之双方完全同意，南北分治，再根据全国民意，以法律统一。如至不得已时，南北作战，日本必绝对中立，承认南北为对等交战团体。

此外尚有一条关于防止赤化的，这大概是芳泽的意思，经中国方面的反对，便删去了。大内在这一般人中比较开明。他说：赤化在日本，虽无可怕的东西，但于中国或适宜亦未可知，可不提。大内本想于一个星期前由京赴汉，持此条文与我政府要人接洽。后接东京来电，政府要他先往东京一行⁹，然后往汉。他在未定[走]前，向石曾要求，与守常面谈。守常遂约他当晚在俄款委员会相

见。是晚九时，大内自带一通译方梦超与他（们）同来。寒暄数语后，守常即告彼：日方条（件）已经看过，不过有些点还望先生予以更明晰的说明，可乎？大内说：好。以下便是守常和大内的问答了。

问：第一条中“共同解决国际间东洋一切的束缚”的意义，是否含有本愿以行为行协助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意思？

答（大内）：是的，含有这个意思。不过日本在国际上，因为不能孤立之故，故不能明示其态度。因为日本若在国际上孤立，虽欲助中国而不能。

问：第一条谋国民经济的提携，以彼此互惠为根据，是否有具体的提议？

答（方梦超）：这是指棉纱一类的商品，是日本输入中国的主要物品，如果中国不与以提携，而增加关税以障之，则日本产业界将不堪此重大打击。

答（大内）：日本地狭人多，如中国不予经济的提携，则日本民族不能生存。

守常说：我们所主张的革命不是国家主义的革命，而是民族主义的革命。我们决不主张专为自己民族的利益，而至牺牲其他民族的生存。

大内说：国家主义的革命是旧式的革命，如今已成过去了。

问：第二条“定期收回治外法权，按期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否把租界（如天津、汉口等）、租借地（如大连等）内的领事裁判权，外国行政权，都包在内？又所谓“定期”、“按期”是何意义？

答（大内）：依我解释，当然全包在内。至如定期、按期云者，是指收回治外法权一类的事，不是仓猝所能办到的，必须与关系国约达一定的期间即当交还。君曾在日本读书，当知日本当年收回法权、税收的维新运动，人民亦曾受多大的牺牲。大隈伯一条腿，就

系为此断送了。

守常说：我当时读日本史，读到此节，曾起最昂奋的兴味。就我的所知，日本在大隈伯出任外交以前，是当外国是一个外交团来办的，很难得有效果。大隈伯出来，便主张采“国际谈判”的政策，把各国分开一个一个的交涉。大隈伯因当时民众不了解，炸去一足而去职，但继他而起的外交家，用他的政策究竟成功。不[还]有一个最值得记忆的，便是当时日本最难交涉的国家，便是英国，一旦与英外交办好了，其他各国便迎刃而解。中国今日情形与日本当日有些相同。

问：第三条中“收回关税完全自主”，是否含有中国把数十年来为英国所把持的海关行政(权)完全收回的意思在内？

答(大内)：就是这个意思。(很郑重的说了二三次，这一条很要紧。)

守常说：上次关税会议的时候，英委员很怕中、日提起这个问题，故赶快借着段政府倒台，就把关会闭会了。

大内说：就是这次的对华的新案，英国亦想维持其海关行政的系统，故虽承认了南方征收二五附税，却要求仍须由海关征收¹⁰，正是这个意思。

守常说：诚然。但是南方政府征收附税，其目的并不在(增)多增收入，而在当作一种内地税，由中国的自设机关征收，而不经海关的手，用意亦在打破英国所把持的海关行政权。

问：第四条中“以好意改善于两国不利益之条约”，是把那些于日本利益于中国不利益(的)那些条约除外了。但是以我看来，关于东省条约，大概都是于日本利益，于中国不利益的！

答(方梦超)：这当然对于那些包(括)在内。当时讨论到此条时，因为顾虑到日本人(骤见)起来反对，从而发生阻力，故用此语以掩饰之。

问：第五条的意义是否希望与中国订立一种差等税率的协定关税条约？

答（大内）：就是这样。

问：第六条中“日本以友谊的精神促成南北一致”，国民政府方面极欲与奉方谋和平，但是奉方对南是否愿意和平，还是问题。日本对奉天有没有把握使之不对南作战？

答（大内）：我于南方倒有些朋友，于奉方却很（少）。是亦有二三相熟者，相见即以此劝之。

答（方）：大约先生是文人。此次[事]与武（人）商议，此次与坂西商议，坂西颇赞成此议。故武人方面由坂西去办。因为现在的陆军大臣，是坂西同学，又是同乡，故好说话。此次大内回东京，即是（与）参谋本部和陆军大臣商洽此事。

问：第六条中“如至不得已时，南北作战，日本必绝对中立”，此在内战，日本应如此。但有一事我欲请问的，如中、英发生冲突，日本是否守中立？

答（方）：这是涉及第三（国）的问题，故未谈及。

答（大内）：（关于此点他答复颇含糊。）中国如与他国冲突，日本自应中立，为于两国有利。此次回京后，将更往武汉一行，便是奔走此事。日本朝野本是方针以处理之，同时亦望中国民从[众]本此方针以避免二国间之冲突。

问答已完，守常乃表示几点意见（不是代表国民党或国民政府，而是个人的）：

第一，欲中、日两国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须根据：在政治上日本对中国让步，经济上中国对日本让步的原则。即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日本须予中国以赞助。关于两国国民经济点[的关系]系，中国须予日本国民以提携。

第二，南北分治，只是一个过渡的视线¹¹，中国国民党究是要

谋中国的统一。可是谋中国的统一，国民党自有其建国的方略，进行中，勿助军阀而予以妨碍，因为中国不统一，于中、日二国经济的提携上，亦甚不利。谈至此，大内以为守常的主张，或有国民党将以武力解决奉张的意思。故复加以辩解说：在统一之先，南北分治或不可免，可是南北分治便是统一的必经阶级。我在南方见民党政友人，便劝其暂时休息，整理内部，不必急于谋扬子江以北的发展。

守常说：此言甚是。我们取得的地方，不仅在武力的占领便算了事，我们要把党的基础深植于民从[众]，在政治上方能算取得了那个地方。否则徒以武力解决，与军阀的武力统一何以异之？失[先]整理内部的忠告，盛意可感。

第三，日本在满洲关系，无[吾]人早有所谅解。

大内听守常言后，颇现欣悦之色。乃悄然告守常：日、中两国以外，还有一国当联合，便是苏俄。其理由我今不明言了。守常即答他道：即不便明言，我亦明白了。乃与之寒暄数语而去。

从这次谈话和六个条件，我们可以看见日本注重的几个要点来：（一）主张中国暂时南北分治；（二）在分治期间，日本政府及其国民在东省内的免[既]得权，不生动摇；（三）怂恿中国收回数十年为英把持之海关行政权；（四）日本希望与中国订立一种差别税率的协定关税条约。这是六条的骨干，此外的辞句，都为装饰外面的好看服罢了。

大内与守常见面后的一日，大内即乘晚车返东了。

三、美 国

美使馆态度忽变¹²，似表同情于英。唐悦良曾与美使及其代办晤谈，言下深不与[满]于国民政府。美使：我实为夙表同情于南

方之一人，但近南方对外态度，深令失望。如何排英至于如此急[激]烈呢？我与蓝普森同船来华，所谈至为详悉。他此次来华，抱着满腔热望，想和国民政府开诚相见，把中英关系弄好，不图发生汉口事件，出乎意料之外。若云承认北方政府征收二五附税，那末试想，有无英使的新案，见南方征收而毫(不)阻止，北方军阀焉有不自行征收之理。听说以群众运动占领了汉口英界之后，而欲以同一手段占领日、法租界，这种办法实在危险的很。以后唐氏又见他的代办，他更说：你们收回租界是可也，但是为何又仇视教会呢？这不是仇洋排外是什么？我们教士在闽的已陷于危险状中，美驻闽领事已有数电告急。由西安跑来的教士说：西安城被困围数月，因[困]在城中的教士真是万死一生，好不容易祷告上帝，若大旱望雨一般的(望)冯玉祥来了西安，以为这可得救星了。谁知冯到西安后，把教堂占了，求冯玉祥保护，而冯不理。这样看来，冯已入了布尔什(维)克，你们南北打成一片了。以苏俄为后背主人，我在[再]不能与以同情了和辩护了。玛慕瑞(公)使离京前一月，他的代办又致电乙函，并[再]次申明此意。并云：他所谈的玛慕瑞今俱已完全同意，此次回国即将此真相报告于美云云。唐得此函后，立来与守常商议。我们认定美使馆这种态度，其用意在取瑟而歌，使之闻之，或许是希望我们对于美教士不加危迫，故严其辞以促成我们注意于是。商请唐君再往美使馆一谈，其措词看下：“我们国民军、国民党人听到美使馆员人[人员](们)突变对我态度，不胜诧异。因大家都知道，首先到广州访国民政府的(是)玛慕公使，对此事实，不但中国民众对美起一种好感，即世界的外交界亦曾予以多大的注意！现在美若还定用这种精神办理对中国的外(交)，相信由此事实所生的良好影响，当更发展而况[光]大，俾益二国邦交不少。我们不解美国为什么忽然要躡[惜]英国走狗？民众运动有时过火一点，容或不免，而且一般民众在反英的狂潮之下，对于美国教士

未便细辨，亦或不免作了殃及美国教士之举，究系一个小小事件，焉能以小小关系而更变二国邦交的大计呢？如有事须我们代达国民政府者，我们可以代达”云云。美代办听了这些话以后，声明：“希望你们以行为证明你们对美的友谊。最近何应钦到福州，美总领事两次访何，均拒不见。希望转达国民政府转告何将军，能够接见美总领事，以便有交涉时可以商量”云云。唐答：我们可以去电转达。我们当即将美使馆的态度，为其希望何应钦接见美领事的事，电告国民政府了。不知可曾收到否？以我们所知，美突变，其原因有三：最近在国际上，东方的离合变迁，似乎是英、美互相提携以对日本。而日本为对英、美之故，一面联合，更有接近苏俄的趋势；此次英、美向远东大调海军，藉口对于华，实行[为]项庄舞剑，志在沛公。英、美殆欲将海军向太平洋移动集中，颇有对日本示威之形势；英、美同种，在剧烈排英怒潮（中），英、美实有许多地方利害一致。有人说，此次讨英新提案，（美使）赞同，愿[与]美政府方针不合，故美政府召还美使。美使以自己因由此事受一打击，而陈友仁同志又径（达）美政府反对英提案¹³，故玛氏对南殊不快。现在玛氏又被命中止回国，不知是何原故？

四、法 国

法帝国主义者，虽与奉、鲁有相当关系，但是他对吾党的态度似较他国为和缓。天津法界前次捕拿党人，旋即释放，便可知道了。最近天津同志二十四人，在法界开会为所捕去，因为是星期日，法领不知此事，翌晨法领闻之，便立令放出。是日委闻讯¹⁴，石曾即向法使¹⁵交涉释放，至少勿引渡。恰巧是日早晨，法使请石曾晤面（其实或系天津法界捕人事，法领请示彼之命释放，彼故作不

知，先向石曾温一温交情）。以下便是法（使）与石曾的问答。

法使先说：好久不见了，所以请你来谈一谈。现在各国都有害怕的样子，好像仇洋排外的惨祸近在眼前。我在中国的朋友如你呀，蔡子[子]民呀，褚民谊呀，都是多年好友。我知道中国人最讲和平的，但是人人传说现在国民党的外交是俄国指挥着，究竟真相如何？石曾答他说：我们是老友了，不能对你说谎话，国民政府实在有些俄国朋友在那里帮忙，但这并不奇怪，奉天方面有他的日本朋友。他们有他们的朋（友），我们有我们的朋友，设法国朋友亦愿来帮助我们，亦是一律欢迎的。法使说：这一点我明白了。后又说，英国总想把各国卷入漩涡，但是法国不肯，但看对英之新提案表示反对，便可明了。此次汉口事件，只须国民党不以对英手段对付法界，法决不与英一致行动。不过有些在法国外交部办事的法国人，思想很旧，他们还想拿二十年前对华的外交来对今日的华人，完全不对的，是办不到的。我们常常有报告到法政府去说，现在中国民众与从前完全不同了，不过我们的力量不够转移他们的旧观念。最好你和蔡子民先生，常常打电话（话）给穆德¹⁶一流社会上的领袖，从社会作作工夫，亦可影响我们的政府，只我一人说，他们或以我太过了。至了[这]一步，石曾又去（问）关于法界捕人的事（去找他）。他说：他不知道此事，容他去电告津领事，万勿引渡是了（其实此时（已）释放了）。务望以后有事先由我们在此商量，以免彼此隔阂的地方。石曾说：那末你可以给电各地领事，凡有关于国民党的事，不可直接与国民党发生冲突，不可轻率的处理，务须电告北京法使馆，以便我们彼此商洽。我亦同样的电国民党各地支部，你以为如何？法使答云：这办法很好，很好。这就（是）最近对吾党所表示的态度。

附言：

日本坂西不久将南下，临行前拟与守常一谈，讨论我军将来到

上海时，关于处理租界如何应付英国的问题。详情当候谈话后报告。

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九)4669

1927年1月25日

载《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

第一辑第18册

狱 中 自 述¹

(一九二七年四月)

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人，现年三十九岁。在襁褓中即失怙恃²，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幼时在乡村私校，曾读四书经史，年十六，应科举试，试未竟³，而停办科举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学校肄业，在永读书二载。其时祖父年逾八旬⁴，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弃世。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⁵。是校为袁世凯氏所创立⁶，收录全国人士。钊既入校，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⁷，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毕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东三年⁸，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后应北京大学之聘，任图书馆主任。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科。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缚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今欲

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从前英、法联军有事于中国之日，正欧、美强迫日本以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之时，日本之税权、法权，亦一时丧失其独立自主之位置。厥后，日本忧国之志士，不忍见其国运之沉沦，乃冒种种困难，完成其维新之大业，尊王覆幕，废止不平等条约，日本遂以回复其民族之独立，今亦列于帝国主义国家之林。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⁹，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因此，我乃决心加入中国国民党。

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曾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¹⁰，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翌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粤一次，讨论外交政策。又翌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钊曾被孙先生指派而出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前岁先生北来，于临入医院施行手术时，又任钊为政治委员¹¹。其时同被指任者，有：汪精卫、吴稚晖¹²、李石

曾、于右任、陈友仁¹³诸人。后来精卫回广州，政治委员会中央仍设在广州，其留在北京、上海之政治委员，又略加补充，称分会。留于北京之政治委员，则为吴稚晖、李石曾、陈友仁、于右任、徐谦、顾孟余及钊等。去年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钊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执行部系从前之组织¹⁴，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已议决取消。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中之全党最高中央机关，现设于武汉，内分组织、宣传、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妇女、海外等部。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系汪精卫，从前只在上海、北京设分会，今则中央已迁往武汉，广州遂又设立一分会。北京分会自吴稚晖、于右任等相继出京后，只余李石曾及钊，久已不能成会。近自石曾出京，只钊一人，更无从开会起矣。钊所以仍留居北京者，实因不得稳妥出京之道路，否则久已南行。此时南方建设多端，在在需人。目下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亦只设法使北方民众了解国民党之主义，并以增收党员而已。

此外，则中外各方有须与党接洽者，吾等亦只任介绍与传达之劳。至于如何寄居于庚款委员会内，其原委亦甚简单。盖因徐谦、李石曾、顾孟余等，皆先后任庚款委员，徐谦即寄居于其中，一切管理权皆在徐、顾，故当徐、顾离京时，钊即与徐、顾二君商，因得寄居于此。嗣后市党部中人，亦有偶然寄居于此者，并将名册等簿，寄存其中，钊均径自允许，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盖彼等似已默认此一隅之地，为中国人住居之所，一切归钊自行管理。至于钊与李石曾诸人在委员会会谈时，俄人向未参加。我等如有事须与俄使接洽时，即派代表往晤俄使。至如零星小事，则随时与使馆庶务接洽。

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联俄联德，因其对于中国已取消不平等条约也。北上时路过日本，曾对其朝野人士，为极沉痛之演说，劝其毅然改变对华政策，赞助中国之民族解放运动。其联俄政

策之实行，实始于在上海与俄代表越飞氏之会见。当时曾与共同签名发表一简短之宣言，谓中国今日尚不适宜于施行社会主义。以后中山先生返粤，即约聘俄顾问，赞助中山先生建立党军，改组党政。最近蒋介石先生刊行一种中山先生墨迹，关于其联俄计划之进行，颇有纪述，可参考之。至于国民政府与苏俄之外交关系，皆归外交部与驻粤苏俄代表在广州办理，故钊不知其详。惟据我所知，则确无何等密约。中山先生曾于其遗嘱中明白言之，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如其联俄政策之维持而有待于密约者，则俄已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尚何友谊之可言？而且国民党之对内对外诸大政策，向系公开与国人以共见，与世界民众以共见，因亦不许与任何国家结立密约。

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之用款，向系由广州汇寄，近则由武汉汇寄。当徐谦、顾孟余离京之时，顾孟余曾以万余元交付我手，此款本为设立印刷局而储存者。后因党员纷纷出京，多需旅费及安置家属费，并维持庚款委员会一切杂费及借给市党部之维持费。数月间，即行用尽。此后又汇来数万元，系令钊转交柏文蔚、王法勤等者，已陆续转交过去。去岁军兴以来，国民政府之经费亦不甚充裕，故数月以来，未曾有款寄到。必需之费，全赖托由李石曾借债维持。阳历及阴历年关，几乎无法过去。庚款委员会夫役人等之月薪，以及应交使馆之电灯、自来水等费，亦多积欠未付。委员会夫役阎振，已经拘押在案，可以质证。最近才由广州寄来两千元，由武汉寄来三千元，除陆续还付前托李石曾经借之债，已所余无几，大约不过千元，存在远东银行。历次汇款，无论由何银行汇来，钊皆用李鼎丞名义汇存之于远东银行，以为提取之便。

党中之左、右派向即存在，不过遇有政治问题主张不一致时，始更明显。其实，在主义之原则上原无不同，不过政策上有缓进急进之差耳。在北京之党员，皆入市党部，凡入市党部者，当然皆为

国民党员。市、区党员之任务，乃在训练党员以政治的常识。区隶属于市，积若干区而成市，此为党员之初级组织，并无他项作用。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只有党之组织，而无工会之组织。在国民军时代，工人虽略有组织，而今则早已无复存在。党籍中之工人党员，亦甚罕见。近来传言党人在北京将有如何之计画，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望当局勿致轻信，社会之纷扰，泰半由于谣传与误会。当局能从此番之逮捕，判明谣诼之无根，则对于吾党之政治主张，亦可有相当之谅解。苟能因此谅解而知吾党之所求，乃在谋国计民生之安康与进步，彼此间之误会，因以逐渐消除，则更幸矣！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谨呈。

李大钊

按原件刊印

诗 歌

筑声剑影楼剩稿

登 楼 杂 感¹ (戊申)

(二首)

(一九〇八年)

—

荆天棘地寄蜉蝣，青鬓无端欲白头。
拊髀未提三尺剑，逃形思放五湖舟。
久居燕市伤屠狗，数觅郑商学贩牛。
一事无成嗟半老，沈沈梦里度春秋。

—

感慨韶华似水流，湖山对我不胜愁。
惊闻北塞驰胡马，空著南冠泣楚囚。
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邱。
海天寥落闲云去，泪洒西风独依楼。

署名：李大钊

《言治》²月刊第1年第4期

1913年9月1日

岁 晚 寄 友¹

(二首)

(一九〇九年冬)

一

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
九世仇堪报，十年愿未违。
辽宫昔时燕，今向汉家飞。
岁晚军书急，行人归未归？

二

几载不相见，沧桑又一时。
廿年余壮志，千里寄新诗。
慷慨思投笔，艰难未去师。
何当驱漠北，遍树汉家旗。

署名：李钊

《言治》月刊第1年第1期

1913年4月1日

题蒋卫平遗像¹

(一九一〇年冬)

斯人气尚雄，江流自千古。
碧血几春花，零泪一杯土。
不闻叱咤声，但听鸣咽水。
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

署名：李钊

《言治》月刊第1年第3期

1913年6月1日

筑声剑影楼剩稿

哭 蒋 卫 平¹ (辛亥)

(二首)

(一九一一年)

—

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
半世英灵沉漠北，经年骸骨冷江头。
辽东化鹤归来日，燕市屠牛漂泊秋。
万里招魂竟何处？断肠风雨上高楼。

二

龙沙旧是伤心地，凭吊经秋祗劫灰。
我入平山迟一步，君征绝塞未曾回。
玉门魂返关山黑，华表人归猿鹤哀。
千载骨灵应有恨，不教胡马渡江来。

署名:李大钊

《言治》月刊第 1 年第 4 期

1913 年 9 月 1 日

筑声剑影楼诗

南天动乱，适将去国， 忆天问军中¹

(一九一三年八月)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署名：李大钊

《言治》月刊第1年第6期

1913年11月1日

赠 筱 舫、寿 山¹

(二首)

(一九一三年秋)

一声笳咽一腔泪，万里城环万仞山。
最是多情今夜月，共君犹自出边关。

前意未尽更赋一律

策马玉门关，不为儿女颜。
悲歌辞易水，壮志出天山。
白草千层雪，黄河九曲湾。
遥知肠断处，应有雁飞还。

署名：李大钊

《言治》季刊第1册

1917年4月1日

筑声剑影楼诗

咏玉泉¹

(一九一三年秋)

玉泉流贯颐和园墙根，潺潺有声，闻通三海禁城等处，皆溯源于此。

殿阁嵯峨接帝京，阿房当日苦经营。
只今犹听宫墙水，耗尽民膏是此声！

署名：李大钊

《言治》月刊第1年第6期

1913年11月1日

筑声剑影楼诗

有 感

(一九一三年秋)

愁尽人天唤奈何，高楼风雨黯笙歌。
伤心人有伤心泪，洒向红颜薄命多。

署名：李大钊

《言治》月刊第1年第6期

1913年11月1日

筑声剑影楼诗

吊圆明园故址¹

(二首)

(一九一三年秋)

夕阳影里，笳鼓声中，同友人陟高冈，望圆明园故址，只余破壁颓垣，残峙于荒烟蔓草间，欷歔凭吊，感慨系之。

一

圆明两度昆明劫，鹤化千年未忍归。
一曲悲笳吹不尽，残灰犹共晚烟飞。

二

玉阙琼楼委碧埃，兽蹄鸟迹走荒苔。
残碑没尽宫人老，空向蒿莱拨劫灰。

署名：李大钊

《言治》月刊第1年第6期

1913年11月1日

乙卯残腊，由横滨搭法轮 赴春申，在太平洋舟中作¹

(一九一六年一月)

浩淼水东流，客心空太息。
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
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
黯黯五采旗，自兹少颜色。
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
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
绝域逢知交，慷慨道胸臆。
中宵出江户，明月临幽黑。
鹏鸟将图南，扶摇始张翼。
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
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
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

署名：李大钊

《言治》季刊第1册

1917年4月1日

黄 种 歌¹

(一九一六年春)

黄种应享黄海权，
亚人应种亚洲田。
青年！青年！
切莫同种自相残，
坐教欧美着先鞭。
不怕死，不要钱，
丈夫决不受人怜。
洪水纵滔天，
只手狂澜。
方不负石笔铁砚，
后哲先贤。

送 幼 衡¹

(一九一六年春)

丙辰春，再至江户。幼衡将返国，同人招至神田酒家小饮，风雨一楼，互有酬答。辞间均见“风雨楼”三字，相约再造神州后，筑高楼以作纪念，应名为“神州风雨楼”。遂本此意，口占一绝，并送幼衡云。

壮别天涯未许愁，
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
高筑神州风雨楼。

署名：李大钊

《言治》季刊第1册

1917年4月1日

送 相 无¹

(一九一六年春)

幼蘅行未久，相无又去江户，作此送之。

逢君已恨晚，此别又如何？
大陆龙蛇起，江南风雨多。
斯民正憔悴，吾辈尚蹉跎。
故国一回首，谁堪返太和！

署名：李大钊

《言治》季刊第1册

1917年4月1日

寄 霍 侶 白¹

(一九一六年五月)

一轮舟共一轮月，
万里人怀万里愁。
正是黯然回首处，
春申江上独登楼。

复辟变后寄惺亚¹

(一九一七年七月)

复辟变后，仓皇南下，侨寓沪上，惺亚时在赣江，赋此寄怀。

英雄淘尽大江流，
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
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
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万山无语句，
只应共泛五湖舟。

署名：李大钊

《言治》季刊第3册

1918年7月1日

山 中 即 景¹

(三首)

(一九一八年八月)

—

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
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

二

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
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

三

一年一度果树红，一年一度果花落；
借问今朝摘果人，忆否春雨梨花白？

署名：李大钊

《新青年》第 5 卷第 3 号

1918 年 9 月 15 日

悲 犬¹

(一九一八年八月)

我初入山，
犬狂吠门前；
我既入山，
犬摇尾乞怜。
犬哉！犬哉！
何前倨而后谦？

《白坚武日记》

1918年8月19日

岭 上 的 羊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

我在古寺门前站立，
小羊的声音来自天际。
看啊！岭上的羊，白的掺着黑的。
一个一个的都爬上山去。
羊啊！我细听你的声音里：
纤弱带着仁慈，悲哀带着战栗，
你不曾伤过别的东西，
你不曾害过你的伴侣；
天天只傍着那山水，
吃些草叶或草子；
只有你怕人，没有人怕你。
我不但不怕你，并且怜你；
我不怕你，并且怜你，就是你的胜利！

署名：李大钊

《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

1919年9月15日

山 峰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

一个山峰头，
长着几颗[棵]松树。
片片的白云，
有时把它遮住。
白云飞来便去，
山峰依然露出。

署名：李大钊

《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

1919年9月15日

山 中 落 雨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

忽然来了一阵烟雨，
把四山团团围住，
只听着树里的风声雨声，
却看不清云里是山是树？
水从山上往下飞流，
顿成了瀑布。
这时前山后山，
不知有多少樵夫迷失了归路？

署名：李大钊

《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

1919年9月15日

欢迎独秀出狱¹

(三首)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究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² 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³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三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⁴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署名：守常

《新生活》第 6 期 1919 年 9 月 28 日

《新青年》第 6 卷第 6 号

1919 年 11 月 1 日

赠 吴 弱 男¹

(一九一九年秋)

暗沉沉的女界！
须君出来作个明星，贤妻良母主义么？
只能改造一个家庭。
妇女参政运动么？
只能造就几个女英雄。
这都不是我所希望于君的。
我愿君努力作文化运动，
作支那的爱冷恺²、与谢野晶子³。

附：

民 间 谣 谚¹

(五首)

(一九一八年十月三一五日、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

瘦马拉搭脖，糠饭秕子活。

——直隶乐亭一带，地主多赴关外经商，农事则佣工为之。
此谣乃讽地主待遇工人不可太苛，言地主以糠饭食工人，则工人所作之工活，亦秕子之类也。

—

春鳌秋鱠，白眼割谷。

——乐亭滨海，产鱼。鳌、鱠、白眼，皆鱼名。春时最肥美者为鳌，秋时为鱠，割谷时则为白眼。

—

不剃辫子没法混，剃了辫子怕张顺。

——民国以来，乡间盛传此谣。张顺殆为张勋之讹。

《北京大学日刊》

1918年10月3—5日

四

雁叫一声，穷汉子一惊。

五

高粱晒红米，鳞膀（鱼名）不给你。

乐亭（守常）

1919年9月28日

《新生活》（通俗周刊）第6期

书信

致 郁 宪 章¹

(一九一三年秋)

入山以来，晨莫呼吸烟霞，日必攀松披榛，寻登绝巘，白云从足下飞去飞来。梨树正值果熟，一枝低压，盈千累百，所至憩息，园主辄赠十数颗，坐石磴食之。泉自高山流下，激动碎石，声响清越，举手仰吸，翛然有羽化登仙之慨矣。深泉濯足，长歌采薇，回山去也。此中佳趣正多，不敢向人间泄漏，恐山灵见怪，且惧兄等羨煞也。名山挚友，不得作一时胜游，孤灯石室，颇有所忆，成长歌一首，盖怀兄及天问兄也。诗肃天问函中，余不白。

此致宪章兄

弟 钊顿首

致某君书¹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间)

手示悉。以琐务未暇即复，伏乞鉴宥。所欲介绍于赵君之友，乃山西人梁伯强²君，其住址在天津英租界电灯房北路东第一号乔公馆，已将赵君姓字函告此君矣（此函用日本书留，当无他虑）。乞即设法通知赵君为祷！局势一变，将来恐不能彻底澄清。民党以后宜善自妥协，勿再授人以柄也。惟明达图之，匆匆不多及。

此问

近佳！

付丙！

弟 张润之³ 李大钊

致 霍 例 白¹

(一九一六年五月)

濒行蒙惠佳作，但对此好山好水，诗句却迟迟不来，盖由心绪恶劣所致。昨对泽民言：“古人爱屋及乌，今则憎人及物，此心绪所以恶劣也。”俟抵沪后当再奉酬。

李大钊

致 霍 例 白

(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前)

例白吾兄如握：

卒业试验已竣否？弟抵沪以来¹，劳于酬应，未能裁箋候问，殊以为歉！此间自溥泉公²来，各派意见消融无间，裨益大局匪浅鲜也。昨济公³接川陈三庵⁴电云，川决于箇日（卅一）宣布独立；湘亦不远⁵；而南京会议⁶虽无结果，冯之态度仍有希望，其部下尤为鲜明。看此情形，长江流域战云漫郁，倪、张⁷与冯已隐成敌国。传闻袁氏备战甚急，此则雌雄之决，仍非出于一战不可也。综述近况，以慰远怀，匆匆不尽。

潘兄均此不另

泽民属笔问候

弟 钊

致 李 泰 菜¹

(一九一七年八月上旬)

革痴吾兄雅鉴：

国变日²别后，苍黄出京，未及走辞为歉！

南来栖迟沪渎³，百无聊赖，幸有投止之所，不至漂泊旅馆，暇惟以读书自遣，尚足告慰耳。

至于发表言论，今已全非其时，即有所欲言，亦无正当之言论机关，供吾发表。大抵今日之民党，已失其正系，不偏于弱，则流于暴，求能平心静气，刚毅不挠，依据法律，以与强暴之势力为恒久之抵抗者，益无闻焉矣。前不自禁，偶为《太平洋》⁴作文一首，既而思之，又自深悔。以今日人心之沈溺于利欲，逆耳之言，庸何能入？且以吾侪年少性率，修养未善，诚信中孚，未足格物，有所论列，徒召恶感，不足诲人，诚不如缄默自守，徐俟劫尽之期，听其自忏之为愈也。

阅《太平洋》知阁下与剑农之爭⁵，持理均有独到，所有稍涉感情者，惟有“苟非……如劳乃宣”一语。但此乃剑农行文之际，偶一失检，断非有意隐风吾兄。剑农敦厚朴实，醇乎儒者，至堪钦佩，幸勿以此区区有所介意也。

至于书契文诠，其义本从时代事物之迁移而日有变革，即如“Government”一语，古义原诠为“治人”，今则有“Self-Government”之用，正与原诠相背。又如“Democracy”，在希腊时代，Ar-

istotle 则用以译“暴民政治”，而以 Polity 译“善良之民主政治”，同时 Polybios 氏又以“Democracy”当亚氏之“Polity”。是知语言之意义，既因时代而有变易。即于同一时代之同一语言，又因用之之人而诠释各异，且有适居其反者焉。吾人用字释辞，正不必顾虑及兹也。以弟愚见，“共和”一语，在吾国今日既屡遭误解，“民主”一语，在常俗用之，亦与“共和”相混，仿佛皆专指国体之形式也者。为正名之计，莫如以“共和”一语，专被之于“不立君之国体”（此处用“民主”亦可），而别以“民治主义”译 Democracy，以示吾民非仅以得一形式上之共和国体，遂而自足，而更努力以求“民治主义”之实现与发达，俾其他“贤人政治”、“有限民主”诸说，皆不得托“共和”之名而蒙马虎皮，以乱国而惑世。此则今日正名之事，切要而不可缓者矣。质之高明，以为何如？

海上无何机会。行严先生已赴日本。尊著与“商馆”交涉事或可磋商，容日致函行严，如何再复。

匆匆不尽欲白。

弟 刹顿首

致白坚武¹

(摘要)

(一九一七年九月八日)

今日所得之佳象最佳，亦与今象不甚相远；今日所能得之恶象最恶，亦与今象不甚相远。兄试澄心以思，吾等所夙夜寐兴所构求之好消息，实亦至无聊赖。放眼神州，即吾侪所谓好消息之一境，衡诸国家政治之性质品位，尚不知相去几千万里，此真所谓沧海横流，人间何世也矣。

《白坚武日记》

1917年9月11日

本文摘自1917年9月11日的《白坚武日记》所记录的李大钊来信内容。

——编者

致 白 坚 武¹

(摘要)

(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

日本此次出兵，纯为干涉俄国民主政治，非防德。一面动摇吾之国体，俾为其保护国，以行其大亚细亚主义；一面扶助俄国王党，重建帝制，然后与德和，而日、俄、德同盟之说或将实现。

《白坚武日记》

1918年3月5日

致《北京大学日刊》记者

(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

记者足下：

友人张君国威，原名国宾，富有血性。尝留学日本，习陆军。一日，游“游就馆”（在九段公园靖国神社旁，中陈甲午、庚子两役由吾国虏获之物品甚多），见而大愤，挥拳击毁之，为日人所捕。某公使敬其忠勇，为更名国威，仍令留学。辛亥事起，张君归沪，督率义军，厥功颇伟。民国建立后复返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习矿科，卒业归国，赴粤开矿，以诸多阻碍不克用其学，乃于去岁应沪上赴法华工之招，刻已抵法国矣。兹得其由法来函，述华工状况颇详确，特将原函录呈概要，请登人日刊，以为有志赴法勤工俭学者之介绍。余不白。

李大钊

《北京大学日刊》第 82 号

1918 年 3 月 4 日

致 袁 守 和¹

(一九一八年十月)

守和先生：

承赐各件及手示均悉。拙译《国际法论》² 呈上一册，捐赠贵馆，并乞指正。交换书籍已按单检齐，俟法科将书送到，即汇呈尊处。敝馆所欲借阅之书，容后函告。诸蒙垂爱，感何可言！以后请教之处正多，惟进而益之。匆上。

即请

公安！

弟 大钊顿首

致袁守和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守和兄：

送漱溟先翁¹挽联，已由申府² 缮就送去。署兄及申府、郭君晓峰并第四人名，人百³ 名已不及署。惟闻漱溟尚有讣闻，吾辈或尚须送一吊帐，届时可合吾等五人共同为之。尊意云何？

弟 钊顿首⁴

致 李 辛 白¹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辛白兄：

上海有位日本人佐原笃介君愿订《每周评论》，自第一号起长期续订，报费若干开单寄去，他必照数汇来。他的住址开在下面：

上海虹口密勒路六号佐原笃介（殿）

弟 刹敬白

致 李 辛 白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辛白先生：

“同文”待印“周报”¹，木版尚未取来，昨日派人去取，彼未等回信。现在号房没有上街的人，今晚又非用不可。乞我兄设法差人到《晨报》去取，取到即交“同文”。

此问

近安！

弟 刹顿首

致 李 辛 白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

昨晚，送何仲书先生信一件，内详。取板[版]因当时未能收回，今特派专差〈走〉，祈交下为荷。

李守常上言

无日期

致 李 辛 白¹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日)

辛白吾兄先生：

郭楞仙寄来邮票三角奉上，乞即照寄；外有殷汝耕²君住址一纸亦望收存，由第一号起按期赠报一份，以吾社拟请殷君任驻东通信员也。

此颂

春禧！

弟 钊顿首

二日

致 李 辛 白¹

(一九一九年二月中旬)

辛白吾兄先生：

乞检出第一号至第九号的《每周评论》二份寄赠东四四条胡同
张岱杉先生，以后按期续寄。

此颂

刻安！

弟 钊顿首

致北京大学学余俱乐部¹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学余俱乐部诸先生钧鉴：

鄙人事忙，不胜庶务干事之任，乞另选。

此颂

公安！

李大钊

《北京大学日刊》第 336 期

1919 年 3 月 19 日

致 胡 适¹

(一九一九年三月下旬)

适之吾兄先生：

听说《新青年》同人中，也多不愿我们做《新中国》，既是同人不很赞成，外面又有种种传说，不办也好。我的意思，你与《新青年》有不可分的关系，以后我们决心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革新的奋斗。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尽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像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不容易了。从这回谣言看起来，《新青年》在社会上实在是占了胜利，不然，何以大家都为我们来抱不平呢？平素尽可不赞成《新青年》，而听说他那里边的人被摧残，就大为愤慨，这真是公理的援助，所以我们愈该结合起来向前猛进。我们大可以仿照日本“黎明会”，他们会里的人，主张不必相同，可是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我们《新青年》的团体，何妨如此呢？刚才有人来谈此事，我觉得外面人讲什么，尚可不管，《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不知先生以为何如？

弟 大钊

致 蔡 元 培

(一九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子民先生道鉴：

有一班友人立“少年中国学会”，月出《报告》一小册，系非卖品。卷首有“名家论坛”一栏，拟请先生为撰一文，长短均可，以当讲演。在春假期间，公务之忙，或较平时稍减，幸赐俯允，不胜感谢。专此，即颂

著安

弟 大钊顿首

三月三十一日

(写于 1919 年)

原件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致 李 辛 白¹

(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至十五日)

住济南新街十三号，交王子壮十二份，大洋三角，自二十六号起。

未署名

无日期

致吉野作造¹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

拜启：

赐下《黎明讲演集》均收阅，谢谢。

此次敝国的青年运动，实在是反对侵略主义、反对东亚的军阀，对于贵国公正的国民绝无丝毫的恶意。此点愿贵国识者赐以谅解。惟不幸而因两国外交纷争问题表现之，诚为遗憾千万。尊论正大公明，当酌为发布，示之国人。我等日日祷望黑暗的东方发现曙光，故亦日日祷望军阀的日本变为平民的日本，侵略的日本变为平和的日本，黑暗的日本变为黎明的日本。在黎明的曙光中，两国的青年可以握手提携，改造东亚，改造世界。

尊议两国大学的教授学生间应开一交通的道路，甚善甚善。顷商之敝校教授，均极赞成。惟详细办法，须俟蔡校长回校后，始能议定。至时当详函以告。

陈独秀²先生因发布《北京市民宣言》被政府捕拿。乞持公论，遥为声援。

吉野博士

李大钊

六月十五日³

致 袁 守 和¹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守和吾兄先生：

久不晤谈，至今想念。独秀被捕，每日设法营救，稍忙，然终未有结果。

各校均已放假，假期不出校么？

前呈去书目一册，如欲购买，即乞与书主接洽，不然乞将书目赐还，以书主催问故也。

暑中佳胜为祝！

弟 大钊敬白

致王若愚、曾慕韩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若愚¹、慕韩²两兄：

我到山中已将旬余，未能修函来告，实以交通不便之故（此间离城十里许，信到京只须一二日，惟此十里许之交通甚缓）。

我所居的地方名叫五峰，距昌黎车站十里左右，在山腹树林深密处，东南可览大海，五峰环抱如楼[搂]，韩文公祠在其怀中。守祠人为一双老夫妇，年近七旬，为我们烧茶煮饭，不辞辛苦。山中饮的是泉水，烧的是松枝，一草一木都有幽趣。兄等盍来此一游？夜间八时由京登车，次晨天明即到，车票三等票现金四元余即足到此，生活费甚简，弟可作主。东行二三站，即是北戴河、山海关，大可一游。

弟 钤白

《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会员通讯]

1919年8月15日

致会 计 课¹

(一九一九年九月)

哲学系学生刘仁静君学宿等费由鄙人暂为担保，一俟家款寄到，即行缴纳不误。此上会计课。

李大钊

致 周 启 明¹

(一九一九年秋)

启明先生：

Malon 与他的 Integral Socialism², 我从经济字典上查得一点, 兹译出寄上, 供参考。

弟大钊

Benoit Malon³ (一八四一——一八九三年)

生于中央法兰西的一个小村, 曾在巴黎当过工人, 一八六六年加入万国工人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在帝政末年间, 同盟罢工与共和党人的运动中, 多有他的活动。他是一八七一年巴黎 Commune⁴ 中的一个党员。失败后逃往 Genoa⁵, 研究社会学者及经济学家的名著。他最佩服的是 John Stuart Mill⁶, 那时他才起首作关于社会问题的论文。后回法国, 创立 Revue Socialiste⁷, 他作编辑人, 是法国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杂志。

Integral Socialism⁸

Malon 作过一本书叫 Le Socialisme intégral, 他是法国集产社会主义派的一个代表者。他对于 Marx 说的那“现在的工人阶级全作资本主义的牺牲, 这资本主义是完全根于滥用工人生产结果的一部分”的道理, 很赞成。但是对 Marx 的唯物史观, 是说人类的历史全部永为纯粹经济的或物质的原因

所决定，却甚反对。他说理想的动机也常可以诱起历史的大运动，所以他主张社会主义的改革，必须是“integral”⁹，换一句话说，就是对于人类精神中所宿有的一切情感的、道德的势力都与以满足。他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一切生产的动因，都成社会主义化。

致 袁 守 和¹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

守和吾兄：

图书馆协会立案，已被教部批驳。前闻人言这是傅次长² 亲自批的，不日把批文抄下寄呈。如何宣布之处，乞兄酌裁。

此问

著安！

弟 大钊顿首

二十九日

致宫崎龙介¹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拜启：

久未通讯，至以为歉！新绿之际，敬祝新运动的隆盛与时俱进。

敝校毕业生方豪、孟寿椿、黄日葵、康白情、徐彦之诸君，赴贵国观光，调查贵国诸大学的学制，并与贵国青年文化团体中诸同学相握手，关于文化上的提携交换意见。诸君多是《新潮》、《少年中国》、《国民》诸杂志的关系者，乞介绍于贵国新派学者、社会运动者，乃至各文化团体中的青年有志。不胜切盼！

宫崎龙介兄

陈启修

陈传贤

李大钊

九、四、二十七

致 宫 崎 龙 介¹

(一九二〇年十月六日)

拜启：

十月七日午十一时，假座香厂六味斋与同志一谈，乞光临为幸！

宫崎龙介兄

小弟 李大钊

致 宫 崎 龙 介¹

(一九二〇年十月七日)

拜启：

九日晚八时顷，请来弟处一谈，为祷！

宫崎兄

李大钊

七日晚

致 周 起 明¹

(一九二〇年十月)

起明先生：

《欧洲文学史大纲》馆中似可收买，但须稍迟，因为经济奇窘的原故。

弟 李大钊

致 注 册 部¹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启者：今日“唯物史观”，因事请假，乞宣布。此上注册部。

李大钊
二十七号

致 钱 玄 同¹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一日)

玄同兄：

仲甫由粤寄来信三件，送上，看过即转交豫才、启明两先生。他们看过仍还我，以便再交别人。

大钊启

致 胡 适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适之兄：

信已传到我手¹。我因为昨天想到你那里去，好带给你看，故未传给他人。不意那位办《北京晚报》的方先生到辛白先生处邀我去谈，所以未得到你那里去。前天见了玄同，他说此事只好照你那第一条办法。但关于研究系谣言问题，我们要共同给仲甫写一信，去辨明此事。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²、研究³、政学⁴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点醋意，真正讨嫌！启明、豫材的意见，也大致赞成第一办法，但希望减少点特别色彩。我三两日得了工夫，一定去看你，好和你谈谈。

守常

复 胡 适¹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²。但如果不及“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

守常

致 胡 适¹

(一九二一年六月中旬)

适之兄：

杜威先生和柯先生的信送上，乞为代覆。杜威先生一信，大致系感谢杜威先生指示我们的厚意，我们自然应该把教育比个人看得更重，不过政府并没有正式向我们表示他愿和解的意思，而且正在那里制造加害我们代表的材料。以后进行，还希望他多多指教。

弟 李大钊

此信不妨稍详，兄可加入些意思。

致 齐 燾 斋¹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穉翁先生尊鉴：

前在电话中曾介绍北大法科毕业生朱君尚瑞堪充英文教员，业蒙允为设法，曷胜铭感。朱君为人笃厚好学，家甚贫苦，在校肄业时，学费由其岳家供给。其夫人为女高师国文部学生，亦在校门墙之列。朱君毕业后，极欲得一职业以自给，免致仍靠亲戚之资助，而奔走以人于政界，既非其心之所愿，又非其性之所近，且不欲脱离于学问。我翁主持四存学校，对此笃实敦厚之才，必愿为之栽植，俾得自尽其能，并得以助进社会，则受赐者，固不只朱君已也。如蒙慨允，即于数日内介绍朱君于先生如何？恳即示复为祷。教潮不日可望结束。哲弟望即通知，属其早日来京可也。

专此即候

近安

晚 李大钊敬上

二十三日

致 周 太 玄¹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日)

太玄吾兄：

久不通信而心常相念，想知己当不以此见怪也！兹有女高师学生林君宝权、苏君梅等赴法入里昂大学，到法时务乞为照拂一切。两君皆研究文学者，关于学问上有所质询，亦请随时赐教为幸！京中教潮已告解决²。愚生方在京，不日当回川也。专此，

即颂

旅安！

弟 李守常

八月初二日

致 蒋 梦 麟¹

(一九二一年十月)

梦麟先生：

滕君统音在图书部专司各系参考室事，昨接星枢先生信称已由聘任委员会存记为助教，此事前曾在总务会议提出两次，均议决以须查明聘任委员会是否通过再下聘书，今既查明已经通过，请即致送聘书为祷！又，装订室校役王君建中（曾在高小卒业）已拨在第二院典书课充试用书记，请通知杂务课及文牍处从停止校役工给之日起，按初级试用书记发薪。又，新聘本校德文系学生向景君为编目课临时书记，专理德文书籍，月薪十五元，自十月六日起来馆办事。兹将启书呈上，乞查收。但敝处尚有事务员高君仁山及书记刘君瑞昌、赵君增选，并未接到此项函件，即希补发至祷！

此颂

公安！

李大钊顿首

致 周 起 明¹

(一九二一年十月)

起明兄：

你的病好了么？前次你给我写信，问仲甫的通信处，我那时亦跑在昌黎山中去了，所以未曾答你。今天接他的信，知道他已回沪，仍住渔阳里二号，有稿即寄这个地方罢。

弟 大钊

复 注 册 部¹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日)

敬复者：陈君德荣在校果系何名，鄙人亦不得知。请函询具名函请蔡先生保释之诸生便知。

此颂
公绥！

弟 李大钊

致 沈 土 远¹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七日)

上远先生：

陈德荣君事，弟探询之结果不得要领，我想由校出一保呈亦无何妨。他们盼望很切，乞即属文牍处拟稿如何？

弟 李大钊

十七日

致校长办公室¹

(一九二二年三月一日)

敬启者：图书馆职员马家骥君久已改为助教，聘任委员会及总务委员会议均皆通过，乞即将薪簿马君名下改为助教为祷！

李大钊敬上

致 孙 伏 庐¹

(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

伏庐兄：

顷接陈仲甫先生来函，内有致起明先生等一函²，属为转登《晨报》。兹特寄呈，乞赐印载，并望转告起明先生。

前托交之《劳动世界》³的译者因患病，拟请“晨报社”先发一部分或全部稿费，能否办到，乞一交涉，电话示知为祷！

原函附呈。

弟 李大钊敬白

致 胡 适¹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适之吾兄：

学潮如何结束？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洛阳²对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昨与溥泉³、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Democratic front)，与反动派决裂。伯兰⁴稍迟亦当来京，为政治的奋斗。《努力》⁵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弟于明日与仲甫赴杭一游，一二日即回沪去洛返京⁶矣。余容面谈，请将此情形告知梦麟、一涵诸同人。

弟 李守常

致 周 起 明¹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

起明吾兄：

昨接胡小石²先生由武高来函云，寒假时当地教职员会拟组织一学术讲演会，属转请吾兄及爱罗先珂先生联袂一行，一切旅费均由该会供给，弟亦拟前往一游。务希俯允，并转约爱罗先珂先生。如何？盼复！

弟 李大钊

致 锡 五¹

(一九二三年一月)

锡五兄²：

弟有武昌之行，兹请兄将赴南洋之两位教员³接洽妥协，即望交付旅费，并函达南洋中学，为祷！琐事奉烦，谅不见却。

弟 李大钊

致 胡 适¹

(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

适之吾兄：

前者路过上海²，曾往西友寓所访兄，以已去杭未遇³。尊恙已痊愈否？念念！

蔡和森君所著之《俄国社会革命史》，《世界丛书》内可否纳入？和森很穷，专待此以为餬口，务望吾兄玉成之。如何？盼你赐覆。校中已决于九月十日举行开学礼，但上课恐须至下月了。

弟 李大钊

致 胡 适¹

(一九二三年十月下旬)

适之兄：

前谈和森君所编之《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已由和森将所取材之书列成一表，现在把他同原稿送交先生，如能收入《世界丛书》，即希示复，以便转达和森！

弟 李大钊

致张溥泉、汪精卫¹ 并附剑云² 函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日)

溥泉、精卫先生：

京、津代表经已选出。京为张国焘、谭克敏³、许宝驹⁴。津为韩麟符、于方舟，余一人不记其名⁵。拟于四日离京，五日由津起程赴沪。特闻。

弟 李大钊

二日

(附言)：

山西未将全体校友加入共同选举。此事尚有问题。俟弟到沪，当将详情报告。外附王君⁶ 报告一份。特先寄呈，备参考。

剑云先生：

今有致溥兄函，乞为转交是幸！

李大钊敬白

二日

致梁瑞麟、吴亚男夫妇¹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

瑞麟、亚男先生：

昨承枉驾并馈食品，谢谢！

“苏州”将于今午十二时启行，预约不克如命矣。由粤归来，再趋访谈。匆匆不尽。

弟 李大钊敬白

致共产国际东方部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亲爱的同志们：

兹去函通知你们，自从通过关于提高党员革命原则和策略的理解水平的决议以来，共产党北京支部执行委员会为了对党员进行更全面和系统的教育，任命了一个党的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党员对党的指示反应相当热烈。

为了使委员会委员和懂外语的先进分子了解得更多，北京支部执行委员会决定建立一个图书馆，以馆藏与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运动有直接关系的图书、小册子、杂志和报刊等。没有一个良好的、可供阅览的图书馆，该委员会及其教育工作几乎很难开展。

鉴于上述理由，请向我们赠送共产国际的所有出版物，并指示出版机构将所有准备出版的新出版物寄送给该图书馆。同时也请向共产国际所属的其他共产党转达我们想与他们交换出版物或免费得到他们出版物的愿望。

如果不能向我们寄送各种语言的出版物，我们希望寄送英语出版物，英语在中国更为普遍。请通过外交邮递寄送。

致以
同志的问候

T. C. Li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致 韦 青 云¹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九日)

青云兄：

兹有国民军第二军骑兵第一旅旅长郑思成君派赴莫京研究政治、军事之学生六名，计开如左方：

王正基 易子琦

刘奉学 任子勋

郑子俊 刘 翊

中有三人拟研究政治，余三人则研究军事。兹特修函介绍，乞为之介绍于外交部安置入学为盼。

军事 { 易子琦 郑子俊
 刘奉学

政治 { 王正基 刘 翊
 任子勋

弟 李大钊敬白

十月十九日

给某同志的信¹

(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

亲爱的同志²：

卡尔甘(张家口)地方党委要求北方区委支付田鹏修、马洁亮、傅恩祖³三同志的月生活费，他们在包头为《新民报》工作。

北方区委认为，这三个同志乃受中共北方区委的派遣做军事工作，由贵方出资支持工作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请做出安排并且对此要求给予回答。致
同志式问候！

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

1926年2月1日北京

李玉贞译

2004年7月

给某同志的信¹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日)

亲爱的同志²：

雷丁³离开此处到天津去了。他临走时托我代为问询：您就为天津工作提供财政支持的问题做何答复（一个月的经费是 1100 美元）？前天我听同志们说，您曾给我寄过一信，但因我当时不在此地，没有收到，也许在那封信里已经回答了。

亲爱的同志，请打个电话或写封信或通过罗森同志告诉我，因为雷丁同志想尽快得到您的答复。致
同志式的问候！

李大钊

1926 年 3 月 2 日

李玉贞译

2004 年 7 月

致 加 拉 罢¹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

尊敬的加拉罕同志：

马龙先生走之前，我和罗森同志决定，由普罗赫穆夫人接替他发送我们的电报，而且必须给她报酬。这一封电报就是她而不是马龙发出的。她想知道，为发电报她能得多少钱？她的月工资又是多少？请将这些情况立即告诉我，然后告诉罗森同志，因为她希望今天晚上就得到答复。 致
同志般的问候！

李大钊

1926年4月10日

李玉贞译

2004年7月

致冯玉祥的密函

(一九二七年二月八日)

奉(张作霖)鲁(张宗昌)孙(孙传芳)三方兵力如下：(一)保定一带有兵五万，后方为万福麟。(二)五原之兵，现调北京，有骑兵四旅，步兵一旅。山西接防包头、五原，有两步兵师，一骑兵师。(三)张家口有两旅。(四)北京有兵一万五千。总计奉军关内兵力，约有十万。至直、鲁军在南京浦口者有一万五千人。在泰安、徐州者有九万人，并有两骑兵旅，天津、青岛亦有若干。孙(传芳)军分二部，总共三万五千人乃至四万人，安徽有三万人以上。奉军作战计划，将出兵河南，但未知各确数耳。奉方出兵，英、日均不赞成之，故奉方财政极为困难。现北伐军用主力攻浙江，入河南者，已有四军、十军与十一军、三军。此军事情形也。

至南方消息，苏联人员仍照旧办事，蒋介石势力亦大。……河南红枪会势力极雄。总之，关于农民运动需设法联络之。

《冯玉祥日记》

1927年2月15日

致 存 哥¹

存哥鉴：

弟于上月底来津，顺抵校，所有一切照拂之处，弟感激在心，自家弟兄亦不必客套也。此问，
近安！

外有信一封。

弟 钊 顿首

致二哥¹

二哥大人鉴：

示悉。此事弟全然不知。彼等狼狈为奸，甚为可恨，惟不知彼等将欲假弟之名作何举动。兄可随时侦察一切，如与弟有干，乞即告知，以便预防，免受其累，是为至祷。匆此，即请近安。

弟钊顿首

联合署名

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发起人启事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

大钊等为便于同人学习法文起见，商请华法教育会会员龚礼南先生，附设一夜班于本校，业经校长认可。凡本校同人及本校同人所介绍者，均可入班。愿学者请至斋务课报名，以便定期开课。

发起人：周同煌、李大钊、段宗林、
李辛白、徐之杰 同启

大学公余法文夜校缘起与简章

近世文明有一最可注意之趋势，即求学业之普及是也。有鉴于寻常教育之不足也，而济之以补习教育、工余教育。吾国古人已有“萤读”、“耕读”之风，皆其先导。今西方教育发展，认此为最要之一，而促其进步之方备至，小而有一二十人夜校之讲习，大而有万国公会之提倡，皆以讲学为宗旨，以惜阴为方法者也。吾北京大学同人以二千计，若干于公务之暇，移其时力于学，所裨于群体与个人进步者，必非浅鲜。兹同人有“大学公余法文夜校”之组织，藉述普通〔及〕之观念如此，并列简章于后，如承本校诸君同抱研究法文之志愿者，惠列大名以为之倡，或别有赞助，皆所感盼。

宗 旨 与 功 用

甲：直接读法文书籍，或备参考，或供译述。

乙：练习会话及通俗文字以资应用。

丙：研究法国之学术与情形，为有志赴法游学或调查者之预备。

组 织 与 教 授

本校由北京大学同志发起，教课由法华教育会会员担任，并常延中西学者轮流讲演。关于本校事务，由同志推举干事部经理之。

本校分为三科：

一、普通法文法语科，第一年。

二、译述科，第二年。

三、语言科，第三年。

卒业分为二种：

甲，在三科中之一科卒业，发给本科证书。

丙[乙]、在三科完全卒业时，以前项三种[科]证书换给全科卒业文凭。

学 期 与 时 间

每年分上下两学期：上学期由1月15日至6月15日，下学期

由 8 月 15 日至 12 月 15 日。

每星期八小时：一、三、五各二小时，二、四各一小时。

资格与介绍

以北京大学同人及同人所介绍者为合格。

学费与报名

每月学费 2 元，全年（九月）共 18 元，分四期交付。入班以前本期学费须一律交清，退学者，无论何故，概不退还。交费期列左：报名时，第一月学费 2 元。二月十五日，第二、第三两月学费 4 元。四月十五日，第四、第五、第六三月学费 6 元。九月十五日，第七、第八、第九三月学费 6 元。入学者及插班者随时均可报名。报名处：北京大学庶务处。

课目与分期

法文科 一学期：字母、拼音、读音、读本，会话、文法、默写。

二学期：读音、读本、会话、文法、默写、作文。

译述科 一学期：文法、字学、读书，默写、作文，译述。

二学期：文法、读书、作文、讲述、译述。

语言科 一学期：读音学、默写、默诵、会话、文法、通译。

二学期：默写、默诵、会话、文法、通译、译述、演讲。

《北京大学日刊》

1918年2月18日

附：

北京大学法文暑假班启事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八日)

本校原有之法文夜班，假期在迩，行将停课。同人等现拟组织一暑假班，以资研习。简章如左：

课程 拼音 句读 读本 文法 翻译 作文

时日 七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每周十二小时，每日上午八时至十时

分班 已习程度甚深或较深者，为甲班；未习或初习程度较浅者，为乙班。前一时教甲班，后一时教乙班。学者，听讲一小时或二小时均听便。

学费 七、八两月现银四元。

报名 报名六月三十日截止。报名处：本校招考新生报名处。

附则 本班原以本校教职员、学生为限，但经本校教职员、学生介绍者亦可加入。

无署名

《北京大学日刊》

1918年6月18日

学余俱乐部征求会员启事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敬启者。同人等发起学余俱乐部。如本校职教员、学员诸君，赞同此旨，愿入本部为会员者，请惠寄台衔，赐交(文学研究所)左翼苍、(图书馆)李守常、(英文研究所)杨真江、(哲学研究所)萧鍊尘、(理科研究所)唐鸿志、(东斋日字号)狄君武、(西斋黄字号)陈乃谦、(西斋)滕统音、(老西胡同十六号)刘光震、(国史编纂处)盛伯宣诸先生处。俟择日再开成立大会。兹将发起简章列后。

学余俱乐部发起简章

第一条 本部宗旨，因本校同人求学余间，藉以联络感情，交换学识为主，不涉校外之事。暂定名曰：学余俱乐部。

第二条 本部地点附设地学会内(东安门内北池子盔头作(胡同))。

第三条 本部会员暂以本校为限。如校外同人，得本会会员介绍皆可入会。

第四条 本部设有各种书报，并随时罗致有关考证之古物及美术品，专供本部同人展览。此外，次第组织游戏部如台球、投壶等类；文艺部如诗社、词社等类。

第五条 本部会员月纳会费一元，由本部按月派人征收。其会员中，现充学员者，会费得减为每季一元，按四季交纳。

第六条 本部于年终及暑假时，燕集各一次，愿与燕者，届时另行组合。

第七条 本部职员应公推正、副部长、常务干事及评议员等，俱一年公举一次。

第八条 本部事务及款项出纳，应由干事员按照议订会章时所定章程办理报告，以供众览。

第九条 本简章未尽事宜，俟征求众意后，再定详细章程，以期尽善。

发起人：吴 梅 冯祖荀 朱希祖
黄 侃 侯 毅 蔡元培
徐宝璜 唐鸿志 马裕藻
马 衡 李大钊 杨真江
邓之诚 叶 瀚 左贯文
童学琦 张相文 肖清海
李续祖 孙诒让 沈尹默
胡 适 肖鸣麟 滕统音
刘光震 盛 锋 蒲寿田
陈钟凡 陈 浏 许绍熙
狄福鼎 陈邦济 夏镜澄

《北京大学日刊》

1919年1月25日

胡适、周作人、刘复、高一涵、 陈大齐、李大钊、钱玄同、唐伟启事

(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

近来有人散布谣言，说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两君，被安福俱乐部收买去了。这种谣言本来不值得一笑，因为安福俱乐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这两位高洁的青年。不幸国中缺乏常识的人太多了，居然有人相信这种谣言，居然有许多通信社和报馆，极力传播这种谣言，我们心里不平，不能不替他们两位辩个清白。

胡 适 周作人 刘 复
高一涵 陈大齐 李大钊
钱玄同 唐 伟

《晨报》

1919年7月6日

举行全校教职员公宴庆祝双十节 启事

(一九一九年十月六日)

径启者。同人拟于双十节举行本校教职员全体公宴，以申庆祝（时间、地点再行决定），届时并有关于全体一二应商之事，欲相讨论为荷。赞成，即当筹备，否则请于七号以前赐函本校庶务处。同人当从多数意见以为决定。此启。

黃右昌	李辛白	马叙伦
马寅初	徐宝璜	刘文典
朱希祖	刘三	马裕藻
李大钊	周作人	沈尹默
黃世晖	沈士远	徐之述
许之埔	胡春林	周同煌

同启

《北京大学日刊》
1919年10月6日

为发起组织李超女士追悼大会启事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苍梧李超女士，幼失怙恃，长受教育，深痛神州女界之沉沦，亟欲有所建树，矢志求学。不幸受家庭之虐待，横被摧残。曩修业于梧州女子师范，广州公益女子师范时，几经艰阻。旋以姊丈之援助，跋涉京华，得受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其家固谓女子无才便是德者，牵制愈力，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已。姊丈筹济备受责言，嫂抱不平几以身殉。女士只身万里，忧愤莫诉，积悲成疾，遽于本年八月十六日赍志以殁，遐迩咨嗟，同深惋惜。同人等谨拟于十一月三十日（星期），在石驸马大街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会追悼，俾慰女士之灵，聊以作生者之气。伏祈各界诸君惠临为盼，如蒙赐以挽章诗文，尤所感激。

发起人：周绍昌 李大钊 陈钟凡
 胡适 蔡元培 毛邦伟
 梁漱溟 罗家伦 康白情
 黄日葵 伍树芬女士
 吴弱男女士 赵炳麟
 关冕钧等四十九人

《晨报》
 1919年11月19日

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做工的穷人，没有力量读书受教育，这不是民智发达上一种缺憾吗？读书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发达，没有职业的流氓越多，这不是教育界一种危机吗？占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父兄养子弟，子弟靠父兄，这种寄生的生活，不但做子弟的有精神上的痛苦，在这财政紧急的时代，做父兄的也受不了这种经济上的重累。同人等因此种种理由，特组织“工读互助团”，来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倘然试办有效，可以推行全国，不但可以救济教育界和经济界的危机，并且可以免得新思想的青年和旧思想的家庭，发生许多无谓的冲突。照眼前试办的预算需费不过千元，凡赞成此举者，请量力捐助，为荷。

发起人：顾兆熊 陶履恭 李大钊
程演生 蔡元培 王星拱
陈独秀 高一涵 胡适
张松年 周作人 李辛白
孟寿椿 徐彦之 陈溥贤
罗家伦 王光祈

《晨报》

1919年12月14日

发起组织北京大学教职员会 启事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我们大家在一个学校里作事，很应该有一个联络情谊的组织，依互助的精神，筹谋本校全体的发展，增益团体生活的趣味。我们曾把这个意思和许多同人谈过，都认为有组织一个北京大学教职员会的必要。现在定于本星期三（即二十一日）晚七时，在第二院（理科）大礼堂，开一教职员全体会，商量商量。请诸位先生预先把组织的大纲想一想，到了那时，务必到会，是我们很盼望的。

马叙伦	李辛白	彭一湖	陈世璋
孟寿椿	朱希祖	马裕藻	孙瑞林
俞星枢	左德敏	郑阳和	李振彝
刘钜锟	汪敬熙	周象贤	张崧年
李大钊	丁绪贤	陈启修	王星拱
唐伟	陶履恭	周作人	龚湘
李大定	段宗林	张承隆	戴嶽
林损	钱振椿	刘三	何炳松
黄右昌	程演生	沈士远	胡适
刘文典	周泽春	谭澄	胡春林
周同煌	沈兼士	钱玄同	陈大齐

徐宝璜 郑寿仁 张大椿 孙 涤
蒋梦麟 姚 憬 马寅初 沈尹默
许文堉 吴继哲 郭须静等公启

《北京大学日刊》

1920年1月20日

北京大学教职员会起草委员会 启事

(一九二〇年二月十日)

(一) 启者：前月三十一日，本校教职员大会议决，暂由前次大会所举出之本校教职员会组织大纲起草员十一人组织临时委员会。同人等即于二月七日开会，举定胡适君担任主席，沈士远、胡春林、李大钊三君担任交际，其余诸君每日由上午八时起至晚十时轮流值班，并于每日下午六时至七时开全体委员会。即于八日起按时在总务处行使职务，至正式会成立为止。惟以同人等能力棉薄，时机又极紧迫，本校同人有愿来此协助者，无任欢迎。

专此，敬颂
时祺

国立北京大学教职员会临时委员

朱锡麟	陈启修	李辛白
俞同奎	蒋梦麟	李大钊
陈大齐	胡 适	胡春林
沈士远	徐宝璜	同启

(二) 启者：一月二十一日本校教职员大会，推定同人等为组织

大纲起草委员会。兹经拟出草案十条，油印附呈尊览。有何意见，乞于一星期内交胡适之先生，以备汇齐，酌加修改，再行奉览。

专此敬颂

时祺

北京大学教职员会起草委员会公启

二月七日

附：

国立北京大学教职员[会]组织大纲草案

一、本会定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教职员会”。

二、本会宗旨：在于本互助之精神、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以补助大学之发展。

三、凡现任本大学教职员者，皆为本会会员。

四、本会采委员会制，设委员若干人，由本校教职员分别投票选举之。委员人数，以会员全数十分之一为标准。每年改选二分之一。

五、本会委员，共分文书、会计、游艺、交际、庶务五组，各组委员，由委员大会互推之。

六、每组委员会互选一人为本组主席。各组主席合组总务会议、总持会议。总务会议设主席一人，由各组主席互选之。

七、本会遇有必要时，得由总务会议召集委员大会，委员大会以委员全数之过半数为法定开会人数。

八、本会每年开全体例会一次。委员之改选，即于例会举行

之。总务会议根据委员大会之议决或会员四十人以上之请求得召集临时全体大会。全体大会以会员全数四分之一为法定开会人数。全体大会，以总务会议主席为主席。

九、本会会员每人每年纳会费现金一元，遇有特别用项临时募集特别捐。

十、本组织大纲得由会员四十人以上之提议，例会列席人数四分之三可决修正之。但此项修正案，须于例会三星期前提交总务会议，由文书委员会印送各会员。

本会会务细则另定之。

(一)本校现有教员二百五十四人，应举委员二十五人；职员一百四十一人，应举委员十五人，共四十人。

(二)按本年委员人数，暂定各组委员数如下：

1、文书九人 2、会计三人 3、游艺十四人 4、交际九人 5、庶务五人

《北京大学日刊》

1920年2月10日

北京大学教职员会筹备选举委员 致黄黼馨等君函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敬启者。本月七日，本校开教职员会立成会，公决“仍推前起草各委员为筹备选举委员。并公决由各委员公请其他教职员会同办理选举事务”等因。查此项事务，极为繁重，同人等能力棉薄，深恐或有疏误之处。夙仰先生热心公益，肆应才长，兹特依据前议，恭请先生为筹备选举委员，以资广益，千祈勿却为荷。

此致

周俊甫、丁庶为、吴善之、柴东生、黄黼馨、杨栋林、许葆初
段之均、马幼渔、杜国庠、刘仲漠、黄幼轩、马夷初、胡壮猷
李伟民、孟寿椿先生大鉴。

教职员会筹备选举委员

陈大齐	李辛白	李大钊
胡适	蒋梦麟	俞同奎
朱锡麟	徐宝璜	陈启修
沈士远	胡春林	谨启

《北京大学日刊》

1920年3月12日

介绍学生工作启事

(一九二〇年四月九日)

现在有一些学生想实行半工半读的主义，用他们的劳力来帮助他们求学的费用。各机关的各位先生，若有学生能做的事，无论短工长工，都请通知下面签名的三个人，并请说明工作的种类和工钱的数目，我们可以介绍相当的人来接洽。

胡适 李大钊 徐彦之同启

《北京大学日刊》

1920年4月9日

图书委员会致校长之 报告书(一)

(一九二〇年五月七日)

- 今将图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决之七项，报告如左：
- 一、预算案内之添购图书费，应定为每年六万元。
 - 二、图书部应设购书课。
 - 三、整理日报目录并添购南方各报。
 - 四、建议总务处组织消防队，以防火险，并从速建筑图书馆。
 - 五、纸片目录，每类应编总号数。
 - 六、各研究所阅览室书籍，均归图书部登录编目。
 - 七、订购书籍之函件，应编号存底。

校长钧鉴。

图书委员会 1920 年 5 月 7 日

图书委员长 顾孟余

图书委员 李大钊¹ 马衡 孙国璋

陈世璋 陈启修 朱希祖

《北京大学日刊》

1920 年 5 月 10 日

原件存北京大学档案馆

图书委员会致校长之 报告书(二)

——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

(一九二〇年五月七日)

今将图书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决之《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十三条，报告如左。

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¹

第一条 本部依本校内部组织试行章程掌理关于图书事务。

第二条 本部设主任一员，由校长于总务委员中指任之，承校长之命商同总务长综理本部事务。设事务员、书记若干员，承主任之命，分办各项事务。

第三条 本部依现有事务之状况，暂设登录、购书、编目、典书四课。

第四条 登录课承本部主任之命，司理左列各事：(1)新书之登录及公布(小册子包括书内，下并同)；(2)杂志之登录及公布；(3)新增书之统计；(4)寄赠书册之答谢及公布；(5)本部各机关报告之检查保存；(6)本部来往文件之掌管(关系典书、购书、编目课

者不属此)。

第五条 购书课承本部主任之命，司理左列各事：(1)本校图书、杂志、报章之购买；(2)送赠书册(卖品及非卖品)之征集；(3)新出书目之征求；(4)购书定单、账目及函件之保存；(5)购书统计之编制。

第六条 编目课承本部主任之命，司理左列各事：(1)书籍、小册子、杂志及图表目录之编纂；(2)书目片之整理装制；(3)图书年报之编辑。

第七条 典书课承本部主任之命，司理左列各事：(1)参考资料之指导及介绍；(2)中外图书及各项杂志、报章之收藏、保存、整理及装订；(3)中外图书并各项杂志、报章之借出及收还；(4)借书账目之编存；(5)借书逾限之催索；(6)各书库及各阅览室之清洁秩序；(7)各种图书、杂志借出及阅览月报及他项统计表之编制与保存；(8)各项借阅书证之发给。

第八条 本部设装订室，司理本部书报之装订。

第九条 本部设打字室，司理本部书目、书单及一切函件之打印。

第十条 本部所属各课得酌量情形，设置领课一员，由一等事务员充任之。书记及装书匠、打字匠得酌量事之繁简随时增减。

第十一条 本部各项办事细则，另章规定之。

第十二条 本条例试行后遇有不适，得由图书委员会提议修正之。

第十三条 本条例经由行政会议通过后试行之。
校长钧鉴。

图书委员会 1920 年 5 月 7 日

图书委员长 顾孟余

图书委员 李大钊 马 衡 陈国璋

陈世璋 陈启修 朱希祖

《北京大学日刊》

1920 年 5 月 10 日

原件存北京大学档案馆

修正教员待遇章程委员会报告¹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评议会长钧鉴：

顷闻评议会将有修正教员待遇规程之举，梦麟等以为凡属校中职员宜受同等待遇，此种规定似宜斟酌周备，俾全校职员均得适用。兹依本年四月一日通过之评议会规则修正案第六条，建议如上，请予提出，不胜盼祷。

蒋梦麟 刘钜锟 章洪钟 许文堉
李振彝 郑寿仁 谭 澄 张承隆
马家骥 周同煌 李辛白 左贯文
汪敬熙 郑阳和 李大定 沈士远
胡祖植 齐吕豫 胡春林 肖清海
李大钊 盛 锋 徐之杰 杨真江
段宗林

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二册

1920年6月22日

争自由的宣言

(一九二〇年八月一日)

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得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来，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我们现在认定，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故把他郑重提出，请我全国同胞起来力争。

(A) 消极方面

一、治安警察条例把人民政治结社、政谈集合、屋外集合、公众运动、游戏、群集、演说、布告和工人聚集、女子参政种种自由交给警察官署去任意处理，结果便把改造社会的政治运动、思想宣传运动、劳动运动、女子运动根本打消，使约法上规定的集会、结社自由成了一句废话。故民国三年三月二日所公布的治安警察条例应即

废止。

一、出版法把人民著作、发行、印刷、出售、散布文书、图书的自由，交给警察官署或县知事处理，不独把宣传文化灌输学术思想的工具完全破坏，并连约法上出版自由也根本消灭。故民国三年十二月四日所公布的出版法应即废止。

一、报纸条例把日刊、周刊、旬刊、月刊、年刊和不定期刊的言论自由，放在警察官署手里，并且先要求许多抵押费，这是中国抄袭日本的特别法律。结果把个人意见和社会舆论的发表权，寄附在警察官喜怒之下，思想既不能自由，舆论也不能独立，约法上言论自由的规定，还有什么效力！故民国三年四月二日所公布的报纸条例应即废止。

一、管理印刷业条例把印刷局的营业自由完全剥夺，使约法上营业自由，全归无效。故民国八年所公布的管理印刷业条例应即废止。

一、预戒条例中所举的犯罪事件，如破坏社会道德，阻挠地方公益等罪名，范围标准都由警察厅或县知事决定；并且不限于已经犯罪的人，便是警察厅、县知事认为“欲行”犯罪的人，也一律适用。凡受预戒令的人，居住、迁移、职业行动都不得自由，与约法上居住、迁移自由的规定完全相背。故民国三年三月三日所公布的预戒条例应即废止。

一、戒严令第十四条规定事件，凡人民、身体、家宅、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书信秘密、居住迁移和财产营业等自由，没有一件不被干涉。这种重大的问题，断不可让行政官自由处置。应该要求：以后如果不遇外患或战争已经开始的时候，不得国会、省议会议决，或市民请求，不得滥行宣布戒严。

(B) 积极方面

一、下列四种自由，不得在宪法外更设立制限的法律：

- (1) 言论自由；
- (2) 出版自由；
- (3) 集会、结社自由；
- (4) 书信秘密自由。

一、这几年来，行政官厅和军警各署对于人民，往往不经法庭审判，擅自拘留，或擅自惩罚，把身体自由权剥夺净尽。应即实行《人身保护法》，保障人民身体的自由。

〔附注〕：《人身保护法》便是英国的 *Writ of Haleas Corpus*，章秋桐译为《出庭状》。该状有几层用处：(1) 出庭状有一定的格式，英国是由高等法院(High Court)发出来的。如果受违法的拘留时，不但本人可以请求，便是亲友或相熟的人也都可以去领。(2) 拘留人的人接到这状，便要立刻将被拘留的人交出。(3) 被拘留人一经出庭状发出，无论生死都要交到法庭去依法审判。(4) 法院既受人请求，应该即刻发出出庭状，不然便要重罚；受出庭状而不将被拘留的人交出者，也要重罚。故这种法律是救济违法拘人的最周密的方法。

一、这几年来选举舞弊可算是达到极点，应由无党派关系的公民组织《选举监督团》，于选举时实行监督；并公请律师，专调查犯罪证据和管理诉讼事项。

胡适 蒋梦麟 陶履恭
王徵 张祖训 李大钊
高一涵

《晨报》

1920年8月1日

提倡临时国民大会启事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敬启者。自顷政局更新，国事诸待解决，国民大会之主张，遂为舆论所公认。本校教职员及学生，亦有热心研究者。同人等窃谓兹事体大，既未便放弃天职，存而不论，又不宜掉以轻心，反滋贻误。爰就所知，邀集谈话，蕲于交换意见，有所折衷。讨论结果，以为时论之对于国民大会，大率着重法律问题（如修改约法及制宪等等），此固国本所关，至为紧要。然使国人心目中热望兴革之政治诸问题，尚未解决，则即使正式国民大会果能成立，而武力干涉，金钱运动之历史，必不免于重演。此国民大会怀疑论所由起也。故同人等主张：先行提倡临时国民大会，解决目前切要事件，庶不致筑室道谋，坐失时机。兹将拟就之临时国民大会提案七条，逐加说明，别纸录附。此不过同人等个人之主张，当否，尚难自信。兹谨函达台端，征求同意，如荷赞可，即乞于函到五日内示复（请亲笔署名，并注明住址），交汉花园北大第一院收发课汇存。再用全体赞成人个人名义，通告京内外各学校及各界团体，以资联络而便筹备。专此布达，即颂
台祺。并盼答复。

王文彬 黄右昌 李大钊
廖书仓 何恩枢 蔡元培

沈士远 蒋希曾 孟寿椿

罗文干 胡春林 谢绍敏

陈启修谨启

九年八月二十日

临时国民大会提案七条

(一)解散非法国会，并不承认非常国会继续存在。

(说明)非法国会——即新国会——产自非法，根本不能成立。非常国会——即旧国会——已失时效，当然不能继续存在。

(二)肃清祸国党孽。禁止起用复辟帝制犯。

(说明)安福祸首虽经拿办，而平日依托党籍卖国自肥者，亦应分别惩办，以儆效尤。又，复辟(犯)帝制犯，均罪在不赦，永不得再行起用。

(三)裁减军队。废除督军及与督军同等制。

(说明)军队原以御外侮，而我国则以军队酿内乱，亟应裁减以轻人民负担。督军、巡阅、军区长以及其它同等军阀制度，均应一律废除，以符民治精神。

(四)凡国民应享之一切自由权利，禁止侵犯。

(说明)凡载在约法之身体、言论、出版、集会一切自由，均应得绝对的保障。

(五)实行地方自治，并得由各地方自行编练民团。

(说明)地方有编练民团权，庶足防兵匪侵害，而举自治之实。

(六)公布国家会计。禁止秘密借款。

(说明)民国财政，人民罔有闻知。一听奸人滥借外债，咸归中饱，饮鸩止渴，可为寒心。嗣后岁出岁入亟应公布，预算决算，亦须

依法办理，并严禁秘密借款，以妨贪冒。

(七)根据民意决定外交方针，并取消一切卖国密约。

(说明)我国外交素为少数人所把持，丧权辱国，殊堪痛恨。以后外交，务须根据民意办理，庶免奸人操纵。所有二十一条与军事协定以及其他卖矿、卖路一切密约均取消之。

《北京大学日刊》

1920年8月21日

北京大学赈灾会启事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今年北方旱灾，异常重大。灾区有五六省之广，灾民有数千万之众，无衣无食，道殣相望。瞬届寒冬，苦痛尤甚。窃思此等难民同属国民分子，坐视不救，夫岂人情。同人等念责任之所在，用特组织斯会，仰祈本校全体赞助，慷慨认捐，以尽互助之谊，无任祷荷！此启。

九·九·一六

△认捐办法：

假定教职员学生每人认捐以一元为单位（多多益善），教职员认捐者，交由会计课代收；学生认捐者，交由斋务课代收。俟集有成数，届时如何赈放，再行公决。

发起人：蔡元培 蒋梦麟 沈士远

李守常 顾孟余 李辛白

马叙伦 胡适等三十人

《北京大学日刊》

1920年9月23日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 成立通告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本会于本月 2 日正式成立。编译丛书及请名人讲演，均在积极进行中。特先将简章宣布如下：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简章

(一)宗旨 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二)定名 暂定为“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会员暂时限定北大同学)。

(三)方法

1. 文字宣传

- A. 编译社会主义丛书：甲种(大丛书)、乙种(小丛书)。
- B. 翻译社会(主义)研究集。
- C. 发表社会主义论文。

2. 讲演

(四)会 员 对于社会主义有信仰和有研究能力的北大同

学，由本会会员介绍或自愿入会，均经全体会员通过加入。

- (五)出 会 会员因(1)自愿、(2)信仰变更、(3)于一年期内对于本会无所贡献者，得自由或由本会认为退会。
- (六)职 务 会务由全体会员负责，采轮流或自由担任制度。
- (七)所得捐 会员用本会名义发行之书报或论文，所得报酬应抽百分之五为本会会费，又百分之五为公共购书费。
- (八)特别捐 会中遇有特别需款时，用绝对自由的方法，征收特别捐。无入会金及常年捐。

(依姓氏笔画繁简为序)

李大钊(守常) 何恩枢(北衡) 徐其湘(六几)

陈学池(儒康) 郭弼藩(梦良) 陈顾远(晴皋)

费秉铎(觉天) 鄢祥禔(公复)

通信处 本校第一宿舍郭梦良处

《北京大学日刊》

1920年12月4日

《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我们起意编辑这个丛书，不外以下的三层意思：

一、想普及新文化运动。我们认为未曾“普及”而先讲“提高”，结果只把几个人提高罢了，一般人民未必得到益处。我们又信一个社会里，大多数的人民连常识都不曾完备的时候，高深学问常有贵族化的危险，纵有学者产生，常变成了智识阶级的贵族，所以觉得新文化应该先求普及。

二、为有志研究高深些学问的人们供给下手的途径。这是和上面说的一层互相关连的。“普及”两字，在别一意义上就是筑根基。各种讲科学讲思想的入门书，在现今确是很需要，便是主张“提高”的，这一步也是跨不过。

三、想节省读书界的时间与经济。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不但进学校读书的权利不是人人都有，就连看点自修书的时间和经济，也不是人人都能有的。这个丛书的又一目的，就是希望能帮助一般读者，只费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代价，去得较高的常识和各科学的门径。

这就是我们编辑这个丛书的一点意见了。关于编辑方面的办法，下面说明。

一、定名：本丛书定名为《新时代丛书》。

二、宗旨：本丛书以增进国人普通知识为宗旨。

三、内容：本丛书内容包括文艺，科学，哲学，社会问题及其他日常生活所不可缺乏之知识。不限定册数，或编或译，每册约载三万字。

四、编译：由同人组织“新时代丛书社”，社员负责。社外著作如合本丛书之性质，而愿让与本社出版者，经本社审查后，再议条件。

(通讯处)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一零八号转“新时代丛书社”、商务印书馆。

编辑人(以姓字笔画繁简为序)

李大钊 李季 李发 李汉俊
邵力子 沈玄庐 周作人 周佛海
周建人 沈雁冰 夏丏尊 陈望道
陈独秀 戴季陶 经亨颐

《晨报》

1921年6月28日

致北京大学教职员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八日)

本校教职员诸君公鉴：

敬启者。本校教职员会推出之临时委员会，自经大多数委员相继宣告辞职后，几于无形消灭，对内对外均无从负责。现在教育经费又生问题，若不将此若有若无之临时委员会告一结束，恐致有误进行。兹定于本月十日（星期六）下午二时在第二院大讲堂开本校全体教职员谈话会，俾弟等得以报告经过之情形，而诸先生亦得以讨论善后之办法。事关公共，敬希賡临。

王绍瀛 周象贤 同启
王星拱 李大钊

《北京大学日刊》

1921年12月8日

“俄国灾荒赈济会”启事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敬启者。现在俄国窝瓦河两岸，有一千五百英里大的地方，因旱成灾，看着就要饿死的人，三四千万。较比去年中国北五省的灾荒还利[厉]害。甚至数百万的灾童，拔野草，割树皮，制成草面包，以充饥肠，不是病死，就得饿死，你说可怜不可怜呢！去年中国被灾，各省的难民，若不是仗着慈善各团体，千方百计的筹赈，不知得饿死多少。但凭中国人自己筹划，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幸赖有各友邦的慈善大家，体上帝救世之心，实行人道主义，极力来帮忙，才救了许多的生命。今年俄国有这样大的天灾，各国均已发起救济的义举，派人到灾区放赈去了。我国人最富于慈善性，凡是亲仁善邻，救灾恤患，一切美德，从不让人独步的，所以，同人等也发起了一个救济俄灾的团体，名曰俄国灾荒赈济会。期望着各大善人提视世界如一家，凡自己力量所能办到的，竭力提倡。虽然今年中国被水旱灾七省之多，也得想办法来救，是不是还得求如各友邦帮助呢？要是先顾自己，不管他们的死活，不独于理不顺，问心也有不忍。敝会为此恳求诸公大发慈悲，一面对于本国的灾荒，急谋救济；一面对于俄人的痛苦，更当加以援助。须知恤邻，即为爱国，济人之急，正是为自己造福。现在都知道维持国际的名誉，这救济俄灾，正是国民的外交。有钱的乐善好施，十百千万的捐款，固最好不过了。就是各界中人节省一点用费，或是一元半元的银洋，或是

几个几十个的铜元，聚少成多，亦不无小补。古人说，当仁不让，愿各慈善大家，量力捐款，救了我们的邻国三四千万待死的灾民。敝会同人全体为此捧着满腔的同情，向你们各位慈善家恭恭敬敬的求告，又向你们感谢。并且愿各位慈善家在自己所想望的以外，还得着多少善的果！

本会董事长 熊希龄

黎元洪 颜惠庆 蔡元培 齐耀珊

张志潭 王迺斌 王芝祥 叶恭绰

田中玉 高凌蔚 潘 复 刘 芳

张英华 王景春 李大钊 高一涵

胡 适 沈士远等(174人)公启

《北京大学日刊》

1922年2月28日

出席北京市教职员联席会议代表 紧要通告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三日)

启者。交部对于教育经费，延不拨付，现已积欠将及三月，而财部对于阁议议决“俟关税实际值百抽五时，每月加拨八校经费十万元”一案，又行推翻。联席会议遂于本月十日开会讨论办法，议决议案两项及提案一项如下：

议案二项：

(一) 交通部每月拨付教育经费二十二万，由关税实行值百抽五时起，改由关税项下直接支付。

(二) “关税实际值百抽五时每月加拨八校经费十万元”一案须即实行，并随同上项之二十二万元由关税项直接支付。

提案一项：

(一) 要求政府将两个月又七成之积欠，于三月十五日以前扫数拨清，若无圆满结果，则教职员对于学校不负责。右项提案，由出席代表各回本校开全体大会，征求同人意见，方能取决。

兹定于本日(十三日星期一)下午四时在第二院大讲堂开本校教职员全体大会，以定办法。事关重要，务望同人拨冗，惠临为盼。

联席会议本校代表

李大钊

王星拱

王绍瀛

周象贤 同启

《北京大学日刊》

1922年3月13日

我们的政治主张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我们为供给大家一个讨论的底子起见，先提出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张，要求大家的批评、讨论或赞助。

(一) 政治改革的目标

我们认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认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

(二) “好政府”的至少涵义

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 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 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 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我们对于今后政治的改革，有三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四) 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具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我们应该回想，民国初元的新气象，岂不是因为国中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的效果吗？当时的旧官僚很多跑到青岛、天津、上海去拿出钱来做生意，不想出来做官了。听说那时的曹汝霖，每天在家关起门来研究宪法。后来好人渐渐的厌倦政治了，跑的跑了，退隐的退隐了，于是曹汝霖丢下他的宪法书本，开门

出来了；于是青岛、天津、上海的旧官僚，也就一个一个的跑回来做参政、咨议、总长、次长了。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部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够了！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五)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的意见

我们既已表示我们的几项普通的主张了，现在我们提出我们的具体主张，供大家讨论。

第一，我们深信南北问题若不解决，一切裁兵、国会、宪法、财政等等问题，都无从下手，但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们主张，由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一切暗地的勾结，都不是我们国民应承认的。我们要求一种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暗中的勾结与排挤是可耻的，对于同胞讲和并不是可耻的。

第二，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但像前三年的分赃和会是我们不能承认的。我们应该预备一种决战的舆论做这个和会的监督。我们对于议和的条件，也有好几个要求：

- (1) 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因为这是解决国会议题的最简易的方法。
- (2) 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
- (3) 和会应协商一个裁兵的办法，议定后双方限期实行。
- (4) 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

第三，我们对于裁兵问题，提出下列的主张：

- (1) 规定分期裁去的军队，克期实行。
- (2) 裁废虚额，缺额不准补。
- (3) 绝对的不准招募新兵。
- (4) 筹划裁撤之兵的安置办法。

第四，我们主张裁兵之计，还应该有一个“裁官”的办法。我们深信现在官吏实在太多了，国民担负不起。我们主张：

(1) 严定中央与各省的官制，严定各机关的员数。如中央各部，大部若干人（如交通部），中部若干人（如农商部），小部若干人（如教育部）。

(2) 废止一切咨议、顾问等等“乾薪”的官吏。各机关、各省的外国顾问，除极少数必需的专家之外，一律裁撤。

(3) 参酌外国的“文官考试法”，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与升级办法。凡属于“考试任官”的，非经考试，不得委任。

第五，我们主张现在的选举制度有急行改良的必要。我们主张：

- (1) 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
- (2) 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应参考西洋各国的选举舞弊法（Corrupt Practice Laws），详定细目，明定科罚，切实执行。
- (3) 大大的减少国会与省议会的议员额数。

第六，我们对于财政的问题，先提出两个简单的主张：

- (1) 彻底的会计公开。
- (2) 根据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

以上是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几个主张。我们很诚恳的提出，很诚恳的请求全国的人的考虑、批评、或赞助与宣传。

提议人	职业
蔡元培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王宠惠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罗文幹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汤尔和	医学博士
陶知行	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
梁漱溟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李大钊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陶孟和	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朱经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张慰慈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高一涵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徐宝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王 征	美国新银行团秘书
丁文江	前地质调查所所长
胡 适	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

附白：一切赞成与反对的言论，我们都很欢迎。请寄到努力周报社，或寄给提议人。

《努力周报》第2期

1922年5月14日

《东方杂志》第19卷第8号

1922年4月25日

出席八校联席会议代表 启事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敬启者。弟等出席八校教职员联席会，原系由于本校教职员代表临时委员会之委托。嗣后，委员会多数委员相继辞职，委员会久已无形消灭，是弟等出席代表之资格久已不存。惟以本校教职员大会虽曾开会数次，拟改选代表，而到会者，总未能达到法定人数。在此期间对外对内苦无接洽机关，弟等只得权负此责。今弟等既依八校联席会议之议决，辞去代表之名义及职任，断无再行滥竽之理。是以再次声明，敬请同人速开大会改选代表，出席联席会，以免贻误会，是为至要。谨启。

王星拱 王绍瀛 同启
李大钊 周象贤

《北京大学日刊》

1922年4月26日

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同人提案

——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
(民主主义)

(For Revolutionary Democracy)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

朋友们：

这次杭州盛会，北京同人因种种原因未能参与，引领南望，能不依依？我们认这次大会，不仅是联络会友感情，乃为求彼此意见一致而讨论几个根本问题，所以我们虽未到会，我们很愿对你们的讨论贡献我们的一点意见。如荷你们的多数赞同，请共同签名在月刊上发表。

下面便是我们的意思。

我们现在不谈任何主义，我们只研究中国目前的事实问题，只看他要求于我们的是哪一种，是政治活动，抑或社会活动？凡是此时住在中国的人，我们想，恐怕没有不感觉武人的横行和人民所受的困苦的。军阀盘据在各省，各省的财权、政权悉归于他们的掌握。他们录用一般趋炎附势藉公肥私的官僚，豢养一群毫无纪律的土匪式的兵士。他们为保存他们的势力和他们的一大群寄生阶级，遂进而横征暴敛。他们因军队太多，一省地盘不足，遂迫

而侵略邻省。于是教育经费被挪移了，实业经费被侵吞了，将各种为公共事业而用的财源都集中于养赡游民和争夺地盘之用。战争的荼毒，勒索的淫威，兵匪的横行，将中国的工商业摧残殆尽，以致毫无发展的余地，只得苟且偷生。言念及此，我们真觉不寒而栗了。

中国内政腐败既已如此，而同时外国资本挟政治势力以俱来。以金钱贿买，以武力威吓，他们从中国的军阀与官僚手中，将中国利权劫取无余。复束缚我们海关订税的自由，享受豁免厘金的权利，更能避免去兵匪的滋扰。他们挟几十年休养的雄厚的资本主义，以与在种种束缚之下的我们新兴的资本主义竞争。为防止我们民众的勃起，乃维持扶植腐败的北方政府（如日本借款给北方讨伐西南），使中国永远在军阀互争之下不能崛起，他们也可永远遂其劫夺。近又为调解国际间的资本竞争起见，成立新银行团，召集华盛顿会议，希图以协和的国际资本主义代替互相竞争。在这样情状之下，我们内受军阀的滋扰，外遭国防[际]帝国主义的胁迫，我们的经济日渐枯竭，生活的程度日渐增高，于是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沦落无已，直到奴隶的生活为止了。

这样物质的束缚，影响及于精神，他在道德上的表现是缺乏振作的精神，奋斗的意志，大多数生活不安，自顾不暇，所以同情心消失，合群性沦亡。他在知识界的表现是知识贫乏，缺乏活气，大多数既奔在衣食，日营“从手到口”的生活，何能更有余力研究学问？道德、知识两俱缺乏，这便是今日惰性的中国，也就是今日麻木不仁、死气沉沉的社会了。

我们认这种社会，不是以空泛的道德目标和不实用的科学常识所能征服的，而且除非物质生活的改善，永远不能将他完全征服。改良物质生活的惟一方法，是只有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的这二重的障碍，由中国人开发本国的实业。我们要贯

彻这主张，势惟有向保护督军制和国际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举行斗争了。我们惟一解除苦厄实行的方法，是只有引导被压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

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人民为最切近的利益奋斗，在群众集会、示威运动、游行、煽动、宣传、抵制这些具体事实当中训练而团结自己，扫除与群众不相容的习惯和道德，吸收富于活气的实际的知识。因为与共同的仇敌作战，养我同仇敌忾的精神，锻炼了互助的能力。这样有价值的经验的获得，将远胜于读书万卷和教育十年了。

在现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势力，以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加速度破坏人类生活，将人类境遇愈陷于悲境，将人类道德愈约成服从的奴性的道德的时候，我们对于他不敢而且不想动他分毫，要学脱尔斯太慢腾腾的以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减速度做不干涉政治的“小学教师”式、“园丁”式的社会运动，还侈言创造少年中国，这真是甚于希望以若干人的唾沫便可扑灭燎原之火了。倘使少年中国（不）因此侈谈而（不）得创造，我们也就延宕少年中国的运动，成了少年中国的罪人了。

希望以社会运动教育全体人民，待全体人民觉悟后再谋政治运动，推翻恶政府，这永远是一不可能的幻想。在社会上尚有不平等阶级之时，被压的民众，永远没有全体意志之可言，一部分的民意总要被治者阶级所收买或威吓。俄国的农奴有反对农奴的解放的；林肯（解）放黑奴而黑奴反对者颇不乏人；俄国帮助撒的人民名为 BlackHundreds（黑群众）；湖南的人民竟有替张敬尧请愿者。只有真的革命家他不顾退化层的人民的反对，径引导一般最有觉悟的群众向前斗争，以冀顽固的人民的归附。我们如若死守或全体参加政治活动或不参加的教义，这只是一种怯懦的心理，只是不敢以少数与最有势力的权威对抗罢了。况且，照不问政治的社会运

动者的想像，社会运动不直接与军阀冲突，怎样可以一时大显灵异将黑暗政府扫去无余呢？

我们鉴于中国(国)内军阀政治的横暴，国外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将中国改良的各种希望都澌灭殆尽了。我们不能忍了，是有诚意改革社会的人们都应该不能再忍了，起来引导民众，打倒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啊！

任何主义者，我们以为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查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United Front)，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朋友们，我们再不能延宕了，我们不能再使内部分裂，反与敌人以可乘之隙了。

我们不是奴性主义者，绝不相信军阀能实现民主政治，因为这就是说，军阀可以扑灭军阀政治，也就无异说君主可以废除君主专制政体，资本家可以废除资本主义了。我们不是改良主义者，也不相信不破坏这制度，加入军阀或官僚阶级中，即可将他改变过来实现我们的主义，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是个人而是制度的本身。我们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要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主义，要连根带蒂的拔除督军制度以实现民主主义。在这一点，我们根本上不信任北洋军阀可以改造中国。

中国的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始终不为军阀的威力所屈服(虽然有人认他们联段、联张是放弃主义，是屈服于军阀的武力，但我们只承认他是一种战略，是可以容许的)，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革命精神。他们在广州近两年来的施设，如废止治安警察法，承认工人罢工权，振兴市政，发布工会条例，办理外交不辱国体等，也可证明他们还是民主主义者，虽然他们常为军阀所驱逐(袁世凯、陈炯明、陆荣廷等)以至失败，然而这是我们人民不能帮助他们的原故。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

不可取旁观的态度，因为像这样，便是间接的扶持或默认反动阶级的利益了。

少年中国学会是知识阶级的团体。知识阶级在中国，只有三条道路：第一是替治者阶级的丑行做知识上的盾牌，替治者阶级用深渊的学识解释、辩护他们的一切罪恶。第二是不干涉政治，任军阀残暴而不敢抵御，自己却以“到民间去”安慰自己，间接延长军阀统治的寿命。第三是引导少数觉悟的民众在各种事业中与军阀代表的黑暗势力奋斗，唤醒国人的同情。朋友们，你们创造少年中国到底走哪一条路呢？

少年中国的文学家啊！你们不是因为要创造少年中国，所以创造动人的文学以冀民众的觉醒么？但是你们若不加入革命的民主主义运动，不更在实际活动的范围[围]中指导他们，民众虽由你们得了感情的激发，他们或者将陷于没办法的境地，或者流于无结果的暴动了。

少年中国的科学家啊！你们不是想（在）在中国发达科学、普及科学教育么？你们的同胞现在正为奴性和因袭思想所支配，他们现在只能终日营“从手到口”的生活，他们要你们先将他们从物质生活的羁勒中解放，再来领受你们的精神粮食啊！

少年中国的工程师和实业家啊！你们不是要创造一个工商业发达的中国么？你们的机会、地盘全遭军阀和国际的帝国主义所蹂躏或强占了，你们还不起来收复么？

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学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了！

黄日葵 陈仲瑜 邓仲解[澥]

刘仁静 李大钊 沈昌

《少年中国》第3卷第11期

1922年6月1日

谭陈纬君夫人行状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夫人姓陈，名玉凤，字纬君。以民国前十五年（一八九七年）三月十七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之太平。父根瀛公，母何氏，皆广东新会人。根瀛公以经商游南洋，至马来半岛，见锡矿丰富，因招工开采，择太平、毗叻屿二处而家焉。夫人五岁即入家塾就学，七岁转入毗叻屿之中西女学，喜读英文，尤嗜美术（图书音乐）。爱父母甚笃，课余尝助父母料理家务，处事公正，家中无论长幼咸畏敬之。十二岁随母氏回粤，入广州坤维女子师范；十五岁以校中教务发生问题，转学于圣神女学；嗣以坤维教务长杜女士组织公益女子师范，因复转入之。夫人当此时期，读书酷好历史，尚论古人，严于褒贬，文稿多载公益同学文编中。夫人在校，为师长及同学所爱戴，年虽稚而皆以长者待之。前清季年，夫人尝与乃姊汪陈璧君夫人，偕作革命运动。在香港秘设机关部，以夫人年方幼，不易惹人注目，同志辄请夫人居其中以守之。夫人临事勇往，不稍怯。民国四年冬，乃姊璧君夫人及姊丈汪精卫先生赴法，夫人亦同往游学，时年十九岁。夫人留法约五年，专习油画，以其性好之故，旁及音乐文学。夫人在学校时，好学精勤不倦，虽疾苦无稍辍。平居习作诗词以为畅舒性灵。二十一岁与吴县谭仲達先生结婚于法国之波铎城。二十四岁偕仲達归国，是年五月，同来北京。事姑亦至孝。今年三月十七日以喉疾及猩红热症，痛故于京寓，时年二十六岁。遗

子一，名伯鲁，二岁；女一，名筱纬，时仅二月。夫人性和蔼，庄静，不苟言笑；尚勤俭，而深恶奢侈奇异之习尚；为人克己，而待人处事皆极宽厚，虽仆役偶有过失，夫人亦皆以婉言正之。择友极严，不问男女，非道德高尚者不与友。夫人颇鄙视政治运动，而重视社会事业，于教育尤具热望，轻官吏与议员为不屑道。方期天假之年，为中国女界作之楷模，今乃不幸以染疾不治，与兹世长辞！呜呼痛已！

沈士远 萧友梅 李大钊 李四光
蔡元培 丁燮林 李煜瀛 李麟玉
王世杰 张竞生敬述

民国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北京大学日刊》

1922年6月24日

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启者，陈独秀君为社会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虽了结，而关于讼费及销毁书籍纸版损失在二千元以上。陈君清贫，同人深悉，遭此厄运其何以堪。凡表同情于社会教育思想有[自]由，及与陈君有旧，愿解囊相助者，上海希交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高君曼，北京希交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收转为荷。

蔡元培 李石曾 蒋梦麟 胡适
邓仲澥 刘仁静 张国焘 高尚德
李大钊 林素园 范鸿勋 黄日葵
蔡和森 缪伯英同启

《晨报》

1922年9月24日

致北京大学全校同人

(一九二二年十月七日)

全校同人公鉴：

国庆日，北京学商各界为促进裁兵起见，举行群众运动，已指定本校为北队出发点。元培等希望全校同人加入北队。特于八日（星期日）午前十时在第三院大礼堂开会讨论。届期务请教职员诸君及学生诸君全体到会。

蔡元培 胡 适 蒋梦麟
丁燮林 李煜瀛 谭熙鸿
李四光 李大钊 颜任光
李麟玉 王世杰 周 览
沈士远 白雄远 同启

《北京大学日刊》

1922年10月7日

致孙中山的信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北方的政治危机正处于最后阶段，很快即可见端倪。公众舆论表示出日渐增长的积极性，这给我党的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时机，我们万不可坐失。我们以国民党员身份要求您裁决下列两个问题：(1)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为此，应特别注意北京、湖北、湖南、上海和广州等地。如果这些中心地区的组织不完善，整个工作就会肤浅分散。(2)最近的北京危机不是近几天来事态发展的结果。早在黎元洪在北京出任总统前曹锟就觊觎政权。安福系(段祺瑞)不能与直系和解。吴佩孚、冯玉祥与曹锟的关系和黎元洪、张作霖与段的关系实质相同。甚至即使派系内发生什么变化，其斗争也仍将是在北洋军阀头目曹锟和段祺瑞之间进行。这场斗争与民国的改进并无关系。直系是我党的敌人，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能屈从于段和黎元洪。再者，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旧军队有 10 倍于我们的兵力，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的新军队将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起初，

我们的力量不会强大,但我们会发展成一支劲旅。列强每天都在处心积虑剥削我们并寻找一个强有力的人作他们的代理者。用空话央求他们的承认来壮大我们自己,不仅会伤害我们的运动,而且会丧失革命气节。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议会在全国人民眼中一钱不值,北庭会议是曹、吴豢养的,如果我们试图让国会议员来穗,那么人民怎么能把我们看得比吴和曹锟好呢?

南方诸省的将领们扩张军队、压迫人民而犯下的罪恶并不比北方军阀稍逊,即令我们把这些人烧掉,在他们的骨灰里也找不到丝毫的革命民主的痕迹。即令我们用一切办法把这些将领们联合起来,那么南北方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而绝不会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我们岂能让千百士兵为此丧生并把沉重的负担加于百姓身上?这样也还会有危险,即因为我们在这一隅的地方主义而把国民革命的速度减缓下来。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广州的战事,这样我们才能在国家政局危急之时去胜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不能囿于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国的工作。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如先生在“五权宪法”中所阐述,而不只限于群众游行),这样,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一支国民革命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不会丧失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居于首位的重要任务,惟有您可为之,因您是4年前护法运动的领导者。我们深知中国尽快获得解放和我党获得发展的必要性,特致函先生,望能采纳我们的建议。盼复。

这是中共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人以国民党员身份致孙中山的信。译自斯内夫特档案第 280 号德文打字件，是斯内夫特从英文译为德文的。由 H·马林寄给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越飞和达夫谦。信的发出日期为 1923 年 6 月 25 日。

——编者

附：

马林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
越飞和达夫谦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

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5 名委员以国民党员身份就中国的政治危机事今天寄给孙中山信的德译文寄给你们。李大钊和陈独秀同志仍在设法同孙谈一次话，尽快做出一个决定。关于这件事，我早已经常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谈过。如果这些人和孙一道不能同意朝新的方向前进，因为他们至今还不相信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有群众基础的党，李大钊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其他同志就要着手去把国民党的地方支部争取过来，采取党的这个新策略。

此致

共产主义敬礼

H·马林

1923 年 6 月 25 日广州

致顾少川、王儒堂言宜即 宣布恢复中俄国交书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

少川、儒堂先生：

顷者，俄国革命，国体变更，中俄邦交，因以暂辍。然此乃事势所趋，国际常例，苟其主体已定，则邦交自当随复。若夫或有日月之延，踌蹰之虑，所以观其统治之力，而察其主体之固定与否。诚以玉帛既将，则信誓无更，谨之于前庶以寡悔，非谓一旦解携遂无复合者也。俄自革命以还，既有年所，曩者犹有旧党扰攘，可以却虑，比则苏维埃共和国已大联合，其四境已谧，寇逋就除，人情趣一，主体固定，旧复何所审顾？而俄使三至，讫无酬答，所以海内怀疑，或受牵制。抑苏俄以平民革命推覆帝政，纵其为治方略，未与我同，此其国内之情，无涉邻与。言其显扬民治，实吾良友。况俄之与我经界相毗，不徒念鲁卫之政，宜先诸国复其故交，即援连疆之谊，亦当应其嚶鸣。至于迩来外交之术，每于国交回复之际，辄有要求附之条件，揆之法理，难为一谈，违理之行，岂宜率效。况俄之于我，互助之勤，亦屡宣布，苟相与以诚，何至食言，若先以利合，后图未可必也。所以思维再三，金谓宜绝瞻顾冀望之怀，立遗尺一复，续两国之交。先民有言，当仁不让，梦麟等欲言之执事者有日矣。以为执事折冲樽俎，见岂不同，而乃声闻久寂，似畏前驱，今者

着吾先鞭者已二国矣，宁当复使超轶绝尘而甘局促自后于人哉。扬国声而辑与国，惟执事之是图。专此布臆，顺颂健安。

署名：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蒋梦麟 陈大齐 王星拱
沈尹默 张竞生 胡适
顾孟余 汤尔和 马叙伦
李煜瀛 马裕藻 沈上远
谭熙鸿 李大钊 朱希祖
沈兼士 陈源 丁燮林
陶孟和 周作人 林玉堂
周览 皮宗石 郁达夫
江绍原等四十七人

1924年2月15日

原稿复印件存北京大学档案馆
卷号 Z11·18

《晨报》

1924年2月16日

致 顾 外 长 函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三日)

少川先生大鉴：

前因回复中俄国交，奉书略陈鄙见，已荷垂赞。比闻王儒堂先生与俄国代表会商结果，不徒彼此已相谅解，且得大体妥协。麟等渴望之怀，殊为欣慰。方冀一经决定，遂可观成，乃昨披报载，情形似又有迁延之势。执事折冲樽俎，谋国深筹，固不厌于精详，然交以利成，为弊已久。中俄均新造之邦，似宜相见以诚，为世界外交创一新例。况大体业经妥协，苟复铢称量较，神智必有不周，亦与承认原则相去愈辽。或更发生误会，则累时协议之功，既付东流，而舆情所属，益为失望。麟等为国家声誉及执事勋劳计，不能已于言也，用敢再布区区，至祈亮察，顺颂政祉不宣。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蒋梦麟	马叙伦	汤尔和	李煜瀛	顾孟余
马裕藻	胡适	沈士远	张竞生	谭熙鸿
李大钊	沈尹默	王星拱	朱希祖	陈大齐
沈兼士	陈源	丁燮林	李四光	陶孟和
周作人	郁达夫等	47人敬启		

1924年3月13日

复制件存北京大学档案馆

卷号 Z11 · 48

北大教授致校长公函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五日)

敬启者：

近见政府公报载有教育部二月二十三日所制定的国立大学校条例，同人等均以为既悖乎理，复昧于事，况以如此重要条例之变更，未闻教育部曾向教育界公开的讨论，率尔颁布，其蔑视学校及教员之人格，殊为可愤。而该条例中谬误之甚者，尤为设董事会一层，及其所订董事任务与产生之方法。窃惟董事会之制度，国外大学固亦有其先例，然此种制度之存在，率皆限于两种性质之大学。其一为纯粹私立大学，其一为公私合办之大学，美、英二国之大学，多属于此两类，以是董事会之制度，亦采用于其间。盖此类大学之经费，或则完全捐自私人，或则由公共团体与私人协济而来，事实上容或有不能不设董事机关之处。至于欧洲大陆之大学（尤其是法国大学）及日本大学，率皆国立并无董事会之机关。其校内一切事宜，由校内教授所选举之机关处理，一二特殊事宜，则由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处理，此外自无须其他机关，徒使之与部校相冲突也。今教育部之于国立大学设立董事会，在原则上立论，同人等已觉其谬于模仿，且就吾国实际状况而言，教育务求独立，不宜转入于政治之漩涡。今依教育部所颁之大学条例，第一届之董事，由教育总长直接聘任，以后董事由原董事会推选，此种产生方法，实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夫国立学校之经费，政府应负筹措之责，无待于

私人之捐助，纵令有待于私人之捐助，而历年以来国立学校经费困难，乃众目共睹之事实，亦未见有私人解囊相助者，是吾国无有以捐款而具有董事资格者也。如此则教育部之所欲聘任及其所得聘任者，依吾人之揣度，不外于在野之官僚，或有力之政客。此等官僚政客，于学术上既无任何之专长，其对于校内一切情形，又皆隔阂不通，而不及校长及教员之清晰。今以之审议学校进行计划及预算、决算暨其他重要事项（新颁之大学条例所规定者），而谓其有良好之结果，非大愚即诬妄耳。况彼等素以政治活动为生涯，其所以欲厕身于教育界者，非曾上台者以此为逋逃薮，即未上台者以此为制造场，一旦政治界中有活动之余地，又将弃其董事任务而他去。是徒以我辈历年累月，朝朝夕夕，口讲指划，手胼胝足之劳工，供其圆桌上偶尔的盲目的支配，吾辈何辜而受其颠倒谬误之统治乎？且此辈一入学校，则教育事业，牵入政治漩涡之危险，更将层出不穷，是又势所难免者也。或曰董事会中之分子，不必尽皆官僚政客，亦可延聘专门人材也。固然大学之外，专门人材大有人在，然专门人材之所以有重要价值者，在乎其有细密的点滴的实行，非徒以其能为概括的大体的计划也。校外专门人材，如肯热心担任清苦教育事业，则大学校长自当延聘为教授，上教室教书，入实验室做实验，日与学生直接相切磋，是诚为大学之幸事。若云概括的计划，可由校外专门人材主持，细密的实行，则以校内之校长及教员供其奔走，是又为本来价值矣。总之，董事会之制度，在其他特别情形之下，未尝无可选择之理由，然就吾国现状言之，——尤其是就北京现状言之，——同人只见其有弊而无利也。为此函请校长向教育部严重交涉，根本取消，大学幸甚。此呈，
校长大鉴。

关应麟	胡濬济	林玉堂	江绍原
沈溯明	李大钊	朱 洪	陈君哲
周 览	宋春舫	顾孟馀	谭熙鸿
张竞生	林 损	沈兼士	高仁山
陶孟和	黄 节	陈大齐	戴 夏
吴 虞	沈士远	沈尹默	张凤举
周作人	钱玄同	马裕藻	单不庵
刘文典	魏友枋	朱希祖	陈汉章
叶 瀚	马 衡	燕树棠	朱希龄
李麟玉	李书华	李泰棻	何育杰
胡 适	王世杰	罗惠侨	高一涵
张贻侗	陈 源	王星拱	石 璞
丁燮林	刘光一	皮宗石	颜任光
李仲揆	杨震文	何 杰	程振钧
徐炳昶	徐宝璜	丁绪贤	陈世璋

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北京大学日刊》

1924年3月17日

中俄交涉破裂后各团体态度¹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吾人以中、俄两国，疆土毗连，有历史的关系，兼以两国民族同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者之压迫，又同为新造之共和国家，根本上有相互提携之必要。况俄国于一千九百十九年及一千九百二十年两次宣言，对我一反旧俄侵略之主义，而建立平等之原则，复于吾人所求于列强而不得之治外法权、退还庚子赔款等，皆不待吾人之要求而毅然撤销与抛弃，以示其实践两次宣言之精神。吾人初以我国办理外交者，必能鉴于已往与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者交涉之苦痛，急于此良友之新俄，共同开一外交之新纪元。待之又待之，一年复一年，未见我国办理外交者，有若何之举动，犹以为或因俄国内部，尚有俶扰，循国际之惯例，不敢轻与然诺。上年以来，吾人始知我国办理外交者，所虑实异是。而新俄联邦已成，国基已固，回复两国之交，不能复任其迁延，以致坐误吾国之福利，于是本我国民之天职，起而督促我国之办理外交者。往者既尝一再致书于顾君维钧、王君正廷，促其本国民之诚意，察舆论之趋向，弗谈条件而立行宣布回复两国国交。二君者，或有书函之答复，或为当面之答复，皆于同仁之意见，认为适当，徒为审慎计，须先有相当之谅解，大体之协定。同人为顾全责任，虽不能满意，而犹委曲容忍。方冀中、俄国交计日而复矣，乃我国操持政柄者，无远大之目光，办理外交者，无独立之精神，既锱铢而较，复朝四而暮三，不顾舆论之从

违，悍然举已成之协定而破坏之。吾人推求责任所在，实不能为操持政柄及办理外交者恕。吾人今本国民之天职，及平昔之主张，郑重告于国人曰：回复中、俄国交事件，虽不幸而中断，吾人仍誓以最短时期，俾之实现，以利吾国家。除一方警告我国办理外交者，立为无条件之宣告承认，一方要求俄代表仍行保持十三日之协定为中、俄正式会议之根据外，特此宣言。

《晨报》

1924年3月22日

致共产国际东方部穆欣⁽¹⁾的信

(一九二四年六月五日)

穆欣同志：

我们请您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一个电报，告诉他们，在中国代表回国前不要派遣任何学生，并请电报告知加拉罕同志，不要介绍学生到东方大学⁽²⁾。

中国代表团 秦 华

王乐夫⁽³⁾

彭述之(彼得罗夫)⁽⁴⁾

1924年6月5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全宗 514, 目录 1, 案卷 80, 第 34a 页英文原件

李玉贞译

译者注

(1) 此信同后面的三封信均为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致共产国际东方部、共产国际执委会及穆欣的信。M. 穆欣(1891—1927)，原姓约合尔，化名马克西莫夫。1920—1922 年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秘书，驻雷维里杰尔外交团的秘书，远东共和国驻中国代表团的秘书。1922—1925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政治专员和秘书。

(2) 东方大学 即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 (3) 王乐夫 即王荷波。
- (4) 彼得罗夫 即彭述之用的俄文名字。三人签名中前二人为英文手迹，彭用俄文，签名为“彼得罗夫”的手迹。

致共产国际东方部穆欣的信

(一九二四年六月五日)

穆欣同志：

我们恳请您接受他们入东方大学就读，因为他们已经到了这里并且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书记的介绍信，况且他们还是国民党员。

Yeh Sew Yee 叶秀怡(音)

Chen Shio Ping 陈绍品(音)

Chen Chung 陈 冲(音)

中国代表团 秦 华

王乐夫

彭述之(彼得罗夫)

1924年6月5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全宗 514, 目录 1, 案卷 80, 第 34b 页 英文原件

李玉贞译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¹⁾

(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

致主席团：

中国代表团听了阮⁽²⁾同志代表各殖民地做的声明⁽³⁾。鉴于本团没有参加此一问题的讨论，所以对他的声明不负责任。我们认为这一声明仅具个人性质。

中国代表团成员 秦 华(签名)

王乐夫(签名)

彭述之(彼得罗夫)(签名)

1924年7月1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全宗492，目录1，案卷152，第4页英文原件

李玉贞译

译者注

(1) 此件原档案没有标注日期。据内容判断，秦华等人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递交此信的时间是大会在曼奴伊尔斯基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做于6月30日第20次会议）之后进行讨论的过程中，阮爱国在7月1日第22次会议上发言，见《共产国际第5次世界代表大会（1924年6月17—7月8日）》（速记记录），192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版，第588—603页。中国代表秦华本应当在同一天发言，但因故没有发言。故据此推断，此信件当不

早于阮爱国的发言。信件背景待考。

(2) 阮 即身兼法国共产党和农民国际代表的胡志明(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使用的是化名阮爱国)。

(3) 声明 指阮曾经在7月1日第22次会议上就曼奴伊尔斯基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发言,见《共产国际第5次世界代表大会(1924年6月17—7月8日)(速记记录)》,192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版,第588—603页。

致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申请书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七日)

目前中国共产党急需工作人员。我们中国代表,请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之后,派遣彼得罗夫和勃林斯基⁽¹⁾二同志到中国从事党的工作。

中国代表团 秦 华

王乐夫

彭述之(彼得罗夫)

1924年7月17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全宗 514, 目录 1, 案卷 80, 第 34b 页

译者注

(1) 勃林斯基即任弼时。

主张抵制国民党同志 俱乐部的成立¹

——李大钊、于树德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帅府园会议上的发言(节录)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

民党同志俱乐部，开成立会时，到会人数竟有 2000 以上，实为不可轻视之举动。而同志俱乐部之总章内，载有跨党者不准人会一条，明系反对共产(党)之表示。如果任其成立，未免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本上发生影响，非设法抵制不可。

《晨报》
1925 年 3 月 12 日

译 著

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

(一九一三年四月一日)

日人中里弥之助氏，著《托翁言行录》，复综托翁学说，结晶而成斯篇，读之当能会得托翁之精神。爰急译之，以饷当世。

译者附志

(一) 噫！虚伪之文明

今之文明，虚伪之文明也。

为少数阶级之淫乐与虚荣，几千万多数之下层阶级穷且饿矣。

人间之情理，以杀人为天下莫大之罪恶。然今之国家，强人以杀人，而严罚其不从者。

科学日益进步，而应用此进步之科学者之手，恶魔之手也。

称之为文明，实则文明者，一部少数之文明也，多数且饿死矣，且见杀矣。

是非虚伪之文明欤？是非可怖之文明欤？

(二) 革命之真意义

人生真实也，不堪虚伪。今之文明虚伪也，则革命必不得不至。

革命云者，何也？

革命者，人类共同之思想感情，遇真正觉醒之时机，而一念兴起，欲去旧恶就新善之心的变化，发现于外部之谓也。

然悔改一语外，断无可表示革命意义之语。

(三)悔改欤

个人欲进于道，其先不可越之门，悔改是也。无悔改而欲入于道，未可以想像也。

时势亦然，国家亦然。时势罪恶之时势也，国家罪恶之国家也。

人分其悔改欤？国分其悔改欤？其悔改而就善。

(四)所谓善者何也

人间本然之理性与良心之权威是也。

(五)劳动者善也

如之何可为善乎？

所谓最大之善何也？

劳动者，最大最初之善也。

无劳动，则无人生。

不解其何为者，可先熟虑反省此一语。我等所以得有烦闷思考者，非以我等有生活故耶？为供我等烦闷思考之时间，非有何人代我等劳动之赐耶？

无劳动则不能生活，即离劳动无人生。于是知劳动为人生之最大义务，从而为最大善也。

当先尽人生之义务，而后人生之意义始解。

离乎劳动之安心也，悟道也，其于根柢虚伪耳，姑息耳，误谬耳！

(六)劳动之定义

劳动云者，生产人生必需之衣食住之“四体之勤”之谓也。

(七)劳动之感苦理由

劳动为毫弗痛苦者，且一如不劳动之无痛苦也。

今劳动者痛苦之原因，盖于他有掠夺彼等之劳动者故也。

易言之，即彼等背后有奸恶之国家制度故也。

(八)理想之劳动国

俾各人悉为劳动乎？

人类将以半日之劳动，易得衣食住。

而将以其余半日，得消遣于灵性之慰安与向上。

劳动能健康人类之心身，使疾病绝迹于社会。

署名：李钊

《言治》月刊第1年第1期

1913年4月1日

精琦氏宪法论⁽¹⁾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迄兹所论，皆关于政府各机关及此等机关所尽之职分。今当综挈自由国家政治下所基之精神，以论宪法。

日者，余自某友获奥可拉荷马⁽²⁾州宪法一册，益我良多。奥州者，吾美之新州也。余既受而读之，甫一展卷，有一事焉，足以感余者，即除与该宪法合印之他项材料外，单纯宪法即有九十六页是也，或者更合其他事项至谓有百七十五页之多，但严格言之，与该宪法有密切关系者，九十六页而已。

余继检合众国之宪法，尽量计之，仅将视奥州宪法页积略同之页十四。人或当不认奥州较合众国为尤要，但此等事实，(要)足以示晚近人民皆以多列事项于宪法为智，则无可疑。查加里佛尼亞⁽³⁾州一八七五年采行之宪法，有五十五页；南加萝林那⁽⁴⁾州一八九五年采行之宪法，有四十六页焉。

应时势之变迁，新州宪法与旧州宪法增补之条文，日见增加，乃为今日显然之趋势，此当深加注意者。是等宪法，于其性质，亦确有变易，今实含有合众国宪法昔所遗而未载之问题。良以吾制定宪法之祖若宗，以为所当列入宪法中者纯为根本法律，他则可让之普通立法焉。今之制定新宪法者，则受平民情感之影响，觉有数多具普通立法性质之条项，亦当概置之宪法之中方为妥，彼盖不信任其立法者也。

宪法一语，义果何居？其所涵之一定概念若何？请略言之。吾人固皆知成文宪法外，尚有纯粹基于习惯、法庭命令、人民默契之宪法。且可断言一切国家，凡有永久政体之足资循守者，即有一种形式或他种形式之宪法。在大不列颠，凡有称为“非宪法的”⁽⁵⁾者，其意即谓事之反对法律者，而其法律乃英人公认为社会生活或政治生活之绝要者也。在合众国，一云“非宪法的”，则谓与成文宪法相冲突之事，此最宜明辨者。虽然吾人倘解析此等宪法并寻其意义，当知英宪之与美宪，论其内容，实无异致。通常言及宪法，辄谓为国家之根本法律。试一解析人民政治生活之根本究竟为何，则知是等事物有与成文宪法之规定不相符合者，固往往而然矣。

梅西⁽⁶⁾教授尝于其《宪法学》中明宪法之界说曰：“宪法者，政治之方略与其权力依之以为分配与调和者也。”此界说所涵仅有一事，即宪法者示人以政府如何组织、如何行使其权力是也。用是以思，虽在蛮僥之族，戴一酋长，行政权之行使与其族世传习惯之决定，举以托之其人，其人本身所为，必准于是等习惯，且多迫制其民使亦从之者，其间盖亦有宪法存焉。

教授柏哲士⁽⁷⁾者，吾美著作家之由法律、宪法方面诠释政理最精者也。彼谓完美之宪法，实以三种根本之部分构成（亦有附加第四部分者）。（一）宪法中施行未来变更之国家组织也。即谓凡国家组织，当使其自能适于政治及社会之情状，应联续不断之变迁，与时俱进，以为之方。而欲行其策，必须有道焉。以明定变更此成文宪法，且有一种权力，必须赋于社会中一部之人民以行此变更。宪法苟不具此适应之性，以遇人民从进化阶级渐次长育之必要，则代循序之变更，必兴猛烈之革命。否则不能有所变革，而国且沈滞于不进之境矣。柏氏故坚谓成文宪法之重要部分，即其适应未来变更及修正之组织也。

顷者，支加哥大学校长曾为一演说，论此类问题。彼于其演说

中谓吾人当知各国均有二种概念，所当记取。其一为一国人民之社会的概念，凡其国民无不括之；其他则为实际的概念，此谓国民中一部之有权通过宪法、制定新宪或修正旧宪者。其在吾邦，此实际的概念，殆指选举人之集合体。依此以观，吾人须于各宪法中有规定焉，以揭出此政治社会组织之意义。易辞言之，即吾人当以人民之名义，加诸有提议修正之权、制定修正即通过修正条文之权及制定新宪之权者。不宁惟是，或当更进而规定其政治社会依之以变更宪法形式之方法焉。

复次，按柏氏之说，凡宪法中当有关于自由之宪法，即必须有防人民自由为政府或私人所侵害之规定也。凡为正当组织之国家，若者为个人之权利，以抗政府逾乎法定权力之行动；若者为个人之权力，以拒同类公民间侵害自由之行动；必皆一一规定，一目了然。故吾人恒于成文宪法中发见权利之宣告，其意惟在保障个人一定之自由，禁政府勿得侵犯而已。

宪法自身当明定界义，指明是等自由适为何物。或有国焉，对于人民形式上并无其权利与自由之保证，但彼权利与自由仍可依习惯而存在。例于神权专制之君主政治，各个公民实无权以抗拒其主权者，彼之意思即为法律，彼欲没却何人之自由，皆可任意为之。但在保证人民权利之宪法下，此类事则非所能为矣。成文宪法及主权者之意思而外，吾人恒见在一定范围内，防制政府，以保障权利与自由之信念，默默行于人民惯习之中，设政府举措轶乎此等范围，则革命必起。故于解析宪法，有一事焉不可不加以注意者，即在凡向平民政治有所要求之国家，多少必与人民以宪法上之自由，即于宪法上未能明白规定此等自由确为何者，然亦皆为人民所默喻，盖社会之惯习已决定之久矣。

宪法之第三部，即柏氏所称关于政府之宪法是也，意即谓政府各机关组织之形式也。宪法一语，本义实不外人民相聚而为组织

以事所事之方而已。此为宪法上明了常睹之部分。宪法无须示人以立法部组织之方、行政部尽职之道、司法官遴选之途，但须特别或依习惯与默喻以决定政府各机关之组织之权力，而划清其主要之职分。总之，宪法之职在规定应时势之必要宪法当若何变更之方法，列举人民之自由，明定政府组织之形式，并常指定政府行其各种权职之方法焉。

学者或谓凡宪法须以某类形式含有一制定文，但此不必明定，亦能默喻。盖造宪之权力，当注意于其规定有法律之效力也。

当夫政治祝典之日，或政治激战之秋，宪法神圣之语，吾侪固习诵而习闻之。是语也，殆谓宪法为当崇拜之物，为神圣典册，非一种普通之法令文书也。

亦有人焉，于所陈义，仿佛含有凡合众国之公民有评讥宪法者，即为不爱国之意，此显为误解。吾之各州集合而成一体，宪法不过各种重要法律、根本法律有限之纪要耳。此种法律时时变更，且应须变更，以吾人生活之境况时有变更故也。吾人于此，当将宪法之概念牢记于心，即宪法者不过最重要根本的法律之明晰纪要，必须研究之，批评之，讨论之，一与他法律等焉。

尚有一事亦当注意，即宪法之形式上为成文文书如吾美者，与彼仅为一定之通常法令，如英之《大宪章》、《权利请愿书》及一八三二年之“改正条件”等等，殆无甚差别。其宪法均能为人所理喻，吾人均可议其立法之为宪法的或非宪法的也。

苟不细察是等法令，则何项条例其性质属于根本的不能指明，必寻集二十种左右之法令汇为全体而成宪法。但是等法令中复多半杂有不属宪法之事项，是等法令及法庭判决而外，尚有多数惯习或于形式全无记载者之可寻，其濡染渐渍于人民之政习也，如彼其深，故允足成为英伦宪法之一部也。是等惯习，殆纯为简率之默契，然其根基则甚牢固不拔。例如英伦之有内阁，几历一世纪之

久，无论何时，内阁于一种重要政策，失其信任于众议院，则所可出者只有两途，非其全体辞职，即解散议院重行招集新选举。此种惯习，久已成英伦宪法之一部矣。此虽未为法令所明定，但其置基于英伦政治精神者既深且固，几无人能思外此复有所可出之途。至于今日，施之于用，其为英伦宪法之一部，固与《大宪章》其物无殊也。

其在英国，得云宪法可以法令修正，英伦巴力门通过之条例皆为合法。设巴力门欲通过一种性质属于根本法律之条例，此条例即于宪法为一种修正。但今者巴力门苟通过一条例，规定内阁当如何构成，何时当引责而退，循何道以尽其职，其于英伦宪法为一种修正，实无加于将数十年间英伦内阁之惯习致之实行也。一种法令倘经通过，吾人固获一特定与明定之事项，但此不过将久经存在者，致之于一定法律之形式，所以使其成为宪法之一部者，乃此习惯之存立为远在其列入法律之前者耳。其在吾美与其他现代国家之有成文宪法者，宪法之采用与宣布，恒不由立法部而别有其人焉。此诚可许之制度，以吾人与吾立法者相习既久，恒以与彼辈相习之故消减对于彼辈之兴味。倘吾人必须于性质上属乎根本之法律谋一变革，则以托诸特为此获选而从事此变革之人为智，且于变革之前，得提出其规定，以求判断于国民，尤为可喜。若在他国，其民少所活动于政治者，宪法有时为一政治当局或君主皇帝之自为其国统治权之机关者，所预备或公布焉。

研究一国宪法而考其制宪机关之何以自谓，何以自明于其制定文中，殊为饶有趣味之事。合众国宪法之前文，起首即曰：“吾合众国人民（解释人民一语之意请俟后节）为造成愈益完全之联合，确立正义，保障国内之安宁，备预公共之防卫，增进普及之福利，巩固吾人及吾人子孙后世自由之幸福，创立美利坚合众国之宪法。”多数制宪机关，不仅于宪法中载明宪法之目的及受此宪法之人民，

且常进而更认其国家实为上天所创造。推其原因，不由于此等观念为古代之遗存与国家源于神权之普遍信仰，即由于其民允执敬谦之礼。今犹念兹在兹，念彼所信神明之助实锡于厥躬也。此等事实，亦颇为宪法学者所注意焉。

考奥可拉荷马州宪法有曰：“吾奥州人民为吾人之自由感谢全能之上帝，并为确保永存此自由之幸福，乃创立此宪法。”日本宪法或普鲁士宪法，则又大异。日本宪法第一章即曰：“赖我祖宗之光荣，缵继万世一系之皇统，愿承祖宗之遗训，增进我国民之幸福，发达其懿德良能并冀与我臣民同心同德，共保国家之繁荣。爰依明治十四年十月十二日之敕旨，发布国家之根本法律，宣扬吾人道德轨范之精神，明示我子孙与我臣民之子孙以永远确守之大典。”“国家之统治权，吾人由祖宗承袭而来，并当传之于我子孙，按宪法条文之所规定，确保此权永远勿墮。”⁽⁸⁾

治宪法学者，当知此种宪法，实质上与其他宪法并无大异。关于制宪机关之自信有权力以为活动，制定宪法之目的与夫权力之为物，固皆有其纪载也。日本帝国宪法中亦承认变更宪法之权力，特与宪法公布有联系之关系，按宪法本身之所规定，则日本宪法惟天皇为有变更之权力耳。

曩于究论司法，已知避免法律上暧昧之难矣，于此亦然。“吾合众国人民”⁽⁹⁾一语，究竟作何解释？即其例也。使吾之宪法为组织社会的国家之人民全体所宣布，吾人当有一种意义以诠“合众国人民”之语。若仅为列入政治的国家之人民所宣布，则当别觅一义以诠之。二义固通用也，然考合众国宪法而寻其可被修正之途，则知“人民”一语，又有第三义与上二义异焉。

宪法中关于修正之条款，初载首基即定无论何时苟两院有三分(之)二认为必要时，康格雷⁽¹⁰⁾即当提议修正；或于各州中之三分(之)二州立法部提出请愿时，即当召集提议修正之会议。苟为

各州中四分(之)三州立法部所追认，或为该会议中四分(之)三州所追认，其修正皆为有效。而追认之法果何所择？则康格雷可以提议也。

吾人于此发见一规定焉。各州中之四分(之)三州，非联成一单位而活动，乃相聚集而各自活动，无间其于彼立法部抑于会议也。故“合众国人民”一语用于此处，实另有一义，异乎寻常。例如纽约之民，其数虽愈乎奈洼塔⁽¹¹⁾州者甚众，而奈洼塔之票则与纽约⁽¹²⁾之票同。吾美之最大宪争，不过答辩吾宪法中一二语句之解释而已，吾人实不能过于慎谨以避误解也。

即在有成文宪法之国，其完全宪法皆有一部分在法庭判决、惯习及人民默契之中，更有一部分存于他种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者，如教会、家族等是也。俄国教会之权力其性质实属于宪法的，而吾美政党，植基于吾之政治组织者，如彼其深，故影响于公民自由甚巨，卒成吾宪法之一部焉。

吾美宪法，固尝规定选举合众国大总统之途矣。按之实际，由政党活动所致选举大总统惯习之变更，久已修正《合众国宪法》，所依然未改者文字而已，此殆近于事实之言也。

顷有一共和党国民委员会会员，论及下次共和党会议地点之决定，因述为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方法而设之种种法令，并谓各代表之所以获选，所关实在合众国或联邦各州之法令无能为役之所，在会议中，恒有此感焉。政党为自由之组织，斯不当为法律所干涉。但政党既成吾政治全构中如斯有力之一部，则令其为法所认，其行动多少当受限制，或且为得。果政党实际已成永久之政治制度，则早已不当谓为自由机关不受干涉，至于今日，已为当于法律承认此惯习法规之时矣。苟一种社会惯习或政治惯习建立如斯其牢，则必可认为法律之成立或其消灭，此但问其于成为法律形式束制行为以前，其民苟愿为守法之公民者，当否于道德上受此惯习之束制

而已矣。

挽近以还，多数成文宪法所涵之规定，往往不全为属于根本法之性质者，时或并不甚重要之法令，以不信任其立法者之故，而亦入于宪法之中，此诚背于宪法之原理也。例如伊林诺伊⁽¹³⁾州宪法规定，不经总投票不能通过普通银行法。盖该州曾经一度极大之慌恐，人民于此受银行政策之害甚重，痛创之后，急不暇择，遂以此规定列入宪法。但其结果则何如者？数十年间，该州迄未能获一完善之储蓄银行法，如东部诸州多数所现行者。推其原因，则以此类银行法须为全国人民所宣布，而一般人民固弗喻完善储蓄银行条例之详情，且无相当之时间与兴趣以研究之也。其有一二条例为其立法部提贡于国民之前者，亦皆遭其摈斥，为其不解此事，且疑此为对于银行法加以攻击，而以不受其干涉为愈也。纽约州最后之宪法，有关于森林之规定，其性质亦与此相似。结果至苟于宪法无所修正，纽约州公有之森林，绝不能行合于学术之处理，以致数十年间，吾之森林常蒙滥用之害。制宪之不慎，吾人惟有自责而已。

在多数宪法中有多数类似性质之例证，如开[关]于普通财产税之规定，亦其一也。依此规定，国民保有一不合学理之税制，且使之苟欲得一良制须受无益之困难，前于论述立法行政之职务时，固已言之。凡涉及租税、银行、关税问题，或具此同类性质者之详细法律，必需专门家详慎之研讨。倘宪法之修正须委之一般人民，则宪法中不当含有其性质不易受允慎商榷之制度，但吾之宪法固多含此类之规定也。

奥可拉荷马州之新宪法与加里佛尼亚州及他州之宪法，亦皆有此类之规定。奥州宪法规定立法部须立一寻常学校教科书之统一制度。加州则规定教科书须由州印行、由州颁布，四年内只许更改一次。夫吾教育界之著作，固未尝不可博吾人之同情，吾人固未

尝不愿善良之教科书有所保证，以利通用。但此类规定见于宪法之中，适足以阻碍境象变迁之认识，故此类宪法往往拒绝最良教科书之应用于儿童。盖此为当属于普通立法之问题，其性质固不属于宪法也。

复次，更有宪法规定立法部须为州寻常学校，关于农业、园艺、栽培及家庭等科学之研究有所设备者。是等学问固甚重要，固当令学子研究之，但不必设此等限制于宪法之中。社会情形、生活状态时有变迁，吾人或当应其必要，而决然易其研究之方法，或视其所规定有益进者，若以规定之于宪法，变更难矣。

总之，凡属于普通立法事项，其性质甚复杂，而为一般人民于通过之前了解不易明晰、讨论不易透彻者与必须时有变更之事项，均不宜列入宪法也。

所谓法律之属于根本者，其意恒指法律之为一般人民所易解者也。彼等可否以对于人民调集军队之权与其政府；可否以无法庭特别命令得以搜索人民私宅之权与其行政官及司法官；彼等应否有立法部议员时常更迭之选举，一般人民固皆能知之，此类事项皆能无误以为通过。关于此类问题，如有致其规定于有效之必要，彼等皆能准备为之奋斗。如此之法律，将有人民为之后盾也。

法律而无人民之喻解与援助，则必不能施行。此等法律，可谓毫无价值，不当列入法令册籍之中，尤万万不当置之宪法。

性质实属于宪法之根本法律，历数十年间只须少加变更，即能与时宜相适。人类之自由，政府组织之形式，关于选举之主要事项，政府各部最普通之职分，皆与国家根本有密切之关系，而不常变更者也。使仅以此类重要根本之事人于宪法，则所获之宪法，其需修正之所必稀。宪法苟得其正范，则所需变更以求适于变动之不居境象者，将泰半为法庭适当之判决所能举。独至必当根本解决之修正，如奴制废止之类，始须有宪法上之变更。而在斯时，必

民意先有变动以要求宪法之改正，而后修正案始易于施行。

今请以简赅之语终结斯篇曰：欲获一宪法而免于不智之咎，即勿使常须修正之问题杂入其中，则必须仅将最重要最根本之事物置之其中，其他屑屑琐些之事，悉宜屏之勿载。学者研究宪法，无论其所研究者为成文抑为不文，苟欲于其精神了解其宪法亦如于其文字者然，则必须不仅研究其宪法之本文、古代之法律典籍、法庭之判决而已，当并及于惯习、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市民全体之组织，而为法庭裁判依之而受左右，人民生活依之而受拘束者。

署名：李大钊

《言治》季刊第3册

1918年7月1日

译者注

- (1) 节译美国 Jeremiah W. Jenkin 著 *Principles of Politics* 中 Constitution 一章。
- (2) Oklahoma.
- (3) California 美国西岸之州。
- (4) South Carolina 美国东南之州。
- (5) Unconstitutional.
- (6) Jesse Macy.
- (7) John W. Burgess.
- (8) 由西文意译若此，《日本宪法》原文一时未能检出。
- (9)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 (10) Congress.
- (11) Nevada 美国西部之州。
- (12) New York 美国东北部之州。
- (13) Illinois 美国北部之州。

世 界 观⁽¹⁾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吾人常探求人生之理矣！人生之理，即世界观（Worldview）也。于此世界观，虽不能尽括一切人生现象，至少亦为网罗于各人有趣意之现象之一种公分母焉。然当求此世界观时，偏执之弊，终难避免。盖吾人每为外来之各种暗唆所动，即为第一难关，就令有最少数者勉强胜此障礙，亦将阻于内部之暗唆，触第二暗礁以至于沦溺。吾人究不能虚心坦怀以求世界观，乃为事实之真相。无论谁何，皆为个人之倾性所左右，已虽不自知，实则依其倾性各受一定方向之指导。就中最有力者，厥为吾人之气质。此气质实指导吾人世界观之探求，使吾人求适合自己气质之世界观进行不已。吾人而欲依客观的、抽象的思索作成自己之人生观者，迷妄莫甚焉。吾人固尝探求真理矣，但吾人之气质终导吾人于一种特殊之真理，以吾人于此可得熟育吾人个性中原素之适当土壤，且得辩护自己短处之具以自处也。果有绝对之真理，人类亦终弗能达，为其终不能脱于主观之制限耳。故凡求世界观者，精确言之，皆不外于一己与环境之间寻一调停之道而已。……

今日吾人所有之种种理论中，其最主要者为政治上之理论，乃系不可争之事实。此即观于报纸，可依其所采之政见而为类别，足以知之。此政治上之理论，包含关于他种人生现象之明了观念。即如保守党之报纸，关于宗教、文学及其他政治以外之问题，皆与

急进党报纸异其意见，其故则政见之对抗，即世界观之对抗表现于外者也。从民主主义之进步，政治遂成现代之最高原动力，如宗教之于中世纪然。今日各人之见解，纯依政治的采色而决定，即政治上之见解，同时亦为对于关乎各人利害问题之一切人生现象之见解。要之，政治上之对抗，依然为自古以来世界观之争斗，不过易一新形耳，其对抗固犹是也。盖此种对抗，乃发于人性最深奥之所，即前所谓气质者。易辞言之，即发于其人之倾性，而为根于其肉体的与精神的素质之全部者也。……

有一端焉，为吾人所当常记于心者，即此依气质而定之二种世界观，不可互为争斗以图征服或灭尽其他。二者同为必要，同为永存，盖全因其依气质而定之故。其相争互持者，殆为保持世界之进步，使之平流并进耳！

署名：S. C. 生

《言治》季刊第3册

1918年7月1日

译者注

- (1) 译摘 Christensen 氏《政治与群众道德》。

哀 音⁽¹⁾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诸君！也曾在静悄悄的夜里听见过沿门弹唱的人的音调么？我虽不是生来担不住情的人，但是没有过听那哀音而不落泪的时候。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何缘故，每听见那哀音必觉着肠子九回。古人说过，一切微妙的音乐都能使听者悲哀。诚然不错。“外讴林”的呜咽，笛声的哀怨，琴音的萧凉，就数到琵琶、钢琴以下的乐器，若是沈心澄耳听着的时候，哪一样不引起吾人的哀思来呢！泣哭的人减去苦痛，可哀的乐器，把泪来慰人。哎呀，我是东西南北的人哪！在马关外夜泊的时候，也曾听见和潮声对咽的歌声断过肠；在北越的旅况中，也曾听见追分的曲落过眼泪；月明风清的夜在四国海中，也曾听过欸乃的声；雪朝在南萨道上，也曾听过马士的歌。这等时候皆曾感动过我的心，然而没有像那一片街头的声音寸断我的肝肠的！

霜寒物音可闻于十里的夜，月色溶溶如水的夜，代替昼间的喧嚣变成静悄的都的夜，沈沈寂寂的中间，忽然挑起三弦一声，突然发响倏高倏低，后来音波次第延长往远处走，不知何时全消灭了。开窗一望，满地惟有月色。诸君试静下心去，听这一霎时的音，鸣奏者虽在无意中鸣奏，然在静听的我听了，那三条丝仿佛像缠绕亿万人心的纤维一样，那音的一高一低，仿佛像人的歔歔一般，仿佛集

合亚当以来人间的痛苦、烦闷、悲哀，都在此时，欲一一诉之于天。一曲人生行路难，真令我有不愿肠九回也不能了。哎！我因此泣，不知是为甚么的泪。我是自悲呢，还是悲人的悲呢？不知，不知。但在此时感人类的烦闷、痛苦就是了。

天不令才华焕发的诗人歌尽人间的悲曲，令闾巷无名的鄙妇为人间代诉其悲于天。有言的悲不悲？我因为此哀音中有可感不可言的无数的苦、无数的血、无数的泪，所以闻之而哀。

幸恕我的谬妄。我每听见那一曲沿门弹唱的节奏，就像有罪的小孩子伏在慈母膝前哭泣，又像迷于情网的恋人追寻他的所爱飘泊四方的一样感动。每诵“Still sad music of humanity”的句子，我就思想这个哀音。

署名：守常

《言治》季刊第3册

1918年7月1日

译者注

- (1) 摘译德富芦花氏《自然与人生》。

国家与个人⁽¹⁾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每家门上有国旗，到处有凯旋门。

日清的战局终结，今日是大元帅陛下从广岛凯旋的日期了。

新桥车站的附近，真成了人海。老少男女，喧哗着，骂着，笑着。人像波浪腾沸的一般。“奉迎圣驾”的旗，红、紫、白、青都在五月的空中翻扬，甚有精采。爱国忠君的精神，空气里也有了。

忽然有两三辆载草的车子，想强冲人群走过去。遇见警官的一声喝叱，就止住了。

忽听背后有叨咕的声音：“甚么？畜生奴！甚么这样高兴？喂喂……的闹的讨厌！畜生奴，我们车力嘶们怎么样呢！”我愕然而顾，顾而又愕然。

立在我背后的，想是一个路旁推车的苦力。头发胡子乱蓬蓬的长着；老黄纸色的脸，更带着青黑色，发出怪光；颊骨高露，可怕的两只洼眼睛，惘惘然现出如饿狼一般的凶光；像是拿抹布凑缀成的单衣，遮不住胸，结绳子作带；光着脚。

群众的里边，有一个小孩子，不堤防将那正在吃着的馒头落在地下，那结绳带的男子，飞也似的抢了去，就吃完了。

小孩子怒了，众人都笑，我要哭。

更没有像“饿”这样可悲的！更没有像“饿”这样可怕的！使人吃人肉的是“饿”，使人毁城寨的也是“饿”！

忠君爱国那些话，任凭君说罢！
但愿勿使陛下的赤子挨饿就是了！

署名：守常

《言治》季刊第 3 期

1918 年 7 月 1 日

译者注

(1) 节译德富芦花《自然与人生》。

附录

守常交来的报告¹(之一)

——全国学生运动状况

(一九二四年七月)

北 京

北京之校数及学生数目，向无可据之确实调查，依北京学生联合会历来发通告之底册，其数约为五十余，然中学以下之各公私立学校皆不在内。此五十余学校中，包含国立学校、部立学校、公立学校、本国私立学校及外国教会之学校五种。国立学校以八校——北大、法大、师大、医大、女高师、工大、美专、农大为首。部立者，以交通大学、俄文法专、高等警官等为首。公立者，以第一至第四四个中学为首。私立者，以中大、民大、朝大、中央法政等为首。教会立者，以燕京大学、汇文大学等为首。学生总数号称三万，大概历来参与学生运动中之各种示威运动者，至多不过五、六千人而已。

北京学生之地位与环境，与各都市或地方异。其最明显者，为接近政治中心，天然为全国学生运动之发源地及领袖。其对于政治较能了解，更受刺激[激]，故其政治热(情)比他处学生为高，遂不时有学生运动之兴起。

北京学生之团体：

(一) 北京学生联合会，为北京学生之总机关。五四成立以来，中间虽时有停顿，总算是能继续的。加入之校数最多时有三、四十校，最少时有十六、七校。其中坚分子向为国立八校，八校中尤以北大、师大为要。北大为北京 S·Y 之策源地，故该会实常受本团之指导也。去年暑假以前，因驱彭运动发生，该会重振五四运动旗鼓，因主持者为本团同志之故，其运动标语及方法皆甚进步。如公然电请国民革命首领孙中山北伐及组织正式政府，主张解散国会，打倒军阀等等，皆可谓为大规模国民革命开幕之第一声。驱彭运动风潮息后，同志学校与非同志学校(暂以其代表之态度为分类标准)间，发生极大之冲突，该会遂裂为二，一以北大为首，一以师大为首，长至四月之久。此次破裂，使 S·Y 同志得不少教训，深觉参加运动之同志之个人态度，及团体对于活动同志之不断的连[联]络及指挥尤为必要。破裂期间，由本团同志利用八校欠薪罢课机会，组织八校读书运动会、教育基金运动会，从感情联络入手，一方消灭旧嫌，一方为恢复学联之预备，结果，该会果于去年腊月由中之四校调和重行恢复。是次，该会加入学校约十六个。其中完全由同志代表出席者九校，故新章所规定之重要各点，及新职员之选举，皆依 S·Y 之意志而实现的。但是恢复未久，尚未能作有力之运动，现在从增加分子及充裕会费着手，不久内部充实之后，将来仍能继续作各种领袖的有力的运动也。

(二) 各校学生会或自治会。前者为国立或少数私立学校所沿用，后者为教会学校所沿用。五四当年，这种会社几于无校无之，今则殊有零落之观，有者亦未有代表全校公意之能力，或本校临时发生若何问题时一度用之，以为解决问题而外，对于政治、社会诸问题殊少过问。

(三)各校内以感情为基础之各省同乡会。此种组织最无意义而最普遍，昔时人多不注意之。最近从事政治运动及团体组织之活动分子，忽发明利用同乡会为树立新势力之新法。其最著者为少年建国团之前身——湖湘学会之联络湖南人中非 S·Y 分子及反对 S·Y 是也。近如民权、民治皆仿其法。吾团亦采用之，且颇有效。北京以外之地方团，似可加之意焉。

(四)以研究学术为宗旨之艺术团体和学术团体。此种团体为横断一校或一地域之组织，其数在北京者亦属不少（惜无精密调查）。其中分子，大都为有头脑、有能力之青年，且多表同情于国民革命者。其中一变而为政治的团体者，亦属不少。此种组织，本团应最注意，平日宜令同志就其所好、所学者加入，先以联络，有机会即可多多吸收进步分子，或竟可使其变为国民革命的团体也。

(五)政客或他种主义者所暗中主持之半学术半政治的团体。此等组织在北京特多，如西北协会、民中俱乐部、民治主义同志会等等，利用少数同乡学生出面主持者为多。其人数少则二、三十人，多则百人以上。其能力，为有组织的运动则不足，捣乱、争小利、破坏国民革命军之阵容则有余。此等团体，吾人最堪注意破坏、扑灭或揭穿之也。

除以上五种学生组织之外，尚有值得善意注意者，如各校内或各校间之体育团体、剧团。此等团体，如能使同志多多加入，联络感情、宣传主义、吸收同志，最为有效。再者，值得敌意注意者，为教会学校及青年会之种种组织及其举动。北京教会学生，五四以后绝少加入学生运动者，对于学生联合会之主张内政外交皆应[不]过问，反对甚力，而对于哈丁纪念碑之树立，则热心万分，其无用及反动，可见一斑。

北京学生与国民党。

北京自恢复国会，以政客而强奸教育，贿选成功以来，一般学生所受之刺激不少。他们一方对于北京政府绝望，一方对于国民革命遂形信托。观于北京、南京、奉天、上海之民意投票之推崇中山、及驱彭运动当时之请中山北伐、组织国民政府，皆足为学生倾向国民革命，赞成国民党之明证。北京方面尤为狂热，除我 S·Y 昔与国民党合作外，加入之团体有民治主义同志会。该会在驱彭以前，不过是只北大二十余人耳，至国民党改组大会时，分子增加至二百人左右，有受民党津贴之出版物《民生周刊》一种，鼓吹三民主义。又有一种团体名民权社，于广州大会闭会后，首倡三角同盟打倒 S·Y。二为少年建国团，初由反对 S·Y 之湖南人所组织，由湖湘学会、中华学会而改为今名。该会在诸团体中成立最晚，而进行最猛，团员号称二百一十人，人颇言其以国民党正统自期（对北京各种小团体言）。广州大会后，与民权社互相唱和。至最近，又（为）争执行部位置，及预备市党部委员之选举竞争，最近且与民权社相结甚固。其拉拢（介绍）国民党员（为投票计）之力、（滥）亦相当。北京学生与国民党得此种小团体为之中介，其在北京之活动，表面顿形热闹。就好方面说，是学生一时皆集中于国民党——国民革命旗帜之下，前途发达大有可观，然就目下情形而言，此等团体固不能实际行动，且此种小组织愈多，必至纷扰有加，革命不足。若以本团地位而言，更为不利，盖此等团体，大半以 S·Y 为攻击之目标者也。上述之点，与吾人加入国民党合作之政策上，大有参考之价值，愿予以十分之注意（在以上这段文字上，作者作了“团体竞争”四个字的眉批——编者注）。

北京学生与 S·Y。

北京学生之知 S·Y 者，除北大外，为数不多，然一年来，知者殆很不少。就知者中，骇怕、妒恨与同情者各半。其所以恨者，多因学生界事皆 S·Y 同志所主持，有时态度（以个人方面为多）之不经意或有陷于包办，致非同志之同事有时有被利用或欺骗之感（民权社及建国团即有此感）。其赞成者，则以 S·Y 做事之能力，任事之精神，态度之光明，胜过民治等然也。前者反对 S·Y，据其所言，皆非反对 S·Y 之主义，乃反对 S·Y 做事的人——此点值得反省。此次于介绍国民党党员中，得不少新同志。此辈皆信社会主义，而不知有此项实行主义之机关者，此等现象，或者为我们同志太不置意于宣传所致。

可注意的蒙藏学生。

北京有个蒙藏学校，学生百五十人，皆蒙、藏官费送来者也。此次本团为国民党介绍党员，得一与他们接触的机会，深觉此辈学生将来于蒙、藏事业之发展，有极大之希望。现加入本团有最进步者一人，人民党者数十人。此后，北京地方当注意此新方向，现在不过提提而已。

广 州

广州初为农业社会，以地滨海，近卅年间，国际帝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农业制度崩坏，工商业又不能自力发展，失业者甚众，人民经济贫困，由是经济变动及于穷乡僻壤。所谓士之阶级，书香之家，已成破落户，不能自持。加之十三年来，政治扰乱，兵燹遍全

省，人民迁徙流离，痛苦不堪，以致全省教育不振，文化低落。在这种经济政治状况之下，发见两种学生。第一种，是投身在教会学校里面读书，希望毕业后在洋人所管的生产机关，或教育机关谋生混饭吃，以及想做官发财。此种人教育出来，只是洋人的奴隶，帝国资本主义之走狗。第二种，是小资产阶级的子弟，厌乱食贫，无法解决自己问题，便想复古，读圣贤书。此种人，以在乡间及私塾里为多。其思想介在此二种之间的学生，为数亦不少。

广州除我们的新学生社之组织外，尚有民权社（七十余人）和知用社（四十余人）。前者好虚荣，不肯参加实际群众运动。曾办一《民权半月刊》，因在校中取得地位而逐渐涣散，我们同志加入活动，现有可取而代之之势。知用社是研究文学团体，妄谈时事，遭我们之痛斥，唯颇得一般商人同情。

广州学生联合会为一种不生不死团体，有大事如反曹及海关运动时，即出来运动号召一下，事过即行死去。其中教会学校学生较占势力，曾于去年暑期发起一次平民教育运动，演剧、筹款，办平民学校四所。该次运动，我们新学生社同志加入合作，故教员多为我们的社员。该会自该次运动后，复寂然无闻矣。我们同志现在正谋加入该会，在进行中。

香 港

香港是商人与一般满清遗老及失败官僚托足地，他们的思想是复辟的，因此旧礼教观念充满群众脑海。他们的子弟自然头脑顽固，但同时都羡慕资本主义，年纪稍长，无不习英文。

帝国主义者在香港，实施其奴隶教育及基督教宣传，因此，香港学生绝无觉悟，与新文化格格不相入。香港学生既多为官僚及

洋买办家子弟，其于学校毕业后，又多靠洋人为生，无毕业后失业的恐惧，故其学生，迥与中国内地小资产阶级性质之学生不同，而学生运动难有希望。我们同志在学生中亦无如何势力。然而，我们同志现正计画在该地组织一公开的学生团体，吸收比较进步分子，做传播新文化及反对外人的运动。

安徽及其他各地

安徽的学生运动，在过去是很激烈的，为驱逐李兆珍而罢课、罢市，为争教育费而流血，为贿选而捣毁议员家宅，都是安徽学生反抗军阀的行为。安徽学员是很奋斗的，可惜我们在其间没有主义的宣传。安徽而外，福建学生亦甚革命，抵制日货、反抗军阀，都闹过几次风潮，可惜我们在该地一点也没有组织。在上海、南京许多学生更笼罩在外人教育势力范围之下，在此处，学生界的空气，缺乏革命精神。他们所崇拜的是金钱主义，他们的目的是将来找饭碗与位置，他们学得最好的(是)英文，无一点反抗政治与从事社会活动的兴趣。外人在中国教会教育之成功，当以江、浙为最了。

湖 南

湖南学生之思想，在此时可谓正在一反动时代，从前种种活动，皆日见沈寂，毫无进步。最大多数，皆麻木不仁，不问世事。其余浪漫的、空想的、自私的思想，亦占大势力。全省而论，约有半数之学校内无一同志。

学校中有学生会、自治会等之组织者，约有三分之二，其余均

极散漫，毫无系统。学生联合会除在长沙为同志从中所主持，尚比较有统率学生之能力外，其余各处，则仅存其名义而已。以同乡关系组织之学友会，则颇形发达，然仅参与地方事务，毫无统一的联络。各种学术研究会，亦均在教员指挥之下而成立，甚少自动的大规模的组织。以意志结合的团体亦不多有，除同志组织有三四个团体外，稍名于社会者，仅一青年学会（安其社组织），然现时亦无形涣散。

学生界之出版物，除学生联合会周刊外，各校发行刊物者，亦复不少。各地方学友会之周报、旬报，在长沙最盛期，凡有二十余种之多，现时存在者不过八种矣。

各种社会运动，学生参入者以爱国运动为最热烈。青年救国团（长沙）、爱国励进会（衡阳），人数均多至数百。平民教育运动，农村运动，则仅同志参加。此外各种游行会、追悼会亦尚能有多数学生足迹。

文学书籍在学生界行销最盛，次之，则为社会主义书籍。《觉悟》在各校约销三百份，《中国青年》最多时行销至六百余份之多。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全宗 514，目录 1，案卷 26，

第 103 -110 页（汉文原件）

守常交来的报告(之二)

——全国国民运动状况

(一九二四年七月)

四 川

四川国民党执政虽若干年，但旧革命党员已衰颓下去，现在四川之国民党全无党员，只有政客。政客在失意时或担当党务，待至接近政权，则已造成政客之地方实力，竞争议会选举为务矣。四川之国民党，包括三派势力（熊、刘、但）。此三派分子瓜分国民党职务，各有组织，此等分子衰老已极，在四川各县办党所收党员，都是谋位置的结合。他们不知群众运动为何物。当庆东海关问题发生时，我们同志提议援助，不能得其赞成，亦不知分散国民党宣言。迁北军兵临成都城下时，我们同志提议召集国民大会，以工人为中心，亦未得头绪，即此数事，已可充分证明国民党之旧分子，根本不了解群众运动。北军人成都后，我们同志又提议：（一）注意向民间宣传，改良报纸。编辑消极的不反对北方，积极的宣传庆东民党政改组经过。（二）注重党员登记，分区开会、训练、教育等四项组织党办法，又不见采纳。他们只希望利用挑拨刘湘与刘存厚分裂，再实行政客手段，重握政权，不愿以民众为基础，盖深恐民众得势，政客

与军阀之势力均无从保存与发展也。自杨森据成都后，彼等或亟谋军事进行，利用政客家挑拨敌方，以谋恢复地盘，组党事更无暇计及了。

由四川的国民党组织，我们可以看出旧国民党为军人与政客，即一种生活上的落伍者，希望他们革命，为如何不可靠的事。此辈心理与目的及其残民手段，固与今日直系下之军阀与政客如出一辙。他们的革命，为的事〔是〕做官发财争地位，仍与群众利益相反，群众也不寄以同情，所以民党于失去成都，北军爪牙入城后，成都人民亦不见有何同情于国民党与反抗北军的举动。

北 京

北京国民党中有很多小团体，党员全为教员知识者及学生。这些学生加入本党，一部分目的是要求活动，在求生活，在争权位。一大部分是徒相信国民党，并不活动，只是挂名的党员。今年为组织北京执行部、各团体中竞争、倾轧、相互利用、造谣、合纵连横、以谋瓜分其中职务。这些团体无与群众接触做群众运动之勇气，无号召运〔群〕众运动之能力，所争者一朝之地位，且各团体各有命令，各有利害，以致国民党之权力反不如各团体内部之势力有效。纯学生的政党组织，其缺点可于北京国民党中完全窥见。

上 海

上海的党员有学生，有工人，失意军人及政客，有商人，有官僚，上海地方之组织，虽执行部努力，但（因）此等分子生活不同，问

题各异，殊非凝聚力可言。区分部、区党部多难成会，有些分子是（的）不到会的，因为他自视甚高。有些人要自己召集若干人组织区分部，直隶执行部的。可见许多人都不明党的组织，而且有点个人主义。但是最近，上海的国民党很知道去注意本地方问题与接近群众，循此方向去做，将来可望进步。

广　　州

广东的国民（党）的情形，见 S·Y 一年来之活动的报告，兹不赘述。

自去年国民党改组，我们加入国民党的理想与计画，已有一部分实现了。这一年各地活动的经验有以下二点可述。

第一，我们以前希望国民党成为一有纪律，权力集中，是〔能〕集合全国革命分子的理想是不能做到的。国民党中自含各派，其各派的利益，绝难一致。且小资产阶级素素〔来〕惰性很深，只知空谈与唱高调，怯于行动，所以要使国民党步伍俄国 G·P· 组织，在〔成〕一统治〔一〕知识阶级的政党为不可能。事实上，凡是我们单独组织的国民党，其活动有数处反较有成绩，若是派别复杂，大半精力都用得〔于〕对付内部，很难合作，其在民间的运动，会变成毫无成绩。

第二，自有本年的国民党活动的经验，我们更深切的明白，国民革命运没有工人、农人的参加，等于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以前我们是很注重国民党改组工作，劳动运动没有进行，所以我们此次认定，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运有一种可能的限度，我们（们）须多独立致力于劳动运动与农民运动了。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全宗 514, 目录 1, 案卷 26,

第 111—114 页(汉文原件)

守常交来的报告(之三)

——全国劳动运动状况

(一九二四年七月)

广　　州¹

广州的工业不发达，只有铁路工人、海员、电灯、电话与兵工厂等是工业工人，手工业甚多(如油业、建筑、米业、驼载、搬运、茶酒居)，在表面看，似乎工人都有组织，但多是空头招牌工会。许多工人加入国民党，有的是盲目的，至多不过是友谊上同情的参加。还有些工人是由一工会号称全体加入，实际不过是互助社(国民党劳动运动机关)，为运动选举投票使他们加入的。到现在改组以后，有些确是一部分感觉切身利害关系入党，切实做国民革命工作的，计粤汉路与艺余工社(三百余人)与兵工厂(三百五十余人)，共加入五[六]百余人，连职员也在内。此二处之工人虽加入而不甚觉悟，故此二区分部的执行委员均是处长和职员，而非工人分子。海员虽已成立工会，但海员群众多对工会淡漠，更无论于政治运动矣。至于在其余手工业工会中，做国民党活动的，多属旧党员乘机做个人活动，故工人了解国民革命之意义者尚少。在我们支配下的油业工会与建筑工会，加入国民党者尚少，共约二百余人。此二

团体实为我们做国民革命运动之根基。

广州之工会组织无大发达，已有的海员、机工、轮渡以及其他小手工业工会，均日形涣散。惟粤汉（路）之车务与机务工团体合为机科工团（现改为艺余工社）。锦纶土丝织造工人，本分为十八行，甚为涣散，经过一次请愿，渐趋一致。油业工会已在三处成立三俱乐部，准备改组两个联合总机关。如工联会与总工会之互相攻击，渐趋和缓。此数者为统一运动之趋势，可视为好现象。

广州一年来之罢工，仅有二次。一、去年九月油业工人罢工，相持三月，因东行不履行条件，至十一月底终止，完全得胜。二、米业工潮在本年一月，经二月之久，要求加薪，得到部分胜利。

在广东工人中的教育宣传，有四种刊物：一、《理发月刊》，无政府主义者主办，专尚空论。二、《兵工厂周刊》，由我们同志编辑。三、潮州之《潮工周刊》尚好。至香港所出之《海员月刊》与《劳动周刊》则完全不知所谓。

工人教育机关，有兵工厂之青年工人学校与工人子弟学校。油业工会之三俱乐部，每周召集工人讲演一次，亦可视为教育机关。

香 港

香港是外洋货物输入中国，中国原料输出欧洲所必经的口岸，经济之权揽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之手。埠内一切生活品，直接间接归外国资本家和洋奴垄断，生活程度高，工人收入仅足糊口，尤以居住一层最感痛苦。

新式工业以机器、造船、航业为最发达。各种手工业次之，织造工业及苦力又次之，运输工人为数亦不少。香港新式工人（海员

在内)占十余万人。工金最优的要算机器工人与海员,每月工金约三四百元。其余小手工业(如木匠、泥水匠等)次之。此种工人不难一跃而为资本家,故不甚感觉痛苦,但多数感觉外力压迫。其次感痛苦的为运输工人,最苦的为店员及织造女工,此种工人,每月[日]工资在五角以下。

香港手工业工人都组织有工会,但不甚团结。船厂工人至今未有组织。海员工会涣散得很,渐变成工人间的官僚组织。香港工人以居外力压迫之下,故爱国心较内地工人为烈,颇倾向国民党,惜国民党以前不能组织他们成党,无多宣传,不善利用此革命之潜势力。

四 川

四川尚无工业,唯有手工业。我们在成都的同志曾改组成都劳工联合会为各业(如机织帮、水丝帮)之联合机关,后在各帮中进行十人团之组织。

武 昌

武昌有纺织业工厂七八个,造币厂工人共一万五千余。此等工厂中,童工与女工占五分之四,余为男工。汉口亦有香烟厂与纱厂,童工与女工均占大多数。作工时间为十二小时至十八小时。工银,童工最低的每日只有八分、一角,最高的每日只有五角。我们同志除在造币厂、麻布局及电话局各有数人外,其余纱厂的运动,完全没有插足进去。

上 海

上海是中国工业的最大中心，以纺织业、造船业、铁工厂、香烟工厂为最多。但上海虽有三、四十万新式工人，并无一真正工会组织，即有工人工会，除海员工会外，仅有—南洋烟草职工会。上海工会不发达的原因：（一）由于租界侦探密布，压迫很严。外人统治租界，由他们本国的经验，已熟知劳动运动之可畏，故预防其发生亦甚周密。（二）由于中古时代遗传下来之秘密组织（如青帮、红帮等），工人流氓内部阶级制度及纪律极严酷，遇有违反该帮规则的，即处死刑。有许多工人寻得工作，由于一帮的首领介绍，如欲组织工会，乃为脱离一帮羁绊之表示，此为首领所不容许者。且该帮杂有侦探、巡捕，对于不法行为亦可侦知。（三）由于纺织业技能简单，从各地投奔应（征）者很多失业的人，如有组织可以另有新工人。且年来中国棉贵纱贱，纱厂多有倒闭，工人更不敢有所行动。至于技能熟练之工人，则或在极严之监视下（如船厂工人），无组织工会之可能，或以生活优裕（如铁路工人），无组织工会之必要。故上海劳动运动，工人虽多，较各地为退化。

上海有许多冒牌工人的团体，如纺织工会，安徽驻沪劳工会，中华劳动联合会，均是拆烂污的高等流氓组织而成，多是一、二人顶着一个招牌，招摇撞骗。有时一人组（织）几个工会，对时事打电报，逢纪念日开会，而且他们与侦探联络。租界外人亦知其为无工人之工会，有此假工会，可以阻真正工会之发生，故亦任其存在。他们对真正的工会运动是尽力妨碍的。虽然他们在报上开纪念会时如何热闹，然而我们的同志不敢与他们合作，因与他们一接洽，即有被侦探注意之危险也。

我们在上海的劳动运动，须与国民党合作，且已与国民党合作。近方在杨树浦及吴淞二地，办两个工人补习学校以为入手之地步。一方亦对各种工人之接洽与调查，都由我们同志以国民党名义去做。上海除劳动运动外，尚有一商店店员联合会，为我们同志所组织，现有四、五十人，正在发展中。

北方铁路工人运动²

我们的最重要的运动要算是北方的铁路运动了。北方及扬子江中部的铁路工人，在C·P指导之下，组织了一铁路总工会。各铁路虽在二·七失败之后，工会被封，活动分子被开除，但有一、二工会仍是秘密的存在着，工人间多有为C·P组成小组教育训练的。在此时的铁路工人，颇有感于团结与组织工会之必要。他们在此时，因无工会，动受职员压迫欺侮，回忆以前有工会时之受人尊敬，自然发生工会要求。不过此时北方军阀势盛，铁路工人难有公开结合，只有由铁路总工会不时派人到各站去巡视教育，助其组织。我们在铁路上，只有三处有地方团，有二处工作完全缺乏指导。闻铁路上青年工人极多，我们如经济充足，则为振作全国劳动运动之命脉起见，实有派人久驻该地以执行青年工人教育及组织工作。

安 源

安源在工会成立一周年之后，近颇注意青年之工人运动，并已于工人中发起了一青年工人同乐会，训练一般青年工人使做我们

的同志。此可视为我们公开的青年工人运动之萌芽。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全宗 514，目录 1，案卷 26，

第 115—119 页（汉文原件）

靳云鹗免职前后北方军事概况

——六月十一日北京通信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一日)

南口战事，在最近两星期以来，非常沈寂，其原因由于孙传芳、李景林、靳云鹗、田维勤与国民军之新结合大有成功之趋势。彼等结合之内容：（一）孙传芳进兵山东驱逐张宗昌；（二）李景林占据天津，阻止奉军南下并援助孙传芳打山东；（三）靳云鹗由娘子关进兵山东[西]并与大同方面之国民军夹击晋阎；（四）田维勤进兵南苑、通州一带，与南口方面之国民军合力驱奉军出关。此种酝酿，各报上鲜有登载，仅有《顺天时报》略有披露。但在张作霖、张宗昌处，固早已有人告发。因此张宗昌、张学良于五月十三日便匆匆返津，并到奉天谒张作霖，一方面固为报告在京与吴氏代表齐燮元会（议）谈之内容，一方面还是为军事问题。

张宗昌离北京时，便令进攻南口之鲁军继续开回济南、德州、沧州一带驻防，名曰兵士过劳，调回休养并剿山东之匪，其实是为防御孙传芳之进攻，闻是时孙传芳之军队已集中徐州一带。张学良去后，便令驻京之奉军全数开往唐山、开平一带驻扎，并宣传奉军对于南口仅取援助地位。及鲁军开回济南后，南口方面之防务大部分为关外奉军，其次为褚玉璞之军队，最次为李景林所部，合共约三万余人，此时之总指挥为褚玉璞，对国民军仅取守势。国民

军闻鲁军撤退，曾作数次佯攻以诱奉联军进攻，而加以重大之打击，因此常发生小战。此时李景林驻防京畿一带之军队，并未向南口增防，而天津一带之李军又在北京附近集中，因此褚氏对李疑虑交加，乃离北京返津，谋牵制李之旁面。此时李景林寄居租界，行动极秘密，褚氏到津曾逮捕李景林之暗探及便衣侦探，对于李氏部下军官供职褚氏部下者，一概降级。李氏因自己光棍军官太多，无法位置，并觉自己实力太小，碍难应付环境，故在天津一带招兵，想扩充势力。因此褚氏便出警告，给李景林一个暗示。其布告有云：“近闻各处仍有私自招兵，实属胆大妄为，殊堪痛恨……”。李氏为反对褚氏，便令其部下操纵金融，使直隶省银行钞票及铜票子不能通行，而破坏地方秩序。并闻李氏部下有想在天津暴动者，褚氏为防御李部下作战，曾撤回南口方面之部队集中廊坊、北仓一带，南口防务乃由奉军调于珍率所部由唐山开到南口接防。同时奉联军在杨村、通州一带掘战壕，以防田维勤进攻及李景林倒戈，并在奉天方面进行国、奉合作以抵制孙、李、靳、田之新结合。

此时国民军见南口之敌人和缓，乃用全力进攻山西，于廿七日占据大同，致晋阎惊恐，连电促吴、张一致进攻，以解大同之危。靳氏藉此机会，想以援晋之名进攻山西，阎氏拒绝，因此靳、田乃按兵不动（此时靳部下驻保定一带，田部下驻长辛店一带），虽吴氏数电，令进兵南口，靳、田终未如命，均以饷械未完备为辞，以敷衍吴氏。在奉天方面，则言吴氏若不进，我军绝不愿单独前进以覆[复]阎氏。国民军得大同后，更进攻雁门关，大有直入太原之势，吴佩孚见势不佳，乃急于由汉口北上。当时各报盛传吴氏北上为吴、张见面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为解决田、靳问题。阎氏见吴后，便大说靳之罪过，吴氏始决定免靳之职，又恐靳氏部下生变，乃在石家庄召集军官会议，先商诸其部下，并令其前卫队旅迅速北上。及吴氏抵保定开军事会议，首先以免靳职令示靳，靳氏大惊，只得

暂为屈服。当时与靳同情之田氏，亦不得不附顺吴氏，以冀保全地位。闻此次吴氏之不敢免田维勤职者，因田与吴关系甚浅，恐其遽然倒戈，吴与靳氏则交情颇笃，虽免职亦不易生大变，且靳免职即可以警田。

吴自免靳后，便自任讨贼联军第一路总司令，并收靳部下改编。在保定曾召集各军大会，商议积极筹备进攻西北军，以解山西之危，其计画以第一路各部队援应南口，归田维勤指挥；以二三路各部队援助晋北，归王维城指挥。现在晋北事急，已令王维城、王文蔚各抽所部精锐经山西太原，改乘汽车赴晋北前线作战，田维勤率部进至门头沟沙河附近。

至于奉方因吴免靳职事，对吴颇表满意，甚愿与吴军合作到底，讨平西北军，因此对于南口战事也积极筹备，每日由京输送粮草赴南口方面，预备作战之用。多伦方面，闻吴俊升之骑兵约二万余人已开到，与国民军小有接触，似是，则张、吴、阎联合进攻国民军之计画已熟，闻本月十四（日）后又下总攻击令。李景林全部均入京，现归胡毓坤指挥：在前方（南口方面）者，有荣臻之第一军，胡之第二军，苏锡麟之第九军及李际春之骑兵师，其实人数不及二万。

前日在廊坊，赵杰师被褚玉璞缴械。闻被缴械之原因为纪律太坏，其实是与孙、李、靳、田结合有关，此师人大多虽被缴械，少数仍流为匪类。李景林现尚在天津租界内养病，闻将来北京。

西北军自吴免靳后，曾开军事会议，决计以七万人攻山西，三万人守南口，一师二旅骑兵守多伦。多伦之总指挥为宋哲元，南口方面之总指挥为鹿钟麟，西北方面为李鸣钟。现闻晋北战事仍急，雁门关有被国军占领之说，但吴、张、阎合作进攻成熟，国民军恐难应付，不过吴、张、阎是否能始终合作，而靳、田、李是否不生变化，均令人怀疑。据传闻，靳部虽被改编，而靳部下有许多官长仍向靳

氏接头，吴氏现在保定久留，不敢早日来京，亦因此问题未妥当之故。至田维勤虽进攻南口，是否愿意参加战事也是问题，因为田部下多不愿向国民军进攻，且知国民军利[厉]害，南口又不易攻下，将来是否会倒戈与国民军合作，皆不可知也。

署名：列武

《向导周报》第 160 期

1926 年 6 月

天津会议与时局的将来

——六月十九日北京通信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九日)

一、天津会议

天津会议之所以必须举行，实以和缓图穷匕（首）见的张、吴关系。这次会议对于现时政局有重大的意义。现在会议已经终止，在会议中两方代表对于内阁问题、军事问题与法律问题，均有相当成议；两方对于天津会议本都抱有决心，两方选派代表都有相当负责地位，其会商结果自然应有相当效力。

当直方代表张其锽等谒张陈述吴对宪法、内阁、军事等意见之后，张谓：“子玉一切均有办法，甚好甚好，请他全权主持，我回奉过节好了。”即到天津会议举行之初，双方代表也不过酒肉酬应，并无会议形式。直方虽提有关于军事与政治的书面意见，但奉方对之似甚淡然，而斤斤于“宪不可护，颜不可复”。等到杨宇霆受命来津，方有一度会议。后来奉方由杨宇霆提出最后意见：

一、奉方始终反对护宪，迭经表示，颜惠庆自称依法复职，奉方绝对不能承认，应请直方促其即日自动取消，即由直方另行推人组阁；

二、对付西北军，奉方一听吴氏主持，合作到底；

三、国会及其他政治问题，在军事未能解决前，奉方认为尚未到讨论时期，不参加任何意见。

闻其结果，直、奉双方代表最后意见归于一致：(1) 颜阁辞职；(2) 军事听吴主持；(3) 政治、法律问题保留。此项议决已由双方签字。(但据另一消息：直方代表张其锽等既于初来之时即碰了张作霖一个钉子，现在奉方又提相差尚远的最后意见，觉得前途困难，于是向杨表示，此等重大问题，须先向吴报告方能继续讨论。并闻张其锽由电话向吴详告以后，吴表示异常不满。如是张即向杨走辞，谓：“双方讨论现在已到相当程度，吾人可以就此结束，本人现在须赴保报告，一切问题只有由二位大帅亲自谈谈，方可澈[彻]底解决”，并于十一（日）夜汽车赴保，杨亦于次晨返奉。杨于起身返奉时，首告张作霖谓：“本人未发表意见以前，不可进京。”)如是万目睽睽的天津会议成了过去的事。

当天津会议的结果由张其锽报告到保之时，吴佩孚及其护宪策士大示[肆]不满，始命劳之常到津与张作霖商量变更津议，被张严辞拒绝，于是乃令张其锽来京进行津议第一项。此项实现之结果为何，即可定张作霖之是否来京。换句话说，就是张、吴是否可以两不冲突。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张其锽所签字之天津协定，为吴及其护宪策士所不赞成。但在事实上又不能反悔，以促起冲突之急于实现。所以直系策略，以颜阁一次阁议后即行解职，在其辞职宣言中含混说辞，使护法者读之，认为颜阁已完成宪法已有根据；反对者读之，认依法摄阁之颜既已下野，逆贼罪名根本不存在，在面子上也可不再反对，(只)要能(只)赚得张作霖入京，就好办了。但是奉系的策略又是怎样呢？于天津会议之中，奉系已开下价钱，现在不过是在津坐等还价。如果颜惠庆果然宣言并非依法摄阁，从此下

台，在张当然可以一度入京，在无可回旋的地位，促直、奉关系之早日决定，但是此与直系政策已针锋相对矣。

二、张、吴妥协中的裂痕

军阀的结合是不会巩固的，现在张、吴面前有一国民军为其共同敌人，所以他们的关系，还得暂时处于要决裂不决裂的形势，而其结果恐怕是凶多吉少。现在我们不能否认他们两位大军阀正在进行妥协，但是我们又何能否认他们正在预备冲突呢？

此次讨赤的结果，吴佩孚以取巧起家，于军事上既未受损失，于政治上又大得便宜，使奉张处于莫可如何的地位。可是到了新直系进行甚猛之时，吴又不得不微向讨赤战争中的盟友表示让步。天津会议之后，吴之地位甚觉困难，他一面表示由张其锽来京进行津议第一步的实现，一面密电孙传芳，告津议中奉方之无诚意，并问将来如果发生战争，孙持如何态度；他又令顾维钧以讨粤为条件，与英国成立二千万借款以厚财力，同时张志潭等又往访国军代表以谋妥协，并接济李景林军械与军饷廿万元。

至于奉方呢？除了催促吴方赶快实行天津协定外，要求吴佩孚退还魏益三部军械及解散唐之道部队。虽然口口声声向国民军作战，但在实际上，奉方连褚玉璞军队都已从前线撤回，而战事工程又皆作可以战国，可以战直的形势。

由此我们可以看见正在妥协的吴、张，双方也正在预备冲突。在护宪等问题未能妥协解决之前，张作霖决不能助吴佩孚作战，使其抬高政治地位。

三、最 高 问 题

张、吴关系不仅在颜阁、宪法上冲突，即在所谓最高问题也冲突得非常利[厉]害。据说吴佩孚以现时为千载一时之机，稍纵即逝，颇欲此时荣任大总统，岂知关东胡子雄心并不弱于秀才，故表面以法律、政治问题公诸国人，里面进行另闢门径达登大宝之目的，所以护法呼声虽高唱一时，现在本身问题僵而又僵，虽经百计疏通与协商，终无公认平允之办法，如是最高问题有另现颜色之谣传：奉张首向秀才提议溥仪复辟，并闻吴已同意。

此说虽然兀突，但日本帝国主义天皇万世的思想，并不见得不如此应用出来，英国帝国主义也不见得不利用此种机会完成吴佩孚政府，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将来时局之出人意表的发现。

但若果如此，张勋的覆辙与段祺瑞的故智，又要重新排演一回，揭开新的改[政]治局面亦未可知。

四、山 西 之 战

吴、张间关系，如果军事上没有大的变化，一时是不会破裂的。现在吴系军队果然开抵前线，势将与国民军战，虽然不必计较前线将兵之战与不战。但是，如果天津协定执行不妥，张、吴不能晤面，国民军克服山西全省，则一旅之兵力可以直扑保阳[定]，新直系势力可以乘时活动，而其结果，吴佩孚欲不倒不能，张作霖欲不退不能，北方形势马上成了一个新的战局，全国形势亦必大受影响。

此种危险实为奉系所深知，故奉派不时向吴表示，请其注意三

角同盟(新直系)的活动，并不可到前线督战，而已系军队军事工作又作向直作战之准备。

近日日本帝国主义虽在奉省增兵，以助奉张镇压统治，同时又令其机关报一方面暗示此种危险之不能幸免，一方面又鼓吹不可作无名之战(讨赤之战为无名！)，同时暗示奉张采取东三省门罗主义。即张之部将杨宇霆、韩麟春等，虽然扶助奉派与吴一度协商并从事与国军一度或然作战的准备，要皆以出关休养生聚为言。由此看来，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既鉴于上次战争之损失，内部实力之不足与经济恐慌(其影响不独与日本以不利，且将引起日、法投资的冲突)，又鉴于战国既难澈[彻]底，即澈[彻]底亦不过助吴声势赫赫，于己并无所利，何况国军得胜于晋，孙传芳虎视于鲁，靳、田等阴伺于侧，而活动未尝稍息，一有机会吴固当为或然之牺牲，张又何能幸免于攻击？如此一来，不如事前早作预备，缩短战线，保守津、榆，形成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的局面。所以纯粹奉军集中津、榆路线，而对于直督亦有以小张代褚之准备。总之不死不生变化万端之局面，在最近将来必有一大发展可以断言。

顷据各方面消息，国民军对于多伦、南口均取守势，对于山西猛力进攻。现在雁门已下，太原无险可守(并有国军已进至太原近郊之说)更有商震反戈(已证实)与阎锡山出逃之谣言。若果如此，大局之突变即在目前矣。

五、时局变化的将来

根据上述的事实，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的结论：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救奉系于危亡，制造讨赤联盟。讨赤联盟的结果，使奉系居于失败的地位。日本实业派与军阀派，对于

讨赤后应取的策略，时常发现冲突之处，故经过如此时间并无确定的态度。而张、吴冲突的局面，尚无显著的发展。前者主张奉系退守关外，生聚休养，训练军队，以救战争中所产生的财政恐慌与实力空虚；后者主张向外发展，以取偿战争损失于中央政权与地盘的占有。但以奉张政治的失败地位，国民军军事的发展，新直系的酝酿，遂使后者计画不能实现。到了现在两者主张似已接近。所以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在满洲增兵为奉张维持镇压，一方面在机关报上反对战争，并劝奉张闭关自守。所以现在奉系保守的策略是积极的，在政治上是消极的。所以奉军集中津、榆线一带，形成退可以守，进可以战的形势，而在政治上只消极的反对吴佩孚的主张。我们可以说，奉系现时在政治上的野心，或止于发言有效，也未可知。

第二，吴佩孚的实力根本就不成一个东西，此次之胜利，实为侥幸。但是因为张、吴密约的关系与运用适宜，他可占有政治上有利[利]地位。虽然，因为实力不能适应他的政治超越的地位，所以他也不能大刀阔斧干出一番事业。现在不独奉张时有与吴破裂之虞，即其此次战争中之一大助手阎锡山，也就到了难以终日之势。除此以外，他的部下靳、田、魏等皆不可靠。所以吴佩孚虽然态度积极，而其结果恐一无成就。但有一事殊足有注意之价值者，吴果失败，代吴而起形成一种势力的，恐怕就是孙传芳、靳云鹗、田维勤的结合。他们的政策大概不外乎联合国民军扫除关内奉系势力。无论他们反对不反对吴佩孚，他们将成为未来时局之重要份子。

第三，国民军以能战之师整个退却，虽然一时处境异常困难，因而态度亦颇消极。现在既然大同、雁门皆已攻下，商震反戈，太原指日可下，其政治上的地位，当然超越于退出北京之时，但一时决不至于在政治上有所发言，而祇从事于军事工作，现在魏益三可以相助于蔚县，唐之道部队或可友助于石家庄一带，孙传芳、田维

勤待到相当时期，亦可突起异动。由此国民军在军事上之胜利与进展，不可谓其绝无操胜算之可能。

第四，民众方面，由此次讨赤战争受尽了人间之极苦，尤其是京、津商人，直、鲁、豫、陕农人。所以商人出于消极的罢市，农民出于积极的反抗。陕西白枪会、硬肚帮竟同残败的二军击退了刘镇华，河南红枪会、山东红枪会、黑枪会皆跃然欲动，为自身利益而战。

凡此种种，时局将来变化之密云，将皆能使我们推测，不久将发生何种局面，而南方革命势力的进展，将与此未来变化以莫大的影响与推进。

署名：列武

《向导周报》161期

1926年6月

北方军事政治状况¹

——十月一日北京通信

(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

一、西北军退出察哈尔时张之江之态度

张之江²之妥协事实约有下列各种：

一、与张、吴个人之谅解：自国民军退守南口，张之江即想将察哈尔继续让出，并曾派代表向张、吴求个人之谅解，同时即在绥远修理房屋，以表示对张、吴屈服之真心，以丧士气；后经各方之阻谏，遂寝投诚之意，维持了数月的残喘。

二、与冯玉祥之思想冲突：近数年来，冯之思想进步颇速，行动亦渐渐左倾，自退守南口后，屡电张之江令其与民党接近，而张乃不但不与民党接近，近在绥远各地发生阻碍民党之事实，处处表示右倾与妥协，故终未达合作之目的，是张之江与冯思想之冲突，无可讳言。

三、愚民政策与颓丧士气：自从冯玉祥表示与民党合作，西北军渐渐了解民党之主义及解放自身的方法，张之江对民党始终不了解，甚是[至]怀疑，见人民热烈的倾向，乃示意基督教徒，提倡笼统的德谟克拉西以转移人民的目标，并且一个个拿到上帝之下去

蒙迷他的脑筋。他对于兵士的训练，只有泣涕与做祷告的两种方法，使兵士们整日的陷于愁苦悲伤的思想中。这种办法，都是含有消灭他们革命思想的意味的。

四、退却时之倒行逆施：

(甲)张之江夫人之一席话：十三号起张之江即公布退却的意思，将家眷及家具都大运特运，好像是不如是不足引起民众的恐慌。当张之江姨太太往西退时，一家人就占八九列车，有五六个列车都是旧的家具，如破床、破棹〔桌〕之类，张之(江)夫人即非常不满，曾当众骂张云：“像你这样的退却，简直是把这些兵士置之死地一样，你的姨太太算什么，为何要占九个列车，兵士们脚断手折都还得一个车位，你的姨太太的破马桶都带走了，像你这样的昏聩，怎能对得起上将军练兵的本意？”张听了没有回答一词，只喊快快开车、开车罢了。

(乙)摧残士卒：张退却时的情形有如上述，由前敌退回时的兵士非常劳顿，不但没有医药，并且不让上车——车因运其家眷及西北银行现款几百万，因此散走四方的为敌缴械者不下三四万人。张并下令将干部学生断后——干部学生比较进步——以达摧残目的，后经李协和³等反对，方另调殿后军。

(丙)退却前之谣言种种：张之江信任一部分交通、安福系的小走狗，以致他们得志西北，并整天捣乱。当退却时，督办署某两处长谓：某部倒戈，某部哗变，或五马已投降吴等谣言，其实都是没有的事。

(丁)日人松室孝良之卖西北军：退守南口后，张之江所依以为左右手之高等顾问松室孝良，时时暗中勾结敌方。西北军退出后，松室即派人欢迎某派并受某军之优待，仍居高等顾问之职。闻张之江尚对此人恋恋不舍，尚遣人邀往西行。

(戊)反动牧师之言论：谓退出察哈尔于张之江非常有利，并且

非战败，因外人说西北军与国民党有关系，国民党在西北非常活动，此次退却，一方为仁者之退让，一方即为与国民党脱离关系。其言论在完全迷惑张之江，观于张极力否认赤化，即其从中作祟之证也。

以上是在西北政界做事之国民党人在张垣⁴目击耳闻之事，极为确实。西北自南口退兵之前数日（八日或十日），日本电通社即发电京阪各报，谓：“西北军非战派的密使到奉”，证以上述之报告，南口撤兵或即张之江与奉方秘谋妥协之结果，亦未可知。

二、最近关于西北军的消息

冯玉祥于九月十日自库伦⁵动身向包头方面出发，临动身时有一电致唐某⁶等，谓此次回国，誓必积极进行革命工作，最要紧的是要把西北军赶快的与北伐军接连起来。说他这一次回来，要分三路进兵：一路由甘肃入陕，由陕西入汉中或出潼关；一路入山西攻取太原，出娘子关或紫荆关；一路由京绥路出南口攻取北京。此计划要即日实现。

在这个电报里他并且说：方振武倾向革命较前益热，预备联合西北二三军的残部，由榆林入陕，改造军队，立志把他的军队变为党军，这是九月一日的消息。但是到十七日消息，包头至库伦无线电忽然不通，库伦方面说是包头为石友三军占领了，石已投降晋军了，故库、包间从此断绝消息，而冯亦不能直接回包头了。关于韩、石投降晋军⁷，有另一个解释，说是商震已与国一军有所结合，故彼等奉冯令为此。九月十日刘芳牧师自包头抵京，说冯已安抵五原，包头国一军将领已纷纷往五原谒冯，冯将在彼处召集军事会议。至于八月十二日京畿一带许多友军相约起义而未果一事，西北军

方面亦为惋惜，完全委过于熊斌（西北军驻京要人）一人，说他并未有详细的电报报告此事；可是就是刘芳亦仅说张家口受收无线电的人亦有通敌的嫌疑，故紧急要电多被阻隔，十二日之事，亦是无线电方面出了毛病。

综合各种消息看起来，多伦之失败，十二日举事之失约，大同之久攻不下，南口之撤兵，以及撤兵时之撞车、军用车出火等等，似均由于内奸之所致。西北军营垒内还有敌人的奸细混在其间，这样在革命战事中，何等危险！此次冯归来，颇决心把西北军改为党军，以从事于革命工作，第一要紧的，恐怕还是肃清内部。

三、陕西的现状

九月八日三原来信说：国一军于八月底，将张兆钾、孔繁锦部完全肃清⁸，攻下天水、平凉、泾川。九月初在西安三原方面之国二军，派代表与国一军代表在某处会晤，商定两路援陕，先出三混成旅，相约九月中会师咸阳，解西安之围⁹。陕甘电报于九月七日已通行无阻。一军已向三原进发，援助国二军。邓宝珊¹⁰仍在三原，国二军大部归其指挥。麻振武部一部分倒戈投降国二军。三原、径阳、咸阳、富平正受国军攻击，陕局变化，即在旬日间云云。京中消息，西安围已解，战事现在华阴渭南间，吴不敢返洛阳，即系因此。

四、河南军事状况

河南的军事状况，我们看下列二表便可以知道：

河南军事调查表(二)

师号	师长标记	兵额	枪数	成分	战斗力	驻地	任务	与人民之感情	系统	备考
第九师	寇英杰	5000	4000	鄂军	平常	郑州郾城	防御樊部	尚不恶		
第五师	贺国光	2000	1500	鄂军	无	郾城	防御樊部	极坏	寇系	
第六师	贾万兴	4000	3000	鄂军	无	郾城襄城	防御樊部	纪律坏		
第四师	陈德麟	5000	3000	鄂军	平常	豫北卫辉	豫北镇守使兼警备司令	坏		
第十四师	陈文钊	2000	1200	直军	无	舞阳	攻樊			
第十六师	徐寿春	2000	1800	直军	稍有	方城	攻樊	军纪尚好		
第二十四师	王维烈	王城	吉袁	尚在直境，少数后备队驻彰德新乡					断系	徐师授南
第二十五师	马吉声	田维勤	0	陕军	无	信阳	攻鄂			
第二十二师	魏益三	魏	三旅	奉军	稍有	郑州	后防司令			
第五军	吴佩孚	红帽军	步枪齐金	有大炮数门					无	尚有一部分队伍在直境
讨贼联军	杨清臣	杨	约数百人枪约三百支	官兵团卫队共二十余件					无	人民反吴
总司令	张锡珍	珍								
师	任应岐	应	9000	8000	旧樊部	平常			吴直辖	
旅										
第十师						许昌郾城	驻防			
						周家口				

一部分尚在直境，一部已南下开到许昌至确山之间，人数不多，且无战斗力。

第十二师	李镇亚	镇道	6000	5000	旧樊军	平	常	樊防	驻	樊	反吴
第一混旅	王遵		800	500	豫军	无					
	樊钟秀	约四万人			枪约二万	只能制胜	全	无			
	马文德	德	1200	800	土匪	无	常	樊	唐河	攻	坏
第三师	李郭	鸿振	800	300	豫军	常	常	樊	东	镇守使	坏
第一混旅	樊钟秀	襄	3000	2000	豫军	平	常	樊	豫	防	坏
第五混旅	袁家	震	2000	1500	豫军	平	常	樊	德	驻	坏
第六混旅	李元	震	2000	1000	豫军	平	常	樊	归德		坏
别队	张玉山	玉	3000	2000	土匪	无		樊	潢州		坏
□	刘镇华	共	约三万人					樊	方城	攻	坏
	张治军	约三万人						樊	登丰	攻	坏
								樊	在直境		最近与樊有关系
								樊	常		与人民感情尚好，而战斗力平
								樊	常		常，只能驻防不能为吴作战。

河南军事调查表(一)

任应岐(土匪)；李有才旅、王化佛旅、张得胜旅、马少山旅；樊醒民约二万人、梁寿恺旅约一万人等最与民党接近者。

庞寿恺旅约六千人、袁廷杰旅约四千人、贺国光旅约二千人、贾万兴旅约二千人、刘万龄旅约二千人、徐寿椿旅约六千人、高汝桐旅一千五百人等次与民党接近者。

刘德霖师二千人、吴俊卿师一千人、李鸿翥旅一千五百人、马及第师三千人、陈文釗师三千人、魏益三四旅约一万人、田维勤、四旅约一万人、袁家骥旅二千人、郭振才旅八千人、白鳌旅一千五百人、袁家鳌旅二千人、沈冠军旅二千人、王寿臣旅三千人等态度不明。

五、奉鲁军对战局的态度及其内部情形

靳云鹏以团结大北洋派一致对南之策，奔走奉张、宁孙间，其计划内容：(一)奉、鲁愿出兵二十万人；(二)孙表示愿以粮食饷项供给此二十万奉、鲁军；(三)以靳云鹏代吴佩孚；(四)十六日晚靳云鹏由津赴奉，节后偕张入关，即实行出兵，并改组政府。闻将推王士珍为临时首领，以靳组阁。但安福系方面，则谓仍推段祺瑞为首领，梁士诒组织内阁。安福系亦参与大北洋派结合之谋，这些确系事实。不过此种计划能否实现还是问题，据最近的形势恐怕是很困难的。奉、鲁军内部冲突甚烈，于珍¹¹未得地盘，甚失意，张学良乃以北京卫戍司令安慰之。此次穆春¹²部之变乱，亦系与高维岳争地盘。张学良往张垣解散变兵，正在车站训话时，变兵开枪击之，其参谋长某及外交处长某死焉，学良避车轮下，仅以身免，狼狈而逃。日下穆春军尚据多伦，与高维岳军抗战。前者郑庠来京见张学良，学良大骂张宗昌说，南口之役直、鲁军无功，全赖奉军之力，并痛诋直、鲁军纪律不良，蹂躏直隶人民。褚玉璞在京亦骂张

学良，说学良要夺他直隶地盘，非武力解决不可。此次张宗昌自奉返津，颇露失意之态，尽因张作霖对他表示直隶必给学良，令褚玉璞往河南，令徐源泉往湖北，所以张宗昌回济南，便召集军事会议，决定由京汉、陇海向河南出兵，褚为第一路司令，王栋为第二路司令，这不是援吴，亦不是援孙，乃是去夺河南的地盘。奉方既如此安排，似欲以学良屯兵天津，以观事变，至必要时沿津浦路向江苏发展。

奉、鲁两系在京的争斗，最近还有一个最明显的有趣的事，即是石头胡同之流血案，当晚在石头胡同妓院请客吃酒的主人，即是王栋，于珍、王琦皆其座上客。是日闻王琦先自退席，而宪兵巡逻不旋踵即到该处，这明明是有人授意含有寻衅的意味，所以当时怒恼了于珍，终究演成了一场血战。奉张闻知此事，颇有责言，命查办滋事军官。于珍一听此话，便勃然地说，查办是可以的，但是在查办以前先要解除王琦的武装，王琦是什么东西，他配当什么司令！像这样的奉系对了[于]鲁系的压迫，鲁系军官究竟能够忍受到几多时，实是一个问题。

张宗昌在京秘印攻击孙传芳的小册子三万本，又闻他小便时，必以便水激淋孙之肖像，鲁军自张垣撤兵时，人人都说要到南方打孙传芳，这都可见鲁张仇孙之心理了。奉军对南始终无诚恳的表示，他的态度是设法使粤与孙战，他在一旁将持观望，候双方精疲力竭时，然后大举夺取吴、孙地盘，以与南方相对峙。

日本京阪各大报，载有九月十七日北京发的特电之传闻，英二百万镑作战费；又日本报揭张作霖的英顾问撒同氏奔走京奉间，怂恿奉张助吴、孙敌粤。

此外莫擎宇、魏邦平赴奉乞援，奉允助兵舰两只，莫等运动苏元春之余部下七八千人，在粤南起事，魏之女婿陈某已到京与魏、莫接洽。

徐绍桢亦勾结章太炎，在津组织反赤大同盟，《民声报》即其机关；闻该报主笔邓清与徐来往密切，函电甚多，徐等与孙传芳勾结甚深。

署名：柏钧

《向导周报》第 176 期

1926 年 10 月

北方政治情形与天津会议¹

——北京通信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天津会议以前，奉、鲁对于时局的意见及其互相的关系。奉、鲁关系自国民军退出南口以后，日渐疏远，而近乎于破裂的地位，故张作霖于直省地盘，豫、苏、皖省等足以引起奉、鲁冲突的问题尚未解决而待解决之时来津，想在天津会议中，解决此问题。

在我们尚未谈到天津会议以前，我们必(先)预先明了奉系对于时局的意见，但以过去的事事实看，我们可以说，奉、鲁的冲突就在直、鲁、苏、皖地盘占领的问题，而分配地盘与破除奉、鲁的嫌隙，将为天津会议的重要日程。兹将奉、鲁的意见分析如左：

一、奉系对河南问题的态度

对于河南问题，奉方之意听其自生自灭，且有宁愿吴之苟存以为南北冲缓而不愿鲁军南下以求发展。

在九江尚未克复以前，褚玉璞急令保大鲁军陆续南下，奉方对此，时加劝阻，每谓吴氏现在的地位，决难久存，鲁方果欲得豫，不妨待吴自灭时，再行用兵，既可夺其河南地盘之实力，又可不蒙破

坏合作之恶名；而且直系军队异常复杂，新直系军队，又有相当势力，又加之西北军雄视于西，北伐军压迫于南，对于解决河南所有之一切困难，鲁军是否有力对付，均是须考虑之问题。不然奉将牵引入于战事漩涡，而又引起奉、鲁间新的冲突。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奉方之意，如果鲁欲取豫必须与吴合作，联“忠吴之军”以击“叛吴之军”，得豫尚属不难，且合于当日合作讨赤之信约。迨将“叛吴之军”肃清后，再与忠吴之军一致对待党军，实力自较充足，纵不能恢复武汉，当可以保有河南。如此做去，奉方可始终持旁观之态度，而不必出兵应援，当为鲁方所赞成者也。如果鲁方不愿如此作去，则惟有待至郑州失守之际，再行调兵入豫，无论如何今日绝不可轻率为之，自投险地，且将遗累奉方也。

二、奉系对江苏问题之态度

对于解决江苏问题，奉系以购买苏军为入手办法，前杨宇霆以十万元汇沪收买海军即其一端，今仍继续采用此项政策，而不欲施以武力，非至政治手段已见成功之际，绝不派兵南下。据确实消息，奉系持此态度有下列之理由：

(一)日本极力反对再出兵；(二)财政困难军饷无着；(三)只须苏军内部可以贿买，当兹孙传芳之势力已大失坠之际，事实上无派兵攻取之必要；(四)鲁方坚持由鲁军单独南下，奉若派兵强与同行，通过山东时鲁方必予以种种阻碍；(五)奉军实行派兵，在未出动之前，鲁军必争先南下，捷足先登，苏、皖自必为鲁军先得，殆无疑义，以今日鲁方之如此强横，奉决无单独南下之可能；(六)张作霖仍亟欲入京主政，无心作战；(七)奉方与津浦南段之苏、皖军(尤其是皖军)，尚无充分之接洽，恐其为奉军南下时之窒碍；(八)用政

治手段取苏，未来之督长，自必属诸杨宇霆，杨之雪耻夙愿于以得偿，若以武力征取，则督长必归前方有功作战将领（张学良不得志于直，对苏乃亦垂涎）；（九）政治手段轻而易举，不落痕迹，可避免他方之嫉忌，且不背奉、孙（传芳）间一致对粤之信约；（十）东南人民渴望和平，若采武力，必招东南人民之严重反感与怨恨，非今日收买人心想做总统之张作霖所肯为。

据与张学良接近者言（奉方某团长），奉方图苏确系采取政治手段，贿买苏省军队，现已有十之六七业经接洽妥当，须待孙传芳丧失安徽或并南京而亦不守时，始实行发动。

现在奉方预定之步骤，必待孙溃退南京之际，再由苏将领通电拥杨（宇霆）入苏主政，不著痕迹，且极堂皇正大之至。

总之奉方主张慎重对苏用兵者，其惟一之用意，实在于“延宕”：一、阻鲁军之南下；二、待自所企图者（政治手段）之成功。

奉方之能否取得江苏，纯视今日能否阻止鲁军之南下，而在鲁军方面，则以时机紧迫，非立刻动员不可，今日实当最紧之关头，张作霖入关所视为最重要之任务，实在于此。去电劝阻鲁军既不生效，计惟有动之以见面之情，并藉天津会议，延宕时日，又恐张宗昌之拒绝来津，乃由学良派许兰洲、王芝祥、徐世光所谓“三大员”者为代表，赴济劝驾，兼带“请罪”之性质，疏解数月来之嫌隙，即世人所谓奉、鲁间之暗潮也。学良大得罪于宗昌，宗昌既不得意于京绥线，复失意于京城，……鲁方以外之事，如中央政局等等，直无发言之权，其怀恨学良实已深极，今日并“老帅”之命，而亦公然不听者，根本实缘于此。现在奉方既有所求于鲁方，望宗昌之惠然肯来，自非先由小张向宗昌劝驾道歉不可。

张宗昌本不愿来，纵不得已而来，亦须摆点架子，其于近日出巡，且于张氏入关而后为赴青岛阅兵之准备，皆故为“不来”之表示。在宗昌之内意，亦深知来之不利而极有害，“老帅”情面究不可

却，结果自非“从命”不可，则直[真]所谓“哑子吃黄连”矣。然宗昌亦自知鲁军之外强中干，内部凌乱，将来得苏而后，仍非藉重奉为后援不可。且学良、麟春等，与己恶感甚深，若再得罪于“老帅”，老帅愤而于鲁军南下之际，设法牵制鲁军之背，亦殊意中之事。今学良既如此恭维，而老帅亦殷勤备至，面子上已光炫已极，明知天津不啻陷阱，情势上不能不投，虽然大好河山眼看将为人有，于心终殊不甘。“老帅”之情面既不可却，与之晤面，自必完全失败，计不如于来津之前，藉星使之往反，以为间接之协商，“大纲”解决后再来津商议细目，实比较的有利，至少亦不至大吃亏也。

三、鲁方对苏、皖、豫问题之态度

当孙军尚能支持与获胜于九江之时，鲁方倾向于图豫，胜于图苏，故在九江未克以前，保大之直鲁军，继续向南进展，依次实行其图豫之计划，置奉方之劝阻于不顾，直至九江陷落传来之时，始止。九江既陷落，择肥而噬，择易而为，舍豫图苏，殆属当然，其军事中心遂由京汉线而复移至津浦线。

直鲁军自大名、大南以至临城，曾于月余前以两军之兵力（直、鲁军中之两军）造成一横的防线，以为必要时进取陇海线之用。九江陷落之消息传来，张宗昌立令此横的防线上之全部军队，齐向临城集中，待令出发，他方石家庄方面，预备队之铁甲车队，亦奉令开往鲁南。但鲁张所以急于发动者，其原因为：

（一）孙与吴现已无挽回其势力之可能；（二）靳云鹗等及苏、皖将领，皆有倒戈之准备，既吴、孙已失去势力，实际上所谓倒戈不必向吴、孙而为向奉、鲁倒戈也。若再缓延不出兵，豫、苏、皖必为倒戈者所占有，则收拾极难；（三）党军已入皖，皖、闽、豫不归于倒戈

者所有，亦必归党军所有，尤堪注意者，为党军之向浙境进攻，冀联合浙南夏超之残部，以占有浙省。一面由皖而苏，一面由浙而沪，东南之危，可谓极矣，若再迟数日而不出兵，黄河流域必为侵入。至河南方面之新直系，刻亦大为活动，不久必代吴（佩孚）而复兴。国民军进逼潼关或先与直系之一部分打成一片，更进而与党军联络一气，而向黄河流域进展，就军事之情势急迫言，亦非立即调兵入豫入苏不可。

鲁方之主张二：奉军攻豫，鲁军攻苏；（一）以苏、豫两处之情势相较，苏实较豫更为紧迫，苏非立取不可，可以立即取苏者，惟有鲁军耳；（二）鲁军已集中鲁南一带，完成一切准备，动员令一下，便可立刻实行发动；（三）奉方对苏毫无军事上之准备，绝难应付今日紧迫之时局；（四）河南局势虽亦吃紧，但奉若立即准备，向豫出兵，纵经数日，亦不为晚，故奉方以解决河南为最适宜；（五）津浦南段之苏、皖各军，当经鲁方疏通就绪，且有与鲁方订立秘密协定者，鲁军入苏，殆毫无阻碍可言；（六）奉方（与）津浦南段之各军，似无甚接洽，彼等必阻碍奉军之入苏。

四、鲁方请奉方攻豫之条件

河南之穷且乱，已达极点，江苏较诸河南自胜百倍。鲁方已知奉之不欲攻豫，更不愿以江苏归鲁，特提出下列优许奉方之条件；只须奉方以江苏划归鲁方，自任收拾河南，则鲁方愿承认下例各种条件：（一）奉军入豫时，保大两属可任意驻防，其详细办法另订之；（二）奉军得河南后，所有陕西、湖北之事，均归奉方收拾；（三）如奉方愿得豫、皖两省，鲁方也可同意之，惟皖境之一段铁路，应归鲁军驻防，但鲁军当任奉军自由通过。将来鲁军得江苏后，倘能更得浙

江，或其他一省，则直隶定让诸奉方；（四）将来鲁军得江苏后，或可将直隶让于奉方；（五）鲁方得江苏后，如张老帅愿作总统，鲁方将以全力拥戴之；（六）无论鲁方地盘扩张至何等地步，永远服从张老帅之命令。

鲁方亦知奉方正以政治手段图苏，深恐奉方之先鲁方而得江苏，于是乃以非正式的方式，传达奉方：

如果奉方一味延宕，而不与鲁方速将对苏、对豫用兵之事在此短时间为此切实之解决，则鲁方鉴于东南形势之危急，迫不及待，惟有采取断然之处置，不问奉方之果否同意，立即派兵实行入苏（以上之表示，张作霖在奉时，早已闻之，一时颇觉恐慌，九江陷落，予张之总统梦以重大之打击，张本拟暂缓入关，兼以对鲁“延宕”者，但事势如此，乃亦不得不立即动身矣）。

鲁方虽提出前记之让步条件，而奉方之意态则依然无甚变更，盖奉亦如鲁之“惟欲争得江苏”也。其对鲁方所提出之对案，略如下记三项：（一）只须江苏归奉，奉愿以皖、豫归诸鲁方，但在今日情形之下，仍不宜对豫立即用兵，非预有相当之把握，鲁军不得轻率入豫；（二）直隶可永久归鲁方所有；（三）奉、鲁取得苏、皖之后，应坚持“维护黄河流域，以防党军北来”之惟一意旨，不得轻于再事向外发展。果须再向外发展，最好限定鲁军，由豫赴陕，奉军由苏取浙。

奉方确拟于苏、皖、豫解决后，与党军从事于和平磋商。从事于和平磋商时，概由奉方作主，鲁方有何意见尽可向奉方建议。果须“讨赤”到底，与赣、鄂党军再战时，亦完全由奉方作主，鲁军不得单独行动。

根据以上的材料，我们一方面可以明了，天津会议之所以必然产生，一方面也可以预料，天津会议之不易得良好结果。兹将经过情形及其结果，就各方面报告汇述如左：

据闻张宗昌尚未抵津以前，二张之间对于南下用兵已有：（一）鲁军暂时不南下入苏，（二）俟孙传芳至不能保守安徽时，由奉、鲁军同时南下，苏省地盘留待天津会议商决之谅解□□。张宗昌数月以来，曾一再向各方声明：“非俟孙传芳前来请援，鲁军决不南下。”最近鲁军之准备入苏，情理上本勉强已极。适杨文恺奉孙之令，急于此时北上，力言：“孙有维持现状之能力，再经若干日之内部整理，必可谋江西之恢复，在现在实无须乎奉、鲁之南援。”此实予张宗昌以莫大之打击，使张宗昌不得不暂缓南下。惟鲁军虽已与奉军议定暂不入苏，但据确报，临城、韩庄之鲁军刻正暗向南方移进，集中苏、鲁边境，且有一部分距徐州只五六里，盖今日复进一步，将来便可尽先占得江苏也。奉军与鲁军同时南下一节，鲁方初颇不愿，仍欲贯彻其“单独入苏”之望，但又无何等理由可言，亦惟有赞成之而已。盖以最重要之关键尚在天津会议中如何为最后之解决。奉方内部之计划，拟于孙传芳失安徽时，立由被贿买之苏军发动迎杨，同时奉、鲁乘风南下，苏军势力究嫌孤弱，非奉军之往不易维持也。

两张到津虽已为日不少，但所谓之天津会议，并无具体形式，只不过酒肉争逐，狂嫖乱赌之余，以谈心之形式，互视各方之欲望而已。而奉、鲁两方秘密会议则进行甚急。综合各方报告，所谓天津会议之结果，可作以下之断定：

一、军事方面 张宗昌因入苏问题一时不易解决，拟于入苏以前，先取陇海线，奉张对此尚未同意。入苏问题含有奉、鲁对苏、皖、豫地盘分配问题，均是不易解决，奉方以延宕手段对付鲁张。最近所闻，奉军由韩麟春率领，直鲁军由褚玉璞率领，沿京汉路入豫。刻正与吴商，请吴率其亲信军队攻陕²，向西北发展，如靳等不合作，则先除之，已于天津会议决定，故自昨夜起奉军即陆续南下，军行在夜间颇秘密（奉在津密设二机关，专以金钱接洽靳、田、魏部

下级军官)。但据另一消息，天津会议决定，与此(有)稍有出入，即褚玉璞入皖，陈调元调苏，孙传芳退浙，并闻此已得孙之同意，但最近孙传芳已于十八日来津一次，其作用如何，尚未得到报告。但据报纸宣传，奉、鲁、孙之间以[已]有下列之决定：

(一)由张宗昌统率直、鲁军十五万克日开赴江西当[挡]党军之主力；(二)由孙传芳军队保守苏、浙，并抵御党军；(三)渤海舰队及东北舰队由海道同时出动，溯江开入江西，并相机抽拨一部分直攻广东，输送军队并参加战斗；(四)张学良以三四方面军团防守京畿一带；(五)张作霖以总制北方军队名义，在后方遥为节制，惟名号尚未决定。如此则鲁系几乎完全胜利矣，但此决非奉系将领所愿意，而未来之新冲突已在酝酿之中矣。当直、鲁入豫消息传出时，鲁系将领异常愤慨，褚玉璞谓奉系与他玩笑，给他们炉烧饼吃；当然此次消息传出后，奉系将领之不满可以断言。如此为奉系拣乾滩之计划，则又当别论矣。

二、政治方面 奉张之总统梦，前本极热，近已冷水浇了三次，故较前为冷却。第一次北伐军占领武汉；第二次是日本提出保境安民之警告；第三次是北伐军占领九江。奉系旧派中之吴俊升、张作相欲承继东三省之最高政权，故极力怂恿奉张，入京主政，尤以吴大舌头为最热心。因郭茂宸之役，多伦之役，吴功为多，而资格亦以吴为最老，故承继奉张亦最有希望。而新派中之杨宇霆、张学良等，则反对之。其原因：(一)新派不欲以东三省最高政权让诸旧派；(二)新派知人心对奉之向背极为明了，不愿奉系蹈“飞的高跌的重”之险境。但新派以奉张高梦极酣，以此进言，恐招其疑忌，故心虽不赞成，而亦不敢出诸口。安福派拥段再出之运动，亦以此渐归沉寂，鲁张亦不赞成奉张入京主政。因知张如入京，直隶必归张学良，而奉嫡系之努[势]力，在关内骤涨，与鲁系以大不利。本月十三日夜十二时，张学良召集新派要人韩麟春、常荫槐等在天津京

奉路局密议，设法劝醒奉张总统之迷梦。杨宇霆与段派有关，似颇消极的赞助拥段。又闻十六（日）晚各省领袖及某代表在津某处秘密[密]会，奉旧派吴俊升方面之人发言，主张拥张为临时大元帅（日报谓：系中央保安总司令驻节天津），列席者默不作声，不欢而散。段派结晋阎、鲁张，与争首座。

三、吴佩孚之地位及其态度 在西北军进入陕西消息传来之后，吴佩孚本有率师西上，以阻西北军东下发展与党军联合会师中原。但自会议决定奉、鲁派兵入豫消息传出后，吴之态度，骤然变化，暂不率师援陕，且有以其残部与南下奉、鲁军以决雌雄之势。近来吴曾七次下向南总攻击令，但无一应者，而且靳、田、魏、寇有种种活动，向奉输诚，拥张为大元帅，并有要吴署名之意，被吴拒绝，吴甚愤慨，但其部下则不断向南向北争觅主人。可以说河南问题实甚复杂，吴既不能统一，奉、鲁亦不能勘定如意。

四、西北军人陕与奉方对策 据最近报告，西北军已至西安城下，城围不日可解，冯已预定即赴平凉督战以期早出潼关。

奉方会议对于西北问题十分重视，谓西北重于东南，决定不肯放松，现正积极图谋，并于前日电讯晋阎：（一）能否驱走冯玉祥离开包绥，（二）能否向冯部即日进攻，（三）一、二条不能实现则须让出京绥全线，由奉军独立进攻。晋阎覆电谓，第一、（二）条绝对不可能，二[第]三条可随便听奉张施行，如此可见晋军对于国军之态度。

五、晋阎对西北军的态度 阎锡山本是一个八面玲珑的老滑头，既不敢得罪奉张，亦不敢得罪形势日见开展之国民党与国民军，且与安福暗结甚深，在天津会议中倾向于张宗昌拥戴段祺瑞。其出席代表过京，曾对某要人言，如时局发展至某种田地，阎可受党政府命令。即如此次晋阎代表见天津会议奉系之贪得无厌，因而退出回晋，以及晋阎答复奉电之语气，可知其决不能与国民军以

重大压迫也。

但现在天津会议尚未终结，张作霖灵魂杨宇霆尚未来津，杨来津后天津会议的最后结果如何，尚须俟下次报告也。

署名：列武

《向导周报》第 180 期

1926 年 11 月

注 释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 1 题解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在莫斯科召开。1924年3月30日,第三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通知派代表团参加会议。李大钊受命率罗章龙、王荷波、刘清扬4人出席大会。这是李大钊在讨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会上的报告。
- 2 我党的同志发表了一位同志的声明 指在国民党“一大”上,李大钊就国共合作问题发表了《意见书》。
- 3 在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里,我党同志占八分之一,在候补委员中占十七分之七 国民党“一大”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5人,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守常、于树德3人当选;又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共产党人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7人当选。

中国最近之政变 ——在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的报告

- 1 题解 1924年6月中旬,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在苏联参观访问并考察讲演。此文即为在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会议主持人袁子贞,记录李季达。袁子贞1925年曾任中共石家庄地委书记,后牺牲。李季达(1900—1927),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共,1924年回国后,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27年

11月被捕牺牲。

文中所说的“政变”，是指江、浙战争与随之而起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而不是指其后10月23日所发生的冯玉祥推翻曹、吴的“政变”。由于远在国外以及形势的复杂多变，文中的某些说法难免不确，但在当时情况下即看到此次“政变”对于中国局势发展的严重影响，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则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正是由于此次“政变”引起形势的急剧变化，11月中，李大钊提前回国。从此，他进入生命最艰险也是最光辉的奋斗阶段。

- 2 直皖战争 1920年7月10日开始，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之间的战争。12日，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派兵入关与直系联合反段，使皖系失败，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下台。
- 3 第一次直奉战争 直皖战争后，奉系军阀与直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又日益激化。1922年4月奉、直两军大战于京津地区及冀东一带，奉军大败，退出关外，张作霖被免除军政各职。文称此时“直系处于全盛时代”。
- 4 萧耀南 字衡山（1875—1926），湖北黄冈人。与吴佩孚同为北洋第三镇（后改为第三师）曹锟部下。1918年随吴佩孚进攻湖南，1921年任湖北督军，曾镇压“二七”大罢工，是吴佩孚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 5 张复兴 生年不详，卒于1925年，应为“张福来”，河北交河人。曾任曹锟部第21师师长。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援军总司令。
- 6 蔡松坡 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99年赴日留学。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在昆明领导新军起义，宣布云南独立。袁世凯复辟帝制，蔡于1915年12月25日在昆明与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讨袁护国，并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入川作战。袁世凯派曹锟为征滇军川路总司令前往镇压，护国军与曹部吴佩孚旅鏖战于泸州、叙州一带。
- 7 冯玉祥 字焕章（1882—1948），安徽巢县人。原在张绍曾部下，不属于曹锟、吴佩孚（北洋三镇）系统。文中所说“冯有功于吴”，是指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任陕西督军的冯玉祥自任援直陕军总司令，率所部第十一师至洛阳与曹、吴联合反奉，对战争胜利起着重要作用。5月10日，被任命为河南督军。11月4日，又被调任陆军检阅使（文中为“监察使”，不确），驻军南苑。文中所说将来直奉战争“冯玉祥走山海关”等，其后情况有很大

的变化。1924年8月20日，总统曹锟召见冯玉祥，拟调冯赴山海关前线，防御奉军，冯以“力不胜任，愿卫京师”为由，没有接受。8月29日，曹锟按吴佩孚的电请，又拟授予冯东北前敌总指挥一职，并派人劝说，冯又拒绝。9月10日，曹锟又第三次请冯负责山海关军事，再被拒绝。9月17日，曹、吴最后确定，由彭寿莘任第一军总司令，负责山海关方面；由王怀庆任第二军总司令，负责朝阳方面；由冯玉祥任第三军总司令，负责热河、赤峰方面。李大钊演讲在此之前，故有冯将去山海关之说。10月23日，冯玉祥经精心策划，发动北京政变（亦称首都革命）成功，幽禁曹锟，主张停战，组织国民军，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使中国政局由此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

- 8 张绍曾 字敬舆（1879—1928），河北大城人。1911年任新军第二十镇统制，驻兵滦州，时冯玉祥在其部下任管带。
- 9 吴禄贞 字绶卿（1880—1911），湖北云梦人。1898年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骑兵科，后加入兴中会、同盟会。1910年任陆军第六镇统制。武昌起义后，赴滦州与张绍曾密谋起义响应，旋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石家庄火车站。
- 10 王承斌 字孝伯（1873—？），辽宁兴城人。历任北洋第三镇曹锟部下管带、陆军第三师团长、混成旅旅长、23师师长。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时，王总管贿选工作，后升任直、鲁、豫巡阅副使兼直隶督军、省长。旋被吴佩孚解除23师师长职务，王有所不满，对冯所告知的政变计划，表示同情，但又表示不背吴，仅守中立，不告密。后被张作霖赶下台。
- 11 齐燮元 生于1879年，卒于1946年，直隶宁河（今属天津市）人，毕业于北洋武备速成学堂。1920年起任江苏督军，1923年任苏、皖、赣巡阅使。1924年9月，与皖系将领卢永祥发生江、浙战争，获胜后兼任淞沪护军使，旋被免职。日寇侵华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治安总署督办，抗战胜利后被枪决。
- 12 何丰林 生于1873年，山东平阴人，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任旅长、浙江宁台镇守使、淞沪护军使。江、浙战争时，任浙、沪联军第一军总司令。战败后逃大连，投靠张作霖，审理杀害李大钊等人时，任审判长。1938年投降日寇，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武官长。
- 13 卢永祥 生于1867年，卒于1933年，字子嘉，山东济阳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原为曹锟旧部，后投靠段祺瑞。1923年，通电不承认曹锟任总统。

1924 年江、浙战争中任浙、沪联军总司令，战败后逃往日本。

- 14 奉张见江、浙起事，而马上出兵 “江、浙起事”，即 1924 年的江、浙战争（1925 年又发生第二次江、浙战争），又称“齐、卢之战”，是江苏督军、直系军阀齐燮元为争夺上海地盘而向皖系军阀卢永祥、何丰林所发动的战争。8 月 26 日，齐燮元下令江苏全省总动员；29 日，张作霖决定：如战争发生，即率兵入关，“作武装调停”。9 月 2 日，卢永祥电告齐已“入侵”，张作霖当即决定假秋操为名，令奉军向山海关进发。3 日，江、浙战争开始，奉军已在进关途中。文中说：“是意中事”，“暗中奉、浙或许一定有联络”。事实上，卢永祥与张作霖间早有联络。9 月 3 日，卢永祥派其子卢小嘉抵奉天，请求张作霖接济款械、借给飞机，张都同意。

附：与《莫斯科工人报》记者的谈话

- 1 题解 此文为李大钊 1924 年旅苏期间与《莫斯科工人报》记者的谈话，当时化名李秦华。

1984 年李大钊诞辰 95 周年时，苏史学家根据李秦华为李大钊化名的线索，找到此文及其他几篇文章，并刊载于《远东问题》杂志（俄文）1985 年第 1 期。1985 年 6 月 22 日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主办）刊载了由帅永章翻译的这几篇文章，包括以下《在莫斯科大剧院“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大会上的演说》和《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此文原题为《中国内战烽起，经济崩溃，帝国主义者为减轻自身困难瓜分中国——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李秦华》。现改此题。

- 2 陈廉伯 生于 1884 年，广东南海人。曾任广州总商会会长兼出口洋庄商总经理、广东英汇丰银行买办，倡组粤省商团，任总团长，有枪近万支。1924 年 8 月 9 日，从欧洲购回枪械 9000 支，孙中山令蒋介石扣留。8 月 12 日，陈派代表 8 人、商团军 2000 人向孙中山请愿索枪，并以罢市相威胁，孙指出这是“居心要反对政府”。8 月 13 日，陈成立“联防总部”，准备推翻广东政府。8 月 20 日，对陈下通缉令，商团随即以佛山为基地发动第一次罢市。8 月 28 日，英舰 9 艘集结白鹅潭，次日，发最后通牒，支持商团。9 月 10 日，孙中山对英抗议。10 月 9 日，商团发动第二次罢市，孙中山同意将所扣商团枪械发还，但商团继续进攻，孙中山认为“万难再事姑息”。10 月 12

月，孙中山手谕蒋介石坚决镇压，“尽灭省中之奸兵奸商”。15日，商团叛乱被弭平。陈廉伯只身逃脱，不知所终。

在莫斯科大剧院“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大会上的演讲

1 题解 1924年8月，孙中山为制止广州商团叛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8月28日，英政府令驻香港军舰9艘集结白鹅潭挑衅，驻广州总领事向广东革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如果镇压商团，英将“全力对付之”。对于英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孙中山予以抗议，国内兴起反帝的群众运动，而当时的苏联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也相继成立“不许干涉中国协会”。9月22日，该协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大会，英、法、日、苏等国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出席，拉狄克等发表了讲话。此文是李大钊在会上的演讲。此文原题为《秦华同志的演说——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在大剧院组织的国际大会上》。现改此题。

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 ——赤都通讯

1 题解 本文发表时有编者按：“李守常先生从赤都寄来的通信。”1984年版文集题为《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现加副题。

2 东方大学 即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1921年10月建于莫斯科，是苏联为东部各共和国与地区培养干部的学校。1923年起，改学制为3年。1925年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前，我国赴苏的革命者曾在该校学习。

3 新经济政策 1921年3月，俄共(布)为克服十月革命后所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而带来的政治、经济危机，决定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将原来的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制，使农民在完税后能够自己支配余粮，并允许私人贸易和开设小企业，实行租赁制和租让制，引进外资，允许多种经济存在，采用经济核算制与物质利益原则等管理方法，利用商品、货币活跃发展经济，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但当时认为这是暂时的后退政策，到20年代末即停止执行。

4 马克丹诺的所谓劳动政府竟自干涉孙逸仙所领导的革命政府 马克丹诺时为英国内阁首相。此处所指是：1924年8月28日，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正处理商团叛乱之时，英军舰9艘集结广州白鹅潭，将炮口指向中国军舰。次日，英驻广州总领事发出最后通牒，声言：“奉香港舰队司令之命，如遇中国当局有向城市开火时，英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之。”9月1日，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提出抗议。

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

- 1 题解 此文为李大钊1924年旅苏期间所作。
- 2 英国人控制了海关 英国人控制中国海关的主要人物为李泰国(1832—1898)与赫德(1835—1911)。1855年，李泰国任上海江海关税务司，1859年任总税务司，随后把上海半殖民地化的一套海关制度推广到广州、汕头等通商口岸，中国的海关管理权从此为外人所掌握。1863年，曾任李泰国副手的赫德继任总税务司，其任职竟达48年，成为英国侵华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 3 麦克唐纳 詹姆士·拉姆赛·麦克唐纳(1866—1937)，曾参加英社会民主同盟、费边社。1900年工人代表委员会(1906年改名为工党)成立时任书记。1911—1914年为工党领袖。1924年1月任第一届工党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支持广州商团叛乱，反对孙中山及其革命政府。

中国的事变和本团的训练

——在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的报告

- 1 题解 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立后，其学生人数：1921年622人，中国学员36人；1922年933人，中国学员42人；1924年1015人，中共党员人数占9%。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熊雄、刘伯坚、萧三、蔡畅等都曾在此校学习。研究中国问题，为该校课程之一。此讲由袁子贞主持，杨介臣记录。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

- 1 题解 在1924年10月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

翻曹、吴统治后，邀请孙中山入京主持大计。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从而在全国兴起响应这一号召的热潮。

1925年1月4日，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北京大学第三院正式成立，有200余团体代表出席会议，来宾逾3000人，并发表成立宣言和章程。会议决定请名人讲演，1月20日由李大钊、于右任分别在北京师范大学与美专讲演，《京报》于21日、22日以《国民会议促成会讲演会纪事》为题作了报道。此文即出自此报道。

为梁容若所藏《三民主义》一书的题词

1 题解 梁容若，1905年生，河北行唐人。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曾任河北省教育厅主任督学、绥远省政府代秘书长。1948年去台湾，历任台湾大学等校教授。

此题词摘自《万里朝宗中山陵》文中（载于《辛亥风云录》，中国新闻社编，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出版）。作者说：“回忆1925年3月，我参与了北京中央公园国父的吊祭以后，把一本《三民主义》请李守常教授题词，他写了上面的话。”此话出自张载《近思录拾遗》，其文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

1 题解 此文由瞿光熙从个人旧剪报中发现，无日期，刊于1958年9月1日《光明日报·史学》第104期。据内容应写于1925年3月下旬。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沙俄军队乘机进驻库伦，支持哲布尊丹巴集团宣告蒙古独立，成立大蒙古帝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先是白俄残部窜入蒙古，后又红军追剿进入。蒙古问题，遂成为中俄建交谈判中的一个障碍。1925年3月6日，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谓1921年出兵蒙古，是为平定白匪。现“业得蒙古当局之同意，开始由外蒙撤兵，目前业已撤尽”，希望中国乘此机会，解决中蒙关系问题。接着，3月12日孙中山又在京逝世。故此文一为响应苏联的外交举措；二为悼念孙中山逝世，宣传其遗训；三为客观形势需要，为北方党的活动提供重要的理论

指导。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在直、奉联合压迫下，国民军只能背靠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即内蒙。适应这种形势，就在此文发表的同时，建立了这三个特别区的中共工作委员会。10月，在张家口成立内蒙人民革命党，继又成立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李大钊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由此汇入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与复兴运动。

主张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代表大会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帅府园会议上的发言（节录）

- 1 据《晨报》报导：出席会议的委员 11 人。对国民党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的地址问题“争辩甚烈”。邓家彦、谢持、石青阳、茅祖权等国民党右派主张在北京开会，李大钊、于树德、王法勤、丁维汾等主张在广州开会。表决结果，11 名中执委主张在广州开会者 5 人，反对者 5 人，会议主持人于右任未表态，未能通过决议。“后来遂由胡汉民以大元帅及代总理命令，召集在广州开会”。

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 ——在河南开封第一师范的演讲

- 1 题解 本文是李大钊在开封的一次演讲，由员生笔记，发表于 1925 年 8 月开封第一师范学生社创办的刊物《雷火》第 8 期。时间应在“五卅”惨案、沙基惨案全国形成反帝运动以后，约为 7 月下旬或 8 月初。李大钊第一次到开封为 1924 年 12 月下旬，是应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之邀来商谈请求苏联援助与二军建设问题。第二次是 1925 年 4 月 10 日胡景翼因病逝世后，二军面临严峻形势，李大钊约于 4 月下旬与于右任一起到开封对继任的岳维峻进行工作。1925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 31 号通告传达中央决定：在开封创办民党宣传学校，主要由李大钊主持，学员 80 人，培训 1—3 个月，然后派往北方各省工作。李大钊第三次开封之行应即为进行此项工作。
- 2 基督旧教 指天主教，与正教、新教并称基督教三大派别。属于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派教会，中世纪时是西欧各国占统治地位的教会，并设立异端裁

- 判所。曾于元代一度传入中国，又于明万历 10 年（1582）再次传入。
- 3 十三洋行 亦称十三行或洋货行，系鸦片战争前广州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其名起于明代，清沿袭。行数并非固定十三家，时有增减。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十三行专营外贸特权被取消。
- 4 英法联军 1856—1860 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侵华战争，先后攻占广州、舟山、烟台、大连、大沽口、天津、北京，焚毁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由东南沿海深入到整个沿海、内地和首都北京，使中国的领土主权受到进一步严重损害。此次战争，性质与鸦片战争基本相同，故又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 5 长胜军 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美国人华尔在上海创建“洋枪队”并任领队，协同清军及英、法联军在上海郊区及苏南地区对太平军作战。1862 年 2 月，华尔率军在高桥、萧塘等地击败太平军，华尔被清政府授予参将衔，“洋枪队”被命名为长胜军。
- 6 八国联军 1900 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国家为镇压义和团运动而组成的侵华联军。6 月 17 日占大沽炮台，7 月 14 日陷天津，8 月 14 日陷北京。次年 9 月 7 日，签订《辛丑条约》。
- 7 此次沪粤诸案 沪案，指 1925 年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5 月 15 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籍职员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伤 10 余人。5 月 30 日，上海工人、学生、市民万余人为此游行示威，英租界巡捕在老闸捕房门前又开枪打死 11 人，重伤 11 人，随即发生五卅运动。1925 年 6 月 21 日，广州英、美、日商行和沙面租界的工人声援“五卅运动”，10 余万人举行反帝示威游行，行至沙面租界对面沙基时，被英、法军警及葡萄牙军舰开枪开炮打死 52 人，重伤 170 余人，这就是“沙基惨案”，亦即“粤案”，随即发生达 16 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
- 8 洪秀全 生于 1814 年，卒于 1864 年，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人。1828 年起屡试不中。后借基督教义，1843 年 6 月创拜上帝会（一说未形成组织）。1851 年 1 月 11 日，于广西桂平金田村举行反清的农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称天王。1853 年 1 月克武昌，3 月占领南京，建都后改称天京。后因内部分裂，加之战略失误，在清廷与帝国主义势力联合镇压下，转向衰落。1864 年 6 月 1 日洪秀全病死，子继位。7 月 19 日，曾国荃部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

失败。

从印度航路发见以至《辛丑条约》 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

- 1 题解 此文为前文《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的续篇，前文筆者附注已说明：“原来此文甚长，因时间限制，李先生只能讲这些，惟闻先生言，他日当写出，供大家阅看。”此文当即是写出的长文的一部分（辛丑之后未见），刊于1925年9月9日出版的《政治生活》第50期，即“反帝国主义运动周及国际少年日特号”。该期的主要内容为前者，而此文则又是反帝内容中的最重要的一篇。《卷头语》称：9月3日至9日是反帝国主义运动周，21年前的9月7日是《辛丑条约》签订的日子。接着刊登中共北京区执委会及共青团北京地方执委会于9月7日《反帝国主义运动周敬告全国民众书》。
- 2 葡人发现印度航路 1498年（明孝宗弘治十一年），葡萄牙人伽玛（Vasco da Gamma）绕过好望角东达印度古里（Calicut）。
- 3 葡人附帆船来华 1514年（明武宗正德六年）葡人佛郎机最早到达广东屯门。1517年强入广州并抵福建。
- 4 里士本 今译里斯本，葡萄牙首都。
- 5 亚母士特丹 今译阿姆斯特丹，荷兰首都。
- 6 耶利扎卑士女王 今译伊利莎白女王。
- 7 德川幕府 亦称江户幕府。日本德川加康于1603年（日本庆长8年）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城（今东京）建立幕府，即封建的政权，采用中国的朱熹学说作为统治思想。19世纪起，统治日益出现危机，60年代，下藩各级武士起而倒幕，并击败幕府军。1868年1月，天皇明令废除幕府制度；9月，改江户为东京；10月，改元明治，实行一系列维新。
- 8 后又为成功所逐 郑成功（1624—1662），福建南安人。起兵抗清失败后，1661年率军2万人出厦门经澎湖进攻台湾鹿耳门，围赤嵌城（今安平镇），大败荷兰占领军。1662年1月，荷总督揆一降，遂收复台湾。旋病逝。
- 9 清廷下诏开海禁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廷令开海禁，设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个海关，准外人来通商。

- 10 陈昂 生于 1649 年,卒于 1718 年,清福建同安人。家贫弃学从商,熟知航海技术和沿海地形、路程,后入水师、攻占澎湖,出入东西洋,因功授总兵。
- 11 阮元 生于 1764 年,卒于 1849 年,字伯元,号芸台,清江苏仪征人。乾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21 年(清道光元年)两广总督任内奏请严禁鸦片,并令鸦片趸船自澳门、黄埔改泊零丁洋。平生提倡学术,创立诂经精舍(杭州)、学海堂(广州),广为罗致学者,编印校刻经籍,为清代著名学者型疆吏大员。
- 12 律劳卑来华 1833 年 12 月 10 日,英女王任命律劳卑(William John Lord Napier)为驻华商务监督;31 日,又谕以妥协和平精神行使在华职权。1834 年 1 月,英外相又训令律劳卑到粤后即以书翰知照两广总督。7 月 25 日,律劳卑抵广州。次日致书粤督卢坤,被拒绝。7 月 30 日,卢坤令律劳卑离开广州,到澳门候旨。8 月 14 日,律劳卑致书本国政府,提出应以实力对华。8 月 18 日,卢坤再逐律劳卑,继又布告停止英人贸易,派兵包围律劳卑等英人驻地。9 月 9 日,英兵船过虎门炮台,继进到黄埔。9 月 30 日,清廷诏卢坤开导防范,勿启边衅。继给卢坤以革职留任处分。
- 13 义律 生于 1801 年,卒于 1875 年,义律(Charles Elliot),1835 年任驻华商务副监督(律劳卑 1834 年 10 月病死于澳门),1836 年 12 月任监督(领事)。后与英军统帅全权公使水师提督懿律(George Elliot)共同率东方远征军(初为战船 20 只,士兵 4000 人)发动鸦片战争。
- 14 梅特兰 即马他伦(Sir F. Maitland),时为东印度舰队司令。1837 年 11 月 2 日,英外相令海军大臣派马他伦率军赴华以为英外交后盾。
- 15 林则徐 生于 1780 年,卒于 1850 年,清福建侯官(福州)人,嘉庆进士。曾任江苏按察使、巡抚。1836 年 2 月(道光 17 年)擢任湖广总督,主用大辟严刑,治吸食鸦片者罪,并订禁烟章程 6 条。1838 年 12 月,授兼兵部尚书衔为钦差大臣往粤查办海口事件,节制所有水师。1839 年 4 月,在虎门销烟 237 万余斤。1840 年 1 月,授两广总督。鸦片战争中,使英军在粤无法得逞。1841 年 6 月,因诬被革职,遣戍新疆伊犁。
- 16 督英 生于 1790 年,卒于 1858 年,爱新觉罗氏,清满洲正蓝旗人。1842 年 7 月,与伊里布一起被清廷授予与英议和全权,并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后任两广总督,授钦差大臣,办理各省通商事宜,与美签订《中美五口通商章

- 程)《望厦条约》),与法签订《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黄埔条约》)。1858年6月,奉诏在天津与英、法联军谈判,因擅自离津,卸责委过,被赐死。
- 17 台威士 今译德庇时(J. F. Davis),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6月17日正式接任璞鼎查为英国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
- 18 徐广缙(1797—1858) 清河南鹿邑人。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2月3日,署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并谕:嗣后如有民夷交涉,不可瞻徇迁就。4月,新任英国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文翰(S. G. Bonham)要求让英人进广州城,徐以百姓不许相拒。几经交涉后,1849年4月,文翰罢议,清廷遂赏徐及其他文武各官及绅民。8月,英政府愤而令文翰提出警告抗议。由此,再起进城事端。
- 19 鲍灵 今译包令,新任英国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1854年11月13日到任。5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约包令于城外洋行会见。包令拒绝,坚持必须于城内官署会晤。
- 20 亚罗船事件 1856年(咸丰六年)10月8日,广东水师搜查私运鸦片之“亚罗”划艇,拘捕匪水手李明太等12人,并拔去艇上英旗。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对此提出抗议,继发最后通牒,要求释放全部水手,公开道歉,限24小时内答复。两广总督叶名琛释放12名水手,但拒绝道歉。英驻港海军遂进攻广州,后发展为英、法联军的侵华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
- 21 玛加理事件与英订烟台条约 玛加里,今译马嘉理,英赴云南探测队翻译。1875年(光绪元年)2月6日,由缅入境,腾越参将李珍国于之前即命各地兵勇绅众准备堵击。2月21日,马嘉理抵户宋河时被杀(同行4个华人亦被杀),是为马嘉理案或滇案,中英间几乎再次发生战争。后中方基本上接受对方的要求:派使赴英通好谢罪,赔款,处分责任者,惩凶手,增开通商口岸(宜昌、芜湖、温州、北海、重庆),改革外交规矩,准英继续派人赴西藏、云南考察。1876年9月13日,李鸿章与英使威妥玛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由此,英势力侵入西藏并深入西南地区。
- 22 郭嵩焘 生于1818年,卒于1891年,湖南湘阴人,清道光进士。马嘉理案发生后,应英使请求,1875年9月,清廷谕派候补侍郎郭嵩焘为首任驻英公使,向英女王维多利亚递国书及谢罪书。他较早地主张学习西方的长处,“以立富强之基”,致遭守旧派诸多攻击。著有《礼记质疑》、《大学中庸质

疑》、《周礼释例》、《使西记程》等。

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

- 1 孙传芳发难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兵败后，张作霖违背奉军不入关、不南下的承诺，不但控制京山线和津浦线北段，而且派兵直抵上海，由杨宇霆、姜登选、张宗昌统治苏、皖、鲁三省，而仍存于长江中下游的直系势力则力图进行对抗。1925年10月7日，时任浙、闽巡阅使兼浙江省督军的孙传芳（1885—1935）在杭州成立皖、赣、苏、闽、浙五省联盟，并被举为联军总司令。10月10日，孙利用日益兴起的人民反奉运动的形势与国民军在北方对奉军的牵制，突然向苏、皖奉军进攻，奉军节节败退，11月7日攻抵徐州。张作霖接受杨宇霆的建议，将张宗昌的10万守军撤离徐州，使奉军战线收缩于德州以北，主要集中于京山线与天津附近，以随时准备对付国民军。孙传芳在五省的势力，直到1926至1927年上半年，才被北伐军消灭。
- 2 奉系的压迫国民军 1925年11月8日，即奉军放弃徐州的第二日，驻热河的奉军阀赵鑫部进入京兆区内国民军鹿钟麟部防地，鹿被迫撤退。11月12日，冯玉祥向段祺瑞报告，京畿东西南三面包围国民军的奉军已增至10万人。
- 3 明明是于国民军有利的 11月13日，段祺瑞下令各方停止军事行动，令所有京汉铁路沿线，应责成冯玉祥、岳维峻极力维持；令津浦路前线，仍责成张作霖、李景林妥为办理。按此原则，奉、冯双方代表于11月16日在津签订和平条约，主要内容为：奉方让出保（定）、大（名）与京汉线归国民军；津浦全线归奉军；京畿双方都不驻兵。文中认为此形势于国民军有利。
- 4 荡平东江 广东国民政府为统一广东，扫除陈炯明势力，1925年10月11日发表东征宣言，13日攻克惠州，22日重创陈部精锐；11月13日占汕头，16日，汕头举行有4万余人参加的“祝捷国民革命军胜利大会”，陈势力基本被消灭。

土地与农民

- 1 关于井田制度，虽尚有人抱是否曾经实行的怀疑 此处系指胡适。1919年

10月出版的《建设》杂志第1卷第3号刊载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人民受无量的痛苦，“最重要的，就是井田制度崩坏”。并称：“井田是计口授田。土地公有，是古代相沿的一个共产制度。”1919年11月8日，胡适致书廖仲恺，认为，胡汉民文中“承认古代真有井田制度，这是很可疑的事。”胡适认为，在那“半开化”时代，“决不能有‘豆腐干块’一般的封建制度。”“不但‘豆腐干块’的封建制度是不可能的，‘豆腐干块’的井田制度也是不可能的。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对于古代有无井田制问题，双方各持不同意见。

- 2 王莽 生于公元前45年，卒于23年，汉元帝皇后侄。5年，毒死汉平帝。8年，篡夺汉政权自称帝，改国号曰“新”。曾令将全国民间土地改称“王田”，称“公田口井”，“不得买卖”，并规定“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越两年，中郎区博进谏，认为“井田”之法，秦废掉它，是“知顺民之心”，“迄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诚未可施行”。王莽遂准许土地买卖，不再坚持推行“公田”制。（见《汉书》《王莽传》）
- 3 含有均分共有性质的土地政策 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称《天朝田亩制度》。1853年（咸丰三年）下半年颁布，1860年重刻刊行。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不分男女，按人口分配，并按产量将地分为九等，“好丑各半”，15岁以下未成年者减半。收成时，除留足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其余如麦、豆、芝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均交国库，各家的婚娶、生育、吉喜等事，由两司马按一定算准从国库开支，鳏寡孤独病残者，由国家供养等。但上述制度，并未实行。
- 4 京兆 1914年10月，袁世凯为加强对京畿的统治，设立京兆特别区，相当于省一级建制。1928年撤销，并入河北省。
- 5 察哈尔 原为蒙古族部名。1914年，北京政府设察哈尔特别区。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改设察哈尔省。1952年撤销，省区并入河北、山西两省。
- 6 华洋义赈会 即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是外国教士在华传教与进行慈善活动的机构。1921年11月16日在上海成立，总部设北京。1922年6月，曾组织9所教会学校和61名大学生分赴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和安徽农村进行调查。

- 7 哥老会 中国民间秘密会社,属天地会支派,亦称哥弟会。成员主要是下层民众,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清末在南方一些地区为革命党人所用,对推翻清政府起过一定作用。民国后日趋没落,并往往为反动势力所利用。
- 8 陈、洪、杨、刘之败灭 陈,指陈炯明(1878—1933),曾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2年6月16日在广州发动叛乱,炮击总统府。1925年10月,被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彻底打垮,逃香港。洪,指洪兆麟,陈广州叛乱时洪任师长,受命首先发动攻击。后任陈部副总指挥。在第二次东征中被击败后,1925年12月7日由港乘外轮赴沪,被该轮中国船员韦德开枪击伤,9日死亡。杨,指杨希闵(1886—1967),滇军出身,1922年投顺孙中山,参加讨伐陈炯明,任滇军总司令。刘,指刘震寰,桂军出身。1922年被孙中山任为桂军总司令,参加讨伐陈炯明。1925年6月5日,杨、刘在广州以反共产为名发动叛乱。6月12日,被彻底击溃,盘踞广州4年的滇、桂军覆灭。

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与北京市党部
举行的元旦升旗仪式上的演讲

- 1 题解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与北京市党部在翠花胡同8号举行升旗典礼。本文为李大钊在典礼上的讲演。1925年11月23日,以林森、邹鲁、谢持、居正为首的部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会议,反对“三大政策”。11月28日闭会,通过反对联共的决议,其中包括取消陈独秀、李大钊的党籍。鉴于北京西山会议派活动的猖獗及北京政变后形势的复杂,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李大钊未能参加于1926年1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在这次会上,仍被继续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次会上,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将谢持、邹鲁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等给予书面警告,限期悔改。此次升旗典礼及李大钊的讲演,是对西山会议派的重要反击,表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与北京市党部仍由李大钊为首的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所掌握。1月5日,西山会议派另组北京执行部,林森、邹鲁、覃振为常委,傅汝霖为北京特别市党部筹备主任。
- 2 青天白日旗 1895年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第一次使用。以蓝色为青天,

中置一射出 12 道光芒的图案。1906 年,孙中山提出增加红色,以成红蓝白三色旗,象征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未来中华民国国旗,但未获同盟会通过。1912 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又提出,参议院议决为海军旗。1913 年,中华革命党成立,用作党旗。1920 年,孙中山就任广州护法军政府非常大总统,明令此旗为国旗。

- 3 廖仲恺 生于 1877 年,卒于 1925 年,原名恩煦,字仲恺,广东归善(今惠阳)人,生于美国旧金山,1893 年归国。1902 年赴日留学,先后入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1905 年加入同盟会。1924 年国民党“一大”后,任中央执委常委、政治委员、兼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等职,坚决拥护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5 年 8 月 20 日,被国民党右派指使暴徒暗杀。著作编为《廖仲恺集》。
- 4 黄埔军校 全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设于广州黄埔长洲岛,故名。1924 年 1 月筹备,6 月 16 日第一期开学,孙中山兼任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总党代表。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熊雄等先后参加政治军事教育与领导工作。1926 年 3 月,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共办 7 期。并在武汉、长沙等地设分校,为中国革命培养大批军事政治人材。1927 年后,在蒋介石控制下成为国民党培养军政骨干的重要基地。
- 5 善后会议 1924 年 10 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11 月 10 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速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11 月 20 日,将出任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宣称将召开善后会议,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解决根本问题。24 日段就职宣言又声称“外崇国信”,以对抗孙中山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明确提出以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直系各军及政党代表组成,而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则由段包办操纵,主要由军阀、官僚、政客组成。1925 年 2 月 1 日善后会议开会,应出席为 186 人,但实到仅 86 人,不足法定人数。次日,国民党中央通电表示“不能赞同”。

新帝国主义战争的酝酿

- 1 凡尔塞的条约 即《凡尔赛和约》，又称《巴黎和约》，全称为《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1919年6月28日，英、法、美、日、意等战胜国与战败国德国在巴黎西南凡尔赛宫签订。由于是在帝国主义大国反对苏俄、宰割战败国及牺牲弱小民族利益基础上订立的，故它本身埋下新的大战的祸根。中国代表未签字，美国代表虽签字，但国会未予批准。
- 2 国际联盟 根据巴黎和会通过的《国联盟约》，于1920年1月成立，简称“国联”，总部设于日内瓦，先后加入63个国家，实际是英、法等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美国初为倡议国之一，后因与英、法矛盾未参加。日、德、意先后退出；苏先加入，后被开除。1946年4月宣告解散。
- 3 华盛顿军备缩小会议 即华盛顿会议，或太平洋会议，1921年11月12日至次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美、英、日、法、意、葡、比、荷、中九国代表参加。中国代表提出关税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军警，收回租界、租借地等提案，均被拒绝或搁置。关于限制军备的美、英、日、法、意《五国海军协定》，规定五国主力舰与巡洋舰的吨位比例为3：5：3：1.75：1.75。它反映几个大国之间对海上霸权的争夺。

在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讲

- 1 题解 1926年1月21日，北京举行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由徐谦（季龙）主席并首先致词，接着苏驻华大使加拉罕、内蒙古国民党执行委员郭道夫及韩国代表讲话（用英语，由李大钊翻译），最后，李大钊演说。1926年1月27日出版的《政治生活》第66期《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纪事》详细报道大会的实况，本文即是该“纪事”的一部分。题目为编者所加。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

- 1 三合会 天地会的别名。因“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故名。清代秘密民间结社之一，又称“三点会”、“三合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对内称“洪门”。“三点会”，即取“洪字偏旁”“点”命名。后取“洪”

- 字右边“共”有合的意思，又称“三合会”。其支派有小刀会、红钱会、哥老会等。鸦片战争后，曾有多次武装起义。辛亥革命时，有些地区派系受同盟会领导，参加起义。
- 2 强学会 又名译书局。1895年8月在北京成立的维新派政治团体。由康有为联络，帝党赞助，文廷式出面，张孝谦主其事。会员有杨锐、徐世昌、袁世凯、张之洞、聂士成等数十人。以“挽救时局为宗旨”，先以报事为主，发行《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次年被清廷封禁。
- 3 保国会 康有为等发起，1898年4月12日在北京成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订章程30条，已略具政党雏型。在顽固派的反对下，仅集会演说3次，即自行结束。
- 4 兴中会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通过《兴中会章程》，秘密入会的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成为中国最早的民主革命团体。推举刘祥、何宽为正副会长（一说举孙中山为会长），会员约130人。次年，成立香港兴中会。1900年，由陈少白在香港出版《中国日报》。曾发动广州、惠州等多次起义。1905年与华兴会等组成中国同盟会。
- 5 同盟会 1905年8月20日，在孙中山倡导下，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确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以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为目标，制定《军政府宣言》与《中国同盟会总章》，举孙中山为总理，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成为中国最早具有现代完整意义的民主革命政党。不到一年，会员发展达万余人。曾领导发动浏醴、黄岗、七女湖、防城、镇南关、上思、河口、广州等多次起义，直至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
- 6 亚拉伯人 今译阿拉伯人。
- 7 耶利查别士女王 今译伊丽莎白女王。
- 8 朱九涛 本名邱道昌，湖南郴州人。假托朱明王朝后人，1851年改名朱九涛，为天地会大首领。1853年，在郴州率众数千人起义，自称太平王。1855年起义失败，被杀害。
- 9 马克思在当时说过，“英国造成了中国的革命，中国的革命将要反响于英伦，经过英伦，反响于欧洲。”此语出自《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今

译为：“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了一个问题，即这个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1页。

- 10 中和党 日本横滨原有的华侨工界俱乐部，曾名“忠和堂”。1899年兴中会会员尤列、陈少白更其名为中和党，成为联络华侨、宣传革命的组织。吉隆坡及南洋英属各埠设有分会。部分成员后转入同盟会。
- 11 兴汉会 1899年冬，兴中会总部邀哥老会、三合会各首领于香港集合，共商反清革命，议决三会合并，定名兴汉会，奉孙中山为总会长。

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

- 1 拉荻客 今译拉狄克（1885—1939），生于奥匈帝国东里西亚的利沃夫城（今属乌克兰）。1904、1908、1917年先后参加波兰、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19年起，任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继任书记。1925年起任中山大学校长。1927年因托派问题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又因布哈林案被捕，再次开除出党，被判处10年徒刑。1988年平反。
- 2 《中国及欧洲的革命》 今译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6月14日（原误为“1862年8月”）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收入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09—116页。
- 3 一八八三年 原文“一八三四年”据今译本校。
- 4 一八四五年 原文为“一八五四年”据今译本校。
- 5 16,167,331磅 原文为“16,167,331两”，以下50,714,657磅、57,84,561磅，原文“磅”均为“两”，均据今译本校。
- 6 “礼尚往来” 《礼记·曲礼上》：“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

- I 张、吴间的讨赤联盟 张，指张作霖，吴，指吴佩孚。二人为奉、直两系军阀首领。“讨赤”是张、吴当时反革命的共同口号。在南方，指广东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在北京，指冯玉祥国民军。6月11日，张、吴代表天

津预备会议决定：“合作到底”，“讨伐西北国民军”；取胜后，“吴以全力图粤”。6月28日，张、吴在京会晤后，对南北国民军联名发布“讨赤”总攻击令。

- 2 《顺天时报》 原名《燕京时报》，1901年12月创刊，1905年改名《顺天时报》，是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重要舆论工具。1930年3月停办，共出9284号。
- 3 虞洽卿 生于1867年，卒于1945年，浙江镇海人。上海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及鲁麟洋行买办。1925年“五卅”运动中，擅自修改与帝国主义交涉的条件，谋求妥协。1927年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
- 4 亚细亚民族大同盟 1926年8月1日至3日，在日本长崎召开“亚洲民族大会”，中、日、印、菲等国代表54人参加。中国提出取消不平等条约与二十一条，日本提出组织亚洲银行，敷设跨亚洲各国的铁路等，会议决定成立“新亚洲同盟会”。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及上海学生联合会通电及发表文告，表示反对，指出它是“假民族会议之美名，施行经济侵略之计”。

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

- 1 题解 1926年5月7日，《中央通告第一百零一号》指出：“现时豫鲁两省红枪会之暴动，已是使张、吴不能安枕了。”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议通过《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又指出：“红枪会是军阀政治下的产物”，是“农民原始自卫组织”，“他们的要求和行动，都是直接间接反抗军阀政治的，他是真正民众的武装，他已成为民族革命中破坏军阀的一个重要力量。我们必须努力引导这个力量，并要努力使这个力量不为军阀、土豪利用。”此文即是对中央决议的进一步全面阐述。
- 2 白莲教 混合明教、弥勒教等内容的秘密宗教组织。产生于宋代，元代逐渐流行，直至近代败灭，活动达近10个世纪。教义崇尚光明，认为黑暗是暂时的，光明就要到来，定能战胜黑暗。信奉“元生老母”（神），同教人都是她的儿女，应一律平等，主张资财均分。教徒遍及华中、华北及西南各省，曾多次发动农民起义。红枪会亦系其支派。

守常政治报告

- 1 西北国民军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任直军第3军总司

令冯玉祥于 10 月 19 日退出战场，班师回京。22 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直系首领、总统曹锟。25 日，冯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参与各部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冯被推举为总司令。当时计有冯兼军长的国民一军，胡景翼为军长的国民二军和孙岳为军长的国民三军。其后，又有魏益三为军长的国民四军和方振武为军长的国民五军。魏部因不久投直，四军即不复存在。1924 年 11 月 24 日，冯以去“民治之障”为由，通电下野，并拒绝临时执政段祺瑞的再三挽留，12 月 10 日，径自宣布“国民军名义即日取消”，自己解除总司令职权。1925 年 1 月 4 日，段祺瑞又任冯为西北边防督办，冯屡辞不获准。3 月间，冯于张家口设西北边防督署，国民军由此成为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但实际上国民军的名称仍常被沿用。

- 2 张之江作奸细 张之江(1882—1966)，字紫岷，直隶盐山(今河北黄骅)人。辛亥革命时，曾随冯玉祥参加滦州起义。其后，在冯部历任营长、团长、旅长，1924 年，兼任察哈尔都统。1926 年 1 月，冯玉祥通电下野，随后赴苏考察，西北边防督办与国民军总司令职由张接任，指挥了南口战役。南口战役的失败，主要由于实力上的悬殊与战略上有失误。张“作奸细”之说，迄无材料和事实可证。五原誓师后，任国民军第 1 军军长、全军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长。1928 年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全国禁烟(毒)委员会委员长。1950 年，毛泽东主席以亲笔信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二、三两届)。
- 3 张之江故意弄错 在南口战事紧急时，直军田维勤部曾有人与张之江接洽，提出由国民军首先向外冲出，然后予以响应、进行内外夹击的建议；张则提出应由对方先行动，然后国民军再予响应，致事未果。
- 4 主和派(非战派) 系指张之江。在直、奉、晋联合进攻的压力下，冯玉祥首先实行联直反奉的策略。1925 年 12 月，他派段其澍为代表携亲笔信向吴佩孚求“精诚合作”，被吴拒绝后，又转而联奉反直。冯出国后，张之江继亦曾派王鸿烈、张树声为代表赴奉求和，张作霖先是拒绝，斥为“缓兵之计”，继也派马炳南、郭瀛洲为代表前来接洽，虚与委蛇。和奉失败后，张又进行联直。张之所以这样做，可视为一种策略，他始终坚持保留军队并随时准备作战。
- 5 撤兵的黑幕 在奉、直、晋的联合进攻下，国民军有三次撤军：第一次是

1926年3月22日，为缩短战线而放弃天津，退守京畿；第二次是4月15日，为避免被包围而放弃京畿，退守南口；第三次是8月15日，为避免被围歼而放弃南口、张家口，全军向平地泉、包头方向大撤退。文中所云“撤兵”，即是指第三次。关于这次“撤兵”，冯玉祥在8月23日得消息后有下列日记：“按敌军之枪炮、粮秣、兵力，均厚于我，惟其结合颇不坚固。故吾未出国时，早有令全军退至丰镇以西之训令，以诱致其自相火并，惜未实行。敌人见我之不退也，遂切实联合，协以谋我，既以重兵攻我南口，复以大军压我多伦，又以晋军牵我后路，楚歌四面，环顾皆敌。我军以伤亡日多，子弹日缺，遂不能不退而西行。待我军战败而退，远不如乘胜西行之足以保全兵力耳。”国民军以20万人的兵力，布置在约1000里长的战线上，抵挡具有优势装备和优越后方条件的敌方联军50万人的进攻，最后败退是不可免的。败退后，部队减至5万余人。五原誓师后，张向冯“请求处分”，冯没有给他处分。

6 家兄 指当时国民党方面领导人。

7 国校政委曾以个人联名方式致电于冯 “国校政委”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的成员。关于“以个人联名方式致电于冯”的情况，1926年8月27日冯玉祥日记中有记载：“晚七点归来，接李石曾等由飞机传来之电报，深以退南口为非是，并言宜分兵陕、甘，出潼、洛，下襄、汉。余思此事谈何容易？我军之枪械兵力及地方补充，均远不若张、吴，坚守南口，徒蒙无谓之损失耳，有何益耶？”从这份电报看，双方认识有异。

8 请即出兵陕西 1926年3月，原在河南被直军击溃的国民二军余部，在帅长李虎臣的率领下抵西安，与已在陕西的国民三军的杨虎城师会合，兵力不足1万人。属于直系的镇嵩军约8万人在刘镇华的率领下，将西安包围，形势异常危急，故援陕成为当时国民军的又一紧迫问题。李大钊在报告中请求援陕并提出关于进军路线的具体意见，即“经富谷县、葭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也就是经陕北向南进军。冯的部署是：只由于右任、史可轩率少数部队由榆林南下，而其主力部队则由宁夏的固原，经甘肃的平凉入陕，然后直趋咸阳，与已经先行入陕的孙良诚部会合，以共解西安之围。这条路的特点是：路途虽较远，但利用甘肃为后方，供给有保障，战略上更有利。经激战，镇嵩军败，11月27日被困近8个月之久的西

安解围。

- 9 方振武、徐永昌军已过榆林 此消息不确。(一)李大钊写出报告时冯玉祥尚未回到部队,国民军大败之后立足尚未稳,不可能在当时即出兵援陕。冯于9月16日回到五原,17日举行誓师典礼,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经稍作整顿,于9月底10月初才陆续派兵入陕。(二)方振武时任国民五军军长、援陕军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总指挥为孙良诚兼第三路军司令(共有7路军)。在国民军中当时只方部最完整(有3个师),力量最强。它于10月29日由宁夏固原出发,经平凉入陕,因而并未经榆林南下。经榆林南下的仅为于右任、史可轩部。(三)徐永昌时为国民三军的师长,代军长,担负后路掩护任务,仍往绥远。徐不久即脱离国民军,投靠阎锡山。
- 10 井岳秀 井秀岳(1879—1936),字崧生,陕西蒲城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响应武昌起义在西安发动起义。1916年,任团长兼陕西第三警备司令。1917年任陕北镇守使,驻榆林。1924年冯玉祥建国民军后,将所部改为陕北国民军,任总司令。1926年10月16日,冯派人到榆林与井联系。12月12日,任井为国民一军第八路司令。
- 11 于须 指于右任(1879—1964),以蓄长髯而得名。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8年8月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1922年8月任上海大学校长,邀李大钊商校务改革。接受李的推荐,任命邓中夏为总务长,瞿秋白为社会学系主任。1924年国民党“一大”,与李同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年底随孙中山入京,又与李同被任为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委员。1926年夏,因国民军形势日益严峻,受李大钊之托赴苏促冯归国,并带给冯亲笔信。冯日记记载:7月9日,“又接于右任电,均劝余归国也。”7月20日,“告赵君往接于右任先生”。7月28日,记与冯第一次见面。8月29日记:“于右任先生来,言援陕事,当与国民革命军一致,但宜缓不宜急,须斟酌情形规定。此言深为有见。”8月17日,冯离苏回国。于提前于10日先行。16日与冯一起到达五原。9月30日,代表国民党中央向冯玉祥授旗。后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
- 12 李鸣钟、刘骥 李鸣钟,国民一军旅长,时任国民军西路总指挥。刘骥,国民一军参谋长。据冯玉祥日记:5月19日,张之江、李鸣钟“为决定改变战略”在国内给他来电。6月15日,冯在莫斯科“同李鸣钟、刘骥谈”。7月26

日，又接张之江、刘骥来电，“报告国内情形”，这说明李、刘于7月26日前经西伯利亚回到张家口。冯日记又记：7月20日，派人“往接于右任先生”，28日，冯与于第一次在莫斯科见面。因此，李、刘与于相遇，应在西伯利亚途中。

- 13 徐季龙** 名谦(1871—1940)，安徽歙县人。1904年中进士。1912年3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次长。1917年7月，随孙中山南下广州进行护法斗争，为大元帅府秘书长。1920年奉孙中山之命晤冯玉祥，从此成为孙、冯之间的联络人。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应邀到京参与国是会议，积极领导支持北方的民众运动，多次担任群众大会的主席。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与李大钊一起被段祺瑞政府通缉。3月20日，冯玉祥离平地泉赴苏，徐随后到库伦时与冯相遇。北伐时期，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司法部长，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时为最高权力机构)主席，进行反蒋斗争。后声明退出政治活动。1940年9月于香港病逝。文中云“徐季龙乃电于往劝冯即归国革命”，冯玉祥日记：7月9日记：“徐季龙来。又接于右任电，均劝余归国也。”
- 14 与史、任等相值** 史，指史可轩，原任国民军旅长，五原誓师后，任总司令部警卫师长。1927年2月，任西安国民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邓小平时任校政治部主任)。任，指任佑民，后任国民军最高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史、任都是到上乌金斯克迎接冯玉祥归国的。由于于右任先于冯玉祥动身回国，故史、任与于在上乌金斯克相见时，冯玉祥尚未到达。
- 15 对孙对奉** 孙，指孙传芳，时任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属于直系，但因非出身于曹锟三镇，故不是嫡系。奉，指以张作霖为首要的奉系军阀，以张是奉天省(今辽宁省)人而得名。国民革命军北伐首先入湘对直系吴佩孚开战，对孙暂取守势。9月3日、7日汉阳、汉口相继攻克。武昌亦指日可破，军事重点势必重新部署。故李大钊9月8日即提出“武汉下后”对孙对奉“不宜同时宣战”的战略意见，以求各个击破。
- 16 顾孟余** 名兆熊(1888—1972)，直隶宛平(今北京市)人。1922年德国柏林大学毕业。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经济系主任、校图书委员会主任(李大钊为委员)。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与李大钊一起被段祺瑞政府通缉。后到广州、武汉。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中央

宣传部长等职，曾参加国民党改组活动。顾言北伐军已“对江西下动员令”，是告诉李大钊以最新情报。据《蒋介石年谱》：8月30日，蒋电令朱培德：“商定攻赣计划”，并决定“赴赣督战”。文中云顾4日来电的消息，即是据此。

- 17 石曾 即李石曾(1881—1973)，名煜瀛，直隶(今河北)高阳人。1902年赴法，1905年毕业于蒙达顿农校，继入巴斯德学院及巴黎大学攻读。1906年，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同年，加入同盟会。1915年，与蔡元培组织华法教育会，后又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任副会长。1920年，先后在北京和里昂创设中法大学，任理事长兼代校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当选中央监察委员。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与李大钊一起被段祺瑞政府通缉。
- 18 寅村 即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湖南长沙人。早年毕业于武昌方言学堂，后游历日本。1922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顾问。1924年春，任广东大学教授，后赴北京从事国民党的学生运动，与李大钊合作共事。曾两次出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与李大钊一起被段祺瑞政府通缉。
- 19 张作霖 字雨亭(1875—1928)，奉天(今辽宁)海城人。土匪出身，1902年被清政府收编。辛亥革命后投靠袁世凯，任师长，旋又任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后，任东三省巡阅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败退关外。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利用段祺瑞的支持与冯玉祥的倒戈，打败直系吴佩孚，把持北京中央政权。1926年自任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4月派军警搜查俄使馆，逮捕并继而杀害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1928年6月被北伐军战败，乘火车逃回沈阳，途经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弹炸死。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孙中山曾采取联奉、联皖(段祺瑞)、反直的策略，双方信使与高层人士往返甚多。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张胜利后，并随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展，此种联盟已不存在。故李大钊策划的“折冲”工作亦难以进展。
- 20 杨宇霆 字邻葛(又作麟阁)(1886—1929)，奉天(今辽宁)法库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为“士官派”首领。曾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奉军第三、第四军团长，东三省兵工厂督办等职。素骄横，主张对南方用兵。

- 1929 年被张学良处死。
- 21 张宗昌 字效坤(1881—1932)，山东掖县人。曾为土匪，幼无赖。1921 年投靠张作霖。1925 年 12 月组直鲁联军，自任总司令，与国民军作战。次年占领北京，杀害著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1928 年部队被北伐军消灭。1932 年在济南车站被韩复榘派人刺死。关于张宗昌“力主援吴”，李大钊 9 月 8 日的情报与判断是正确的。据考，张作霖于 9 月 6 日召集张宗昌等开军事会议，讨论援吴佩孚以抵抗北伐军的问题。9 月 16 日，派张景惠为代表赴长辛店晤直军副总司令齐燮元，磋商接收保(定)大(名)问题。9 月 17 日，张又到郑州与吴佩孚磋商。吴为保住地盘，拒绝援助。9 月 25 日，张宗昌、褚玉璞以援鄂为名，不待吴的同意，就出动 6 路军进逼保大，齐燮元移兵拒之。9 月 30 日，吴佩孚派张国济、符定一为代表到济南请求张宗昌暂缓接收保大与南下河南。
- 22 安福方面 安福，是安福俱乐部或安福系的简称。1917 年反张勋复辟之后，皖系首领段祺瑞又重掌中央政权，为了排斥原总统黎元洪复职和恢复原国会，1918 年段亲信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所谓俱乐部，以收买政客，伪造选举，进行政治阴谋策划。这一政客集团，被称为“安福系”，其所把持的新国会，被称为“安福国会”。1920 年的直、皖战争皖系失败，徐树铮等被通缉，安福俱乐部亦被解散，但这部分政治势力仍在活动。文中“安福方面”即是这方面人物的代称。
- 23 褚玉璞 字蕴山(1887—1931)，山东梁山人。土匪出身。1921 年随张宗昌投张作霖，时任直隶省军务督办兼省长。后被国民革命军击溃，逃大连。1931 年被旧部活埋。
- 24 柏烈武 名文蔚(1876—1947)，安徽寿州人。1905 年，与陈独秀组织岳王会，旋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与陈其美一起收复南京，继任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北伐联军总指挥。1912 年任安徽省督军兼民政长。1913 年 7 月，宣布安徽独立，进行讨袁。1924 年国民党“一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后受命督办北方党务，与国民军多所联络，对国共合作持积极态度。李大钊与之共事，即在此时。1927 年 1 月，任国民革命军第 33 军军长。
- 25 钟兄 中共中央代号。

南口陷落后的北方形势 ——九月一日北方区政治通讯

1 题解 1924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北方区委员会（简称北方区）。之前，1924年3月建立中共北京区委员会（简称京区）。京区与北方区都负责党在北方的工作。地区包括京、津、冀、豫、晋、陕、三特别区（察哈尔、热河、绥远；即内蒙）及东三省等地。1926年7月，全区有党员2069人，李大钊任书记。

1926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编发《中央政治通讯》，以“为供给中央局负责同志及重要区域负责书记了解各方面工作情形及决定政策时之参考。”规定只印14份，要求“绝对妥为保存”。并规定北方区的代号为“白和”。本篇为北方区发于该刊的第一篇通讯，现查陆续发表的另有9篇共11篇。署名情况有四种：（一）署北方区（2篇）；（二）署白和（4篇）；（三）署李大钊个人（2篇）；（四）未署名（3篇）。上述署名尽管不同，但实质并无异。因中央明确规定，此通讯仅发给“重要区域负责书记”，在北方，也就是只发给李大钊，而不包括其他任何人。在这种意义上，北方区（白和）与李大钊是等同的。而事实上，通讯中所述的工作，也完全归于李大钊；其情况也只有李大钊才能掌握。至于其文字，经辨认亦应属于李大钊，其中明确署李大钊个人的2篇，1984年版《李大钊文集》已收入。另9篇未收。现一并收入。

2 十四日攻下南口的消息 1926年6月28日，张作霖、吴佩孚在京会晤后，即联名发布“讨赤”总攻击令。7月5日，奉军、直、鲁军对南口下总攻击令，7月24日开始猛烈攻击。至8月初，国民军击退联军10余次总攻。8月5日，联军再下总攻令，在龙虎台、关公岭、虎峪村等要地白刃战百余次，凤凰山双方争夺前后易手10余次。8月9日，营子城、偏坡峪、铁卢沟、毛司台、落马坡等要隘失守，鲁军铁甲车队攻破南口外壕，致形势危急。左侧翼多伦收复后，又被奉军攻克，总部张家口已受威胁。8月12日，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于张家口召集师长以上军官会议，决定放弃南口，实行总退却，向绥远、甘肃作战略转移。14日正午，奉军占南口火车站。下午2时，南口全部被奉军与直鲁军占领。次日，张作霖通电，称：“南口为长城著名要塞，直鲁军、镇威军以十余万人，自八月一日总攻，至十四日克之。”这就是报告

中所称的军方的正式消息。

3 致大同、天镇两城直至南口陷落尚未攻下 直、奉、晋联军对国民军的进攻，从1926年4月下旬开始，其综合兵力约50万人，国民军兵力20余万人。退守南口后，驻扎于北起多伦、沽源，经延庆、南口西至丰镇2000余里的防线上。故其前期作战方针为：对奉直联军（东线）取守势，对晋军（西线）取攻势，企图首先迅速夺取雁门及以北地区，然后集中力量再对付奉直。东线以鹿钟麟为总司令，坚守南口；西线以宋哲元为总司令，5月18日向晋军进攻。至6月中旬，晋军两道防线被攻破。被迫退守雁门，晋北绝大部分县城为国民军占领，但天镇（傅作义部坚守）、大同（张汝萍部坚守）、浑源、蔚县等战略要地未能攻克。在雁门关外的争夺战中双方都损失惨重。7月初以后，战事重点遂转移以东线南口为主，其中一部分兵力，由宋哲元率领去收复被奉军占领的多伦。但西线仍面对8万晋军，故不能不仍留相当兵力。至于说南口失守以后，再去夺取山西以为出路，那已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形势是：8月19日，联军占张家口；26日，晋军不仅收复全部失地，而且占领了丰镇与平地泉。这两个地方，即是文中所预计可能的第一道与第二道防线。

北方区对于三特别区及 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

- 1 三特别区 即热河、察哈尔和绥远。1950年后撤销，绝大部分为内蒙古自治区。
- 2 仲一 即王仲一。1924年曾任中共上海区执委会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干事。1925年初，任张家口特别支部书记。1925年秋，萧三调任张家口地委书记，王任组织委员。
- 3 麟符 即韩麟符。1924年国民党“一大”和1926年“二大”，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冬，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在张家口成立，任副书记（李大钊任书记）。三特区“民校”工作即国民党工作，由其负责。
- 4 路友于 生于1895年，卒于1927年，山东诸城人。1918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20年回国任教北京大学。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任北京执行部候补执行委员兼秘书，与李大钊密切合作。1926年，国民党“二大”当选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1月，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与李大钊同时被捕就义。

5 平山 即谭平山(1886—1956)，广东高鹤人。早年人同盟会。1920年参加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后任中共粤区首任书记。中共二、三届中央委员，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民党“一大”后，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农民部长。李大钊要求中共中央速派谭平山去西北军工作之前，徐谦向国民党中央也正式提出《西北国民革命军党务工作计划》，关于设立总政治部，建议“主任可于李石曾或谭平山同志中择一人任之”。1926年9月11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56次会议讨论决定，任命李石曾为西北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但未到职。谭则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职，后为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

6 一飞 即王一飞(1898—1928)，浙江上虞人。1921年春赴苏入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1924年秋回国，1925年秋曾任江浙区委(上海区委)书记，后任张家口地委军事委员、中央军委特派员。据冯玉祥日记1926年10月3日记载：“下午五点，到政治学校，适选举党务委员，余批评王一飞同志热心而欠细密。”按此，王此时已在冯部工作。王后又到上海区委工作，曾参与领导1927年3月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

7 特派××同志去西北一行 ××同志，指陈乔年(1902—1928)，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苏学习，1924年回国，时任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从五原视察后，调离北方区，至湖北省委工作。

8 至五原与伯坚接头 五原，时为国民军(西北军)总部所在地。刘伯坚时任国民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但实际上在五原的时间很短。9月17日五原督师后，10月8日，即与冯玉祥一起赴包头。11月18日，由包头又返五原。11月24日，离开五原到达临河，此后即向宁夏、甘肃前进。12月24日到平凉。1927年1月26日到西安。此件的时间是1926年10月18日，则伯坚此时正在包头，离他返回五原的时间，尚有30天。而他11月18日回到五原后，实际只停留5天，并已全力进行西进的准备工作。故陈与刘接头的地点应是在包头。而陈返回的时间，也不会晚于11月17日。

听取陈乔年关于西北军 政治工作考察报告后的意见

1 题解 此篇原题为《听了乔同志报告后的结论》。乔同志应即陈乔年。此篇刊于1926年12月初第12期的《中央政治通讯》上，而实际所作的时间应在致刘伯坚信之前或大体同时。这是李大钊指导当时工作的系列文件之一。即：1926年10月18日，对三特区与国民军中的工作发出第一个指示文件；随后即派出陈乔年进行考察，约于11月初返回汇报；听汇报后，又于11月9日给伯坚发出指示意见。此意见大约于11月17日前，可以到达在包头的伯坚手中。11月18日，伯坚返五原。11月24日，离五原西进。1926年12月5日，又给在二、三军中工作的魏野畴去了指示信。至12月15日，建议陕西工作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

切实改进与做好西北军中的政治工作 ——致刘伯坚

1 题解 此篇原题为《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时间为1926年11月9日。信中有在伯坚信中发现如“西北工作方针”中所指出的错误之语，这个“西北工作方针”，应是指《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也就是说，此信是发于中央指示方针之后。

2 刘伯坚 时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为石敬亭）。参见《守同志来信》注16。

守同志来信

1 鲁张 指张宗昌。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奉系势力扩张至山东、江苏、安徽、上海等地，张宗昌任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旋改任山东军务督办，统治山东。他虽属奉系，但又有相对独立性，故称鲁张，以与张作霖的奉张相区别。详参见本卷《守常政治报告》“张宗昌”条注。

2 杨度 字子敬（1875—1931），湖南湘潭人。曾两度留学日本。清末曾主张君主立宪，1915年又曾发起筹安会，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1922年转向革

命,为配合南方革命而奔走活动,对于张宗昌的联络与策动,即其中之一。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前后,亦曾多方设法营救。1929年,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起着特殊作用。1931年9月在沪病逝。

3 驱孙而拒杨 孙,指孙传芳。杨,指杨宇霆。“怂恿”张宗昌“驱孙而拒杨”,是李大钊当时所提出的一种策略。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后,奉系占有江苏、安徽、上海。1925年11月,孙传芳出兵赶走江苏督军杨宇霆、安徽督军姜登选、淞沪镇守使何丰林,直至占领徐州。对此张宗昌时图报复,故李大钊试图利用当时的形势与张宗昌的报复心理,但“驱孙”的计划并未实现。1926年11月10日,张宗昌决定以“援孙”为名向孙统治的地盘出兵,但张作霖规定,对方“不请不动”。张宗昌率15万人南下到达浦口时,张作霖又命令不准过江。后来,孙传芳虽把张宗昌的部队接过江,但“驱孙”之事却没有发生。

4 收纳靳、田、魏 靳,指靳云鹗,字荐青,山东邹县人。初任皖系旅长。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后,投靠直系。1923年2月,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直、奉战争中任直军第5路司令。1925年10月,到汉口拥吴再起,被任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兼豫省省长。1926年3月,吴佩孚令靳率12万人沿京汉路北上,向冯玉祥国民军进攻。靳与吴“讨冯”的主张相反,认为应“联冯讨奉”,故态度消极。5月,被吴以“贻误戎机”罪免职。9月,吴因鄂战失利,又恢复其职务。12月,又被吴免去14省讨赤联军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职务。

田,指田维勤,靳部的师长、军长。南口战役中,担任直系东路进攻。1926年11月,吴令田负责前方军事。12月,为援陕全军总司令。12月,靳云鹗被免职,田任14省讨赤联军副总司令。1927年被国民军战败,俘后处决。

魏,指魏益三,字友仁,直隶(今河北)藁城人。1917年入陆军大学。1921年投靠张学良,任旅参谋长。1925年11月,郭松龄起兵反奉,郭任魏为第十军参谋长兼炮兵旅长。郭失败后,魏收集余部,被冯玉祥任为国民军联军第四军军长。1926年3月,魏脱离国民军,投靠吴佩孚,被任为讨贼联军第三路总司令。这个“贼”,是指冯玉祥。南口战役中,担任直系西路

进攻。9月，被吴任为第八军军长。12月，靳云鹗被免职，魏被任为11省联军副总司令。

国民革命军克武汉后，吴佩孚的败局已定。其所剩部队，主要为靳云鹗部（包括田、魏）。他们都有个选择去向问题，故李大钊提出“收纳”的策略建议。

- 5 靳、田、魏、寇等派有代表到汉 窦指寇英杰，字弼臣，山东利津人。早年投清军。1923年，任湖北陆军混成旅旅长。次年任师长。1925年，任河南省督军。1926年10月，任郑州防军司令。12月，靳云鹗被解职，任14省联军副总司令。1927年1月，任讨贼联军第三军团长。继投直、鲁联军，任第十二军军长。后投蒋介石南京政府，任第三十军军长。抗战时，投汪伪政权。

李大钊提出“收纳”靳、田、魏建议，实际上他们已在暗中联络。据《蒋介石年谱》11月23日记：“河南寇（英杰）、魏（益三）、靳（云鹗）等代表，均来输诚。”24日，蒋又电示唐生智：“嗣后我军对北方人才，宜尽量收纳，以示大公而免误解。”12月23日，蒋又认为，“河南事，必使其内部生变。”12月28日，蒋任魏益三为第三十军军长。蒋同时“闻靳云鹗有附义消息”，顿觉形势“又有转机”。靳云鹗1927年5月投向武汉国民政府后，曾任河南省政府委员。田维勤于1927年附奉。

- 6 邓演达 字择生（1895—1931），广东归善（今惠阳）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去德国留学。1925年，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26年，当选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6年10月，决定直辖鄂、湘、川、黔、赣、闽诸省，为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主要左派领导人之一。1931年8月，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

- 7 王励斋 王法勤（1870—1941），字励斋，河北高阳人。早年赴日留学。辛亥革命后，任京津同盟会纠察部长。1912年，任国民党北方支部副支部长、河北省议会议长、国会参议院议员。后奔走讨袁与策划护法。1924年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委员、北方军事特派员等职。在此期间，与李大钊合作共事。北伐战争期间，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商民部长、河南省特派员，后为国民党改组派成员。1941年5月病逝于成都。

- 8 吴有下野之说 1926年11月28日，吴佩孚通电宣布下野，声称：“决计退

息林下，不复再问政事。”但事实上，仍在率部挣扎。吴的真正下野时间为1927年2月14日。

- 9 斯二 指靳云鹏，为靳云鹏之弟，故称。详参见本篇注4。
- 10 靳大要总理 靳大，指靳云鹏，字翼青，山东邹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任山东第五师师长、陆军部次长、山东省都督、段祺瑞参战军（后改边防军）督练。曾3次组阁出任北京军阀政府总理：第一次，1919年4月至1920年5月，以安福系为中心组阁；第二次，1920年8月至1921年5月，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由直、奉共推组阁；第三次，1925年5月至12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靳继任政府总理。1926年冬，靳积极活动，拟第四次组阁。12月20日（即李大钊此信15天后），张作霖在天津蔡园邀靳面商，令其组阁，张意作总统。未果。
- 11 晋闻的驻京代表 晋闻，指阎锡山，时任山西督军兼省长。其驻京代表此指温寿泉。
- 12 雨帅 即张作霖，字雨亭，被称为雨帅。详见本卷《守常政治报告》注⑩。
- 13 百川 阎锡山，字百川，山西五台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率山西新军响应，被举为山西都督。1912年投靠袁世凯；袁失败后投靠段祺瑞，被任为山西督军兼省长。在军阀战争中，先是联冯反直，继又联奉、联直反冯。北伐战争开始后，以其山西战略地位重要，故李大钊与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极力争取阎响应北伐，给阎亲自去信。后阎直接与蒋介石联络。据《蒋介石年谱》，1926年12月1日，“阎锡山代表赵戴文请见，陈述愿加入国民革命军。”1927年6月，阎通电自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8年2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对奉作战。
- 14 事齐事楚 《孟子·梁惠王下》：“滕文公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此处借言晋闻的处境。
- 15 杨增新 字子周，云南蒙自人。1889年进士，1908年，被光绪帝封为阿克苏道尹。1912年，任新疆都督兼布政使，1916年任督军，1925改任督办。文中云“杨增新确已故去”，不确。杨增新于1928年7月1日表示拥护蒋介石，7月7日被人刺死。
- 16 刘伯坚 生于1895年，卒于1935年，四川平昌人。1920年赴比利时、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旅比支部书记、旅欧总支书记。

1923年赴苏，入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6年8月，随冯玉祥回国，任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部长。1935年3月，牺牲于江西大庾。

17 刘牧师 指刘馨远，曾在冯部传教。

国民二军中工作应注意之事

— 致魏野畴

1 题解 本篇原副题为《十二月五日致魏同志的信》，魏同志，即魏野畴（1898—1928），陕西兴平人。1920年在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与刘天章、杨钟健、李子洲组织陕西旅京学生共进社，1923年加入中共。其时，李大钊应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的请求，派魏赴榆林，后又在杨虎城部工作。1926年冬任国民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曾是中共西安、陕西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国民二军，前身为于右任领导的陕西靖国军。1924年10月初建时，军长为胡景翼，驻开封。1925年胡病故后，岳维峻继任军长，部队扩充至20余万人。1926年春，在吴佩孚、张宗昌的联合进攻下，由开封向洛阳、陕西撤退。仅3个月即基本被打散，岳维峻逃到山西被捕。余部由第十师师长李虎臣率领到达西安，与那里的国民三军第三师师长杨虎城部汇合。追击的刘镇华镇嵩军赶到后，遂将西安包围，历时近8个月。为抵抗镇嵩军，杨、李取消所部二、三军的番号，统称国民联军陕军，推李虎臣为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魏即在此任职。

国民二军另尚有北撤的一部分，由邓宝珊、弓富魁率领与国民一军汇合，后参加了五原誓师和重建。重建的编制是：张之江为第一军军长，邓宝珊为第二军军长，徐永昌为第三军军长，方振武为第五军军长，弓富魁为第六军军长。但魏野畴并未到邓所部的二军去工作。1927年2月，冯玉祥下令废除原一、二、三、五等军番号，重新编制。

2 K·M·T 当时国民党的代号。

3 张静江 又名张人杰（1871—1950），浙江吴兴人。1924年国民党“一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时任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白和对于陕西问题的意见

- 1 题解 1926年11月27日，援陕国民军彻底击垮围困西安近8个月之久的镇嵩军，解西安之围，使北方革命形势由此发生根本性转折。对于解围后陕西工作问题，中共中央与北方区早就极为关注。《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6年11月）所载《冯玉祥回国后之国民军》中说，冯玉祥与陈乔年谈话称：“问题不在现在解西安之围，而在解西安之围之后。我深知二军性质，今日解了他的围，明日可缴我的械。”五原誓师时，冯玉祥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让于右任任副总司令。于表示：“不知陕中将领是否革命。如我任职而归，恐将领向我要饷要械，我无法办，故暂不接受。”于后来也未接受。上述情况，对于中共中央与北方区考虑陕西工作产生很大影响。给魏野畴的信和这个通知，都与此有关。
- 2 二军本身之改造，几为不可能之事 关于二军以及二军与其他各军的关系，其后由冯玉祥采取了果决有效的措施作了解决。1927年1月19日，他致于右任电中提出：“编制按各路顺序下编，废去从前二、三军名号，以化除畛域。”2月17日又通令全军：“所有一、二、三、五军等名目应即一律取消。”决定“认真淘汰老弱及不堪造就之官兵，宁缺毋滥。”“其不守本分或不堪造就者，令其缴械遣散。”国民军联军共编制17路军。所有改编部队，由以张之江为委员长的国民联军检查委员会进行分头点验，并负责全军纪律的检查。同时，冯玉祥还制订了一整套严格的军规条例。中共中央与李大钊所关注的难题，获得解决。
- 3 陕西 C.P. 的工作亦应统一起来 1925年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豫、陕区委。1926年初，其领导下的中共西安地委成立。后因西安被围困，中央决定再由北方区委管辖陕北地区党的工作，6月，成立绥德地委。1926年12月，李大钊派耿炳光为临时特派员回陕工作。中央根据北方区建议，1927年1月28日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区委。3月中旬，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耿炳光为书记，魏野畴、李子洲等4人为委员，全区党员（不包括国民军中党员）为388名。此后，陕甘党的工作，才脱离北方区，归中央直接领导。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赤化观

- 1 《政治生活》上发表的以“猎夫”为笔名的文章，学者们经考证，历来均认为

是李大钊的作品，“猎夫”是李大钊用的化名。本篇署名为“猎父”，我们经研究认为，也是李大钊的作品。古文字“夫”“父”可以互用。据《辞海》的注释云：“夫，旧指从事体力劳动或被役使的人。如渔夫、车夫、役夫。”“‘父’，对男子的尊称，父犹傅也，男子之美称也。”或曰：“对老年人的尊称”。如：“渔父、田父”等。所以古来渔夫——渔父、猎夫——猎父、田夫——田父是可以互用的。

国民政府与晋阎关系(之一)

——白和通讯

- 1 KMT 北京政治分会曾间接对晋阎为下列表示 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成立于 1925 年初，即孙中山在京病重期间。成员有丁惟汾、李大钊、李石曾、吴稚晖、王法勤。

此处所说“分会”对晋阎之表示，李大钊《守同志来信》中曾具体引述。李大钊说：“我即着人答复他说”。也即是李大钊以个人之名对晋阎作出答复。在这里，李大钊个人之名的文字，与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是同义的。当时中共北方区委(包括白和代号)的文字与李大钊个人文字之间的关系，亦应如是观。

- 2 余部已开始回晋 国民军从南口败退后，晋阎出兵攻复晋北失地并占领绥远。由于形势发展，晋阎与国民军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1926 年 11 月 1 日冯玉祥日记记载：“本日接广东无线电，浙江、福建已归国民政府，安徽不日亦有变化。又闻吴佩孚已退顺德，刘镇华已退潼关，故阎百川电商启予，令将在绥队开回太原，防吴之败兵侵入，一防刘镇华退潼关后，二军窥其晋南也。”商启予，即商震(1884—1978)，时率晋军驻绥远，被阎委任为绥远都统。

- 3 此外，尚有与晋合作西北军约两万人 “与晋合作”，此为臆语。1926 年 8 月 14 日南口陷落后，国民军向西北败退。韩复榘、石友三、郑金声率三个师向阎锡山投诚，所提惟一条件是：“宁死不打国民军”。阎予同意，并让“各级士官一律照旧”，未予改编或作其他处置。冯玉祥五原誓师后，率刘伯坚等人亲往实为晋军驻地包头(当时张之江等将领反对前往，认为太冒险)，对已投晋的韩、石等人进行教育，表示“既往不咎”，使这部分人又回到

国民军。对此，阎锡山亦未予阻拦。

4 士英 即姜士英，为当时蒋介石的代号。

5 温寿泉 生于 1880 年，卒于 1955 年，山西洪洞人。1904 年赴日留学，次年入同盟会。1911 年响应武昌起义，任山西军政府副都督，后又任燕晋联军参谋长、都督府军政司司长等职。1949 年前，还曾任傅作义高等顾问。建国后，任北京文史馆馆员。

6 筵仙(L) 指李大钊。

7 韩麟春 生于 1888 年，卒于 1930 年，沈阳人。1908 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民国后曾任陆军部次长。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第一军副军长，是激烈的主战派。1927 年夏，与张学良、于珍一起，率奉军入豫与北伐军和国民军作战，后被击败。

国民政府与晋阎关系(之二)

——白和通讯

1 民中 即国民党中央。

2 戊日 时电报以韵目代表日期。按序，戊代表 15 日，从文字内容看，应是 1926 年 12 月 15 日。

3 奉进攻五原 奉军第 8 军万福麟部于 1926 年 12 月 18 日向五原进攻，被守军宋哲元部击败，退归绥（今呼和浩特）。12 月 24 日，万部加上增援骑兵共 3 个旅 2 个团又继续进攻，占领包头。1927 年 1 月 8 日，占领五原。

4 国军仅至阌乡、灵宝 国民军于 11 月 27 日解西安之围后，对刘镇华镇嵩军实行追击。12 月 3 日，刘汝明部打出潼关，进入豫西阌乡。12 月 14 日，刘郁芬部又攻占灵宝。吴佩孚急令驻陕县（文中称陕州）的柴云升部固守待援。12 月 21 日，刘郁芬部攻克陕县。文中所说情况尚未攻克陕县，说明此文写于 12 月 21 日之前。

5 韩麟春攻山西 此事没有发生。

奉系最近军事计划

——白和报告

1 题解 本篇注明：“系十二月二十五日天津所寄之报告”。当经李大钊审定

以北方区名义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张作霖于1926年12月1日于天津蔡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当日即基本决定军事战略方针,即由孙传芳担任长江前线,由张宗昌直、鲁军在江北为其后盾;由韩麟春17军由京汉线援吴佩孚;由汤玉玺、高维岳协助阎锡山在包缓方面防范国民军。其后,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河南方面。12月8日,任于珍为奉军援豫总司令,连续三日致电吴佩孚向武汉反攻。12月10日,奉军以磁县为中心已集结完成,并与吴部发生冲突。1927年1月6日,张作霖决定奉军大举入豫。本篇反映此前的奉方情况。

- 2 皆出于杨宇霆之规划 杨宇霆,字邻葛。1926年12月10日,被张作霖任命为安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
- 3 英公使蓝得森在津与张会议 蓝得森,应为蓝普森。1926年12月22日,在天津拜晤张作霖。
- 4 党方宜速与靳成立妥协 此问题,李大钊甚关注。其战略意义,后为事实所证明。吴佩孚对于奉军入豫,时而动摇,时而接受,忽而抗拒,惟靳云鹗自与南方接洽后坚决与奉对抗。1927年2月8日,张作霖宣言进兵河南。2月12日,田维勤、魏益三等公推靳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吴部基本上归靳指挥,与入豫奉军进行激战,既使吴佩孚进攻冯玉祥国民军的计划归于夭折,亦使奉军不能直接威胁武汉。至1927年6月,入豫奉军终被北伐军与国民军击败,退到黄河以北。

致柏文蔚、王法勤、徐谦、顾孟余

- 1 题解 此函见《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九)4669,题目为编者所加,时间为1927年1月24日。

柏文蔚(1876—1947),字烈武;王法勤(1876—1941),字励斋;徐谦(1871—1940),字季龙;顾孟余(1888—1972),原名兆熊。此四人时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徐、顾并为中执委常务委员,徐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他们与李大钊都曾有过合作共事的关系,在当时政争中起着重要作用。

- 2 此间经费困难 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的经费,向由广州国民党中央汇寄,迁都武汉后由武汉汇寄。中因政争关系,数月停寄,只好靠借债维

持，薪金、水电费均积欠。李大钊此信发出后，由广州寄款两千元，武汉寄款三千元。

- 3 轶然决计设都武汉 1926年10月10日武汉攻克后，蒋介石首先提出将国民党中央迁鄂的建议，主张“新国都将设于武昌”。鲍罗廷先是反对，后予支持。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正式决定迁都武汉。12月5日第一批重要人员出发，在广东的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随即停止办公。12月13日，鲍罗廷与徐谦、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王法勤等举行谈话会，提议并随即决定：在中央执委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由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国民政府执委组成临时联席会议，以执行最高职权，徐谦被推定为主席。但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第一批赴鄂要人张静江、谭延闿、顾孟余等12月31日抵南昌，蒋介石于1927年1月3日突然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反对迁都武汉。随即发生激烈的迁都之争。

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之一) ——关于晋闻之报告

- 1 题解 1927年1月24日，李大钊托吴渊给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柏文蔚、王法勤、徐谦、顾孟余带去一信，并带上北京政治分会给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关于政治、军事、外交的综合报告书。此件原存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九)4669，经南京第一档案馆整理，刊于《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1辑第18册。篇幅甚长，为便于阅读研究，现按原顺序内容，分列篇目，正标题之一、之二……是新加的，副标题则基本是原有的。

从文字看，关于靳云鹗的2篇及杨宇霆的1篇，文字缺少进一步整理加工，较凌乱。但是，此文系经李大钊过目并经他认可作为其所主持的工作报告的一部分，则是不成问题的，故一并列入。

- 2 国军不战而退五原 1926年12月18日，奉军第八军万福麟部向五原进攻，被宋哲元部击退。12月24日，万部增援骑兵共五旅两团再次进攻，占领包头。1月9日，占领五原。

- 3 孔繁蔚 生于1885年，山东滕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山西督署参谋长、大同镇守使。时任第二师师长。后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参

议、山东省建设厅长。1949年后，任山东省政协委员。

4 晋军宣急速与革命总部及国民军总部发生密切关系 革命总部，是指武汉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自亦包括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部。李大钊代表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与晋阎的联系，系属于武汉方面的间接联系。其后，晋阎又派代表直接与南方联系，初为孔庚，后为赵戴文。据蒋介石年谱，1926年11月30日，蒋分析时局仍把阎锡山列入“敌方”。12月1日，阎代表赵戴文请见，“陈述愿加入国民革命军”。自此，晋阎与南方关系即基本确立。12月2日，蒋演说中称：阎加入“只是时机问题”。又说：“山西真能加入革命军，山东、北京就不成问题。”12月20日，蒋又接见晋阎代表。

晋阎与国民军总部的关系，1926年9月五原誓师后，即开始改善。已经投晋的韩复榘部等3个师约2万人重回国民军，阎未予阻拦。11月21日，冯玉祥任命晋军将军原主要对手商震为国民联军副总司令，阎亦若无其事，并对处于困境的国民军有所接济。据冯玉祥日记载：1926年12月8日接李石曾来电，云阎锡山确与国民军合作。12月12日，冯派薛笃弼联络晋阎，并与李子善常驻太原。1927年2月19日，会见晋阎代表南桂馨。此后，冯、阎双方共派军政要员9人于赵村组成联合办事处。1927年6月，晋阎允出兵7万担任石家庄、大同两方截敌后路之任务。李大钊联晋策应北伐的计划，最终实现。

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之二)

——关于靳云鹗之第一次报告

1 靳云鹗 参见《守同志来信》注④。1926年10月4日，吴佩孚令靳率部冲出武胜关增援武昌，靳未从令。11月21日，吴召开郑州会议，决定前方军事由田维勤负责。12月28日，吴通电解除靳讨贼(后改为“讨赤”)联军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职务，指责其不反攻汉阳，并散布诋毁文件。此两次报告所反映靳的活动，以此为背景。据蒋介石11月23日日记记载：这时，靳云鹗已派代表与其接洽。

2 玉帅 吴佩孚，字子玉，被称玉帅。

3 郭贼伏诛 郭贼指郭松龄(1883—1925)。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第3军副军长。1925年11月，与冯玉祥达成密约，22日回戈反奉，向沈阳进

军，要求张作霖下野。旋因日军助奉，在巨流河被击败。12月24日，在新民被捕杀。

- 4 孙君馨〔馨〕远，曩为我仇，今亦为我友　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孙率闽、浙联军支持江苏督军直系齐燮元，击败浙江军务善后督办附奉的卢永祥。继又于1925年11月向奉军进攻，赶走江苏督军杨宇霆、安徽督军姜登选，大败张宗昌于固镇一带，一直把奉军赶到徐州以北，孙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给奉系军阀以重大打击。1926年9月以后，国民革命军战事转向江西，孙求救于奉张，走向联合。
- 5 陈调元　生于1886年，卒于1943年，河北安新人。早年毕业于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1925年任江苏第四师师长，投靠孙传芳反奉，任江苏军总司令、安徽督军。1926年12月21日，在南京与张宗昌、孙传芳议定，由陈部在皖境沿江抵御国民革命军。据蒋介石日记记载，1926年10月25日、11月23日，陈已派代表向蒋输诚。1927年3月4日，陈归附国民革命军。
- 6 生智　即唐生智（1889--1970），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北伐军前敌总指挥。
- 7 四军　指田维勤所部。
- 8 斯对樊亦有〔友〕好　樊即樊钟秀（1888—1930），别号醒民，河南宝丰人。1921年受编于吴佩孚，后与孙中山秘密联系，被委任为建国豫军总司令。1924年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时在河南配合国民革命军对吴佩孚作战，所部约2万人。
- 9 任师　任，指任应岐，时任第10师师长，为樊钟秀旧部，有9000人。
- 10 张英华　生于1886年，河北衡水人。毕业于北洋大学，继留学英国，回国后任民国大学教授，北京政府财政部次长、总长兼币制局总裁。1926年11月任河南省长。
- 11 鸡公山别墅　鸡公山，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南，为大别山支脉，因主峰报晓峰两侧宛如雄鸡双翼而得名，景色宜人。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后，吴佩孚逃避于此。

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之三)

——关于靳云鹗之第二次报告

- 1 效帅 张宗昌，字效坤，被称效帅。
- 2 师景云 河北徐水人。冯国璋亲信。1914年，被封为“宣武上将军”，任将军署参谋长。
- 3 曰[白]属靳之一派 系误传。据《白坚武日记》记载：吴“误起靳荐青，而武汉遂不可救矣。”不仅如此，“吴帅甫抵刘家庙，而靳之军伍已先北开至广水，缴卫队之械，收帅骑之马，叛迹已至暴露”。又认为：吴“对靳则前倨而后恭”，对靳之“处分手谕已下”，又听从寇英杰的“调停”。如果当时“靳去，则乘孙、党两军苦战于江西之际，以三旅之众可以下武汉。惟当断不断，不能处分一抗不用命之靳，遂至军心涣散，将士解体，遂成掩耳盗铃之局，不待奉军入豫，而已知不可收拾矣。”可知，白主张对靳取果断处置。
- 4 张其锽 生于1877年，卒于1927年，广西桂林人。字子武，清末进士。1912年，任湖南都督府军务委员。1918年护法期间为谭延闿幕僚。1922年6月，任广西省长。1925年吴佩孚东山再起后，担任其秘书长。白坚武认为，吴之失败，“张子武实负重大责任”。对于靳云鹗，“独子武济其恶”。张作霖亲口说，曾给子武“10万元之贿”。1927年7月2日，张随吴逃往四川途中，在樊城上游竹筱铺被归附冯玉祥的张联升部击毙。吴佩孚仅率妻子卫士数百人得脱。吴之势力，至此消灭。
- 5 符定一 生于1877年，卒于1958年，湖南衡山人。京师大学堂毕业。曾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安福国会众议员、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时为吴顾问，白坚武谓之属“太太派”。1946年，应毛泽东之邀访延安。1949年后，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
- 6 至于魏益三自必与靳取一致之行动 据《蒋介石年谱》1926年11月23日记载：寇英杰、魏益三、靳云鹗都已派代表来“输诚”。12月23日，蒋电示唐生智，魏益三代表王周宾已切实表示：“此次虽与河南各军同来，但各军情形复杂，意见不一，魏军表面上当与各军取一致，实际上愿与我方作进一步切实合作之磋商。”并意“须得一正式军长名义”。1926年12月28日，吴佩孚再次免靳云鹗讨贼（后改“讨赤”）联军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职务，斥其

失守汉阳，不事反攻，并让副总司令田维勤、魏益三、寇英杰取代其权力。这时，蒋已任命魏益三为第 30 军军长。1927 年 1 月 1 日，靳部通电讨吴，于郾城、驻马店一线向吴进攻。1 月 14 日，魏益三致电吴佩孚，请与北伐军议和。吴召集会议，决定解决魏部。2 月 12 日，田维勤、魏益三等又推举靳云鹗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统率河南各军抵抗奉军，并发表讨张作霖通电。3 月 1 日，靳云鹗将吴佩孚部改编为 16 个军。3 月 7 日，张作霖下令对靳部总攻击。3 月 11 日，冯玉祥进兵河南布告称：“靳总司令云鹗，倡义豫中。”6 月 14 日，冯玉祥就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靳云鹗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河南省政府委员、冯玉祥所部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其后，靳任南京国民政府上将参议。1930 年，回济南经营企业。1935 年病死北平。

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之四)

——关于杨宇霆的报告

- 1 张作霖拟于旧历年前入京 1926 年 11 月 30 日，孙传芳、吴俊升、张宗昌、阎锡山、商震、寇英杰、陈调元等 16 人联名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 月 1 日，张于天津蔡园就职，12 月 27 日入京。当日，由外交处长访晤各国驻京公使，告知张不日将亲往访晤。
- 2 吴俊升 生于 1863 年，卒于 1928 年，山东历城人，行伍出身。袁世凯称帝时封二等男爵。1921 年任黑龙江督军兼省长，后历任东三省保安副司令、第五军军长、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兼保安司令等职，为奉系军阀重要骨干。1928 年 6 月，与张作霖一起回沈阳，在皇姑屯被炸死。
- 3 维持顾阁 1926 年 12 月 20 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园邀靳云鹏、潘复等会商，请靳组阁，并请潘与之合作。靳当即接受，进行筹备。1927 年 1 月 7 日，张变计，通电表示维持顾维钧内阁。1 月 12 日，顾内阁决定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权。
- 4 设法笼络安福系、交通系、研究系 张作霖此项计划已开始实施。1927 年 1 月 20 日，张作霖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函知国务院，为“礼罗耆硕，集思广益”，设外交、财政、政治三个讨论会。聘孙宝琦、陆宗舆为外交讨论会正副会长；曹汝霖、叶恭绰为财政讨论会正副会长；梁士诒、曾毓隽为政治讨论会正副会长。梁为交通系元老，曹、叶为新交通系，曾为安福系，孙、陆为直

系老官僚。

- 5 杨度 参见《守同志来信》注②。1927年2月5日，顾维钧内阁任杨度为包字铁路督办。
- 6 奉军即入河南 1927年1月6日，张作霖决定奉军入豫。2月6日，荣臻部最早进入彰德（今安阳）。2月8日，张作霖发表进兵河南宣言，内称：“专为剿灭过激主义”，“豫中吴佩孚驻节，自任反攻，时阅半年，未闻豫军进展一步，兹分饬直、鲁联军及三、四方面军分途前进，誓收武汉，进取粤湘。”至2月13日，奉军完全占领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3月9日，奉军分3路渡黄河。3月17日，占领郑州，吴佩孚逃往洛阳、巩县，靳云鹗败退。4月7日，奉军占领郾城。
- 7 任可澄 生于1877年，卒于1945年，贵州安顺人，清末举人。曾组织宪政预备会，后与蔡锷领导护国运动，任云南都督府最高顾问。1918年任贵州通志局总裁，继任贵州省长。时任顾内阁教育总长。

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之五）

——关于北京外交使团最近态度的报告

- 1 汉案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都武汉。1月3日，武汉各界举行庆祝大会。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江汉关前演讲，英国水兵武装登陆干涉，以刺刀刺伤群众5人。是谓汉案。当晚，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就汉口惨案向驻汉英领事葛福口头抗议，令其立刻撤退水兵，由中国军警接防；否则，不负责任。次日，陈友仁又照会葛福，谓肇事英舰，在本案未解决前，不得离开汉口；否则，遇有事故，国民政府概不负责。4日下午，汉口各界联席会通过要求赔偿、惩凶、撤退英舰、收回英租界等决议，徐谦代表国民政府表示支持。当晚，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
- 2 蓝普森 Miles Wedderburn Lampson(1880 -1964)，或译蓝浦生，1916—1920年任英驻华使馆头等参赞。1926年升任驻华公使。12月1日到上海，随即先到汉口与武汉国民政府接洽。12月18日，由英驻京代办欧迈尔向外交使团提出《英国变更对华政策建议案》，即文中说的“对华新提案”。
- 3 中国民众及国民政府都认新提案有援助北方的意思 新提案建议由各国

政府发表宣言，“声明拟将修改条约之事及其他悬案，俟华人自行组成有权力之政府时即与之交涉”；又主张“声明俟中国国定新税则规定颁布时，即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之权”；“对于华会附加税，应以无条件准中国全国立行征收”，但“所收附加税进款，不必由各税务司解交上海保管银行”。“如何支配储存问题，应由中国主管官署自行决定”。声明中俟诸将来之语，显然有不承认南方国民政府之意：附加税的“全国立行征收”，并称“由中国主管官署自行决定”，不解交上海。这些都有利于北京政府。1927年1月12日，北京政府下令，从2月1日起，对进口货按值百抽二·五附加税，奢侈品抽百分之五。英提案还称：如华人不顾条约或有攻击外人应享之利益，各国当协同从事。

- 4 胡政之 生于1889年，卒于1949年，四川成都人。1905年起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12年起任职《大共和日报》。1916年起，任《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1921年创办国闻通讯社，任社长。
- 5 现在恐已达到忍无可忍的程度了 此为英使蓝普森恐吓性语言。他一面面对武汉国民政府提出退还已被收回的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一面要求英政府对华增兵，并在外交使团提出，用武力“协同防卫上海”。1927年1月24日，英战舰12艘、英印军队1.6万名，铁甲车一队、坦克炮一队，航空兵两队，分别由英国、印度和香港出发，开赴上海。但是英国的武力威胁并未达到其目的。
- 6 左分利 即佐分利，时为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作为出席关税会议与法权会议的代表到北京。12月1日，又到达上海。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江苏省党部及学联、青年团代表征询政见。在南方活动后，2月3日经北京返回日本。
- 7 芳泽 即芳泽谦吉(1874—1965)，日本人。1899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即来华，历任厦门、上海、牛庄等地副领事。1912年任汉口总领事。1916年任日使馆参赞。1919年任日外务省亚洲局局长。1923年起任驻华公使，1930年离华。1952年10月复出，任驻台湾“大使”。
- 8 坂西 即坂西利八郎(1870—1950)，日本人。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来华在京津等地从事间谍活动。后任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政府军事顾问，历时12年。其后日本侵华的战犯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本庄繁等均是其

门徒。

- 9 后接东京来电，政府要他先往东京一行 李大钊与李石曾此时的外交活动，主要秉承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1月20日，蒋介石派出代表吴铁城秘密赴日，交涉中日关系问题。大内此次突然改变径去武汉的计划，奉令先回东京，内中当与此新变化有关。大内对李大钊的访问，恰在吴铁城赴日后的二三天时间。2月15日，戴季陶又奉蒋命赴日（化装成日本人），并称：“乃以国民党同志资格，求日本朝野谅解本党真意。”后与佐分利等外务省官员会谈。
- 10 虽承认了南方征收二·五附税，却要求仍须由海关征收 此点是英国的阻挠手法。因为，当时海关仍掌握在英国人手中，故李大钊强调是“由中国的自设机关征收”，以“打破英国所把持的海关行政权”。1927年1月15日，国民政府于九江征二·五附税。1月18日，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由上海到武汉，与陈友仁、宋子文会商。表示接受中国条件，二·五附税另设机关办理，不经过海关。对于此会商结果，其他国家默认，而日本芳泽则坚决反对。
- 11 南北分治，只是一个过渡的视线 1926年12月7日，蒋介石在攻克南昌、九江后，在庐山召开中央会议，决定军事上“采取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的策略”。12月18日，派孙科、蒋作宾赴奉联络。而西方一些国家，此时则提出南北分治的主张。1926年12月22日，英使蓝普森抵津晤张作霖，劝张用和平手段解决国是，并提出南北分治，张表示坚决反对。张称：中国历史上向重统一，且只有北方征服南方，决无南方来统一北方之理。李大钊此处说“只是一个过渡视线，中国国民党究是要谋中国的统一”，并有其“方略”。此种说法，与当时的战略策略是协调的。
- 12 美使馆态度忽变 1926年12月3日，美国务院宣告：美对粤军在长江各条约口岸收回海关事件，决不采用任何方略阻止。12月19日，美新任驻汉口、广州、天津总领事巴烈特接政府训令，对华仍持亲善人民的方针，对南北两方不偏袒。但1927年1月10日，北京使团会议讨论九江、汉口收回英租界问题，决定电本国政府请示办法，美国也和英一样向华增兵。1927年1月13日，英亚洲舰队总司令泰伟德赴长江上游侦察，美亚洲舰队总司令威廉士抵上海。并称奉政府之令，“有便宜行事之全权”。1月18日，美驻

华公使马慕瑞奉令回国讨论对华方针，旋又接电称：中国时局严重，尤以上海最须警戒，令返任。此时，在长江的外国军舰，英国 18 艘、美国 21 艘、日本 17 艘、法国 7 艘，共 63 艘。

- 13 陈友仁同志又径(达)美政府反对英提案 1926 年 12 月 31 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致电美国务卿凯洛格，称英提案使上海“恐变为血战之地，外国商业或将永远受害”，请美国政府阻止。
- 14 委闻讯 指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领导人。
- 15 法使 当时法使为玛德(Damien Martel, 1878—1940)，法国人，伯爵。1913 年来华任使馆头等参赞。1916—1918 年任代办。1925 年起任公使，1930 年离任。李石曾、蔡元培、褚民谊，都曾留学法国，与之交往较多。
- 16 穆德 John Raleigh Mott(1865—1955)，美国人。1888 年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即从事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协会和学生活动的创始人。1930 年前多次来华，周游演讲，传布基督教义，颇有影响。曾获诺贝尔和平奖。

狱 中 自 述

- 1 题解 1927 年 4 月 6 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串通外交使团，突然派军警包围并搜查苏使馆界内的苏远东银行、中东路办事处及其他官舍，逮捕李大钊等 60 余人。杨度及国立北京大学等九校校长等营救无效，4 月 28 日与路友于等 20 人以“扰乱治安”罪被安国军特别法庭秘密判处绞刑，时年仅 38 岁。本文为李大钊狱中所写，存有三稿。三稿的内容基本相同，但有几处文字略异。现收入第三稿，而对于初稿与二稿中的不同文字，予以注明。
- 2 在襁褓中即失怙恃 初稿为：“在襁褓之中，即丧父母。”
- 3 应科举试，试未竟 初稿为：“甫经府试”。
- 4 其时祖父年逾八旬 初稿为：“其时祖母去世，祖父年逾八旬。”
- 5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初稿为：“钊感于国势之陵夷不振，颇起（二稿为：‘慨然起’）深研政治以期挽救民族（二稿于此有‘振奋国群’四字）之思想。遂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学校。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

校。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二稿于此有：“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政法。”）乃决心报考法政专门学校，幸被录取。”

- 6 是校为袁世凯氏所创立 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民国成立后，改称“直隶法政专门学校”），是为了适应清末改革，仿行宪政的需要，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于1906年7月（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奏请创办，次年7月招生考试，8月入学。该学堂章程明定：“仿京师大学堂办法”，预科3年，正科3年，向全国招生。正科内分政治与法律两种，修业年限比京师大学堂缩短1年，但增加课时（每周约30小时），毕业后“照分科大学奖励给予出身”。另设速成性简易科，只向直隶地方招生。
- 7 皆赖内人辛苦经营 李大钊1900年完婚，夫人赵纫兰女士（1884—1933）。由于他襁褓中失怙恃，未成年丧祖父母，他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6年，都靠赵纫兰女士辛苦支持。北洋法政招生广告规定，仅膳费一项每月即需交纳5元。1913—1916年，李大钊继又赴日留学。其时，长子李葆华（1909年生）甫4岁，长女李星华（1911年生）甫2岁。家累之重，亦全赖夫人赵女士支持。
- 8 留东三年 李大钊赴日留学的时间约为1913年底或1914年初。正式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本科的时间为1914年（大正三年）9月8日。1915年下半年，投入留日学生中兴起的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1916年（大正五年）2月2日，因“长期缺席”被学校“除名”。1916年5月中旬，返抵上海。
- 9 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 以下至“我乃决心加入中国国民党。”初稿为：“而民族独立运动之革命事业，尚未完成。中国如仍不适应世界之潮流，急起直追，以求民族独立与自主，则国脉民生，将无自振拔，以维持其存在于世界矣！”二稿为：“中国民族尚困制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在国际上恢复其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国计民生必将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欲挽救危局，非唤起全国民众及愿与民众结合之武力，共同立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不可，于是决心投入中国国民党。”
- 10 互教时间 初稿于此后，尚有“先生与我等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之语。

- 11 任刻为政治委员 1924年7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置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决策机构,由孙中山任主席,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后改为瞿秋白)、戴季陶、伍朝枢、邵元冲7人为委员。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被确诊为肝癌,遂谕将原设广州之政治委员会移设北京,并指定汪精卫、于右任、李大钊、李石曾、吴稚晖、邵元冲、陈友仁7人为委员。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决定各重要地区设立政治分会。3月,北京政治分会成立,李大钊为委员之一。
- 12 吴稚晖 吴敬恒(1865—1953),字稚晖,江苏武进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翌年在巴黎参加组织世界社,继刊行《新世纪》周刊与《世界画刊》,宣传无政府主义。1915年在法国参与组织勤工俭学会。1917年曾任北京大学学监,1921年任法国里昂中法大学首任中国校长,次年任商务印书馆国语传习所所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当选历届中央监察委员。孙中山北上后,曾任政治委员会委员。1927年后,反对国共合作,支持并参与蒋介石“清党”。
- 13 陈友仁 生于1878年,卒于1944年,广东顺德人,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1912年回国,先后任北京政府法律顾问、《京报》英文总编辑,参与反袁和反段斗争。1919年代表广州护法军政府出席巴黎和会。后任孙中山外事顾问,随孙北上,孙病危时代笔起草《致苏联遗书》。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任外交部长。
- 14 北京执行部系从前之组织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决定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地建立地方执行部。4月20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正式成立,委员有丁惟汾、李大钊、于树德、恩克巴图、王法勤等五人。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后,决定取消,统一按省市系统建立国民党组织。

诗　　歌

筑声剑影楼剩稿·登楼杂感(戊申)(二首)

- 1 题解 李大钊于1907年即丁未年(光绪33年)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此诗写于“戊申”即1908年。筑,古击弦乐器,形似筝。战国末年,燕人高渐离善击筑,曾于易水和歌送荆轲入秦。秦灭燕后,渐离变姓名。秦始皇使人

熏瞎其目，置宫中击筑。高渐离于筑内暗藏铅块，扑击始皇，未中，被杀。本诗发表时署明《筑专用剑影楼剩稿》“筑声”之义，当取此。“筑声剑影楼”，为作者当时自署的斋名。

- 2 《言治》月刊 《言治》为北洋法政学会所办的政治评论与理论性刊物。法政学会于1913年初由应届毕业生所建立，决定办《言治》月刊并设编辑部主其事，郁嶷与李大钊同任编辑部主任，1913年4月1日创刊，同年12月停刊，共出6期。1917年4月，该学会又出版《言治》季刊，1918年8月停刊，共出3期。前后两刊，李大钊都是主要编者和撰稿人。

岁晚寄友(二首)

- 1 题解 此诗所称之“友”，应为蒋卫平。所称之“岁”，应为1909年。

蒋卫平(1882—1910)，字大同，河北滦县人，1905年入永平府师范学堂，继转入永平府中学堂，与李大钊同学。他“少有大志，慕班超、马志尼之为人，顾念时艰，慨然以天民先觉为己任。”他“常谈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诸人之学说”，因“极慕谭嗣同之为人，改号慕谭”。(见《蒋大同传》，原载《三民主义半月刊》第7卷第6期，1945年11月15日出版)1907年，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蒋卫平则去东北参与宋教仁所领导的革命活动。1908年，蒋去中俄边境考察，曾被俄兵捕入监狱。出狱后又在黑河等地参与对俄交涉事宜。1910年8月5日被俄兵诱至江中开枪杀害。

李大钊早年与蒋友谊最深。此时与李大钊“几年不相见”而又从事于“驱漠北”活动的友人，只有蒋卫平一人。

李大钊悼蒋之诗，题已标明，故此诗应写于蒋活着的时候。因此不可能写于1910年8月即他遇难之后(原文集注为“疑作”于“辛亥年岁末”)。此外，诗的内容亦可证：其一，“九世仇堪报”之说，应是指清王朝统治中国当时之数。从清顺治算起，到1909年11月14日、15日光绪与慈禧先后死去，清对中国的统治恰为“九世”。如算到辛亥后则应是“十世”。“复九世之仇”，常用者虽可视为概数，但其源“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一语则为确数。故此诗作概数理解可，作实数理解亦正合。其二，诗中“廿年余壮志”之语，与作者当年的实际岁数亦正相合。李大钊生于1889年(光绪十四年戊子年)，至1909年(戊申)按农历算此时恰为20

岁。因此，“岁晚”应是 1909 年岁末。

李大钊怀蒋与悼蒋的五首诗，发表时即是按写作顺序的：此诗发于《言治》月刊第 1 期；《题蒋卫平遗像》发于该刊第 3 期；《哭蒋卫平》二首发于该刊第 4 期。

题蒋卫平遗像

1 题解 1910 年 8 月 5 日，蒋卫平因进行抗俄活动被俄兵杀害。此诗约写于获悉蒋遇害的消息后。

筑声剑影楼剥稿·哭蒋卫平(辛亥)(二首)

1 题解 蒋卫平于 1910 年 8 月在黑河边境为俄兵杀害。据诗中“经年骸骨冷江头”、“凭吊经秋祇劫灰”等句，此诗应写于 1911 年（辛亥）冬。此诗亦为《筑声剑影楼剥稿》。

筑声剑影楼诗·南天动乱， 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

1 题解 此诗约写于 1913 年 8 月，发表时署明《筑声剑影楼诗》。

1913 年 7 月 12 日，在袁世凯步步进逼下，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人以江苏南京为指挥中心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7 月 23 日，袁世凯在命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职务的同时，任命冯国璋为第二军军长兼江淮宣抚使，率部沿津浦线向南京进攻。天问，自 1959 年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对天问首解为“郭厚庵”（即郭须静）之后，人们一直沿用。但白坚武《余之新宪法平衡观》（载《言治》月刊第 5 期）一文称：“天问不敏，亦欲从当世诸君子论议后有所短长。”由是，天问乃白的自称。另又据其日记记载：“民国 2 年 6 月，毕业本科。充冯上将秘书，南行。”由此可见，白的“南行”，正是李大钊诗中“忆天问军中”的直接印证。故天问即是白坚武，此为赠白坚武诗。“二次革命”于 9 月 1 日彻底失败。9 月 4 日，白随冯国璋到达南京。故此诗应写于冯国璋到达南京前，即约在 1913 年 8 月。

赠筱舫、寿山(二首)

1 题解 此诗约写于1913年初秋。此题为编者拟。

筱舫，名尼鼎云，河北任县人。寿山，名刘锡龄，字绶珊，河北滦县古冶人。1913年夏，二人与李大钊同毕业于直隶法政专门学校。

阿尔泰，新疆北部军事重镇，北临中蒙边境阿尔泰山。民国成立后，1912年4月俄公使即向袁世凯提出外蒙独立问题。此后，新疆边境与沙皇俄国、蒙古之间关系日趋紧张，时起冲突。10月，阿尔泰帕勒塔军恢复科布多，蒙军退向库伦。11月，沙俄与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擅自订《俄、蒙协约》，俄政府继又不准中国在俄、蒙边境驻军。1913年1月，蒙军千余近逼布尔根河，新疆都督杨增新急电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派兵往御。1913年2月，蒙军又企图窜扰阿尔泰山一带，杨增新决定加强防守。7月5日、11日，蒙军骑兵数千名先后进犯阿尔泰察汗通古，被击退。随后，北京政府陆军部决定派尼鼎云、刘锡龄二人押送一批军火赴阿尔泰支援。

筑声剑影楼诗·咏玉泉

1 题解 此诗约写于1913年秋，为《筑声剑影楼诗》，题为编者所加。

玉泉位于颐和园西的玉泉山，早期有泉眼14处，如第一泉、迸珠泉、裂帛泉、试墨泉等。有的泉眼喷水高达3米以上，为燕京八景之一。早在金代，它即是金中都的水源。元代建大都后，又专修一条人工渠道，引水入宫供饮用，称为金水河，现颐和园西墙外尚留有遗迹，故李大钊诗中谓“流贯颐和园墙根”。清乾隆帝钦定玉泉为“天下第一泉”，谓“凡出山而有冽者，诚不如京师之玉泉。”

筑声剑影楼诗·吊圆明园故址(二首)

1 题解 此篇为《筑声剑影楼诗》，题为编者所加，约作于1913年秋。

圆明园原为一片柳陌菱荷之地，明代曾有皇戚建园。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为雍正皇太子赐园，始称圆明园。雍正登基后扩建，乾隆时又增建长春园及绮春园，三园相毗连，统称为圆明园，总面积为350公顷，周长

10 公里，建筑面积与故宫相当，约 16 万平方米。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掠劫焚毁。

乙卯残腊，由横滨搭法轮赴春申， 在太平洋舟中作

1 題解 此处乙卯年腊月，系为 1916 年 1 月 5 日至 2 月 2 日。“残腊”，则当在 1 月末。

1915 年下半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日益公开化。12 月 12 日，公然明令根据“国民公意”接受帝位的“推戴”；继称将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将民国 5 年改为“洪宪元年”，并定于 1916 年 1 月 1 日正式登基。与此同时，海内外反对袁世凯复辟的势力也迅速奋起并形成新的联合，国内作为反袁旗帜的梁启超于 12 月 16 日秘密离津赴沪；此前，他的弟子蔡锷已奉命秘密离津经日本、越南于 19 日到达昆明；国外以黄兴为首的欧事研究会成员李烈钧等按事先联络已于 17 日抵达昆明，12 月 24 日，在昆明正式组成讨袁的护国军。25 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将领联名通电讨袁，宣布云南独立，护国战争爆发。12 月 28 日，孙中山电令上海等地革命党人响应讨袁，并令居正赴青岛在山东与东北组织讨袁军。章士钊、孙洪伊、汤化龙等也在上海积极进行讨袁活动。李大钊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由日本返抵上海的，后因形势变化与计划调整，又返回日本。

黃种歌

1 題解 此诗见于李墨卿(翰章)的《墨园随笔》(下)第 497 页。同时有序，称：与李大钊“同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相处甚契，在早稻田中华青年会同居者年余”。并称：“时余与李君及高一涵”等“在留日学生总会任文事委员会委员，编辑《民彝》杂志，李君《黃种歌》披露，同人无不举节、赞其气概之雄伟。”

送　幼　蘅

1 題解 此诗写于 1916 年(丙辰)春。“江户”为东京古称，建于 1457 年，1868

年7月17日即明治新政府军进驻后，始改称东京。10月，被定为天皇居城，成为日本首都。其地理位置面向东京湾，故称。“再至江户”，系指1915年“残腊”李大钊亦曾由此取海路回国。

送 相 无

1 题解 此诗作于1916年春。相无，即刘相无。1915年下半年反袁运动兴起后，李大钊因投身于此运动已“长期缺课”，1916年2月2日被学校除名。由沪返日后，即住在东京郊外高田村的月印精舍，故前诗云“再至江户”，此诗又云“又去江户”。题为1984年本编者加。

寄 霍 侶 白

1 题解 霍侶白，亦写霍例白，广东人，李大钊留学日本时的友人，后应邀与作者同办《晨钟报》。

1916年5月中旬，作者由日返国，临行前，霍赠诗云：“当年相遇即相知，抵掌谈心恨见迟。今夕离别却无语，独吟风雨一楼诗。”李大钊途至长崎给霍寄明信片云：“濒行蒙惠佳作，但对此好山好水，诗句却迟迟不来，盖由心绪恶劣所致。昨对泽民言：‘古人爱屋及乌，今则憎人及物，此心绪所以恶劣也。俟抵沪后当再奉酬。’”此诗即是李大钊到沪后次日对霍的酬答。

复辟变后寄惺亚

1 题解 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孙洪伊于当日在上海电促曹锟及近畿师旅长兴师讨逆，次日，又向全国通电反复辟。7月3日，原本参与张勋阴谋计划的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向北京进讨。7月4日，孙中山与孙洪伊等商定在上海设立民国政府，并致电两院议员南下护法。李大钊约于1日或2日（3日以后京津间已有战事，火车不通）“仓皇”至津乘轮赴上海，寓于孙洪伊处，支持孙中山为首的反对张勋复辟与段祺瑞乘机窃权毁法的护法斗争。

白坚武号惺亚。张勋部“辫子兵”4300余人，于6月8日进驻北京天坛与先农坛，13日迫使大总统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时京津形势已混乱紧

张，而李大钊这时尚在乐亭探亲，白去信促李大钊速回，于 6 月 25 日在天津晤面。7 月 1 日，白坚武由津赴沪到孙洪伊处，8 日，受命赴江西联络当时的督军李纯；15 日，李纯坚留他任督署顾问。7 月 22 日、29 日和 8 月 4 日，白接李大钊由沪先后三封来信。8 月 6 日，又接李大钊信，并附此“寄怀”诗。可见，此诗当写于 7 月底。7 月 21 日，李纯接任江苏督军，白随之任顾问兼秘书，到南京。11 月 11 日，李大钊经南京与白告别，返回北京。

此题为编者拟。1984 年本题为《复辟变后寄友人》。

山中即景（三首）

1 题解 此三首诗的前两首曾发表于 1918 年 9 月 15 日出版的《新青年》第 5 卷第 3 号，署名李大钊。另据 1918 年 8 月 19 日白坚武日记中记载：“接李守常函一件并白话诗三首”，题同为《山中即景》。第一、二首为：“（一）自然的美，美的自然。绝无人处，流水空山。（二）人在白云中，云在青山外。云飞人自还，依旧青山在。”其文字与《新青年》所载略有出入。第三首《新青年》未载，现按日记所载收入。惟其后尚有白坚武的注语：“佳处颇有司空图诗品风味”，从略。

悲　　犬

1 题解 此诗同见于白坚武日记 1918 年 8 月 19 日所记，李大钊《山中即景》三首诗之后。

欢迎独秀出狱（三首）

1 题解 1919 年 6 月 11 日，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游艺场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警察巡警与步兵统领衙门便衣密探当场逮捕。后经社会各界声援营救，北京军阀政府被迫于 9 月 16 日将其释放。此诗即写于其时。

2 独眼 陈独秀当时曾用的笔名。

3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1918 年 12 月 22 日，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为“五四”时期重要时事政治评论性报纸。出至第 37 期，于

1919年8月31日被军阀政府查封。

- 4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语出自1919年6月8日第25期《每周评论》上陈所写的《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文为：“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实验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赠 吴 弱 男

- 1 题解 吴弱男，女，章士钊夫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后与章士钊一起赴英。1909年在英国伦敦结婚。此题词为1919年下半年。
- 2 爱冷恺 瑞典人，女权运动活动家。
- 3 谢野晶子 生于1878年，卒于1942年，日本女诗人。

附：民间谣谚（五首）

- 1 题解 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蔡元培校长《征集全国近世歌谣》启事，并附“简章”，规定：本校教职员、学生可自行搜集，嘱托各省官厅、转嘱各县学校或教育团体代为搜集；时期自宋起迄于当代；内容为有关一地方、一社会、一时代之人情、风俗、政教沿革或类格言、童谣、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而寓意深远或有天然神韵者。通行的社会、时代及某些辞句，须予注解。定于1919年6月30日为截止日期，1920年12月31日前编成《中国近世歌谣汇编》和《中国近世歌谣选粹》两书，以为本校1921年的25周年校庆的纪念。初稿审定与汇编由刘复（半农）担任。故此歌谣发表时署名：“文科教授刘复编订，本校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先生来稿。”

1984年本编为《歌谣选》三首，《谚语》二则，现合为一题。

书 信

致 郁 宪 章

- 1 题解 郁嶷，字宪章，湖南澧县人。1913年7月与李大钊同毕业于直隶法

政专门学校。曾任北京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校教授，湖南财政厅长。

此信未署日期，1984年版文集题注为“1919年初秋”。但从内容看，应写于1913年9月或10月，即李大钊赴日留学之前。因为：（1）李大钊游碣石山虽有八次，但只有1913年秋的先后两次与此信的内容最相合。如此信云：“梨树正值果熟”，而1913年的《游碣石山杂记》中亦云：“时值秋梨正熟”；此信云：“深泉濯足，长歌采薇，回山去也。”而“杂记”中亦云：“坐石山濯足”，“倦游归去，长歌采薇，悄然有慕古之思矣。”（2）学友中，李大钊与白坚武一度关系最密。从1916年起，白坚武始有日记，举凡与李大钊的函件往来特别是其诗作，无不有记载。例如，1918年8月19日的日记中，即记有李大钊于五峰山寄来的《山中即景》三首与另一首《悲犬》；1917年8月6日的日记中，则记有李大钊的《复辟变后寄惺亚》；但是，惟独此信中所言怀郁嶷与天问的一首“长歌”，虽云“诗肃天问函中”，两者却毫无所记。由此可知：此信与那首诗的写作时间不是1916年以后，而是在此之前。此前白坚武日记虽按年补记数点事项，但包括1913年8月李大钊所寄的《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那首名诗，他都没有记载。因此，此信与那首忆郁嶷与天问的“长歌”，都应写于1913年秋，而不应是“1919年的初秋”。

致某君书

- 1 据此书发现者杨天石先生的《李大钊致佚名氏密札试解——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见《光明日报》2003年）说：“此函不署年月，无收信人。（上海）环龙路档案题作《张润之、李大钊致某君书》，可知当年整理档案时收信人已无考。函中有‘付丙’二字，要求收信人阅后烧掉，可知此函为密札，更加值得重视”。故我们将这封“密札”以《致某君书》为题收入全集。此信的接受者是谁？写于何时、何地点？杨天石先生在《李大钊致佚名氏密札试解》一文中作了分析、判断。他认为此信的接受者“是张继”，写于“李大钊、张润之在日本之时”。写作时间当在“李大钊于1914年1月赴日留学，1916年5月归国”“此一时区内”。详细论析请参阅《李大钊致佚名氏密札试解》。

- 2 梁伯强 即梁济善，山西崞县（今原平）人。山西大学堂教习。1903年癸卯科中试，1904年入翰林院任检讨，后赴日本入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回国后，投入立宪运动，曾任山西咨议局议长。1913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1914年任教育部次长，1915年10月辞职。
- 3 张润之 字泽民，直隶武强人，与李大钊同龄，同为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生，1914年毕业后同时去日本留学。1914年春，曾与李大钊共同翻译日本人今井嘉幸的博士论文《中国国际法》，在日出版。袁世凯谋划复辟帝制，李、张都积极投入反袁斗争。李组织中华学会和神州学会从事反袁活动，张均是积极支持者和参加者。

致 霍 例 白

- 1 这封信系一九一六年初夏李大钊途经长崎时，写在明片上寄给东京霍例白的。李大钊由日本回国参加反袁斗争前夕，霍例白曾赠诗一首：“当年相遇即相知，抵掌谈心恨见迟。今夕离别却无语，独吟风雨一楼诗。”

致 霍 例 白

- 1 抵沪以来 李大钊由日本抵沪的时间，约为1916年5月15日。李大钊离日时，霍曾送行并赠诗；抵沪后，李大钊即作答。信中云南京会议无结果和四川决于二十一日独立，则此信当写于1916年5月21日前。6月下旬，霍亦毕业回国，7月11日与李大钊一起乘轮北上，参与创办《晨钟报》。
- 2 溥泉公 张继（1882—1947），初名溥，字溥泉。时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在各派间进行联合反袁。
- 3 济公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时作为梁启超进步党的代表在沪进行反袁活动。
- 4 陈二庵 陈宦（1869—1943），字二庵，时任四川巡按使，督理四川军务。蔡锷率领护国军人川讨袁后，陈进行消极抵抗。1916年5月21日，宣布四川独立。因陈素为袁世凯所宠信，故对袁打击甚大。
- 5 湘亦不远 湖南将军汤化龙之弟汤芗铭（1885—1975），于5月29日宣布湖南独立。此亦公认为促使袁迅速垮台的又一重要因素。
- 6 南京会议 由江苏督军冯国璋发起，有15省区代表参加，于1916年5月

18日至30日在南京召开的讨论袁世凯地位问题的会议。冯的本意是让袁取消帝制后仍保留总统职位，在袁与反袁势力之间以调和为名加以利用，操纵政局，但为多数代表所反对。最后，毫无结果而散。

7 倪、张 倪，指倪嗣冲，时任安徽巡按使；张，指张勋，时任长江巡阅使。倪、张同为南京会议发起者，坚决主战，反对袁氏退位。迫于形势，冯国璋在会议最后表示，对张勋主战，“不敢赞同”。故信中说，他们之间，“已隐成敌国”。

致 李 泰 菜

- 1 李泰菜 生于1897年，字革痴，曾任北京高等师范附中教员、绥远特别区教育厅长。著有《欧战史要》、《西洋近百年史》、《国民军史稿》等。
- 2 国变日 指1917年7月1日，时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
- 3 南来栖迟沪渎 张勋复辟事起，李大钊历险出京抵沪，寓于法租界宝康里65号孙洪伊处。
- 4 《太平洋》 政论性月刊，1917年3月1日在上海创刊，李剑农任主编。李大钊寓沪期间，于1917年8月5日出版的《太平洋》第1卷第6号上发表《辟伪调和》的文章。信中“作文一首”，当即指此。其后，继又发表《此日》、《暴力与政治》两文。
- 5 阁下与剑农之争 1917年7月15日出版的《太平洋》第1卷第4期发表李泰菜《共和——致〈太平洋〉记者》的信，提出辛亥以后，“共和之声，喧腾人口，顾仆对于兹名，颇有怀疑。”并认为：“共和之名，译自日人。喧传吾国，遂为通称。仆意仍以译为民主为宜。”李剑农于信后答复，认为用“民主”一词，“不若仍以习用之共和二字译之为便”。进而又称，“共和二字之古义，虽不能与欧语 Republic 全符，苟非曲学顽旧如劳乃宣者，必不认其为君主政治或寡人政治也。”

李泰菜对于李剑农此复随即作出强烈反应。于1917年8月15日出版的《太平洋》第1卷第5期，又以《共和》为题《再致〈太平洋〉记者》，认为剑农的解释，“以论理眼光观之，可谓毫无价值。天下事无无漫不讲理而武断言之者也。”并指出：正因为“立名未善，故与劳氏以立论之资。仆惟痛心于此，故先正名。不图足下终有‘苟非曲学顽旧如劳乃宣者，绝不能认为君主

政治或寡人政治”一语，平心论之，仆一青年，何至与劳同其思想？”李剑农于此第二信后又答复，表示“疏谬固所不免”，“幸喜闻反对之论”。对“如劳乃宣者”一语，表示“决非于足下有所讽刺”，“若足下正名之本旨，则固仆所衷心感慕。”“此仆措词失謹，致招足下误会，罪甚罪甚。”但是，对于“民主”与“共和”的用法，李剑农仍表示“宜从习用”，不怕其与清朝遗老宣扬复辟之著《共和正解》、《续共和正解》之“共和”名词相通。

李大钊写此信的时间，应为李剑农对李泰棻第一信的答复后与第二信的答复前，亦即《太平洋》第1卷第4期出版（1917年7月15日）后和第1卷第5期出版（1917年8月15日）前，即约于1917年8月上旬，而不应是1917年10月。

致白坚武（摘要）

1 题解 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李大钊奔赴上海，寓孙洪伊处，于11月11日返京。故此信写于上海。

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态度，与孙洪伊一致，即支持孙中山的护法斗争，故写作并发表《辟伪调和》、《暴力与政治》等文章。但是，李大钊所思考探索的问题，则比当时的实际政争远为深刻得多。所以又很苦闷（见给李泰棻的信），很不满足（如此信）。对于此信，白坚武首先写道：“守常为人品洁学粹，俯仰今日之污世，大材不克收相当之用。余年来清友惟斯人耳！”在记下本函内容后，又写道：“可谓伤心独见之语，非一般时流政客所能梦见也。”

致白坚武（摘要）

1 题解 此信见于1918年3月5日白坚武日记。2月19日、22日，白给李大钊连寄两信，此信当有对来信答复之义。白时任直系将领江苏督军李纯的顾问。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1918年1月29日，日本军方由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主持研究出兵西伯利亚问题。而作为必要准备，则需取得出兵进驻中国东北三省北部的合法依据，这就是所策划的订立中日两国的军事同盟。日本的此项计划，皖系军阀头子参战督办段祺瑞积极响应，而直系首领、总

统冯国璋则有所抵制保留。在内外压力下，1918年2月，冯接受日本提出的军事合作的原则建议，但又强调这种合作，应仅“限于中国境外”，“中国境内的防务则由中国军队自己承担”。日本当然反对冯此一限制，认为“没有必要分境内境外”。于是，日本策划绕开直系的反对，提出由双方军事当局具体协商，也就是与段祺瑞协商。而此时，皖系军阀徐树铮正勾结奉系入关，拟驱冯下台。冯被迫同意了日方建议。这就是1918年3月16日所签订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12条)和5月19日又签订的《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9条)，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及中东铁路进而出兵西伯利亚提供条约依据。1918年8月2日，日本宣布对俄出兵；16日，单方宣布出兵北满，其名义是“防俄、德”。李大钊写此信时，中日间尚在通过外交途径秘密磋商中，故白坚武在抄录此信主要内容后，评之为“可谓见微”。由此可见，此信一方面反映直、皖之间矛盾的背景(李纯是直系骨干，白特别关注此事当与此有关)；另一方面又表现李大钊的远见卓识与国际眼光。

致 袁 守 和

1 题解 袁同礼(1895—1965)，字守和，河北徐水县人。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入清华学校图书馆工作，曾任馆长。1920年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后又赴欧考察，在伦敦大学和巴黎大学进行文献研究。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职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著有《西文汉学书目》、《俄文汉学书目》、《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目》等。

此信及以下致袁守和的信，均由袁先生亲属北京师范大学医院袁增圻大夫所提供。

此信未署日期。但从信的内容看，约写于1918年的下半年，新学期开始不久。

2 《国际法论》 即《中华国际法论》。日本今井嘉幸博士著，李大钊、张润之合译于日本，1915年4月东京健行社发行。

致 袁 守 和

1 漱溟先翁 梁漱溟(1893—1988)，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其父梁济

(字巨川),1918年11月10日在北京投净业湖(今积水潭)自杀。

- 2 申府 张申府(1893—1986),又名崧年,河北献县人。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留校任教,参与创办《每周评论》,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成员之一。
- 3 人百 雷国能,字任伯、人百。时为北京大学教员。
- 4 此信约写于1918年11月13日,即巨川先生自沉后第三天。

致 李 辛 白

- 1 题解 此信未署日期。信中云“自第一号起长期续订”,则当于《每周评论》第一号当时应尚未出版。《每周评论》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故此信约写于1918年12月20日。

李辛白(1875—1951),原名修隆,字燮枢,安徽无为县人。1904年参加陈独秀组织的岳王会,次年人早稻田大学,并首批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芜湖军政分府民政长,取名“辛白”,以示辛于职守、立身清白。后又任安徽省警察厅长、北京政府教育部佥事。1915年在沪办《通俗杂志》。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任讲义课(后改为出版部)主任、庶务主任。对于北大的“日刊”、“月刊”、《每周评论》、《新潮》等报刊的出版贡献甚多。1919年8月还创办《新生活》周刊,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继李大钊之后,与蒋梦麟、马叙伦、周树人等被通缉,离开北大南下。后主要在安徽从事教育工作。

致 李 辛 白

- 1 “周报” 指《每周评论》,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此信未署日期,信中云,木板“今晚又非用不可”,说明当写于《每周评论》出版前夕,即1918年12月21日。

致 李 辛 白

- 1 题解 此信时间署“二日”,并有“此颂春禧”之语,说明写于农历春节前或春节期间。查1919年2月1日为农历正月初一,则此处“二日”当为1919年的2月2日。

2 殷汝耕 生于 1889 年，浙江平阳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中国同盟会。1913 年又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16 年上半年曾参加留日学生的反袁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因汉奸罪被南京国民政府逮捕，1947 年被枪决。

致 李 辛 白

1 题解 信未署日期。因云寄九号之前的《每周评论》，则当写于 1919 年 2 月 16 日该号出版之后与 23 日将出的第十号之间。

致北京大学学余俱乐部

1 题解 1919 年 1 月 25 日，蔡元培等 33 人发起组织学余俱乐部。简章规定：“由北京大学同人组织之，以联络感情，商兑学术为主旨。”3 月 18 日《北京大学日刊》公布成立大会选举结果，其中，蔡子民为部长，李大钊为庶务干事，胡适、黄季刚等分别当选为交际干事与文牍干事。次日，《北京大学日刊》即发表此信。叶瀚于同日也在日刊上登出了辞职启事。其后，3 月 20 日、22 日、25 日及 5 月 30 日，沈尹默教授、廖书仓同学、徐宝璜教授及职员胡之德等也相继登出启事，辞去文牍干事、庶务干事、交际干事及会计干事职务。5 月 5 日，蔡元培校长也在日刊上发表辞去俱乐部部长职务的启事，启事特别声明：“与学余俱乐部脱离关系”。俱乐部成立不久就这样无形消失，个中原因不详。

致 胡 适

1 题解 原信无日期，但从内容看：(1)所提到的“这回谣言”，是指 1919 年 2 月《神州日报》两次刊登半谷通讯，谓陈独秀、胡适、陶履恭、刘复等 4 人，“以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并称：陈已在天津，“态度颇消极”；陶胡等三人，“由校长以去就力争，始得不去职。”对此，蔡元培于 3 月 19 日致函该报，指出“全是谣言”。(2)所提到的《新中国》，系创刊于 1919 年 5 月，而信中仍提“不办为好”。可见，此信应写于蔡元培的辟谣信之后与《新中国》创办之前，约在 1919 年 3 月下旬。

致 李 辛 白

- 1 原件未署日期。根据内容判断,此信似写于《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出版之后,第二十六号出版之前,即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至十五日之间。

致 吉 野 作 造

- 1 吉野作造 (1878—1933),曾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教师,回日后在东京帝国大学法科讲授政治史。1910—1913年游学欧美,1919年2月与福田德三、今井嘉幸等组织黎明会,宣传民本主义。其《黎明讲演集》曾赠予李大钊。北京《晨报》1919年6月18、19日连续以《吉野博士之我国最近风潮观》为题,报道他与李大钊的联系及对于五四运动的有关评论。其中说:“兹觅得吉野博士致北京大学某君书摘译于左。”所说“某君”,应即指李大钊。吉野信中认为,五四运动“毕竟带有排日的色彩”,李大钊此信及1919年10月12日《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均予辩驳。关于中日两国教授、学生间的交流联系,1920年5月,由高一涵、黄日葵等组成的代表团赴日访问;随后,日方亦有代表团到北京大学访问。
- 2 陈独秀 字仲甫(1880—1942),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主编。1919年6月11日陈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其本人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被北京警察厅和步兵统领衙门的便衣密探逮捕,因各方声援营救,北京政府被迫于9月16日将陈释放。
- 3 此信写于1919年6月15日。

致 袁 守 和

- 1 题解 此信未署日期,但从所云“独秀被捕”与“各校均已放假”推断,当在1919年暑假开始不久,时李大钊尚未离校。李大钊是在读了《每周评论》第31期所载的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后(见《再论问题与主义》)才离京的,也就是在1919年7月17日以后才离京的。因此,此信约写于1919年7月15日前后。

致王若愚、曾慕韩

- 1 王若愚 王光祈(1892—1936),笔名若愚,四川温江人。时任成都《群报》、《川报》驻京记者,1919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时当选为执行部主任。1920年赴德留学,先读经济,后习音乐,主张音乐救国,获博士学位。1936年1月病死于德国。
- 2 曾慕韩 曾琦(1892—1951),字慕韩,四川隆昌人。1916年留学日本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和中央大学。1918年回国,与王光祈、李大钊发起筹建少年中国学会,次年7月正式成立时,当选评议部主任,继赴法留学。1923年12月,在巴黎发起成立爱国主义青年团,1929年后改称中国青年党,为主要首领。1951年5月病死于美国。

致会计课

- 1 题解 此信未署日期。刘仁静(1902—1987),湖北应山人。1917—1919年北大预科学生,1919年升入哲学系,请求李大钊写此担保条。此篇原题为《为哲学系学生刘仁静缓交学宿费的担保条》,现改此题。

致周启明

- 1 题解 周作人(1885—1968),原名櫆寿,又名启明,浙江绍兴人。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参与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

原件未署日期。1919年上半年,周作人曾考察介绍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他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兴趣,应在此考察之后。此信约写于1919年下半年,新学年开始。

- 2 Malon 与他的 Integral Socialism 马隆与他的《整体社会主义》。
- 3 Benoit Malon 贝奈特·马隆(1841—1893),法国工人运动组织“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可能派)领导人之一,整体社会主义派在法国的主要代表人物。
- 4 巴黎 Commune 中 即巴黎公社。
- 5 Genoa 热那亚,意大利主要港口城市。

- 6 John Stuart Mill 约翰·穆勒(1806—1873),又译约翰·密尔,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其著作 *On Liberty*、*A System of Logic* 被严复译为中文,题为《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等文中曾多次引用其著作。
- 7 Revue Socialiste 《社会主义评论》,贝·马隆创办的一种月刊,倡导工团主义和合作社会主义,1880 年在巴黎和里昂两地出版,1885—1914 年在巴黎出版。19 世纪 80 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
- 8 Le Socialisme intégral 《整体社会主义》,贝·马隆著。
- 9 “integral” 整体的、完整的。该词最初与社会主义运动发生联系是在意大利。19 世纪末,意大利社会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因倡导社会主义不应该只依靠工人,而要不分阶级地依靠整个受苦的人而得到“整体派社会主义”之名。该派主张和平、合法地实现社会主义,在法国和比利时工人运动中有较大影响。马隆流亡意大利期间可能受到该派影响,接受其整体社会主义理论,并有所发挥,用来反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主张社会主义的改革是整体的,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物质上的需要,同时还要满足人们一切道德与情感上的需要。

致 袁 守 和

- 1 题解 此信仅署二十九日,未署年月。1918 年 12 月 21 日,北京图书馆协会在北京大学开成立会,通过会章并选举职员。结果袁同礼(清华图书馆长)当选为会长,李大钊当选为中文书记。报请教育部立案,应在这次会议之后。信中云,此“立案”被“批驳”,“是傅次长亲自批的”。说明此事发生在 1919 年的下半年。五四运动后,北京政府对教育文化界加强了控制。而傅嶽棻则是因其敌视新思潮而被宠用的人物。故此信约写于 1919 年下半年。
- 2 傅次长 即傅嶽棻,湖北武昌人,清末举人。1919 年 6 月至 1920 年 8 月任教育部次长,并曾代理教育总长。

致 宫 崎 龙 介

- 1 题解 此信据原件笔迹为李大钊所写。信封上写“面递宫崎龙介先生”,是

由方豪等北大学生赴日考察团带到日本去的。从“久未通讯”的文字看，这是李大钊等与宫崎龙介久别后新的联系的开始。故另两信应在此信之后。

宫崎龙介(1892—1971)，日本熊本县人。192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在大学读书期间，即参加大正民主运动。此时，李大钊尚在日本留学。1920年起，任《解放》杂志主笔。1926年，与李大钊的老师安部矶雄、吉野作造建立劳动协会；12月，参与建立民众社会党，并任中央委员。孙中山逝世后，曾来华吊唁。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在日成立中山会。建国后，曾多次来华访问。

致宫崎龙介

1 题解 此信未署日期。如前一信题注所析，李大钊与宫崎龙介新联系的开始是1920年4月，故有久别致歉之语。而此信则显然是已有频繁交往的情况下所写，故不可能是在1919年。此信云，订于“十月七日下午十一时”宴请宫崎龙介，则此信应写于前一日，即1920年10月6日。

致宫崎龙介

1 题解 此信仅署“七日晚”，未署年月，而前一信所订的宴会时间，恰为“十月七日午十一时”。故此信所署的“七日晚”，应为当日的晚上，即1920年的10月7日。

致周起明

1 题解 此信未署日期。周起明，即周启明。信中云他需用的《欧洲文学史大纲》馆中虽可购买，但却因“经济奇窘”而暂无力购买。此种经费状况约在1920年下半年。而周氏提出需用此书，又大约在新学期开始后，故此信约写于1920年10月。

致注册部

1 题解 1920年10月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课程。此信约写于1920年12月。

致 钱 玄 同

此信钱玄同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一日，在寄鲁迅（豫才）、周作人（启明）信时一并转去。陈独秀（仲甫）的“来信三件”，鲁迅于一月二十日寄还了李大钊。（参见《鲁迅研究资料》（十二）。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五月出版），据此，我们暂将写此信的日期定为十一日，供学者作进一步考订的参考。

致 胡 适

信已传到我手 1920 年 12 月 16 日，陈独秀由沪赴粤前给胡适、高一涵信，谈《新青年》今后的方针。内云：“《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尊重哲学、文学为是。”并请胡、高二人“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胡适于 12 月 27 日收到此信，随即复信，认为《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遂提出三个办法：(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2)“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3)“暂时停办”。对胡的这种意见，陈独秀回信反对。

胡适针对陈独秀的回信，于 1921 年 1 月 22 日又给守常、豫才、玄同、孟和等 8 人写信，说明此前与陈的信来往的原委，认为陈对他的“答书颇多误解。”并说：“守常兄已将书传观，我至今日始见之，未及加以解释，恐误会更深，故附加一函，并附独秀与孟和书一份，再请你们各位一看。”此处所说“守常已将书传观”，应是陈独秀对胡“误会”的那封信，亦即此信中所说的“传到我手”的信。

李大钊此信中，尚说“昨天想到你那里去，好带给你看。”说明胡适当时尚未见到陈这封信（按：此信迄今尚未见。估计是写给守常等人，而不是单写给胡适的）。李大钊还说：“我两三日得了工夫，一定去看你，好和你谈谈。”胡适 1 月 22 日的信中说，对传到李大钊手中的信“至今日始见之”。可见李大钊此信，当写在 1 月 22 日之前的四五天，约为 18 日或 19 日。（1984 年版文集题注为“当在 1921 年 1 月末或 2 月初”）。

- 2 交通(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集团。首领梁士诒于清末曾任交通银行帮理、铁路总局局长等职，后又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兼交通银行总经理，罗致财政、交通部门政客，时称交通系。1916年后，曹汝霖又任交通总长、交通银行总经理，次年又兼财政总长，成为新交通系首领。
- 3 研究(系) 1916年8月，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要由进步党议员组成宪法研究会，是为了对抗由国民党议员组成的宪法商榷会，被称为研究系。
- 4 政学(系) 北京政府时期以李根源、张耀曾为首要，以欧事研究会成员为基础的政治集团。1917年于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中形成，后又南下参加护法斗争，与滇、桂系军阀相结合，排斥孙中山，被称为政学系。

复 胡 适

- 1 题解 1921年1月22日，胡适在给李大钊、鲁迅等8人的信中重申自己对于《新青年》的主张，“并请对于此议下一个表决”。李大钊于1月23日在胡适的信旁边写了自己表决性的意见。（即此处所称的复信）1月26日，胡适又将李大钊等8人的意见，分别列于1月22日的信之后，再次向8人通报。
- 2 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 “从前的第一条办法”，即胡适对陈独秀1月16日来信所提出的：“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

在李大钊此意见后，胡适又注：“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也即同意胡的第二个办法。

赞同胡的第二个办法的，还有张慰慈、高一涵、陶孟和、王抚五、周作人、鲁迅、钱玄同，基本上形成一致的意见。但是2月11日，《新青年》被上海法捕房搜查封闭。2月15日，陈独秀由广州致胡适信，认为《新青年》“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对于胡批评他对陶孟和的误解，他表示：“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

致 胡 适

- 1 题解 此信无日期，1984年版文集题注为“疑写于1919年五六月间”。但从信的内容看，则应写于1921年6月中旬。

因为：杜威于1919年5月1日到上海，随即在南京等地讲学，至1919

年9月下旬才到北大。李大钊信中有“我们自然应该把教育比个人看得更重”和“政府正在那里制造加害我们代表的材料”等话，则是针对1921年6月11日杜威给国立各高等学校联席会议的一封信而说的。1921年3月15日起，北京大学等国立各高校教职员停职罢教，向政府索欠薪并要求确保教育经费，李大钊为出席联席会议代表并曾代理主席。杜威此信称：“我大胆奉劝诸位，若是政府和你们讲和，你们须把学校利益放在第一，把个人的痛苦放在第二。就是说，你们须先要求政府发还积欠，保障从前力争的各校未来经费和开支。只要政府实行公布了他的方法，教员诸君就可以表示自己对于教育和学生的诚意，从速开讲。但是，一面又要宣言：学校一开，政府便当赔偿各受伤教员的损失，而且对于教职员任何人都不再追究。若是政府有不守信的形迹，诸君可取一种行动，表示你们对于马叙伦君和各位负伤代表的共同责任。”杜威信中还说：“若是诸君不先论教育问题，而先论个人的痛苦问题，恐怕这种谅解和援助就要和诸君离开了。”6月13日，一向反对罢课、罢教的胡适也向李大钊建议，让他在联席会议上提出发表停止罢教的宣言，免得“牺牲太大，收束无期”。关于教员被打伤和“政府”“正在那里制造加害我们代表的材料”，则是指6月3日，马叙伦、李大钊、沈士远等代表和支持他们的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新华门前被卫兵打伤的事。6月4日，政府竟诬指他们“破坏秩序”。重伤住院的马叙伦受军警监视，甚至进行传讯。就在杜威写信的6月11日，马叙伦愤而绝食。故此信不可能写于“1919年五六月间”。

致 齐 梁 斋

1 题解 梁翁，即齐梁斋，时任四存学校（今北京市第八中学前身）校长。明代著名理学家颜元著有“存性”、“存学”、“存治”、“存人”四编，以此义为校名。该校为私立学校。其后主办者张荫梧曾以仁、智、勇、信解释“四存”。其教育特点是重视继承颜李学派的精神，实行半工、半农、半读和军事化。此信只署“二十三日”，未署年月。1984年版文集题注为“写于1920年”。但据信的内容看，应为1921年7月。因为：(1)李大钊介绍法科毕业生朱尚瑞去四存学校任教，又称其夫人为女高师学生，“亦在钊门墙之列”。则此事必发生在李大钊已在法科和女高师任课之后，而不可能在此之前。李大

钊是1920年7月才成为北大教授的。从该年10月起，先后在北大历史系、经济系、法律系开课和北京女高师等校兼课。(2)信中又云：“教潮不日可望结束”，此“教潮”当指1921年3月15日开始的北京国立高校教职员为索薪与确保教育经费的停职罢课。后经范源濂等人的调停，政府接受罢课斗争提出的要求，7月28日，蒋梦麟等8校长通电复职，次日，教职员亦宣言复职，此次教潮结束。故此信的“二十三日”应为1921年7月23日。

致 周 太 玄

- 1 周太玄　后改名无(1895—1968)，四川成都人。1919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随即赴法留学，创办并主编《旅欧周刊》。1931年获法国理学博士学位，次年任四川大学理学院院长。1952年任重庆大学校长，后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兼中国科学出版社社长。著有《动物心理学》、《人的研究》、《诗的将来》等。
- 2 京中教潮已告解决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后，1920年起，北京多次发生“教潮”。1921年3月15日，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因政府积欠薪俸及教育经费无着而决定“暂行停止职务”。17日，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共同发表“停职宣言”。6月3日，发生新华门前流血事件，马叙伦、沈士远、蒋梦麟、李大钊等被打伤。7月13日，范源濂等出面调停。7月24日，北京政府满足调停的五项要求，并派员慰问“六·三”受伤者，教潮遂告结束。李大钊信未署明“八月初二日”，并云“京中教潮已告解决”，当即是指此一次“教潮”。其写信的年头应是1921年8月2日。

致 蒋 梦 麟

- 1 題解　此信未署明日期，但从信的内容看，应写于李大钊任图书部主任与蒋梦麟任总务长期间，并写于新学年开始“十月六日”以后。

1919年12月8日，蔡元培校长委任蒋梦麟为总务长，李大钊为图书部主任，由蒋直接领导李大钊的工作。1920年5月制定《图书部试行条例》，对人员组成、职责、机构、业务等作出了明确规定。1921年2月，总务委员会又规定新聘事务员、书记均以三个月为试用期。李大钊信中所陈的事，均与上述规定有关，故应写在上述规定之后。

从 1919 年底以后，北大经费即屡生危机。1920 年 8 月 4 日，蔡元培校长呈教育部，称“本校辍发薪资已经三月之久”。1922 年 8 月，蔡元培又因经费“积欠五月以上”而反复要求辞职，并从 9 月 12 日起，委托蒋梦麟代理校长。因此，在此两年的 10 月，李大钊均不大可能请求蒋解决信中所提出的增人与提高待遇等问题。1921 年 10 月，由于上半年的“教潮”经范源濂等调停到 7 月 24 日获解决，政府决定由财政部以盐余 200 万元作为担保，印发每张 10 万元的证券 20 张，交教育部作为教育经费之准备金。从而，使经费上陷于困境的北京大学一时有所好转。李大钊此信可能写于此时，即 1921 年 10 月。

致 周 起 明

1 题解 此信未署日期，1989 年版《李大钊文集》（续）题注为“似写于 1920 年春”。但据考，应为 1921 年 9 月底或 10 月初。因为：（1）起明（周作人）生病的时间是：1920 年底患肋膜炎；1921 年春加剧，入山本医院；6 月 2 日至香山碧云寺休养，9 月 21 日返寓。故信中间“病好了么？”信中谈到周“前次”来信的事，说明此信是对周来信的答复。而周来信的时间，则理应在 9 月 21 日返寓前后。（2）陈独秀“回沪”的事，当是指他由广州回沪，而不是指他由京回沪或由别处短时外出回沪。因为信中说到他“仍住渔阳里 2 号”，这种说法，仅能适用于他由广州回来的情况。陈独秀于 1920 年 12 月 17 日离沪去广州，1921 年 9 月中旬也即是大约周作人病愈回寓的时间又回到上海。李大钊此信，应是在得知陈回沪的消息后所写。

复 注 册 部

1 题解 注册部在当时北大属总务系统的一个部门。1919 年 12 月 8 日，蔡元培校长在委任蒋梦麟为总务长同时，委任郑寿仁为注册、编志、询问、介绍部主任。注册部应是该部的简称。

陈德荣 即陈颖，广东文昌县人。1918 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生）。据有关著作称，陈于 1920 年曾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与黄凌霜一起创办著名的工人刊物《劳动音》。后因陈、黄持无政府主义而退出小组。刊物由罗章龙等接办（见邵维正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解放军出版

社 1991 年版)。

关于陈保释事，北大校史资料卷号 E11—48—2 呈蔡元培校长的信封上有批字：“本校学生查无陈德荣其人”。后又有教务处助教谷源瑞 3 月 2 日证明：“陈德荣即本校学生陈颖。”于是，又有一批示(似为蔡校长批)：“请沈士远先生约李守常先生商量一回，发文牍课拟稿”。另在李大钊“致沈士远先生”(见下封信)的信封上，又有人写“1922.3.7.”字样。

李大钊此信未署日期，但下一信“致沈士远先生”则署“十七日”。这个“十七日”，当为 1922 年 2 月 17 日。因为：沈士远从 1920 年 9 月即为代总务长(总务长蒋梦麟在蔡元培出国期间代校长)；1922 年 1 月 31 日蒋连任总务长，但因自己出国，决定仍由沈代理。2 月 20 日，沈以教授“无暇兼顾”为由提请辞职。遂改由谭熙鸿代理，谭于 2 月 21 日到职。因此，李大钊致沈的信，只能是在 1922 年 2 月 20 日前，即是 2 月 17 日。而复注册部的信，则应约在 2 月 10 日。信封上“3.7.”的字，当是在谷源瑞 3 月 2 日证明之后，实际最终处理的时间。李大钊 17 日信中提出的“属文牍课拟稿”出保的意见，与蔡校长的批示正合。但是，如陈确曾参加中共北京小组的早期活动，李大钊为何经仔细“探询”仍“不得要领”。似尚有些难解。

致 沈 士 远

1 题解 此信未署年月，仅写“十七日”，1984 年版文集题注为：“疑写于 1919 年五四运动中”。此信的年、月，在前信《致注册部》的题注中已考证。应为 1922 年 2 月 17 日。

沈士远，时为北大教授。1919 年 12 月 8 日，蔡元培任命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同时，委任沈为校舍、斋务、杂务、卫生部主任。其后，沈与李大钊共事较多，同被推选为北大教职员会委员、校评议会评议员。

致 校 长 办 公 室

1 题解 此信 1984 年版文集题为《为图书馆职员马家骥改薪函》。现改此题。据北大校史档案，该件由当时校长办公室秘书谭熙鸿签字，交办公室书记胡骏勗办理。经办人批字：“查马君家骥改助教系十、十一、十七。聘会通过。骏勗上十一、三、七”。因此，马家骥由学校聘任委员会通过改为

助教的时间,为 1921 年 11 月 17 日,胡骏勋办理的时间是 1922 年 3 月 7 日,而李大钊写此信的时间,则应约在 1922 年 3 月 1 日。

致 孙 伏 庐

- 1 孙伏庐 即孙伏园(1894—1966),原名孙福源,浙江绍兴人。192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时任《晨报》副刊主编。
- 2 陈仲甫先生来函,内有致起明先生等一函 陈仲甫,即陈独秀,他给李大钊的函,尚未发现。致周作人等的函,见于 1922 年 4 月 7 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 4 月 11 日的北京《晨报》。《晨报》于 4 月 4 日曾发表由李大钊起草、王星拱等署名的《非宗教者宣言》;同时,亦发表了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幼渔等 5 人的《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对此,陈独秀寄函李大钊并附来给周作人等 5 人的信,要求在《晨报》上刊登。孙伏庐按其要求于 4 月 11 日刊出;同时,也将周本人对陈信的答复,同刊于《信教自由的讨论》栏内。据此,李大钊写此信的时间,应约为 4 月 9 日。

陈信批评周作人是“向强者献媚”,周信回答:“先生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反对言论,不特不加以容许,反以恶声见报。即明如先生者,尚不免痛骂我们为献媚,其余更不必说了。”周在答信之外还发表了《思想压迫的黎明》的文章,认为王星拱、李大钊等人的《非宗教宣言》,是“唯理运动的态度”,他是“赞成的”。如果人们都持这种态度,他们也就“无反对的必要”。但是,有些人竟声称对“基督教”等宗教“铲除恶魔”,要用群众运动进行“舆论制裁”,这使他“预感着取缔思想自由的危险”。他认为,对宗教信仰主要靠“启发知识”,使人“自主转移”,而不应以多数人的声势对少数人进行压迫和干涉。

- 3 《劳动世界》 英国柯尔著,冯莘毅译,1922 年 4 月 17 日起在《晨报》副刊连载。冯当时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

致 胡 适

- 1 题解 此信未署日期。但内云“弟于明日与仲甫赴杭一游”,当知系李大钊 1922 年 8 月赴中共中央杭州西湖特别会议前夕所写。关于此会议的时间,说法不一。张国焘回忆为 8 月 8 日;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

《共产党》书中说是 8 月 17 日，并广被引用；《陈独秀年谱》记为 8 月 22 日。但从此信及陈、李行踪看，似均不确。

陈独秀于 8 月 9 日被捕，8 月 17 日尚在狱中。李大钊 8 月 18 日于北京东方饭店主持设宴招待苏俄代表越飞并发表讲话。所以，17 日他在西湖开会是不可能的。

陈独秀于 18 日出狱。这次会议的时间，必须在陈出狱后才可定。而李大钊赴会的时间，则又必须在接到中央的通知后才可定。因此，8 月 22 日在西湖开会也是不可能的。

信中所述孙中山的某些主张与活动，必须在 8 月 23 日之后并且是到了上海之后才有可能了解。“中山抵沪”，是 8 月 14 日。其中所述的政治主张，见于 8 月 15 日发表的政治宣言。8 月 23 日，孙中山接见吴佩孚代表王法勤与曹锟代表孙岳。信中说“洛阳对此，可表一致”，很显然，这必须在 8 月 23 日孙接见之后，并且由于李大钊与白坚武、王法勤的密切关系才能迅速得知。信中说“中山命议员即日进京”，也见于 8 月 23 日的这次接见的谈话中。因此，可以认为，李大钊大约于 8 月 26 日到达上海。

信云：“昨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问题；又云，“弟于明日与仲甫赴杭一游”。则可知，这两天之间的一天，即应是写信的日期。据报载，8 月 25 日孙中山会见马林。马林作为越飞代表的身份，与孙中山谈中俄关系；又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与孙中山谈国共合作问题。马林的这次会谈，应是在陈、李与溥泉的商谈之前，而这两次会谈，又都应是在西湖会议之前并为这次会议作准备的。因此，其日程应是：8 月 26 日，李大钊到沪；8 月 27 日，李大钊与仲甫等商谈 25 日马林与孙中山会谈情况，8 月 28 日，陈、李与溥泉会谈；当日，李大钊给胡适写这封信，8 月 29 日，赴杭开中央特别会议。8 月 30 日会议结束。8 月 30 日返沪后在上海活动，经张继介绍、由孙中山亲自主盟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首先加入国民党。

据上述，此信约写于 1922 年 8 月 28 日。

2 洛阳 此处代指吴佩孚，时据洛阳。

3 溥泉 张继（1882—1947），原名溥，字溥泉，河北沧县人。1903 年与陈独秀一起在沪编《国民日报》。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16 年反袁斗争中及回国后与李大钊有交往。此时，作为孙中山的代表与中共联系，其后走向

反共。

- 4 伯兰 孙洪伊(1872—1935)，字伯兰，天津人。清末立宪运动中的主要领袖人物之一，后由民主党、进步党转而加入国民党，在反袁与护法等斗争中起过一定作用。
- 5 《努力》 指《努力周报》，1922年5月7日在北京创刊，胡适主编。对陈炯明曾倾向偏袒，对孙中山则又有所批评。1923年10月停刊。
- 6 去洛返京 信中预定的行程，后有改变。于9月8日到洛阳，11日返京。

致 周 起 明

- 1 题解 武汉寒假讲演会于1923年2月1日开始，应邀参加讲演的除李大钊外，尚有王抚五、张仲琳、麦克乐、朱希祖四位教授。李大钊在武汉高等师范学校讲《进步的历史观》，共3讲，其他4位主要在中华大学讲课。2月4日，李大钊还应邀在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讲女权运动的潮流与性质。此信应写于该年的寒假之前，大约为1922年的12月。周作人（启明）与爱罗先珂这次都没有到武汉去。
- 2 胡小石 时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主任，1949年后，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致 锡 五

- 1 题解 此信未署日期，原件为李大钊亲笔书写的真迹，由北大图书馆研究员王世儒从北大历史档案中发现。《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2月26日在《公告》栏内曾登出《新嘉坡南洋华侨中学校聘请教员的预约》，北大毕业生多人应聘。1923年1月24日，《日刊》又刊出《校长办公室启事》：“王其新、王春培、杨兴栋三君请注意：南洋中学聘（请）教员之川资已汇到，请足下于本日下午二时，亲到本室与秘书李守常（大钊）先生商洽前往为要”。但因有变故，三君未按时赴约。此时，正好李有湖北之行，所以只好嘱锡五代办了。李大钊1922年12月曾致函周起明，告之“武汉高师胡小石先生”来信说：“寒假中，当地教员会拟组织一学术讲演会”，“嘱转请起明及爱罗先珂先生”同去。李在信中说明，他已决定去湖北；1923年2月4日，李确实应湖北女权运动同盟的邀请，作了一次演讲（李在湖北的学术活动，详见《致

周起明》题解)。依据以上史料可以判定:《致锡五》的写作日期,当在李大钊 1922 年 12 月 5 日任校长室秘书以后,赴湖北讲学离京以前,即 1923 年 1 月下旬。

- 2 锡五 即谷源瑞(1892—1955),字锡五。山东威海人。1918 年毕业于北大本科哲学系,时任北大助教兼教务处秘书。
- 3 两位教员 一位是王培春,一位是曹奇山。据北大教务处 1923 年 1 月 31 日拟的致南洋中学公函称:“贵校前托蔡校长聘定之教员三人……,有两人已就他聘,只余原定之英文、化学教员王培春君”。“知需人甚急,乃更商请曹奇山担任数学、物理,已得曹君承诺。当即请王、曹两君刻日起程前来”。

致 胡 适

- 1 题解 此信未署日期。信封上邮戳为 1923 年 9 月 7 日,地址为寄自北京石附马后闸三十五号,署名李守常。胡适的收信地址为浙江西湖烟霞洞。
- 2 前者路过上海 1923 年 6 月 12 日至 20 日,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李大钊赴会与返京均路过上海。此处系指返京途中。
- 3 以已去杭未遇 1923 年 1 月 1 日起,胡适向北京大学请病假一年。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载:“六月,先生因患痔瘤,又从上海到烟霞洞养病。”10 月 4 日下山,5 日到上海,共住了 3 个多月。按此推算,胡适去杭州烟霞洞的时间约为 6 月 20 日前后,故李大钊由广州返抵上海时未遇。

致 胡 适

- 1 题解 此信未署日期。继前信之后,其时约在 1923 年 10 月中下旬。

致张溥泉、汪精卫并附剑云函

- 1 《致张溥石、汪精卫》函,是杨天石先生发现的。此件原为国民党原上海环龙路档案。原件中另有给剑云的信一通。信是经邮局寄出的。信封上写的收、发信人及地址为:“上海法界望志路永吉里八号,崔震华先生;北京石附马后闸三十五号李寿昌寄”。封面左上角北京邮局打印的邮戳发信日期为:“2.1.24”,即 1924 年 1 月 2 日。杨天石先生将此文献以《国共合作的历

史文献——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为题,发表于2003年出版的《百年潮》。

- 2 剑云 杨天石考定:剑云即崔震华,字嘶云,一字剑云。河北庆云(今属山东)人。原为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学生,毕业后在北京、保定等地从事反清活动。1912年8月与张继(即张溥石)结婚。
- 3 谭克敬 字时钦,贵州平越人。1896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国民党员。
- 4 许宝驹 字昂若,浙江杭州人。1899年生。北京大学国文系学生。国民党员。
- 5 不记其名的另一位天津代表 据杨天石考证,是陈镜湖。陈字印潭,辽宁建平人。与韩麟符、于方舟同为直隶第一中学学生,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22年考入南开大学文科班。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经李大钊介绍,与韩麟符、于方舟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后,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
- 6 王君 据杨天石考证,“应为王用宾。山西临猗人。1881年生。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山西支部长。辛亥革命后,任国民党山西支部副部长。1920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不久,被委任为北方特派员,1922年,任国民党山西支部筹备处长。他与刘斐训、刘景新同为山西省出席国民党“一大”的指定代表。从附言中谈及的“推选代表”未经“共同选举,此事尚有问题”云云,可见,山西的国民党党务在李大钊的主管范围之内。

致梁瑞麟、吴亚男夫妇

- 1 麻解 此信未署日期。信云“由粤归来”,当是指李大钊于1924年1月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后返沪的时间。又据考,“苏州”是指“苏州轮”。该轮由上海启航赴粤的时间是1924年1月10日,李大钊乘火车离开北京的时间是1月5日。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京、津、鲁、武汉、上海、浙江等地的代表均同乘此轮。故李大钊写此信的时间,应是1924年1月10日,地点在上海。

致韦青云

- 1 麻解 青云,即韦青云,原北京高师学生,北京市学联领导人之一,时任职

外交部。国民军第二军，建于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时驻河南。原军长胡景翼，1925年4月于开封逝世后，由岳维峻继任，李大钊于7月曾赴开封对岳进行工作。写此信的时间应为1925年10月19日，而不应是1926年（1989年文集（续）注）10月19日。因此时国民二军已处于四面受敌、走向衰败的形势，已不可能有此举。

给某同志的信

- 1 此信及同年3月2日《给某同志的信》、4月10日《致加拉罕》电，均是俄罗斯学者潘佐夫教授发现并提供的。原件为英文。三份文献是潘佐夫的祖父格里高里·鲍里索维奇·爱伦堡所长期珍藏的私人档案。爱伦堡先生1902年生于伊尔库斯克，1923年，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派他到中国和外蒙古工作。他曾在苏驻华代表处（后改为驻华使馆）工作过，和加拉罕大使共事。1927年回国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任职，1928年在共产国际中国研究所作事，其后到莫斯科大学任教。
- 2 某同志 此信无收件人姓名。译者参考其他资料分析，估计是写给当时苏驻华大使J. M. 加拉罕的，确凿与否，尚待考订。
- 3 傅恩祖 傅等三同志的姓名均从英文音译。这三位同志的情况不详。

致某同志的信

- 1 此信由俄罗斯学者潘佐夫先生发现并提供，详见1926年2月1日《致某同志的信》的注释。原件为英文，没有收件人。原件上方写有俄文“Партийчайка в Китае”（在华支部）的字样。译者估计是指苏联驻华使馆内的苏共党支部。
- 2 雷丁 译者估计是赵世炎，待考。

致加拉罕

- 1 此电同为潘佐夫教授发现并提供。详见前注。原件为英文。加拉罕即当时苏联驻华大使J. M. 加拉罕。李大钊的署名，原为英文“T. C. Li”。

致 存 哥

I 此信及《致二哥》均由方行先生提供。原件未署年份及月日。写信日期尚无法确定，暂收于此。

致 二 哥

I 原件无日期，写信日期尚无法确定，暂收录于此。

联合署名

图书委员会致校长之报告书(一)(二)

—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

I 李大钊经章士钊先生推荐，于1917年11月中旬到北京大学任职，1918年1月任图书馆主任。1919年10月21日，校评议会议决的《评议会选举法》规定，评议会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综合全校教授总数互选五分之一”，二是“加入教务长、庶务主任、图书馆主任、仪器室主任，但无表决权”。根据这一规定，李大钊应是1919年11月25日组成的校评议会的评议员之一，但无表决权；同年12月8日，蔡元培校长在《北京大学日刊》公布，委任图书部主任李大钊为校总务委员会6位总务委员之一，12月11日又在日刊公布，指任李大钊为图书委员和学生自治委员；1920年6月22日，校评议会派李大钊加入“修改职员（教职员统称）待遇章程委员会”，任委员；1920年7月8日校评议会特别会议全体议决：“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同年7月23日，文牍课发出请“李大钊先生为本校教授聘书”。同年10月1日，注册部在《北大日刊》发出通告：“李大钊先生担任史学系唯物史观研究，自来周（开）始授课”，当年11月，他又担任本科政治学系教授，后又任本科经济学系教授；1920年10月14日，《北大日刊》发布校长《蔡元培启事》，宣布1920年度到1921年度校评议会选举结果，李大钊当选为本届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并继续被校长指任为校总务委员会和图书委员会委员。此后在1921年、1922年和1923年连续3届的校评议会换届选举中，他连续当选，并连

续被指任为总务委员会委员、图书委员会委员(此职 1923 年由新任图书馆主任皮宗石接替),1923 年度至 1924 年度改任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长;1922 年 12 月 2 日,李大钊在《北大日刊》发表“已辞图书主任职务”的《辞职启事》,事隔三日,12 月 5 日,日刊发表《校长办公室通告》:“请李守常教授担任”“校长室秘书职务”。李大钊任这一职务近两年,直至 1924 年 10 月 7 日“因事告假出京”。另据 1925 年 2 月,蒋梦麟给蔡元培的信中说:“守常已回京,仍任校长秘书”。由此看来,李大钊 1925 年时,仍是校长室秘书。(以上史实均见 1918 年至 1924 年《北京大学日刊》《北大职员录》及《北大评议会议事录》。其原件均存北大档案馆)。

- 2 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五年间,为推进图书馆的建设,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图书馆,作了多方面的工作。他不仅从理论上,对学校图书馆的性质、功能及作用,对图书馆工作的内部管理机制、图书编目学、图书流通等方面进行了颇为系统的研究和理论阐述,并且从工作实际出发,吸收西方图书管理经验,为北大图书馆总结、制定了不少基础性的制度、章程和运行管理规则。这篇经图书委员会议决的《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仅是保存下来的重要文献之一。刘复教授在《对于改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意见》一文中说:他为改革图书馆的工作,“上任后,没有一天不是很诚恳,很刻苦的想法改良,而且还曾开过几次会议”,征询“研究藏书学”的教员的意见,“帮他设法改良”。据《北京大学日刊》记载下来的史料,足以证明刘复教授所言不妄。1920 年前后,李大钊征询改革图书馆意见的工作,不仅用开座谈会的方法,而且用通讯的方法广为求教,并将有见地的意见或文章交北大日刊发表。如 1920 年 7 月 28 日及其后,日刊连续发表了刘复教授的长文《对于改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意见》;9 月 15 日又发表了顾颉刚先生撰的《重编中文书目的办法》;11 月 27 日,日刊发表了《丁绪宝自芝加哥致图书部主任函》和张西曼的《扩充俄文图书之意见书》;同年 10 月 23 日、11 月 20 日以及 1921 年 1 月 20 日、2 月 5 日、10 月 13 日,日刊继续发表了袁同礼从国外写来的《致蒋梦麟、李守常两先生函》及《致蔡校长》、李守常等等的多封来信,介绍欧美各国图书馆现状,出版现状、图书馆协会业务交流情况,并提议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建立联系、交流书目等等。由此可见,李大钊倡导推动改革图书馆,使之适应于近代大学教育、科学研

究的需要，成为先进文化、先进思想的交流基地的思想与实践，得到了师生的广泛支持与关注。

修正教员待遇章程委员会报告

- 1 此报告在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北京大学评议会上被通过，同时会议议决如下：“扩张原有修正职员待遇章程委员会，加入：蒋梦麟、郑寿仁、李辛白、李大钊、沈士远五位。”

中俄交涉破裂后各团体态度

- 1 1924年2月16日，北京大学四十七名教授致函顾维钧，要求恢复中俄邦交。后北洋政府派王正廷与苏俄代表加拉罕谈判，中途谈判破裂。1924年3月22日北京大学四十七名教授再次致函顾维钧。此文无署名，但从内容看，系1924年2月16日致函的继续。

主张抵制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成立

——李大钊、于树德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帅府园会议上的发言（节录）

- 1 这是李大钊、于树德3月10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抵制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办法时的发言。这次会议通过了下述提议：“中央执行委员会移京之后，因无武力可借，不能发生强制效力。一般党员已不受执行委员会之支配。危险情形，不堪设想……不如将中央执行委员会移会广州，将来全国执行委员会，仍在广州举行，俾有所凭藉，易于支配”。

附 录 注 释

守常交来的报告（之一）

——全国学生运动状况

- 1 这份报告是原共产国际收存的中文手稿原件。在其扉页上写有“Доклад ом шу Чжмай”（即守常交来的报告）。扉页的左上角标有“12、III、1924”。

收在全宗 514 号中的“报告”共有四份：《全国学生运动状况》、《全国国民运动状况》、《全国劳动运动状况》及《中国北部劳动运动概况》。前三份文献无署名，均用《政治生活周报》的稿纸以毛笔书写。第四份文件是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名义写的，报告首页上除盖有北方分部的印章外，还盖有“书记张农”的圆形印章。这四份文件的档案页码编号是连续的。前三份文献，虽无署名，但档案上却明确注明是“守常交来的报告”。尽管如此，我们尚不宜匆忙确定就是李大钊的手稿，故暂作附录收入之，供大家作进一步的研究、考订。这几份文献现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守常交来的报告(之三)

——全国劳动运动状况

1 2 “广州”与“北方铁路工人运动”两个小标题，原件未标出，是我们整理、编辑时加上去的。

北方军事政治状况 ——十月一日北京通信

1 麻解 本篇署名柏军，当系北方区军事通讯之意，亦属北方区代称。

2 张之江 参见《守常政治报告》注②。

3 李协和 李烈钧(1882—1946)，字协和，江西武宁人。1904 年留学日本。1907 年加入同盟会。1913 年“二次革命”中任七省讨袁联军总司令。1917 年护法斗争中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总长。在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时在国民军中参与军机。

4 张垣 即张家口，时为西北军督办署亦即国民军总部所在地。

5 库伦 即今之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

6 唐某 指唐锐良，时任国民军外事处处长，在京活动。

7 韩、石投降晋军 韩指韩复榘，石指石友三，都为国民一军中师长。南口战役失败向西退却过程中，向拦截的晋军投降，住包头一带。冯玉祥回国后，由冯赴包头进行工作，重回国民军。

8 将张兆钾、孔繁锦部完全肃清 张兆钾，原甘肃陇东镇守使；孔繁锦，原陇

南镇守使。西安被围困时，吴佩孚委任张为援甘总司令，孔为副司令，嗾使他们于1926年5月向已进甘的国民军进攻，刘郁芬、蒋鸿遇在兰州与之相持一个多月。6月下旬，郑大章、吉鸿昌等援军赶到，实行反攻。8月19日，张维玺师克天水；8月30日，孙良诚师克平凉。张、孔窜逃。

- 9 九月中会师咸阳，解西安之围 国民联军第五军方振武部与援陕总司令孙良诚部会师咸阳的时间为11月23日，而不是9月中。11月27日，解西安之围。
- 10 邓宝珊 生于1894年，卒于1968年，甘肃秦州（今天水）人。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发动伊犁起义。后在陕西参加领导讨袁战争、护法战争。1924年任国民二军第十师师长。五原誓师后，任二军军长、国民联军援陕副总指挥，1927年1月任驻陕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抗战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与中共合作。1948年底作为傅作义代表与中共和谈。建国后，曾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 11 于珍 生于1888年，辽宁铁岭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26年9月代替王怀庆任北京卫戍司令。12月，任安国军援豫总司令。1927年又任援鄂军前敌总指挥。9月被晋军所俘。
- 12 穆春 时任奉军第十四师师长，攻占多伦时扰民残民。1926年9月10日，被张学良拿办，对团以下违纪军官，分别处死或遣散。

北方政治情形与天津会议

——北京通信

- 1 题解 1926年11月6日，北伐军攻克南昌。11日，蒋介石在九江举行军事会议，决定赣事由朱培德主持，今后对浙、皖取急进方针。11月12日，张作霖在天津召开奉系军事会议。次日，张宗昌及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商震之代表应邀到津。15日，正式开始天津会议。决定张宗昌援孙传芳，褚玉璞援吴，但孙、吴不请则决不出动。另请阎援刘镇华，商改编绥西之国民军，力如不逮，奉即派骑兵协助。18日，孙传芳微服由宁亲自抵津求援。20日，会议进一步决定：张宗昌率直鲁军15万南下，进兵江西；孙传芳保守江苏、浙江；张学良守京畿；渤海舰队、东北舰队亦南下参战。张作霖任北方

军队统帅。11月22日，杨宇霆应张作霖之召由奉抵津，孙传芳拜服道歉，并称愿将东南奉还给杨。杨对出兵力主谨慎从事。张宗昌是日返济南下援孙动员令。天津会议暂结束。12月1日，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天津会议继续举行。仍决定孙传芳守长江前线；张宗昌在江北作后盾；韩麟春率17军入豫援吴；热河汤玉玺、察哈尔高维岳协助阎防包绥国民军。12月6日，孙传芳表示迎张宗昌率直鲁军过江。吴佩孚则反对奉军入豫。

本篇署名列武，其音与李大钊化名猎夫相近。亦是北方区的军事通讯。

- 2 请吴率其亲信军队攻陕 1926年11月27日国民军解西安之围。12月6日，吴佩孚在郑州开军事会议，决定联奉反攻，派田维勤为援陕全军总司令，张治公为前敌总指挥，但实际无进展，其部下主要力量拥靳云鹗起而与入豫奉军对抗。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李大钊全集 第5卷 (最新注释本)

作者 =

页数 = 561

S S 号 = 11560592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